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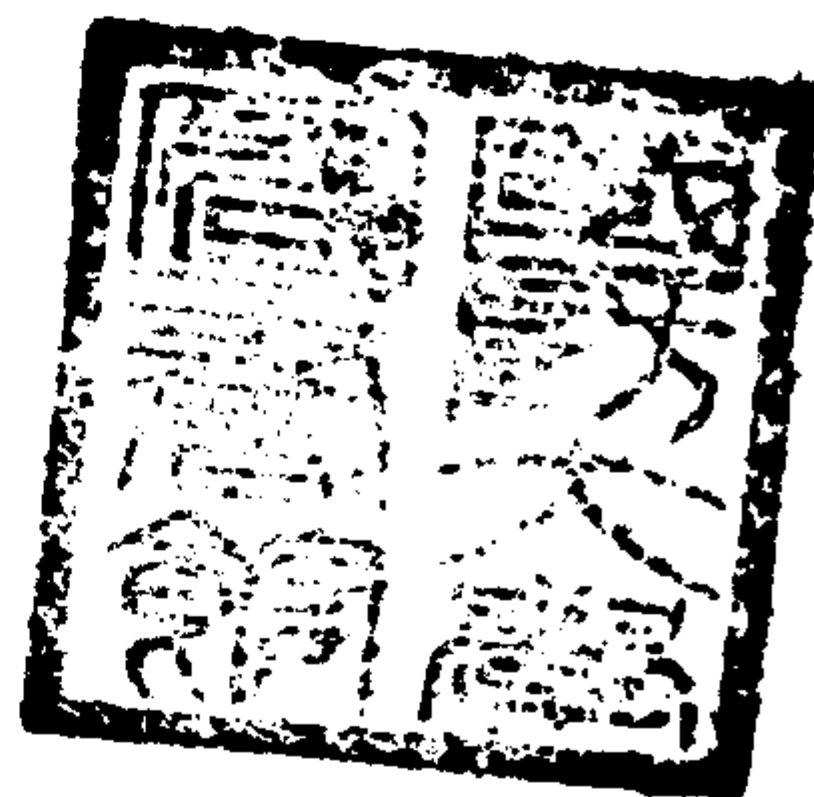


毛泽东哲学思想教程

主 编
宋一秀 商孝才

副 主 编
金邦秋 陆云彬 康绍周
李海平 杨保仁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序

马克思、恩格斯曾说：“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所有这些体系都是以本国过去的整个发展为基础的，是以阶级关系的历史形式及其政治的、道德的、哲学的以及其他的成果为基础的。”^①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的具体内容也是这样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它是一定历史时代需要的产物，是马列主义同中国现代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并且是以中国过去的整个发展，以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特点，以中国阶级关系的历史形式及其政治的、道德的、哲学的种种成果为基础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正如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把中国长期革命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作了理论概括，形成了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的指导思想，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哲学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哲学基础和活的灵魂，它贯穿于毛泽东思想的各个组成部分之中。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中国的土壤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是党和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的最本质的特征，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44页。

体实践相结合的经验概括和总结。这一方面说明毛泽东哲学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直接继承，其基本原理是一脉相承的，同源于一阶级的思想体系，因此任何想把二者割裂开来的企图都是完全错误的；另一方面，又说明毛泽东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丰富和发展，带有自己的特殊性，因此任何否定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历史发展性的说法也是完全错误的。从这一本质特征出发，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基本特点还有多方面的表现。

从内容上看，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特点，在于它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运用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全部活动，形成了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丰富和发展，主要是指对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从理论上作出科学的回答和系统的阐述。这就是：根据实践的发展，创造性地提出新概念、新思想、新理论，解决实践提出的新问题，如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中国式的武装夺取政权的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两类社会矛盾的学说，等等；根据实践的需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进一步解释和发挥，并加以系统化，如《实践论》、《矛盾论》等等；根据实践的特点，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运用于新领域，提出新领域的新理论，如毛泽东军事辩证法、党的建设辩证法、统一战线辩证法、社会主义建设辩证法、思想政治工作的辩证法、国际斗争的辩证法、唯物辩证的工作方法，等等。所有这些毛泽东哲学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丰富和发展的范例。

从形式上看，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特点，在于它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具有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带有浓郁的中国化的色彩。这是因为，毛泽东哲学思想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继承和发展，不仅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经验的哲学总结，而且还批判地改造和吸收了中国传统哲学的优秀遗产，即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中的精华，并

且运用中国古代文化典籍和民间成语故事来阐明深刻的哲理。这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独具的特色。

从社会作用看，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特点，在于它要求哲学指导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和理论问题，把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紧密地结合起来，使哲学真正成为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锐利武器。毛泽东历来重视哲学的普及工作，多次号召哲学要从课堂上和书斋中解放出来，用通俗的语言讲解深刻的哲理，把它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他一贯坚持世界观和方法论统一的原则，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化为具体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创立了思想方法论的完整的体系。

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学习和研究，近十年来在我国理论界、学术界引起了越来越广泛的重视。从1981年以来，全国召开过四届毛泽东哲学思想学术讨论会，不少省市也分别举行过多次学术讨论会。全国和部分省市先后相继成立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会，全国和各省市的社会科学院不少设有专门的研究室，创办了两份专门研究毛泽东思想及其哲学理论的刊物，各综合大学、师范院校和各级党校陆续开设了毛泽东哲学思想课程，学术界出版和发表了大量关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著作和论文。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学习和研究，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欣欣向荣、色彩缤纷的局面呢？这是由时代的发展和实践的需要所决定的。

首先，这是正确理解和评价毛泽东哲学思想的需要。过去在一段时期里，对毛泽东思想及其哲学理论，存在过两种错误倾向。一是由于教条主义和个人迷信的影响，出现过把毛泽东思想教条化、绝对化的倾向。特别是由于林彪、“四人帮”的歪曲篡改、任意肢解、无限拔高，把毛泽东思想及其哲学理论，糟蹋得面目全非，遗害不浅。粉碎“四人帮”之后，又出现了“两个凡是”的思想。二是在解放思想过程中，有少数人曾出现过信仰危机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倾向。他们怀疑、动摇、任意贬低以至全盘否定

毛泽东思想及其哲学理论。这种对毛泽东思想任意拔高或任意贬低的倾向，都是错误的，都会给革命和建设事业带来损失。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历史决议》，科学地评价了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的历史功绩，阐明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基本内容和特点，及其在毛泽东思想中的历史地位，为我们学习和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其次，这是坚持和发展毛泽东哲学思想的需要。对毛泽东哲学思想，一要坚持，二要发展。不坚持就谈不上发展，不发展也难于长期坚持。在坚持中发展，在发展中坚持，这是辩证的统一。在实践中坚持，又在实践中发展，这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真理发展规律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真理的发展也只有通过实践。我们一定要努力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去认真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才能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邓小平说：“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①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把毛泽东哲学思想推向前进，是我们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根本态度，也是我们不可推卸的职责。

第三，这是加强“两个文明”特别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我们要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集中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的最重要的保证。毛泽东哲学思想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仍然是指导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包括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不可替代的哲学基础。因此，发挥它作为哲学的独特功能在改革、开放、搞活中的作用，即充分发挥

^①《邓小平文选》，第133页。

它的认识功能、改造功能、预测功能的作用，对于揭示改革的规律性，实施改革的方案，预测改革的进程，训练科学思维能力，培养有理想、有文化、有道德、有纪律的一代新人，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马克思说：“哲学家的成长并不像雨后的春笋，他们是自己的时代、自己的人民的产物，人民最精致、最珍贵和看不见的精髓都集中在哲学思想里^①。”他还说：“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文明的活的灵魂”。^②哲学发展史表明，任何一种哲学思想都是一定时代政治经济发展的产物，是一定时代自然、社会和思维矛盾运动的概括和总结。在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毛泽东哲学思想正是“人民的产物”、“真正的哲学”，集中了人民最珍贵的精髓，反映了时代精神的精华。

中华民族是具有悠久历史和富于辩证思维的民族，其优秀的哲学传统源远流长，影响既深且广。但在中国历史上，从来还没有一种哲学理论像毛泽东哲学思想那样，对中国社会的变革，对中国历史的发展，对人类社会的贡献，发挥过如此巨大的作用。所以能如此，因为它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但是，正如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个开放系统一样，毛泽东哲学思想也是一个开放的系统，而不是封闭的僵化的系统。它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它过去是、今后仍将是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的。早在60年代初，毛泽东在一次关于读书的谈话中指出：“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提出了一系列的新问题，如果单有《实践论》、《矛盾论》，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这就明确地给我们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新的任务。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进行了拨乱反正、全面改

①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20、121页。

革，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突破了社会主义的僵化模式，形成了一系列的新思想、新观点，实践了毛泽东提出的要求。这不仅恢复了毛泽东思想及其哲学应有的权威，而且使毛泽东哲学思想获得了新发展。时代的发展和实践的需要，要求我们必须具有多学科的知识 and 高度综合的能力，才能把毛泽东哲学思想不断推向前进。应当说，它的主要历史篇章，不应局限于过去，而应着眼于未来。我们相信，不久的将来，人们将会看到毛泽东哲学思想更加光辉灿烂的新篇章。

毛泽东哲学思想是一门科学，有它自己的科学体系。对于如何来表述它的体系，目前学术界尚在探讨中。本书所采取的体系，是笔者历年来的一种思考，力图突破哲学原理四大块的框架，以实事求是为核心、为灵魂，贯串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各个组成部分，既阐明它的基本原理，又阐明它在各个领域的多方面展开，并揭示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以此来建构它的科学体系，力求反映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特色。

笔者学识粗浅，承蒙编著者邀请委以主编本书的重任，帮助拟定编写提纲，在全书初步统稿后，又读了全部书稿，并尽绵薄之力，最后为书稿作了补充、修改和审定。多年来，笔者就想以本书的体系写一本这方面的书，但由于承担了国家的重点科研项目，时间和精力有限，故一直未能动笔。因此，本书的撰写出版，在一定程度上了却了笔者的这桩心愿。这一课题的完成是与商孝才、金邦秋同志的积极组织以及全体作者的通力协作分不开的，他们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当笔者最后改定这部书稿的时候，窗外响起了喜迎龙年的爆竹声声，心中充满着兴奋和喜悦！

宋一秀

1988年2月17日 凌晨

于北京大学畅春园

编者说明

《毛泽东哲学思想教程》是由(以笔划为序)上海市委党校、上海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北师大、安徽师大、汉中师院、东北师大、西南师大、华东师大、陕西师大、复旦大学、南开大学等十二所院校部分从事毛泽东哲学思想教学和教研工作的教师、研究人员集体编写,供各类高等院校师生使用的教材。这本教材对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和内容作了新的探索。在体系上,本书把“实事求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作为总论,贯串全书,把毛泽东哲学思想基本原理各个部分有机地联系起来,形成一个比较严密的科学体系;在内容上除总论外,分为十七章,系统论述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基础知识和基本原理,及其在各个领域中的运用和展开,体现了毛泽东哲学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我们党的集体智慧的结晶;此外,本书还阐发了毛泽东哲学思想在新的历史时期的丰富和发展。本教材适用范围较广,各高等院校、党校以及各种类型的政治学校和干部读书班都可选用;对社会科学研究单位也有参考价值。

本书由北京大学宋一秀和华东师大商孝才主编,各章撰稿者:宋一秀(序言)、商孝才(总论、第十四、十七章、结束语)、复旦大学金邦秋(第一、十五、十六章)、陕西师大康绍周、裴大洋(第二章)、北师大杨保仁(第三章)、华东师大胡秉同(第四章)、西南师大李渤川(第五章)、上海社会科学院陆云彬(第六章)、南开大学王春年(第七、九章)、东北师大田克勤(第八章)、上海市委党校李海平(第十章)、安徽师大汤文曙(第十一章)、华东师大

张锡岭(第十二章)、汉中师院叶孟理(第十三章)。

全书由(以姓氏笔划为序)李海平、杨保仁、陆云彬、金邦秋、康绍周、商孝才统稿和初步定稿。东北师大薛文华、西南师大柳文超、安徽师大方永祥参加部分统稿。最后,由宋一秀修改和审定。商孝才、金邦秋主持全书编写的组织工作。

在编写过程中,我们得到了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领导同志的关怀和支持,得到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领导同志的支持和指导。此外,我们还参阅和吸收了近年来毛泽东思想研究方面有价值的成果。在此一并表示诚挚的谢意!

毛泽东哲学思想作为一门科学,有些问题在哲学界还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尚待进一步探讨。由于我们的学识和水平有限,本书中的缺点和错误在所难免。我们诚恳希望读者提出意见,以便我们今后把本书修改得更好一些。

编 者

1988年1月

目 录

编者说明	1
序	1
总 论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	1
第一节 实事求是与中国革命	2
一 “实事求是”涵义的新的科学规定	2
二 坚持还是背离实事求是，是中 国 革命和建设兴衰成败的关 键	5
第二节 实事求是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根本点	7
一 实事求是与哲学基本问题	8
二 实事求是与实践唯物论	9
三 实事求是与矛盾辩证法	10
四 实事求是与科学认识论	11
五 实事求是与群众路线、独立自主	12
第三节 实事求是是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的核心	13
一 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基本方面的内在联系	14
二 只有坚持实事求是，才能勇于坚持真理	18
第一章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23
第一节 毛泽东哲学思想产生的客观条件	23
一 毛泽东哲学思想产生的时代特点	23
二 毛泽东哲学思想产生的阶级基础	25
三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理论来源	28
第二节 毛泽东哲学思想产生的主观条件	32
一 毛泽东在第一师范时期的哲学思想	32
二 青年毛泽东世界观的转变	39
三 毛泽东世界观转变过程的基本特点	45

第三节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历史发展·····	48
一	毛泽东哲学思想在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从萌芽、形成到系统化·····	48
二	毛泽东哲学思想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丰富和全面发展·····	51
三	毛泽东哲学思想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初期的进一步发展·····	53
四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曲折发展·····	54
五	毛泽东哲学思想在新时期的运用和发展·····	55
第二章	主观和客观相符合·····	57
第一节	一切从实际出发·····	57
一	一切从实际出发,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唯物论的基石·····	57
二	客观实际,是存在于头脑以外的一切事物·····	59
三	一切从实际出发,就是要从中国的国情出发·····	61
第二节	坚持调查研究·····	63
一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63
二	调查研究必须有正确的态度和科学的方法·····	66
三	时时了解社会情况,时时进行社会调查·····	69
第三节	发扬自觉的能动性·····	71
一	自觉能动性是人类独有的特点·····	71
二	自觉能动性和客观规律性·····	75
三	自觉能动性在一定条件下的主要的决定的作用·····	77
四	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为发扬自觉能动性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79
第四节	反对主观主义·····	80
一	主观主义是实际工作中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表现形态·····	80
二	主观主义是一种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	82
三	反对主观主义是一项长期的任务·····	85
第三章	认识和实践相统一·····	88
第一节	实践是认识的基础·····	88

一	实践的科学含义和基本特点	88
二	实践的基本形式及其相互关系	89
三	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92
四	从实践论的观点,阐明了天才问题的理论	95
第二节	认识的辩证过程	97
一	认识过程的两次飞跃	97
二	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	101
三	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	104
第三节	通过实践发现、证实和发展真理	106
一	在实践中不断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	106
二	真理同谬误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	109
三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112
四	改造主观世界同改造客观世界的关系	113
第四章	矛盾普遍性与矛盾特殊性相联结	115
第一节	唯物辩证法的核心与矛盾的普遍性	115
一	矛盾规律是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	115
二	坚持矛盾的普遍性,发扬彻底的辩证法	121
第二节	矛盾特殊性理论的系统阐发	124
一	矛盾特殊性的学说	124
二	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的理论	128
第三节	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事物矛盾问题的精 髓	133
一	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辩证关系	133
二	关于事物矛盾问题的精髓	136
第五章	矛盾的同性和斗争性相结合	141
第一节	矛盾的根本属性	141
一	矛盾的同一性	141
二	矛盾的斗争性	145
三	一切事物矛盾关系的实质	147
第二节	矛盾运动的内在机制	150

一	同一性的有条件性	150
二	斗争性的无条件性	153
三	一切事物矛盾运动的源泉	155
第六章	唯物辩证的范畴论	159
第一节	范畴的综合性特征	159
一	什么是范畴的综合性特征	160
二	范畴的综合性特征的客观依据	161
三	范畴综合性特征的意义	162
第二节	范畴之间的内在联系	164
一	本质是一个最根本的核心范畴	164
二	范畴是以本质为中心的相互联系的系统	167
三	坚持范畴内在联系的意义	170
第三节	范畴的成对系列	172
一	本质与现象	172
二	主流与支流	174
三	内容与形式	176
四	可能与现实	180
五	必然与自由	183
第七章	唯物辩证的自然观	189
第一节	自然界的辩证发展	189
一	自然界一切都在运动变化发展中	189
二	自然界的存在和发展是对立统一的	192
三	自然界物质的无限性和无限可分性	194
第二节	自然科学的辩证发展	197
一	自然科学同生产实践的关系	198
二	自然科学同阶级斗争的关系	201
三	自然科学同哲学的关系	204
四	我国自然科学发展的方针和道路	207
第八章	唯物辩证的工作方法论	210
第一节	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体	210

一	世界观和方法论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210
二	提高领导艺术,讲究工作方法·····	211
第二节	分析和综合相结合的方法·····	214
一	分析和综合必须是客观的、全面的·····	214
二	分析与综合相结合的具体方法·····	216
第三节	一般和个别相结合的方法·····	218
一	一般和个别相结合与党的群众路线·····	218
二	一般与个别相结合的具体方法·····	220
第四节	民主和集中相结合的方法·····	221
一	民主和集中及其关系·····	221
二	民主和集中相结合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	222
三	实现民主和集中相结合的方法·····	224
第五节	统一性和独立性相结合的方法·····	226
一	统一性和独立性及其关系·····	226
二	统一性和独立性相结合与独立自主原则·····	227
三	统一性和独立性相结合的具体方针、方法·····	229
第九章	社会基本矛盾和两类社会矛盾·····	231
第一节	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	231
一	社会基本矛盾理论的历史发展·····	231
二	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内容和特点·····	235
三	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解决方法·····	239
第二节	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	240
一	社会主义社会两类社会矛盾理论的提出和发展·····	240
二	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我国政治生活的主题·····	244
三	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方针和方法·····	247
第三节	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	251
一	社会主义社会在一定范围内还存在着阶级斗争·····	251
二	两类社会矛盾和阶级斗争·····	253
三	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特点·····	255
第十章	领导与群众相结合·····	258

第一节	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258
一	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	258
二	群众观点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	260
三	正确把握领袖和群众的辩证关系	262
第二节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264
一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正确依靠和领导群众的科学方法	265
二	坚持群众路线,必须采用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的方法	268
三	民主集中制是保证正确依靠和领导群众的有效手段	270
四	把群众路线与群众运动区别开来	271
第三节	共产党的路线,就是人民的路线	271
一	实行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具体方法	272
二	坚持领导和群众相结合,必须反对不正之风	276
三	坚持领导和群众相结合,必须反对官僚主义	277
第十一章	党的建设的辩证法	279
第一节	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	279
一	党的思想建设	280
二	党的组织建设	281
三	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的关系	284
第二节	党内团结和党内斗争	285
一	党内团结和党内斗争的辩证统一	285
二	开展两条战线斗争,防止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	289
三	对犯错误的同志应采取分析态度	292
第三节	党内矛盾的根源和实质	294
一	党内矛盾的根源	294
二	党内矛盾的实质	298
第十二章	统一战线的辩证法	301
第一节	社会的主要矛盾与统一战线中各种社会势力的相互关系	301

一	社会主要矛盾决定着统一战线的任务和内部结构·····	301
二	一条战线,两种联盟·····	304
三	一个目标,民族团结·····	306
四	一党领导,多党合作·····	309
五	一个国家,两种制度·····	312
第二节	统一战线的策略原则的辩证法·····	313
一	又联合又斗争的原则·····	314
二	既统一又独立的原则·····	316
三	具体分析、区别对待的原则·····	318
第十三章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辩证法·····	321
第一节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与客观经济规律·····	321
一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必须从中国国情出发·····	321
二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必须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	323
第二节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与各种经济关系·····	330
一	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	330
二	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	332
三	国家、集体和个人·····	334
四	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	336
五	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	337
第三节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与人的主观因素·····	339
一	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	339
二	自力更生和学习外国·····	340
三	革命精神和科学态度·····	343
第十四章	思想政治工作的辩证法·····	346
第一节	破和立的统一·····	346
一	先破后立·····	346
二	先立后破·····	348
三	破和立的统一·····	349
第二节	政治和经济的统一·····	350
一	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	350

二	思想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	352
三	政治和经济的统一·····	355
第三节	红与专的统一·····	356
一	红与专的科学含义·····	357
二	红与专的统一·····	358
三	又红又专——知识分子成长的必由之路·····	359
第四节	理想教育要科学化和具体化·····	361
一	理想是现实与未来的统一·····	361
二	用科学方法向人们灌输马克思主义理论是理想教育的一条重要原则·····	365
三	关心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理想教育工作的出发点·····	367
第十五章	军事辩证法·····	370
第一节	唯物辩证的战争观·····	370
一	战争与政治·····	370
二	战争与革命·····	372
三	战争与经济·····	374
第二节	战争的客观规律性和人的自觉能动性·····	376
一	研究战争规律要着眼其特点和发展·····	376
二	战争的主观指导要符合于客观实际·····	379
三	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是人不是物·····	380
四	主动性、灵活性和计划性·····	383
第三节	人民战争战略战术的辩证法·····	387
一	全局与局部·····	387
二	进攻与防御·····	389
三	集中与分散·····	391
四	持久与速决·····	392
五	内线与外线·····	393
六	游击战与正规战·····	394
七	运动战与阵地战·····	396
八	歼灭战与消耗战·····	397

第十六章 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贡献	400
第一节 周恩来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贡献	400
一 注重调查研究,坚持实事求是	400
二 在革命实践中运用辩证法,丰富辩证法思想	403
三 坚持群众观点,密切联系群众	411
第二节 刘少奇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贡献	413
一 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实践观	413
二 反对实际工作中的唯心论和形而上学	416
三 加强党的思想建设,注意共产党员的思想修养	420
四 关于两类社会矛盾的学说	423
第三节 朱德对毛泽东军事辩证法的贡献	426
一 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的用兵新法	426
二 军事上辩证的“结合”方法	428
三 民族的、人民的、民主的建军原则	433
第十七章 毛泽东哲学思想在新时期的运用和发展	436
第一节 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恢复和发展	436
一 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	436
二 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新发展	438
第二节 体制改革与社会基本矛盾	445
一 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发展的客观要求	445
二 深入开展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	448
三 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的新发展	450
第三节 建设社会主义民主	452
一 社会主义民主的科学含义	453
二 社会主义民主的基本特点	454
第四节 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457
一 精神文明的科学含义	457
二 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的辩证关系	458
三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461
结束语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历史地位	466

总 论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

毛泽东哲学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经验的哲学概括，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

在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丰富内容中，有一个一以贯之的精神，这就是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根本体现，是贯穿于毛泽东思想各个组成部分的活的灵魂，是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长期艰苦斗争中，逐步形成的根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路线及其一切言行的准则。邓小平同志指出：“毛泽东同志在延安为中央党校题词，就是‘实事求是’四个大字，这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①马克思曾说过：“哲学家的成长并不像雨后的春笋，他们是自己的时代、自己的人民的产物，人民最精致、最珍贵和看不见的精髓都集中在哲学思想里”。^②实事求是，正是“人民的产物”，集中了人民最精致、最珍贵的精髓，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因此，坚持实事求是这一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无论对于我们学习和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还是对人们的社会实践活动，都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① 《邓小平文选》，第6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20页。

第一节 实事求是与中国革命

我们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和建设六十多年来的战斗历程，清楚地告诉我们：革命事业的胜利或失败、成功或挫折、前进或后退，都是同坚持实事求是，还是背离实事求是这一思想原则紧密相联的。

一、“实事求是”涵义的新的科学规定

“实事求是”一词源出于《汉书·河间献王传》，原文是“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唐人颜师古注解：“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也”。它的原意是说在研究学问的时候，要根据事实材料，求索其真相，引出结论。毛泽东把“实事求是”这个古老的思想命题，作了新的科学规定，他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①经过这样的解释，就赋予了它崭新的涵义，从而使它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命题。

毛泽东对实事求是原则的概括和解释，有一个历史过程。他从开始参加革命活动起，就非常重视了解实际情况，注意调查研究。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在湖南农村作了深入调查之后，写出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一报告是实事求是的一个典范。在1929年12月古田会议上，他为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写了《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其中专门批判了主观主义问题，教育党员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以代替主观主义的分析和估量。“使党员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由此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和工作的方法，使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478页。

同志们知道离开了实际情况的调查，就要堕入空想和盲动的深坑”。^① 1930年5月，毛泽东写了《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提出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②的著名论断。

在土地革命战争前期，毛泽东做过许多详细调查，并写出了一系列调查报告。1931年1月，他在《兴国调查》前言中说：“实际政策的决定，一定要根据具体情况，坐在房子里面想象的东西，和看到的粗枝大叶的书面报告上写着的东西，决不是具体的情况。倘若根据‘想当然’或不合实际的报告来决定政策，那是危险的。过去红色区域弄出了许多错误，都是党的指导与实际情况不符合的原故。所以详细的科学的实际调查，乃非常之必需”。^③ 毛泽东在1931年4月2日发出的《总政治部关于调查人口和土地状况的通知》中，强调要“更具体地以铁的事实来解答我们现在许多问题”，进一步提出“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④。

在长征到达陕北后，毛泽东于1936年12月写作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接着于1937年7、8月间写作了《实践论》、《矛盾论》等哲学专著，为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奠定了理论基础。

早在30年代末，毛泽东就明确地使用了“实事求是”的概念，提出科学的态度是“实事求是”。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发表了许多文章和讲话，系统地阐述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他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第一次对实事求是作了科学的解释。他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经过这样的阐释，“实事求是”就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之一。1942年开始的全党整风运动，就是一次实事求是的思想教育运动。1942年毛泽东给延安中央党校作了“实事求是”的题词。1945年他又为“七

①② 《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第33、48页。

③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182—183页。

④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12、13页。

大纪念册”作了“实事求是，力戒空谈”的题词，号召全党实事求是地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

在解放战争时期，面临复杂的客观情况，毛泽东又强调指出：“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一切共产党员所必须牢牢记住的最基本的工作方法。我们所犯的错误，研究其发生的原因，都是由于我们离开了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主观地决定自己的工作方针”。^①

在社会主义时期，毛泽东一再教育全党，要保持和发扬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他的《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是这个时期系统地论述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代表作。1961年，毛泽东在党的八届九中全会上提出，“搞一个实事求是年”，并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从以上可以看出，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毛泽东对实事求是的内容作过许多解释和发挥，使这个原则不断得到丰富、发展和完善。

我们党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如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他们不仅是实事求是的楷模，而且对实事求是的意义作过许多精辟的阐释。邓小平明确提出，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根本点”，他还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为中央党校题了‘实事求是’四个大字，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这四个字”^②。陈云提出了“不唯上、不唯书、要唯实”的原则，他要求“讲实事求是，先要把‘事实’搞清楚”。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指出：实事求是，就是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这是党中央在新的历史时期，对实事求是所作的完整的概括和科学的解释。

总之，“实事求是”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是毛泽东哲学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03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121页。

思想的根本点，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实质。

二、坚持还是背离实事求是，是中国革命和建设兴衰成败的关键

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实事求是是中国革命经验的哲学概括。中国革命实践证明，在党的指导思想中，是否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这是革命和建设兴衰成败的关键。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六十多年历史里，有过三次大的历史性转变。

第一次历史性转变，是由北伐战争的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的兴起。我们党在北伐战争的初期和中期，采取了符合革命斗争形势的路线和政策，和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实行合作，积极参加了军事斗争，放手发动群众，开展了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领导和推动了北伐的胜利进行。可是，在这次革命战争的后期，当时党的主要领导人陈独秀，抛弃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无视中国和世界发展着的社会矛盾和阶级关系，采取了压制群众的方针，放弃了领导权，面对蒋介石、汪精卫的叛变，一味妥协投降。结果，使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归于失败，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人民惨遭杀害。经过失败，得到了惨痛的教训，于是有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等大小二百多次的武装起义，进入了创建红军的新时期，创立了井冈山、海陆丰、赣东北、洪湖和湘鄂等革命根据地，找到了符合中国革命实际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开创了土地革命战争的新局面。

第二次历史性的转变，是由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到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在土地革命战争中，我们有了以井冈山为中心的许多块革命根据地，红军发展到三十万人。但是，这时，党的领导权却被王明等教条主义者所把持，他们把马列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离开中国的实际情况，提出并推行了一条“左”倾冒险主义的路线，最后导致第五次反

“围剿”的失败，红军不得不举行二万五千里长征。中国革命丧失了除陕甘边区以外的一切根据地，使红军由三十万减少到三万人，使中国共产党由三十万党员降到只有四万党员，而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党组织几乎被破坏殆尽。总之，受到了一次极大的历史性的惩罚。血的教训唤醒了全党，尤其是党的高级领导人。1935年1月，党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教训，清算了“左”倾教条主义的军事路线，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从此，中国革命走上了正确的轨道。1935年长征到达陕北后，党制定和实行了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正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促成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推动了全国抗战。八路军、新四军开赴敌后，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战争的新局面。在延安整风之后，1945年4月到6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总结了历史经验，制定了正确的纲领和路线，团结了全党，革命事业更加迅速发展。在抗战胜利后，人民解放战争不到四年，便推翻了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取得了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人民共和国。

第三次历史性转变，是由“文化大革命”的破产，到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兴起。建国以后，我们顺利地完成了土地改革、剿匪反霸、镇压反革命和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接着又胜利地实现了社会主义改造，并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但是，1958年的“大跃进”，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内乱，使社会主义事业遭受到巨大损失。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以后，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由于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提出了改革、开放、搞活的基本方针，开创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从而使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的三次历史性转变，说明我们党具有无限生命力。但是，为什么党所领导的革命事业会走着“之”

字形的道路呢？其原因是多种多样的，而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党的指导思想是否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实事求是地回答和解决中国革命一系列的基本问题，即是否遵循实事求是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原则。1953年春，毛泽东找薄一波谈话时，回顾了以往的历史，意味深长地说：1942年全党整风，才真正找到了一条根本的指导原则，也可以说是中国革命胜利的道路，这就是主观和客观相一致。这就是说，经过二十来年，我们党“才找到主观与客观相一致这个中国革命胜利的道路”。^①我们的一切胜利和成就，都是同党的指导思想上确立了实事求是原则分不开的，而一切错误都是在指导思想上离开了实事求是的缘故。不仅民主革命的胜利和失败是如此，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成就和挫折也是如此。“大跃进”的挫折，就是因为盲目冒进，急于求成，违背了客观经济发展规律。“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是对中国的阶级斗争和政治形势作了违反客观实际的错误估计，因而是非不分，敌我混淆，造成了大量的冤假错案，给党的事业带来了灾难性的损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从中国国情出发，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建设具体实践密切结合所得出的基本结论。所以，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的高度概括和哲学总结，是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无价之宝。

三次历史性伟大转变的事实充分说明，实事求是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革命和建设兴衰成败的关键。

第二节 实事求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根本点

毛泽东对“实事求是”所作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解释，集中体现

^① 薄一波：《崇敬与怀念》，1981年7月3日《人民日报》。

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的高度统一。邓小平说：“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① 还说：“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② 这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高度概括和总结。因此，坚持实事求是，就是坚持唯物论、辩证法和反映论；背离实事求是，就必然抛弃唯物论、辩证法和反映论。

在我党历史上，不论是犯右倾或“左”倾错误的同志，在理论上一一般都承认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承认事物的运动、变化和发展，但在实际工作中却往往从主观出发、从本本出发，而不是从实际出发、从客观出发，表现为理论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亦即实际工作中的唯心主义。因此，坚持实事求是还是背离实事求是，实际上就成为我们党内部唯物论和唯心论、辩证法和形而上学斗争的焦点。

一、实事求是与哲学基本问题

实事求是作为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它体现了彻底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同马克思主义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唯物主义的解决是一致的。恩格斯曾经指出：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这一问题包括思维和存在谁是第一性、谁是第二性，以及思维和存在有没有同一性两个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从世界本原问题上对哲学基本问题作了科学的解决，建立了彻底唯物主义的哲学。唯物主义哲学要求对具体事物的了解，必须如实地反映客观事物的本来面目。毛泽东所提出的实事求是，正是坚持了这一唯物主义的原则。实事求是不仅肯定了客观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而且肯定了客观事物及其规律是可以认识的。实事求是的基本精神就是人们在认识和改造

^{①②} 《邓小平文选》，第109、133页。

世界的过程中，必须从实际出发，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探索客观规律，按客观规律办事，使主观指导符合客观实际。

实事求是这一命题，把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无产阶级政党的实际工作联系起来，进一步说明了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在实事求是的内涵中，客观存在不是一般的物质，而是国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是工作对象，工作的条件，群众的实践和需要等等；思维也不是一般的意识，而是对客观事物内部规律的认识，是指导我们行动的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计划、方案、办法等等。因此，实事求是不仅是一般的哲学命题，它还是总结我们党几十年的斗争经验，把人们在实际工作中所遇到的主观和客观的关系问题，提到哲学的高度加以概括，揭示出哲学原理同人们日常工作的内在联系，使一般哲学原理成为人们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思想武器。所以，实事求是体现了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体现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鲜明特色。

二、实事求是与实践唯物论

实事求是是中国化的实践唯物论。实事求是，就是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就是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它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论中国化的表述，它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基本原则。第一，实事求是肯定了客观世界（“实事”）及其变化发展规律（“是”）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是人的认识对象和出发点。第二，实事求是肯定了客观事物及其规律是完全可以认识的，不然就否定了去研究（“求”）的必要和可能，就会滑入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第三，实事求是要求人们发挥主观能动性去掌握客观规律，能动地改造世界。它正确地解决了主观能动性和客观规律性的关系问题。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相统一的高度，解决了精神和物质、思维 and 存在、主观和客观的关系问题，从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唯物论思想。

三、实事求是与矛盾辩证法

实事求是原则是矛盾问题精髓的体现，是分析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根本方法。唯物论和辩证法是从不同侧面研究客观物质世界，唯物主义着重说明世界的物质性和客观性；辩证法着重说明客观物质世界的普遍联系和矛盾发展。毛泽东对唯物辩证法的最重要的贡献，就是系统地阐明了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分析了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共性和个性的关系，并指出这是事物矛盾问题的精髓。而实事求是正是这个精髓的体现。因为，第一，客观世界由于内在矛盾的作用，总是不断运动、变化和发展的，这就要求人们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不断研究发展和变化着的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每一个革命者，能否正视事物的变化和发展，能否防止思想僵化、善于使自己的主观认识随着客观实际的发展而发展，能否从客观事物的矛盾运动中把握客观实际，是能否做到实事求是的关键所在。第二，物质世界是多样性的统一。对每一客观事物及其运动形式的认识，不但要注意它和其他各种运动形式的共同点，更重要的是注意认识它和其他运动形式相区别的特殊点，分析和认识每一事物的矛盾特殊性。只有从实际出发，分析具体事物所处的条件及其特点，才能把共性和个性统一起来，才能找到解决矛盾的方法。

客观实际是千差万别的，又是千变万化的。实事求是的基本要求之一，就是要认识和掌握这些差别和变化，即认识它的矛盾多样性，找出其规律性，按照具体的时间、地点和条件认识问题、解决矛盾。毛泽东正是从矛盾特殊性角度，阐明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个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具体分析，就是要求客观地、全面地、发展地看问题，反对主观性、片面性、表面性，这是实事求是的根本要求。毛泽东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阐明了共性和个性关系，阐明了矛盾特殊性的理论，从而使具体情况具体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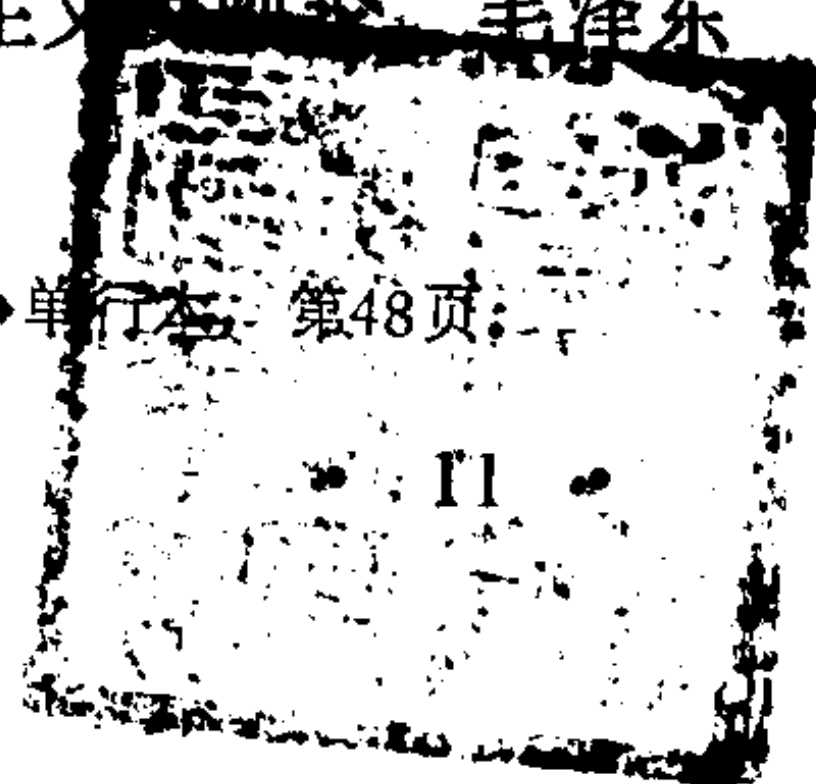
析的思想系统化和理论化，这是对实事求是原则的深刻发挥，指明了实事求是与矛盾辩证法的一致性。

四、实事求是与科学认识论

实事求是反映和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主要内容和要求。毛泽东关于认识论思想的基本观点，是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他认为，人的认识是在实践基础上不断从物质到精神、从精神到物质的辩证发展过程，人们将实践中获得的正确认识，转过来为实践服务，去指导人们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人们要获得正确的认识，达到改造客观世界的预期目的，必须发扬符合客观实际的自觉能动性，坚决反对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相分裂的主观主义，坚持理论和实践、主观和客观、知与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而这个统一的集中体现，就是“实事求是”。因为离开实事求是，在认识论上就会导致主观和客观相分裂，认识和实践相脱离的“左”的或右的错误倾向，从而陷入唯心论或机械论的泥坑。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在论述“实事求是”问题时指出：“毛泽东同志着重阐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是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特别强调充分发扬根据和符合客观实际的自觉的能动性。他以社会实践为基础，全面地系统地论述了辩证唯物主义关于认识的源泉、认识的发展过程、认识的目的、真理的标准的理论；指出正确认识的形成和发展，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多次的反复；指出真理是同谬误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真理是不可穷尽的，认识的是非即认识是否符合客观实际，最终只能通过社会实践来解决”。^①这就把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有机地结合起来，说明坚持实事求是，就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反映论。毛泽东

^①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单行本，第48页。



所阐述的能动反映论的整个内容，都贯串着实事求是的精神。

五、实事求是与群众路线、独立自主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指出：“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是贯串于上述各个组成部分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它们有三个基本方面，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我们党把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这三点明确地规定为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这在我们党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这是阐述毛泽东思想的新发展，当然也是论述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新进展，它无疑也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活的灵魂。这更加深刻地说明，实事求是原则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根本点，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

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这三个方面之间有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而最根本的、最核心的东西，还是实事求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是有机的统一。

党的群众路线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是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要一切为了人民群众，一切依靠人民群众；二是唯物辩证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两个方面，都离不开实事求是。我们实事求是地看待历史，就要老老实实地承认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要坚定地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相信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的。至于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也是以实事求是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在党的实际工作中的具体运用。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同党的群众路线是相辅相成的。坚持实事求是的根本途径，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在一定意义上说来，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就是从人民群众的实际需要和思想觉悟程度出发。超过了群众的实际就是“左”，落后于群众的实际就是右。可见，坚持实事求是的过程，实质上就是走群众路线的过程，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过程。两者是相互辉映、相得益彰的。

独立自主，是说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的力量进行革命和建设。当然，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并不是说不要外援和拒绝向外国学习。但是，争取外国的援助和向外国学习，也必须从中国的国情和实际需要出发。独立自主和学习外国的关系，在哲学上说，就是内因与外因、根据与条件的关系，二者既相反又相成，既对立又统一，我们决不能把独立自主与对外开放绝对对立起来。但如果离开实事求是的原则，独立自主和对外开放就是一句空话。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决议》指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从中国实际出发，依靠群众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必然结论。”

由此可见，实事求是原则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和最根本的特点，它渗透和体现在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各个方面，是贯穿于毛泽东哲学思想各个组成部分的根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它体现了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和历史唯物论的高度统一，体现毛泽东哲学思想所具有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特色，以及它所富有的独创性。

第三节 实事求是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的核心

邓小平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同志用中国语言概括为‘实事求是’四个大字。”^① 党的十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中规定：“党的思想路线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② 紧接着说：“全党必须依据这条思想路线，科学地总结历史经验，调查研究实际情况，解决国内和国际事务中提出的新问题，反对一切‘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③

① 《邓小平文选》，第242页。

②③ 《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81—82页。

这里，不但指明了实事求是是党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的核心，而且阐明了共产党人只有坚持实事求是，才能勇于坚持真理。

一、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基本方面的内在联系

毛泽东创立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也分别论述了思想路线的基本内容，但他没有把这些基本方面完整地有机地统一起来，并赋予它明确的思想路线的规定。在新时期，我们党对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所作的完整的科学的新论断，在我党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从而丰富和发展了党的思想路线和基本内容，并得到了充分的论证和展开。

（一）“一切从实际出发”

一切从实际出发是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前提条件。就是说，只有一切从实际出发，才能真正做到实事求是。

毛泽东把尊重规律、尊重事实的思想，概括为“从实际出发”。他说，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叫我们看问题不要从抽象的定义出发，而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从分析这些事实中找出方针、政策、办法来。

在新时期，我们党坚持和阐发了毛泽东提倡的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并明确规定“一切从实际出发”作为党的思想路线的重要内容。邓小平指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违背，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一定要和实际相结合，要分析研究实际情况，解决实际问题。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一切共产党员所必须牢牢记住的最基本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①在这里，邓小平阐明了如果不从实际出发，而从主观出发，实事求是就会成为一句空话。从而揭示了从实际出发

^① 《邓小平文选》，第109页。

和实事求是不可分割的有机统一，阐明了一切从实际出发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前提条件。

（二）“理论联系实际”

理论联系实际是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必然要求。毛泽东总结了中国革命的丰富经验，对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作了精辟的论述。他把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规定为中国共产党的三大作风之一，向全党提出了“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任务。他明确指出，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他说，不应当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当作教条看待，而应当看作行动的指南。他强调说，理论联系实际的态度，“就是有的放矢的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①

我们党在重新确立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中，进一步发挥和深化了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十二大通过的新党章，明确把“理论联系实际”规定为党的思想路线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并说明理论联系实际也是实事求是的必然要求。理论和实践的统一是在发展过程中逐步实现的。实践表明，从实际出发揭示客观事物的规律性，需要有正确的理论指导；而理论只有深入实际才能获得生命，不断丰富和发展。如果没有正确的理论指导，从实际出发就有可能陷入片面性、表面性和盲目性，就不可能做到实事求是；反之，如果把理论当作万古不变的教条，不顾及实际的发展，理论就会成为空中楼阁，也就无所谓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因此，邓小平把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统一起来进行论述。他说：“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今后，在一切工作中要真正坚持实事求是，就必须继续解放思想。”^② 他还说：“解放思想，就是要运用马列主义、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59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23页。

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① 这就指明了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和坚持马克思主义是统一的，从而说明了理论联系实际是党的思想路线的必然要求。

(三)“实事求是”

实事求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核心。实事求是的思想蕴含着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践是真理的标准的内在因素。

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精神实质，就是要按照客观事物的本来面目及其内在规律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早在30年代初，毛泽东就提出了“在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和僵化地按“既定办法”的思想路线的对立。在《实践论》中，他揭示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运动的总规律，《实践论》实质上就是实事求是论。在延安整风中，他把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简明扼要地表述为“实事求是”四个大字。在60年代，他进一步指出人们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的多次反复才能形成，从而阐明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实质。

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党重新确立和发挥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明确地把“实事求是”放在党的思想路线的核心地位。邓小平指出：“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② 他进一步指出，我们说的做的究竟能不能解决问题，问题解决得是否正确，关键在于我们是否能够理论联系实际，是否善于总结经验，针对客观现实，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这就是要实事求是地揭示客观事物的内在本质及其发展规律。为此，他精辟地指出：“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这是唯物主义。不然，我们开会就只能讲空话，不能解决任何问题。”^③ 这是对党的思想路线的唯

① 《邓小平文选》，第165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121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109页。

物论基础最明确的表述，阐明了实事求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核心。

(四)“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是党的思想路线的重要基石。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毛泽东的一贯思想，从30年代、40年代到60年代都反复进行过论述。在1963年11月18日，他在修改《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线——五评苏共中央公开信》一文时，又亲自加上了“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发展史上关于真理“唯一标准”的最明确的表述。这就阐明了党的思想路线的实践基础，从而指明了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也就是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基石。

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党把“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规定为党的思想路线至关重要的内容，不仅恢复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应有的权威，而且指明了实践是真理标准问题的重大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邓小平曾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他还说，思想路线不是小问题，这是确定政治路线的基础，正确的政治路线能不能贯彻实行，关键是思想路线对不对头。所以，不要小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争论，这场争论意义太大了，它的实质就在于是不是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就精辟地阐述了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的统一，发挥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思想，尖锐地批评了“两个凡是”的错误。邓小平强调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①这就把是否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提到了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提到了社会主

^① 《邓小平文选》，第133页。

义现代化成功与失败的高度。这是对真理的实践标准的理论的丰富和发展，进一步阐明了实践标准是党的思想路线的重要基石。

我们党在新时期所概括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的基本点，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这四个方面既各有侧重，又互相贯通、互相补充，而最核心的是实事求是。邓小平指出：“过去我们搞革命所取得的一切胜利，是靠实事求是；现在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靠实事求是。”^①他还说：“违反毛泽东同志实事求是的思想，违反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实际上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反映。”^②在这里，邓小平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阐明了实事求是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路线的核心。

二、只有坚持实事求是，才能勇于坚持真理

实事求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根本点，是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的核心。因此，我们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就是坚持唯物论、辩证法、反映论和唯物史观，这样才能在实践中坚持真理，发挥真理和发展真理。

1945年4月，刘少奇在《对中央妇委同志的讲话》中指出：“任何指导方针，都要实事求是。”^③而“坚持实事求是，必须有高度的革命精神、革命勇气才能做到。”^④1962年1月27日，刘少奇《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再次指出：“要实事求是还要有勇气，没有勇气，就不敢实事求是。”^⑤又说：“在这里，对于那些被迫说假话的人，对于这种软弱的人，应该说几句话。毛泽东同志以前说过：为了坚持真理，为了实事求是，为了说老实话，应该有‘五不怕’，这就是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不怕老

①② 《邓小平文选》第133，123页。

③④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07、313页。

⑤ 《刘少奇选集》下卷，第438页。

婆离婚、(毛泽东：这是对男的说，对女的说是不怕老公离婚。)、不怕坐牢、不怕杀头。准备了这‘五不怕’，什么话也敢讲，就敢于实事求是，敢于坚持真理。刚才不是讲实事求是要有勇气吗？要有什么勇气呢？就是要有这‘五不怕’。有了这‘五不怕’，还有什么可怕的事情呢？因此，应该说老实话。坚持实事求是，就是坚持真理。”^①毛泽东和刘少奇在长期的革命实践活动中，反复强调这个问题，是对我们党血和泪的深刻教训的总结。

在一般的情况下，在对待简单的问题上，坚持实事求是并不十分困难。难就难在特殊的情况下，也能不折不扣地坚持实事求是。比如，在取得伟大胜利的情况下，人们称颂赞扬，自己沾沾自喜，陶醉于胜利，把功劳归于自己，骄傲起来，对人对事的处理，就往往难于实事求是了；在失败的情形下，或者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容易被失败和困难压倒，灰心丧气，悲观失望，只见黑暗，不见光明，不能实事求是地分析客观形势；在某种社会潮流面前，缺乏清醒的头脑，容易随波逐流；在错误路线下，一时认识不清，积极去推行，就会自觉不自觉地离开实事求是原则；在权势很大的时候，由于党性不强，往往容易趾高气扬，盛气凌人，甚至头脑发昏，忘乎所以；在上级领导压力下，明知不对，还不得不执行，也不敢如实反映情况，甚至瞒上欺下，弄虚作假，完全背离实事求是；在物质引诱面前，个人主义思想作祟，往往抵抗不住“糖衣炮弹”的攻击，干出伤天害理的事情，这就毫无实事求是可言了；客观事物的矛盾没有充分暴露，或事物的本质被假象所蒙蔽，这也难于完全做到实事求是，等等。这是真正做到实事求是客观上的困难。

坚持实事求是之难，还表现在主观上，这就是立场、观点和方法问题。客观的因素固然不能完全由人来左右，但是，如果能

^① 《刘少奇选集》下卷，第439—440页。

使自己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而又坚定，就可以在大多数情况下，做到承认实际，认识实际，照实际办事。即使一时情况不明，而出了差错，也能很快纠正。所以，坚持实事求是，关键在于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我们的正确立场，就是无产阶级的立场，人民的立场，对于共产党员来说，就是党的立场，坚持党和人民的最高利益，把它作为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为党的事业而奋斗。有了这样的立场，就能在任何情况下都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在权力很大的时候，就会看到权力是党和人民给的，保持清醒的头脑，以普通劳动者自居，平等待人。在遇到压力时，就会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为坚持实事求是而顽强地去斗争。相反，如果不站在党和人民立场上，而站在资产阶级的，或个人主义的立场上，一切以个人或小组的利益为转移，就不可能坚持实事求是。

坚持实事求是，除立场之外，还得有正确的观点和方法。观点和方法不正确，即使有了正确的立场，仍然有可能背离实事求是。比如有教条主义观点和方法的人，他就不是从实际出发，按照实际办事，而是从本本出发，照本本办事，这就难于做到实事求是。“两个凡是”盛行期间，大量冤假错案在很长一段时间不能平反，就是这个原因。因此，实事求是本身是立场、观点和方法的统一。无产阶级的、人民的或党的立场，就是实事求是的立场。而具有正确的观点和方法，对于坚持实事求是，也是十分重要的。

在民主革命时期，进步人士、共产党人坚持真理，宣传马列主义，往往受到打击和迫害，坚持实事求是要有勇气，敢于斗争，这是很自然的事情。这是追求真理、宣传真理的历史的必然。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还不可能在任何范围、任何时间里都畅通无阻。违背无产阶级立场的情况，受资本主义、封建主义腐朽思想侵蚀的情况，还会经常发生。

而当这种情况出现时，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就会抬头。比如，在“大跃进”的年代，有一些心术不正的人，“为了个人利益，有意造假，有意夸大成绩，有意封锁消息、扣留信件，有意对说老实话的人进行打击报复”^①，这就是证明。这种心术不正的人，不仅“大跃进”年代有，在“文化大革命”中更为突出，就是在今天的社会生活中，这种心术不正的人，也是存在的。为了实事求是，坚持真理，就要敢于同这种心术不正的人进行斗争，这仍然要有实事求是和坚持真理的革命精神和勇气。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仍然存在着各种复杂的社会矛盾和斗争。例如敌我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党内矛盾以及这些矛盾在各个领域的表现。这就需要正确区分和处理各种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这里要有实事求是的态度和维护真理的精神。但是人们往往把思想认识上的分歧与争执，把哲学上的矛盾斗争，同组织原则联系起来，对不同意见者采取组织手段。比如，在“大跃进”年代里，有些党组织，不容许党员提出不同的意见，对敢于提意见的人，随便说成是有思想问题，甚至指为“反党分子”；有的党组织，不容许党员在党的会议上，自由地切实地讨论工作问题和政策问题，不容许党员批评工作中的缺点，特别是批评党组织领导人的缺点；有些党组织，对于向上级反映真实情况的党员和干部，进行打击报复，“甚至审判和惩罚了敢于说真话、敢于坚持真理的党员。”^②这样，造成党内生活不正常，使得有的党员和干部，虽然了解情况，但不敢说老实话，怕说了真话受打击；有的党员和干部，怕说真话，承认错误，要作检讨，受批评，怕面子不好看，因而也不敢实事求是。实践表明，坚持实事求是，坚持真理仍然要有革命的精神和勇气。

总之，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毛泽东哲学

① 《刘少奇选集》下卷，第439页。

② 《刘少奇选集》下卷，第409页。

思想的根本点，是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的核心。实事求是的最根本的要求，就是为人处事要老老实实。我们应该是老老实实在地办事，讲老实话，做老实人。邓小平同志说：“我们一定要恢复和发扬毛主席为我们党树立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这是一个共产党员的起码标准。”^①这就是说，实事求是共产党人一切言行的准则。只有坚持实事求是，才能做到坚持真理和发展真理，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

^①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112页。

第一章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马克思说：“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文明的活的灵魂”。^①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产生决不是偶然的，它的产生有着历史的必然性，即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理论来源和历史条件。

第一节 毛泽东哲学思想产生的客观条件

一、毛泽东哲学思想产生的时代特点

任何一种哲学思想总是适应一定时代斗争实践的需要而产生的，伟大的时代必然产生伟大的哲学思想。我们研究哲学史上任何一种科学的哲学学说，都要从具体的历史条件出发，揭示时代的特点。

马克思和恩格斯所生活的时代，是资本主义处于上升时期。资本主义还处在自由竞争和相对平稳的发展阶段，这时无产阶级革命还处于准备时期。怎样使无产阶级由“自在的阶级”变成“自为的阶级”，这是时代向革命者提出的一个重大课题。马克思、恩格斯承担了历史的重任，他们批判地吸取了人类思想发展的优秀成果，总结了西欧各国工人运动的实践经验，为无产阶级创立了崭新的科学世界观——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21页。

列宁生活的时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进入了帝国主义阶段。资本主义已走向垄断阶段，资本主义世界各种矛盾进一步加深，阶级斗争日益尖锐化，革命浪潮逐步高涨，无产阶级革命已由准备时期进入直接实践时期。如何进行无产阶级革命，这是时代向革命者提出的一个新课题。列宁揭示了帝国主义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规律，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可以在一个国家首先取得胜利的理论，领导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取得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把马克思主义推向一个新的阶段。

毛泽东生活的时代，仍然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但是，十月革命的胜利，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发展的方向，开创了世界历史的新时期，十月革命大大促进了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解放事业，此时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民族民主革命已不再属于旧的资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而是属于新的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了。列宁对东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寄予无限的希望。列宁指出：“东方觉醒之后，现代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①，他还说：“斗争的结局归根到底取决于这一点：俄国、印度、中国等等构成世界人口的绝大多数。”^②毛泽东指出：十月革命后，“现在的世界，是处在革命和战争的新时代，是资本主义决然死灭和社会主义决然兴盛的时代”^③。可见，十月革命后，时代给革命者提出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如何进行革命这一崭新而重大课题，这是世界革命史上从未遇到的困难而又特殊的任务。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理论和实践上出色地完成了这一时代提出的困难而崇高的历史任务。

近代的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极端不平衡的半殖民地半

① 《列宁全集》第30卷，第137页。

② 《列宁全集》第33卷，第453—454页。

③ 《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第368页。

封建的东方大国，帝国主义世界的基本矛盾和中国社会内部的各种矛盾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成了世界东方各种矛盾的焦点。中国人民大众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矛盾，是中国近代社会的主要矛盾。这样，中国尖锐复杂的社会矛盾的存在以及中国人民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就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并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准备了社会条件。

十月革命胜利后，时代的另一个特点是社会主义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由理想变成了现实。历史和时代向马克思主义者提出了另一个重大的新课题，就是取得政权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如何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如何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本国具体实践相结合，认识本国社会的特殊性，揭示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找到本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从而将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艰苦的探索，走过了曲折的道路，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误的教训。今天，已初步找到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对科学社会主义作出了重要贡献。

总之，毛泽东哲学思想是在回答时代提出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无产阶级怎样进行民族民主革命，和夺取了政权的无产阶级怎样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这些新课题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二、毛泽东哲学思想产生的阶级基础

近代中国，自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社会阶级矛盾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中华民族和帝国主义的矛盾、人民大众和封建主义的矛盾，是中国近代社会的基本矛盾。因此，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国内封建统治者的斗争，成为中国近代革命斗争的主题。

鸦片战争以后，由于外国资本主义列强的侵入，逐步破坏了

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基础，给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造成了某些客观条件。早在19世纪中叶起，外国侵略者为了倾销商品和利用廉价劳动力，就纷纷在中国的香港、上海、广州、厦门等地开工厂、办企业，因而出现了中国的第一批产业工人。从19世纪60年代起，清朝政府的“洋务派”也开始办军事、开矿山，又出现了一批产业工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中国工矿企业的工人有六十多万人，加上海员、铁路等工人，已有一百多万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帝国主义各国忙于战争，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中国的民族工业进一步得到发展，到1919年，中国的产业工人已发展到二百多万人，主要集中在铁路、矿山、海运、纺织、造船等产业部门。

中国现代工业无产阶级是一个崭新的劳动阶级，它具有世界各国工人阶级的一般基本优点，即与最先进的经济形式相联系，富于组织性纪律性，没有私人占有的生产资料。同时，由于不同的历史条件，中国无产阶级又具有三个突出的优点：

“第一、中国无产阶级身受三种压迫（帝国主义的压迫、资产阶级的压迫、封建势力的压迫），而这些压迫的严重性和残酷性，是世界各民族中少见的；因此，他们在革命斗争中，比任何别的阶级来得坚决和彻底。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中国，没有欧洲那样的社会改良主义的经济基础，所以除极少数的工贼之外，整个阶级都是最革命的。

第二、中国无产阶级开始走上革命的舞台，就在本阶级的革命政党——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成为中国社会里比较最有觉悟的阶级。

第三、由于从破产农民出身的成份占多数，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的农民有一种天然的联系，便于他们和农民结成亲密的联盟。

因此，虽然中国无产阶级有其不可避免的弱点，例如人数较

少(和农民比较), 年龄较轻(和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比较), 文化水准较低(和资产阶级比较); 然而, 他们终究成为中国革命的最基本的动力。”^①

中国无产阶级从它诞生时起, 就勇敢地投入了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 我国工人阶级进行过多次罢工、起义, 并参加了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运动。其中, 著名的斗争有: 1858年香港两万多市政工人和搬运工人, 反对英、法侵略军占领广州的罢工斗争; 1906年安源煤矿六千多工人参加了同盟会在萍乡、浏阳、醴陵举行的起义; 1911年辛亥革命时, 川汉铁路筑路工人举行了暴动响应资产阶级反对清政府“铁路国有化”运动。同时, 还举行了多次的经济斗争, 如: 1913年北京邮政工人反对送信次数增多而举行罢工; 1914年上海招商局等三个轮船公司的工人, 为了一部分工人要求增加工资而举行总同盟罢工; 1916—1919年上海等地工人为增加工资而进行多次罢工斗争。在斗争中, 工人还秘密结社, 如哥老会、老君会、行会等, 但这些组织往往被买办商人和地痞流氓所操纵, 因而不可能引导工人阶级走向胜利的道路。在很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 工人阶级只是作为资产阶级的追随者参加革命斗争, 这些自发的斗争往往以失败告终。

1919年的五四运动是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影响下发生的。五四运动是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转折点, 它标志着中国工人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五四运动期间, 中国工人阶级开始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政治舞台, 显示出自己的战斗力量。这就清楚地表明, 虽然中国无产阶级人数不多, 但它是一个最先进、最革命、最有战斗力的阶级, 它完全有能力担负起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使命。五四运动, 一方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 第336页,

面加快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进程，另一方面，加速了中国无产阶级由自在阶级向自为阶级的转变。

中国无产阶级的成长壮大，为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产生奠定了阶级基础。

三、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理论来源

哲学是现实斗争的总结和升华，又是人类认识成果的继续和发展。恩格斯说：“每一个时代的哲学作为分工的一个特定的领域，都具有由它的先驱者传给它而它便由以出发的特定的思想资料作为前提。”^①任何一个哲学家，如果不从一定的思想资料出发，就不可能形成自己的哲学思想或哲学体系。同样，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产生、形成和发展也不例外。

（一）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继承和发展

毛泽东哲学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是继承和发展的关系，它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完全一致的同属于无产阶级的科学的世界观。这是因为：

第一，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哲学就逐渐成为指导中国革命的理论武器。毛泽东指出：“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②十月革命以后，特别是五四运动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广泛的传播。当时，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在宣传马克思主义中，开始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分析中国革命的问题。在传播马克思主义中，李大钊、陈独秀等人起了重要作用。李达、毛泽东、蔡和森、瞿秋白、周恩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85页。

②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677页。

来等，也都进行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工作。

第二，毛泽东一贯强调学习、宣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极端重要性。他曾说过，马克思主义有几门学问：马克思主义的哲学，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但基础的东西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东西没有学通，我们就没有共同的语言，没有共同的方法，扯了许多皮，还扯不清楚。有了辩证唯物论的思想，就省得许多事，也少犯许多错误。

在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方面，毛泽东为全党作了表率。他在领导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百忙中，仍十分重视学习、研究、运用和普及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延安时，他发愤读书，钻研哲学。他除了认真研读当时能搜集到的马列哲学著作外，还仔细阅读了苏联和中国哲学工作者写的哲学教科书和小册子以及其他哲学著作，从中得益甚多。如：1936年11月至1937年4月，他曾详细地阅读了苏联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第三版）^①，并写了近一万二千字的批注。在批注中，他联系中国革命的实际，批判了“中国的主观主义者”、“中国的教条主义者”、“延安的形式主义者”。为了推动干部学哲学，他还提议成立新哲学会，号召大家积极学习马克思主义新哲学。毛泽东还亲自组织了学哲学小组，讨论时不拘形式，自由漫谈，各抒己见，甚有成效。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他多次劝同志们学哲学，学习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反对各种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他强调指出：全党都要学习辩证法，提倡照辩证法办事；全党都要注意思想理论工作，建立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队伍，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和宣传；进行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教育，等等。

第三，毛泽东哲学思想，不论就其基本内容和体系，就其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根本点，还是就其基本原理以及基本范畴来说，

^① 西洛可夫、爱森堡等合著，李达、雷仲坚合译，上海笔耕堂书店，1935年6月版。

都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一脉相承。就是说，无论以实践为基础的认识论，以矛盾规律为核心的辩证法，还是以社会基本矛盾、两类矛盾和群众路线为主要内容的历史唯物论，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的继续和发展。

总之，毛泽东及其战友从来没有想要创立一个独立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外的哲学体系，相反，他们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忠实的继承者和捍卫者。当然，马克思主义决不是一成不变的僵死的教条，而是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的科学。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忠实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但又不迷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本”。他们在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

（二）对中国哲学遗产的改造和吸收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直接理论来源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时，他也十分重视我国的文化遗产，并善于把马克思主义的内容和中国的民族形式紧密结合起来，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毛泽东指出：“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①又说：“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②他主张废除洋八股，反对唱空调，“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③。周恩来说：“毛主席开始很喜欢读古书，现在做文章、讲话常常运用历史经验教训，运用得最熟练。读古书使他的知识更广更博，更增加了他的伟大。”^④的确，毛泽东对先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第287页。

②③ 《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第288页。

④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333页。

秦哲学，楚辞汉赋、唐宋古文，宋明理学，清代学术和历代史实等，都有相当精湛的造诣。从而使他能运用自如地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中国的民族形式、作风和气派紧密结合起来。

第一，运用中国传统哲学的概念和范畴，并赋予新的内容和涵义，来阐述唯物论和辩证法的基本思想，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欧洲式为中国式。如“实事求是”、“形而上学”、“矛盾”、“同”、“异”、“一分为二”等，都是我国古代思想家提出的重要哲学范畴，毛泽东进行了改造，赋予了新的涵义。

第二，对中国哲学史上关于知行关系论争的总结。

《实践论》副标题就是“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对中国哲学史上知行关系问题进行了科学的概括，揭示了知行关系就是认识和实践的关系，阐明了知和行的辩证统一，正确地解决了知行问题与历史观相统一的问题，从而在理论内容上对我国古代的知行观加以改造，全面地阐述了以实践为基础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

第三，对中国古典哲学中朴素辩证法的改造和吸收。

中国历史上的辩证思维传统，源远流长。特别是在儒家、道家和兵家的学说，如《周易》、《道德经》和《孙子》等名著中，都蕴含着丰富的朴素辩证法思想。毛泽东在文章、讲话和报告中，经常引用中国古典哲学、历史文献和成语典故里的朴素辩证法思想。例如，在《矛盾论》中，他引用老子《道德经》中“相反相成”的名句，并阐明了这一命题的科学含义，指明对立面之间的互相依存、互相转化的重要性，特别强调转化的条件性。他在论述矛盾特殊性时，引用了孙子的“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和《水浒》上宋公明三打祝家庄的故事，以说明分析矛盾时切忌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等等。

这样，毛泽东通过对中国古代哲学遗产的批判总结，一方面把中国古代的辩证法和唯物论思想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阶段，另一

方面又把中国数千年来辩证法和唯物论的精华吸取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宝库中，丰富了唯物辩证法。这就使得他的哲学思想生动活泼，亲切易懂，具有鲜明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正因为如此，所以它能为广大干部和群众所喜爱，并容易掌握、理解和运用，成为革命群众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锐利的思想武器。

第二节 毛泽东哲学思想产生的主观条件

以毛泽东命名的毛泽东哲学思想毫无疑问是深深刻上了毛泽东本人的思想印记，它的产生和发展与毛泽东的主观条件、尤其是和他的世界观的形成和发展是分不开的。因此，要了解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内容和特点，首先探讨毛泽东早期世界观的形成过程是有必要的。毛泽东和同时代的其他马克思主义者一样，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进行了艰苦的探索，与时代一起前进，在思想上经历了一个从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从唯心主义到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转变过程。

一、毛泽东在第一师范时期的哲学思想

毛泽东 1913 年春至 1918 年夏在第一师范读书期间，社会上新旧两种势力和新文化运动内部革新与改良两种社会思潮的斗争十分激烈。在第一师范，毛泽东确立了革命民主主义的政治观念，他强烈地主张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这个时期，他广泛地阅读政治理论书籍，从孔孟、宋明理学到王船山等人；从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孙中山到陈独秀、李大钊；从赫胥黎的进化论、康德的二元论到 18、19 世纪欧洲的民主主义、空想社会主义以至托尔斯泰主义，他都有所接触和研究。正如他自己说的：“在这个时候，我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想的大杂烩。我憧憬‘十九世纪的民主’、乌托邦主

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但是我反对军阀和反对帝国主义是明确无疑的。”^①这一时期，毛泽东的哲学思想集中体现在《讲堂录》、《体育之研究》、《〈伦理学原理〉批语》等论文、札记、笔记和通信之中。它涉及到本体论、发展观、认识论、历史观和伦理观等各个方面，其基本特征是主观唯心论，经过二元论向唯物论转变。

（一）主观唯心论与心物二元论

到1910年秋，毛泽东基本上抛弃了原先的无我论而转向贵我论和唯我论，夸大了自我和精神的作用。他在1913—1914年所做的《讲堂录》中记述说：“重现在有两要义：一贵我（求己）（不责人），二通今，如读史必重近世以其与我有关也。”他还记录了孟子的话说：“体有贵贱，有小大，养其小者为小人，养其大者为大人。一个之我，小我也；宇宙之我，大我也；一个之我，肉体之我也；宇宙之我，精神之我也。”“我之界当扩而充之，是故宇宙一大我也。”这就是说，物质之我是小我，精神之我是大我，它是万物的主宰，按照精神之我行事才能成为大人。在1916年，他给黎锦熙的信中，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说：“世界之外有本体，血肉虽死，心灵不死。”1917年8月23日的信中，更加强调人心的作用。他认为：“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有不能为者乎？”但“动其心者，当具有大本大原”，这个“大本大原”就是“宇宙之真理”，也就是所谓“宇宙精神”。这一唯心主义思想，在1917年下半年至1918年上半年写的《〈伦理学原理〉批语》中表述得更彻底。他写道：“吾从前固主无我论，以为只有宇宙而无我，今知其不然。盖我即宇宙也。若除去我，即无宇宙；各我集合，而成宇宙。而各我又以我而存，苟无我，何有各我哉！是故，宇宙可尊者，唯我也；可畏者，唯我也；可服从者，唯我也。我以外无可尊，有之亦由我推之，我以外无可畏，有之

^① 斯诺：《西行漫记》，第125页。

亦由我推之，我以外无可服从，有之亦由我推之也。”还说：“个人有无上之价值，有百般之价值，使无个人(或个体)则无宇宙。故谓个人之价值大于宇宙之价值可也。”“世界固有人有物，然皆因我而有也。”显然，这是唯我论，是主观唯心主义的表现形态。此时，毛泽东所以强调自我精神的作用，是和他激进民主主义思想分不开的。在他看来，只有强调自我、认识真理、改造人心，才会有国家和民族的改造，这也体现了当时新文化运动重视个人精神和主张个性解放的潮流，带有时代的特征。

在五四运动前夕，毛泽东还没有接触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什么是宇宙的本原，是精神还是物质，没有得到科学的回答。这与他深受唯心主义思想的熏陶有密切关系。当时第一师范的老师杨昌济在讲授伦理学时，采用德国康德派哲学家泡尔生所著的《伦理学原理》作课本。毛泽东在《伦理学原理》一书中，曾写下了一万二千余字的批语，对宇宙本原问题反复表述过自己的意见，提出了“精神不灭，物质不灭”的命题。他说：“一人生死之言，本精神不灭、物质不灭为基础(精神物质非绝对相离之二物，其实即一物也，二者乃共存者也)。”又说：“吾人之死未死也，解散而已。凡自然物不灭，吾人固不灭也，不仅死为未死，且生亦系未生，团聚而已矣。由精神与物质之团聚而为人，及其衰老遂解散之。”这就是说，在青年毛泽东看来，人生是肉体与灵魂的团聚，并认定精神与物质“共存”。他还说：“宇宙亦终在同状之中，并无创作之力。精神不灭，物质不灭，即精神不生，物质不生，即不灭何有生乎？”这就进一步表明，他肯定世界上有物质与精神两种本原，深受康德心物二元论的影响，带有二元论的色彩。康德二元论的哲学，并不是科学的世界观。但对于当时的毛泽东说来别有一番新意。1950年，当毛泽东重新看到他作过批语的《伦理学原理》一书时，曾回忆说：“我们当时学的尽是一派唯心论，偶然看到像这本书上的唯物论的说法，虽然还不纯粹，还是心物二元论的哲学，

已经感到很深的趣味，得到了很大的启发，真使我心向往之了。”^①在一定意义上说，心物二元论是毛泽东从唯心论迈向唯物论的桥梁。

在第一师范，毛泽东除了攻读大量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外，还读了不少自然科学的书，并极为重视接触社会实际。1917年暑假，他曾和同学结伴步行近千里，从长沙动身，到宁乡、安化、益阳、沅江等五县进行社会考查，这对毛泽东世界观的发展有重要影响。在毛泽东早期的哲学思想中萌发了不少唯物主义思想。在《〈伦理学原理〉批语》中，他写道：“自然者，真也，实在也”，“凡自然法则者，有必然性”，“人类者自然物之一也，受自然法则之支配，有生必有死，即自然物有成必有毁之法则。”早在批语之前写作的《体育之研究》中，其唯物主义思想更为突出。他在谈到德智体三育的关系时说：“体者，为知识之载而为道德之寓者也，其载知识也如车，其寓道德也如舍。体者，载知识之车而寓道德之舍也。”还说：“道德皆寄于体，无体是无道德也。”在这里，他以形象生动的比喻，阐明了人的精神和肉体的关系，说明了精神依赖于物质的道理。在认识论上，他的唯物主义观点也极为明显，他认为游戏、学习和写作，“皆所谓客观之活内容”，而观念则是客观事实的“写象”，“写象即观念”。他在《〈伦理学原理〉批语》中指出：“美学未成立以前早已有美，伦理学未成立以前，早已人人有道德，人人皆知得此正鹄矣。种种著作皆不过钩画其实际之情状，叙述其自然之条理。”这完全符合唯物主义反映论原理。

（二）辩证法与相对主义

在毛泽东早期的哲学思想中，辩证法思想相当丰富，其中以变化、抵抗和差别的观点尤为突出，体现着发展、对立和矛盾思想的天才萌芽。在《讲堂录》中记录着：“天下万事，万变不穷”，

^① 李锐：《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第108页。

“恩生于害，害生于恩”，“夫善积而成者也，是故万里之程，一步所积，千尺之帛，一丝所积。差一步不能谓之万里，差一丝不能谓之千尺。”这些话就包含着变化、发展、转化等思想。在《体育之研究》一文中，进一步认为事物不是静止不变的，而是日日变化和互相转化的。他说：“人之身盖日日变易者，新陈代谢之作用，不绝行于各部组织之间，目不明可以明，耳不聪可以聪，虽六七十之人，犹有改易官骸之效。”在这篇文章中，他还极为重视人的主观能动性。他说：“外部之事，结果之事也”，“内部之事，原因之事也”。他又说：“学校之设备，教师之教训，乃外的客观的也，吾人盖尚有内的主观的，夫内断于心，百体从令，祸福无不自己求之者，我欲仁斯仁至，况于体育乎。苟自之不振，虽使外的客观的尽善尽美，亦犹之乎不能受益也，故讲体育者，必自自动始。”还说：“勤体育则强筋骨，强筋骨则体质可变，弱可转强，身心可以并完，此盖非天命而全乎人力也。”在《〈伦理学原理〉批语》中，辩证法的观点也十分突出。他说：“宇宙间事物之活动，事物自我活动而已。”“此世界中变化万殊”，并提出：“天地盖唯有动而已”的命题。在毛泽东看来，不仅自然界是变化、发展的；人类历史也是不断变化发展的。他说：“治乱迭乘，平和与战伐相寻者，自然之例也。伊古以来，一治即有一乱，吾人恒厌乱而望治，殊不知乱亦历史生活之一过程，自亦有实际生活之价值。吾人揽史时，恒赞叹战国之时，刘项相争之时，汉武与匈奴竞争之时，事态百变，人才辈出，令人喜读。”至于升平时代的历史，“则殊厌弃之”，“安逸宁静之境不能长处，非人生之所堪，而变化倏忽乃人之所喜也。”他还说：“各世纪中，各民族起各种之大革命，时时涤旧，染而新之，皆生死成毁之大变化也。”这就是说，只有生死成毁之大革命，才是历史发展“大变化”的决定性环节。

青年毛泽东还认为，宇宙间的事物，有作用就有反作用，作用愈大反抗愈烈。他在《〈伦理学原理〉批语》中指出：“河出潼关，

因有太华抵抗，而水力益增其奔猛；风回三峡，因有巫山为隔，而风力益增其怒号。”泡尔生说：“人类势力之增，与外界抵抗之减，其效本同”。对此，毛泽东批评说：“此不然，盖人类势力增加，外界之抵抗亦增加，有大势力者又有大抵抗在前也。”这就是说，相互作用，压力和反抗，作用与反作用是自然现象。他认为，人并非自然之奴隶，而可以改造自然，他说：“吾人虽为自然所规定，而亦即为自然之一部分，故自然有规定吾人之力，吾人亦有规定自然之力，吾人之力虽微，而不能谓其无影响自然。”

毛泽东早期辩证法思想是极为可贵的，但它具有朴素自发的性质，没有形成自觉的规律性的认识，而且还呈显出浓厚的相对主义色彩。他说：“观念即实在，实在即观念。有限即无限，时间感官者即超绝时间感官者。想象即思维，形式即实质，我即宇宙，生即死，死即生，现在即过去及未来，过去及未来即现在，小即大，阳即阴，上即下，秽即清，男即女，厚即薄，质而言之，万即一，变即常”，等等，这样，所有对立的事物和概念之间的原则界限通通被抹煞了。客观事物在一定条件下既相互联系又相互转化，这是相对性，但它们之间的相互的差别又具有确定的不容混淆的界限，这是绝对性。如果抹煞它们的质的区别，忽视转化的条件，就会导致否定事物的质的规定性，把事物变成不可捉摸的模棱两可的东西。这反映了毛泽东早期辩证法思想中的杂质。

（三）宇宙之真理与伦理道德的改造

这一时期，青年毛泽东的历史观基本上是唯心主义的。他夸大精神的作用，企图在精神领域寻找历史发展的动力和源泉。他把历史发展的动力归结为“宇宙之真理”。而所谓“宇宙之真理”，在人身上的表现就是思想和道德。他在1917年给黎锦熙的信中说：“思想主人之心，道德范人之行，二者不洁，遍地皆污。”中国的贫穷和落后，根本原因就是“思想太旧”，“道德太坏”。所以，他极力主张从哲学、伦理学入手，变换人们的思想和道德。他认

为：“当今之世，宜有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变换全国之思想，此如大纛一张，万夫走集，雷电一震，阴噎皆闻，则沛乎不可御矣。”在《〈伦理学原理〉批语》中，则明确说：“观念造成文明，诚然、诚然。”这就把历史当作观念的实现，把观念看成历史的动力，从根本上颠倒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他认为“道德非必待人而有”，主张“主观之道德律”；他从“性癖与义务感情本为一物”出发，主张“天理”即在“人欲”中；他把“实现自我”提到了“人类之目的”高度，主张“精神之个人主义”。在个人与群众的关系上，则片面夸大英雄豪杰的作用。在《体育之研究》中就认为，人类所以从蒙昧状态走向文明，是因为“有圣人者出，于是乎有礼，饮食起居皆有节度。”而在给黎锦熙的信中则说：“圣人既得大本者也”，所以“明其现在、过去与未来，洞悉三界现象”。而把群众视作“小人”，认为“小人累君子”，但君子不应做逃避社会现实的隐士，而“应有慈悲之心，以救小人”。显然，这是圣贤创世的英雄史观。应当指出，这时毛泽东的历史观也有了某些唯物主义的因素。例如，在《〈伦理学原理〉批语》中，他写道：“圣人者抵抗极大之恶而成者也”。还说：“圣贤豪杰之所以称，乃其精神及身体之能力发达最高，乃人人应以为期向者也”。所以，“谓圣贤豪杰独可为舍身拯人之事，而普通人可以不为，是谓圣贤豪杰之身心能力发达最高，而普通人不必如是也，宜为合乎伦理之言哉！”“既认为圣贤豪杰之所为，即当认为普通人之所为”。这就是说，圣贤是在同邪恶势力作斗争中锻炼出来的，是普通人都是可以做到的。在1917年写的《一师校志》中则说：“根据国家现状，社会中坚力量实是大多数失学的国民”。这表明，这时毛泽东虽然还没有脱离英雄史观的基地，但他已开始摆脱个人英雄史观的束缚了。

综观毛泽东在这一时期的哲学思想，基本上是唯心主义的，并含有相对主义成份，但又有丰富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观点。

二、青年毛泽东世界观的转变

自1918年夏从湖南第一师范毕业至1920年底，是青年毛泽东世界观的根本转变时期。毛泽东世界观的转变，是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经过五四运动，通过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参加政治斗争实践而实现的。这一时期，他在政治上由激进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迈进，在世界观上由唯心主义向辩证唯物主义转变。

1918年8月，为筹备组织湖南学生赴法勤工俭学，毛泽东第一次来到北京，经杨昌济介绍，认识了当时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的李大钊，并经李大钊的推荐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当了一名助理员。他在工作之余，旁听了北大的一些课程，参加了学校的哲学会、新闻学会，对政治的兴趣更加浓厚，思想也更加激进了。为了寻求真理，找到中国的出路，他读了许多书，包括无政府主义的一些书刊，研究了各种思潮和学说。1919年五四运动暴发时，毛泽东已从北京返回长沙。在全国革命浪潮的推动下，他立即投身于革命运动之中，积极领导了湖南的青年学生运动，筹组了湖南全省学生联合会，并于1919年7月出版了学生联合会的会刊——《湘江评论》，他任主编。《湘江评论》不仅是提倡新文化、反对旧礼教的宣传者，也是民众革命运动的组织者，它大大推动了湖南以至华南各省的青年学生运动。在此期间，新民学会在毛泽东领导下也积极开展活动，发动了反对湖南督军张敬尧的学生总罢课，发表了驱张宣言，领导各阶层人民同张敬尧进行斗争。毛泽东后来回忆说：“在五四运动以后，我把大部分时间用在学生的政治活动上。”^①就在这些革命实践活动中，毛泽东实现了其世界观的转变。

在唯物论和认识论方面，从理论联系实际、调查研究的思想

^① 斯诺：《西行漫记》，第129页。

的初步提出到实践活动第一观点的基本确立。1919年7月，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临时增刊第一号上，发表了《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一文，批评康梁维新变法的改良主义思想，他说：“那时候的思想是空虚的思想。我们试一取看那时鼓吹变法的出版物，便可晓得一味的‘耗矣哀哉’刺激他人感情的作用，内酌是空空洞洞，很少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那时有一种‘办学堂’，‘办自治’，‘请开议会’的风气，寻其根底，多半凑热闹而已。凑热闹成了风，从思想界便不容易引入实际去研究实事和真理了。”1919年9月，他草拟的《问题研究会章程》中，在谈到研究问题的方法时说：“问题之研究，有须实地调查者，须实地调查之”，“无须实地调查，又一时不能实地调查者，则从书册、杂志、新闻报纸三项着手研究。”在这里，毛泽东把实地调查放到了第一位。同年11月，他明确提出：“吾们讨论学理，应傍着活事件来讨论。”这就是说，研讨理论必须联系当前的实际，这是对理论联系实际思想的朴素的而又相当深刻的表述。

1920年秋冬，毛泽东总结了驱张运动和自治运动的经验教训，深切痛感理论对于运动的依赖关系，认识到实际改造运动比之理论上的鼓吹更为重要。1920年9月26日，他在湖南《大公报》上发表的《“湖南自治运动”应该发起了》一文中说：“无论什么事，有一种‘理论’而没有一种‘运动’继起，这种理论的目的，是不能实现出来”。如果“不继之以实际的运动，湖南自治，仍旧只是纸上好看，或在口中好听，终究不能实现出来。”同年11月25日，他在复李思安的信中说得更明确：“湖南须有一些志士从事实际的改造，你莫以为是几篇文章所能弄得好的。”在这里所说的“运动”，“实际的运动”，“实际的改造”，即社会实践的一种形式。这是毛泽东早期哲学思想发展的重大质变，开始向辩证唯物主义转变。

在辩证法方面，五四时期，毛泽东基本清除了相对主义和唯

心主义的杂质，阐述了科学辩证法的矛盾、联系和发展的原则。在五四运动中，他发表的许多文章都提到“差别”和“矛盾”。例如：协约国帝国主义和同盟国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协约国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中国同协约国及同盟国的矛盾，我国南北军阀的矛盾，新旧势力之间的矛盾，农民同田主之间的矛盾，工人同资本家的矛盾，等等。所有这些矛盾，毛泽东都认为是客观存在的差别和矛盾，而不能仅仅归之于概念和思维的矛盾。这样，他原来认为客观世界无差别，差别只存在于概念中的思想被消除了，把辩证法置于唯物主义基础上。这时，他的“变化”观点，已经不是一般的万物处于变动不居的状态，而是把“变化”看作是前进上升运动，看作是新事物战胜旧事物的过程了。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使他认识到共产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优越更先进的社会制度。他在《湘江评论》上撰文说：“自‘世界革命’的呼声大倡，‘人类解放’的运动猛进，从前吾人所不置疑的问题，所不采取的方法，所畏缩的说话，于今都一改旧观，不疑者疑，不取者取，多畏缩者不畏缩了。这种潮流，任是什么力量，不能阻住，任何什么人物，不能不受他的软化。”他坚信资本主义必将为共产主义所代替、向共产主义方向发展。他说：“一九一九年以后设有战争，就是阶级战争，阶级战争的结果，就是东欧诸国主义的成功，就是社会党人的成功。”毛泽东从实际情况出发，总结了“驱张”和“自治”运动的经验，阐明了目前运动同根本目标的辩证关系。他在1920年7月，为易礼容的信所加的按语中说：“驱张运动只是简单的反抗张敬尧这个太令人过意不去的强权者，自治运动只是简单的希望在湖南能够特别定出一个办法（湖南宪法），将湖南造成一个较好的环境。我们好于这种环境之内，实现我们具体的准备工夫。彻底言之，这两种运动，都是应付目前环境的一种权宜之计，决不是我们的根本主张”，但是“‘驱张’运动和‘自治’运动等，也是达到根本改造的一种手段。”同年11月25日，他在给罗璈阶的信中指

出：“我虽然不反对零碎解决，但我不赞成没有主义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解决。”湖南自治，“这实是进入总解决的一个紧要手段，而非和有些人所谓零碎解决实则是不痛不痒的解决相同。”在毛泽东看来，“驱张”、“自治”运动虽然不是湖南问题的根本解决，但与根本解决密切相关，它既是根本解决的准备工夫，又是促进根本解决的重要手段。可以看出，毛泽东提出的策略思想，既不同于“零碎解决”的改良主义，也不同于空谈“根本解决”的纸上谈兵，而是既不放弃根本目标，又不忽视目前运动，充满着从具体情况出发的唯物论和辩证法的精神。

在历史观方面，从唯物史观的初步确立到根本转变的实现。毛泽东发表在《湘江评论》上的《创刊宣言》和《民众大联合》等文章，虽然还不成熟，但在某些方面他的思想已接近马克思主义。在《民众大联合》一文中，他认为在十月革命影响下，世界革命的风暴必然要到来。他说：“自前年俄罗斯以民众大联合，同贵族的大联合、资本家的大联合相抗，收了‘社会改革’的胜利以来，各国如匈、如奥、如捷、如德，亦随之而起了许多的‘社会改革’。虽其胜利尚未至于完满的程度，要必可以完满，并且可以普及于世界，是想得到的。”这时，他已认识到人民革命的根本原因在于反动统治阶级对于人民的压迫和剥削。在《创刊宣言》中，他说：“到了近世，强权者、贵族、资本家的联合到了极点，因之国家也坏到了极点，人类也苦到了极点，社会也黑暗到了极点。于是乎起了改革，起了反抗。”他还认识到要推翻贵族资本家的反动统治，“由少数阶级专制的黑暗社会，变为全体人民自由发展的光明社会”，根本办法必须依靠民众，把民众组织起来，联合起来。他写道：“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什么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为什么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他说：“因为一国的民众，总比一国的贵族资本家及其他强权者要多。”在五四运动掀起的革

命风暴席卷全国震惊世界的形势下，他振臂高呼：“我们知道了！我们醒觉了！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刻不容缓的民众大联合，我们应该积极进行！”号召广大民众联合起来，积极投入革命斗争。他坚决批驳了那些轻视群众、否认群众力量和组织能力的错误观点。他指出，不是群众没有能力，而是反动统治者压迫和剥削的结果。他说：“原来中华民族，几万万人从几千年来，都是干着奴隶的生活，只有一个非奴隶的是‘皇帝’（或曰皇帝也是‘天’的奴隶）。皇帝当家的時候，是不准我们练习能力的。”现在不同了。在伟大的革命斗争中，种种方面都要解放了，“压迫愈深，反抗愈大，蓄之既久，其发必速”，只要在斗争中去实践，去“练习”，“他日中华民族的改革，将较任何民族为彻底。中华民族的社会，将较任何民族为光明。中华民族的大联合，将较任何地域任何民族而先告成功。”所有这些思想，特别是对群众力量的评价上已远远高出于一般革命民主主义者之上，已接近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

然而，由于毛泽东这时接触马克思主义还不够深、不够广，还不是完全的共产主义者，原来思想中的唯心主义思想尚未完全肃清，仍未摆脱它的影响，还崇尚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所以，他在《创刊宣言》中说：“各种改革，一言以蔽之，‘由强权得自由’而已。这种对抗强权的根本主义，为‘平民主义’（德谟克拉西，一作民本主义，民主主义，庶民主义）。”他虽然主张用民众大联合的力量来推翻贵族资本家的统治，改造这个黑暗的社会，但却反对使用革命暴力，而妄图劝说贵族资本家回心向善，放弃强权。他写道：“在对人的方面，主张群众联合，向强权者为持续的‘忠告运动’，实行‘呼声革命’——面包的呼声，自由的呼声，平等的呼声——‘无血革命’，不主张起大扰乱，行那没效果的‘炸弹革命’，‘有血革命’。”

1919年12月，为了驱逐反动军阀张敬尧，毛泽东第二次到北京，使他在政治思想上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北京期间，他读了许多关于俄国革命的书和当时能找到的中文的共产主义的著作。在延安跟斯诺谈话时，他回忆说：“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我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阶级斗争》，考茨基著；《社会主义史》，柯卡普著。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①

1920年7月6日至10日，新民学会旅法会员在法国蒙达尔尼集会，提出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学会方针，但对用什么方法达到“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目的，发生了意见分歧。毛泽东于1920年12月、1921年1月写给肖子升、蔡和森及在法诸会友的两封信中，对蔡和森主张组织共产党、走俄国式的革命道路的意见“表示深切的赞同”，而对肖子升主张“温和的”、“以教育为工具的革命”进行了中肯的分析批评。他说：“我以为现世界不能行无政府主义，因为现世界显然有两个对抗的阶级存在，打倒有产阶级的迪克维多，非以无产阶级的迪克维多压不住反动，俄国就是个明证。”^②毛泽东指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这是事实，不像唯理观之不能证实而容易被人动摇。我固无研究，但我不承认无政府主义的原理是可以证实的原理。”^③并提出：“革命非得政权不能发动、保护和完成。”^④1921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学会

① 斯诺：《西行漫记》，第131页。

②③④ 《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3集，1921年1月。

长沙会员大会上的发言》中，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对无政府主义、实验主义和各种假社会主义进行了批判。他指出：改良是补缀办法，不行。“社会政策，是补苴罅漏的政策，不成办法。社会民主主义，借议会为改造工具，但事实上议会的立法总是保护有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否认权力，这种主义恐怕永世都做不到。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如罗素所主张极端的自由，放任资本家，亦是永世做不到。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①

可见，毛泽东于1920年12月、1921年1月写给蔡和森等的两封信和他在1921年新民学会元旦大会上的发言，是青年毛泽东完成世界观的根本转变——实现由唯心主义向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由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转变的重要标志。

三、毛泽东世界观转变过程的基本特点

青年毛泽东在探索救国救民真理的过程中，十分注意把理论的探索同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结合起来，这不仅有力地促进了他青年时期世界观的转变，而且对以后中国革命的发展带来重要的影响。

毛泽东在青年时期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突出地表现于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积极参加斗争的实践，十分注意了解中国社会的实际，强调在斗争实践中学习。毛泽东在求学时期就以极大的精力和满腔的热情阅读了大量的古今中外的书籍，他读书的目的十分明确，“通今，读史必重近世”^②。就是说，读书的目的是为了改造中国。他非常注意从报纸上了解国内外的形势，“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③。他主张“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④。因此，学生时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第2—3页。

②③ 毛泽东：《讲堂录》。

④ 毛泽东：《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

代的毛泽东就十分注意对中国社会实际情况的调查和研究，注意接近工农群众。1917年夏天，他利用暑假了解农民的生产和生活；1918年8月，他在组织湖南赴法勤工俭学学生去北京途中，利用交通被洪水阻滞的机会到河南郾城附近的农村了解农民的生活情况；到北京后，他又利用到长辛店了解赴法勤工俭学预备班学员情况的机会，多次深入长辛店机车车辆厂了解工人生产、收益和职工生活情况。他还发起成立问题研究会，从第七期开始接办《新湖南》，为了组织驱张运动他第二次到北京，成立平民通讯社，参加李大钊组织的《少年中国学会》。他还和陈独秀等组织发起《上海工读互助团》。1920年秋，在湖南提倡人民宪政运动，并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还在长沙组织工人运动。这些活动，大大地推动了毛泽东世界观的转变。他深刻地认识到，“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微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个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①毛泽东从青年时代就注重了解和研究中国社会实际的这一思想特点，是促使他从唯心主义者转变为唯物主义者的重要动因。

第二，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注意领会精神实质，明确用来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毛泽东从青少年时期就十分勤奋好学，他对历史、地理、文学和政治学、伦理学、哲学等，都有浓厚的兴趣。他读书非常认真，经常写笔记、作眉批。在杨昌济老师的“贯通今古，融合中西”治学方法的熏陶下，使他逐步养成了对古今中外的思想文化批判吸收的精神。毛泽东在读书时，非常注意把握其中的精神实质，而不是停留在字句的表面和枝节问题上，他阅读马克思主义的书也是如此。他回忆说：“我在李大钊手下担任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就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陈独秀对于我在这方面的兴趣也是很有帮

① 《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1集。

助的。我第二次到上海去的时候，曾经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①毛泽东这种虚心好学的精神，使他在青年时期就获得了渊博的知识，较早地接触并接受马克思主义，为实现世界观的转变奠定了雄厚的思想文化基础。

第三，同各种错误思想作斗争，通过学习和实践，勇于追求真理，修正错误。毛泽东并不是天生的“圣哲”，他在青少年时期曾接受过封建主义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各种思想或思潮的影响。他的世界观的转变正是在不断地同旧思想斗争的过程中实现的。按照他早年的话说，就是“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挑战”。^②毛泽东在青年时期就确立了改造社会的远大志向和抱负。他认为，社会的改造须以人（包括自己在内）的改造为前提，而人的改造既包括个人远大的理想、高尚的情操、顽强的意志和健康的体魄的锻炼和培养，也包括思想认识和觉悟的提高。因此，他十分注意自己思想的改造。在第一师范时期，他曾“非常佩服”胡适；一师毕业后，他在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下，想在岳麓山下找一块地方搞“新村试验”；第一次去北京时，他曾受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然而，通过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经过五四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及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多次论战，尤其是通过对切身斗争经验的总结，终于使他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

毛泽东青年时期世界观的转变过程，以高度压缩了的形式，在观念形态上反映了近代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他在短短的十几年的时间里，经历了政治思想和哲学思想的复杂变化，走完了八十年来中国近代革命思想发展的全部过程，实现了从民主主义向

① 斯诺：《西行漫记》，第132—133页。

② 《毛泽东给黎锦熙的信》，1917年8月23日。

共产主义、从唯心主义向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转变。毛泽东世界观根本转变的完成,也就是对他早期哲学思想的否定。但毛泽东早期哲学思想作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前史,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产生提供了必要条件。

第三节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历史发展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是一个历史过程。它的产生、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成长和壮大的历史,也反映了中国革命的发生、发展和胜利的历史。正确认识和把握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就能比较深刻地理解毛泽东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经验的哲学概括,就能比较完整地掌握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基本理论,就能比较系统地认识毛泽东哲学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就能比较全面地了解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历史地位,就能自觉地坚持毛泽东哲学思想,并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深化和发展毛泽东哲学思想。

一、毛泽东哲学思想在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从萌芽、形成到系统化

从1921年党的成立到1930年5月《反对本本主义》一文的问世,是毛泽东哲学思想从萌芽到初步形成时期。这个时期,又可分为1927年大革命失败前后两个阶段。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是党的幼年时期,毛泽东哲学思想还处于孕育、萌芽过程中。毛泽东哲学思想萌芽的具体表现是:(一)根据中国的国情,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二)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实际情况作了具体分析。(三)重视农民问题,开始探索解决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毛泽东的《中国

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是两篇代表作，标志着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萌芽。

1927年大革命的失败，给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一个新课题：中国革命应当向何处去？毛泽东等一批党的领导骨干，从成功和失败的实践中，取得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学会独立地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党的工作重点由城市转入农村，在那里积蓄和发展革命力量，组织人民军队，进行武装斗争，依靠广大农民，建立革命根据地，懂得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真理。毛泽东在革命斗争实践中，在党和人民的集体奋斗中，总结了新鲜经验，作了艰苦的理论创造，才于1927年至1930年间初步形成了毛泽东哲学思想。其具体表现是：

（一）揭示了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阐明了中国革命的发展规律，开辟了一条中国式的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毛泽东于1928年10月至1930年1月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著作，分析了当时国内外错综复杂的矛盾，论证了中国红色政权发生和发展的原因、条件，提出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工农武装割据”的理论。

（二）正确地提出了建党建军原则，初步形成了一条马克思主义的军事路线。1929年12月，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是其中的主要部分。《决议》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朱德就提出了一套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的战略战术原则，这就是“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和“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它标志着毛泽东军事思想中战略战术原则开始形成。

（三）揭露了本本主义的错误，初步确立了一条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毛泽东于1930年5月写了《反对本本主义》一文，这

是一篇理论联系实际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体现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特色：（1）它作出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2）它首次明确提出了要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3）它第一次提出了“思想路线”的新概念，同时指出了两条思想路线的对立：一条是“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一条是从本本出发按“既定办法”办的保守的思想路线，并明确地告诫全党，“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4）它还蕴含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基本点，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的雏型；（5）它对社会调查的根本途径、方向和方法以及调查技术等也作了论述。

总之，在这一时期，我们党在理论上的深刻创造及其对实践指导上取得的成功，说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已独立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论和辩证法观察和分析中国革命问题，并作出了科学的正确的结论，这标志着毛泽东哲学思想开始形成。

1930年到1937年，是毛泽东哲学思想从形成到逐步系统化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我们党以毛泽东为代表，坚决抵制和批评了把共产国际的指示和苏联经验教条化和神圣化的错误，并深刻总结这方面的历史经验，在此过程中完成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系统化建设。

其主要方面有：

（一）分析了国内外新的矛盾和问题，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策略。1935年12月，毛泽东在陕北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从政治路线上清算了“左”倾机会主义，运用唯物辩证法分析了新的形势、新的矛盾，批评了“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的错误思想，系统地论述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从哲学的高度阐明了统一战线的辩证法。

(二)揭示了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形成了一整套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

1936年12月，毛泽东发表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从军事路线上对“左”倾教条主义作了清算。《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不仅是一篇杰出的军事著作，又是一篇光辉的哲学著作，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军事哲学。

(三)深刻阐明了以实践为基础的认识论和以矛盾为核心的辩证法，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矛盾论作了系统的发挥。

毛泽东1937年7、8月间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讲哲学、撰写了《实践论》和《矛盾论》，两论标志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达到了系统化的新高度。这两篇哲学论文，是对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经验的哲学总结，从哲学高度分析和批判了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原则的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从而深刻地阐明了以实践为基础的认识论，以矛盾为核心的辩证法，为中国革命的胜利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们不仅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系统化的标志，而且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二、毛泽东哲学思想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丰富和全面发展

1937年8月至1949年10月，是毛泽东哲学思想从系统化到多方面展开的重要时期。毛泽东在领导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把《实践论》和《矛盾论》的哲学理论，创造性地运用于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形势分析和党的建设等方面，撰写了一系列重要著作，对中国革命经验作了系统总结和理论概括。这个时期，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得到了系统化、理论化，毛泽东思想得到了全党公认，

成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这个时期，毛泽东哲学思想多方面展开的主要方面是：

（一）建立了完整的军事辩证法理论。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写的军事哲学著作，如《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战争和战略问题》，解放战争时期写的《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以及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中提出的著名的“十大军事原则”，和一系列党内指示和电报，提供了在实践中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的光辉范例。毛泽东军事辩证法思想，为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作出了独特贡献。

（二）系统地阐述了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使党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有了新的发展，整风运动中提出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和“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为解决党内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创造了新的形式，提供了新的经验。毛泽东的《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等文章，以及《〈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集中阐述了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理论和实际相统一的思想路线；提出了调查研究是克服主观主义、转变党的作风的根本方法。

（三）把唯物辩证法运用于无产阶级的斗争策略，确立了又联合又斗争的统一战线政策。毛泽东继《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报告之后，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共产党人〉发刊词》、《论政策》等著作中，依据阶级关系的变化，捕捉各个时期的主要矛盾，提出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原则。提出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策略，把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高度地统一起来。这些渗透着唯物辩证法思想的文献至今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四)完整地创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学说。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著作中，揭示了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规律，阐明了革命转变论和革命阶段论的辩证统一，指出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即区分为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阶段，制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纲领、经济纲领和文化纲领，并阐明了它们的辩证关系。

(五)全面地总结了人民革命的经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毛泽东1949年6月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完整地阐明了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他论述了阶级专政同阶级消灭、国家消亡的辩证关系，严格划分了人民与敌人、革命派与反革命派的界限，规定了各阶级在国家政权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揭示了历史上一切国家的共同本质和不同阶级国家的特殊本质，阐明了无产阶级专政与民主的辩证关系。毛泽东关于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运用和发展。

(六)创立了一整套唯物辩证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早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毛泽东就提出要“注意工作方法”。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他撰写了《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关于健全党委制》、《常委会的工作方法》等一系列文献，从而把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具体化为一整套唯物辩证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

三、毛泽东哲学思想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初期的进一步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标志着中国进入了历史发展的新阶段。1949年10月到1957年4月，毛泽东哲学思想在总结新的实践经验中，得到了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其主要方面有：

(一)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经过努力到1956年基本上完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体现了对马克思主义辩证

法的具体运用。

(二)开始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1956年4月26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报告,十大关系即十大矛盾,都是针对革命和建设中的形而上学的错误倾向而提出的,充分体现了矛盾双方既对立又统一的辩证关系,是把唯物辩证法运用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典范。

(三)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创立了两类社会矛盾的学说。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坚持用对立统一规律观察社会主义社会,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规律,创立了两类社会矛盾的学说,回答了时代向马克思主义者提出的新课题,强调指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生活主题。

四、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曲折发展

1957年到1976年,是毛泽东哲学思想曲折发展的时期。这一时期情况错综复杂,一方面,毛泽东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继续增添了新的内容:(一)揭示了人类认识不断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跃的规律,论述了自由和必然的辩证关系;(二)提出了“物质可以变成精神,精神可以变成物质”,丰富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三)揭示了天才问题的本质,批判了唯心论的先验论,坚持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唯物史观;(四)提出了划分三个世界的伟大战略思想,这是运用唯物辩证法观察国际斗争的范例。

另一方面,毛泽东晚年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有重大的失误。对于“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毛泽东负有主要责任。但是,他终究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晚年在世界观和思想方法上的错误,正是由于他违背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基本原则造成的。因此,必须把毛泽东晚年的主

观主义的失误同科学的毛泽东哲学思想区分开来。

五、毛泽东哲学思想在新时期的运用和发展

1976年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发展的新时期。在新时期，我们党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运用和发展主要表现在：

(一)正本清源、拨乱反正，重新确立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二)强调完整地正确地理解和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恢复了毛泽东思想的权威，概括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主要内容，阐明了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贡献以及它的历史地位。

(三)对社会主义的再认识，进一步揭示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逐步确立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新的理论基础。

(四)提出了一系列新的哲学观点，为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增添了新的内容。其中主要有：关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关于建设社会主义必须根据本国国情，走自己的路的观点；关于在经济文化落后的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须有一个很长的初级阶段的观点；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集中力量实现现代化的观点；关于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商品经济的观点；关于改革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对外开放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要条件的观点；关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重要特征的观点；关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坚持改革开放的总方针这两个基本点相结合、缺一不可的观点；关于执政党的党风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的观点；关于按照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发展同外国共产党和其他政

党的关系的观点，关于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的观点，等等。

总之，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党不仅恢复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本来面目，而且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不断进行再认识，作出哲学的概括和总结。随着实践的发展，毛泽东哲学思想必将不断开放出灿烂之花，结出丰硕之果，取得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新胜利。

第二章

主观和客观相符合

解决主观同客观之间的矛盾，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实现主观同客观具体的历史的统一，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根本内容，并贯穿在它的各个组成部分之中。为了解决主观和客观的矛盾，达到主观和客观的统一，需要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调查研究，发扬自觉的能动性及反对主观主义。

第一节 一切从实际出发

一、一切从实际出发，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唯物论的基石

一切从实际出发，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恩格斯在批判杜林“原则在前”的先验主义观点时，深刻地阐述了唯物论的基本观点。他说：“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这些原则不是被应用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而是从它们中抽象出来的；不是自然界和人类去适应原则，而是原则只有在适合于自然界和历史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这是对事物的唯一唯物主义的观点”。^① 列宁指出：“唯物主义的基本特征正在于：它的出发点是科学的客观性，是承认科学所反映的客观实在；而唯心主义则需要‘弯路’，以便这样或那样地从精神、意识中，从‘心理的东西’中‘引出’客观性”。^② 这就是说，不同的出发点，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74页。

②《列宁选集》第2卷，第301页。

决定着唯物主义同唯心主义两条根本对立的哲学路线。

在中国革命实践过程中，唯物论同唯心论的对立，表现为一切从实际出发同一切从主观愿望出发这样两条思想路线的对立。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教条主义者和经验主义者，不是从中国革命实际出发，而是从抽象的原则出发、从主观愿望出发。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应用马列主义指导中国革命中，强调把马列主义同中国的革命实际结合起来。他们在同主观主义，特别是同教条主义作斗争中，提出了“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科学论断。毛泽东说：“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教导我们认真地研究情况，从客观的真实的情况出发，而不是从主观的愿望出发。”^①“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外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②而要这样做，就须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要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列主义一般原理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

毛泽东一再指出：“根据实际情况”讨论审查上级的指示，“看问题不要从抽象的定义出发，而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等等，这些都是说革命政党的思想、理论、路线、方针、政策、计划、办法等等，要从客观实际及其客观规律中引出正确的结论来。毛泽东历来强调：物质的客观实在性和物质对于意识的根源性，或者说意识对于物质的依赖关系。因此，“一切从实际出发”，是一个物质决定精神、存在决定意识的唯物主义命题，是中国革命和建设工作中的唯物论，是同主观主义的唯心论相对立的哲学论断，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论简明通俗的中国表述方式。

^{①②}《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473、478页。

二、客观实际，是存在于头脑以外的一切事物

什么是“实际”呢？毛泽东说：“除了我们的头脑以外，一切都是客观实际的东西。……只有我们的头脑（思想）才是研究的主体。”^①在这里毛泽东所说的主体（“头脑”=思想）相当于主观，即人类的精神、意识和党的理论、路线等等。与主体相对立的“客体”，也就是“头脑”（思想）以外的一切“实际”东西，即客观，是主体研究即认识和改造的对象。“实际”这个概念，有两种含义：一种是指真实的情况；一种是指人们的行动，也就是一般人所说的“实践”。毛泽东使用这一概念，时常是双关的。毛泽东哲学思想中的“实际”概念，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物质”范畴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但又有所区别。

中国共产党人这个主体所研究的对象，主要是中国这个自然和社会的客观存在，然而又包括这个主体意识之外的某些意识现象，如人民群众的愿望、需要、觉悟、情绪；敌人的愿望、情绪、心理、智谋等等，都包括在共产党人所研究的“实际”范围内。所以毛泽东关于“实际”的概念，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物质观，又在实际工作中扩展了这种物质观。

毛泽东指出，客观事物由于内部矛盾的推动，它的发生、发展和消灭的过程是无穷的，人的认识的发生、发展和消灭的过程也是无穷的。从实际出发，不仅要从相对静止的客观实际出发，而且要使自己的思想跟上客观过程的变化发展，要从变化发展着的实际出发。

从实际出发，还要求从全面的情况和事物的总体出发。毛泽东说，不了解矛盾各方面的特点，就叫做片面地看问题，或者叫做只看见局部，不看见全体，只看见树木，不看见森林。又说，马克思主义看问题，不但要看到部分，而且要看到全体，不应该“坐井观天”。刘少奇讲：“要做到真实，就要全面。”^②

①《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第101页。

②《刘少奇选集》上卷，第402页。

从实际出发，还要求从典型的实际出发，也就是要从可以决定事物性质的主要矛盾出发。毛泽东讲：“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列宁研究帝国主义，都是收集了很多统计和材料，但并不是全部采取，而只是采取最能表现特点的一部分。”^① 如果抛弃了具有典型意义的材料，尽管摘取了许多“事实”，但都是一些细微末节，那也不能真正做到从实际出发。

从实际出发，不能只从事物的现象出发，最重要的是要从事物的本质和内部联系，即规律性出发。毛泽东说：“我们看事情必须要看它的实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作入门的向导，一进了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② 从实际出发，就是要按照客观事物的规律办事。

从实际出发，要从群众的社会实践和意愿出发。客观世界只有纳入人们的社会实践领域内，才对人们的思想发生直接影响。所以从实际出发，就要从人们的社会实践出发。人民群众是社会实践的主体。从社会实践出发，就要从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出发。还要考虑人民群众的觉悟水平、需要和意愿。毛泽东说：“凡属正确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都是和当时当地的群众要求相适合，都是联系群众的。”^③ 超过群众觉悟程度的命令主义是错误的，因为它害了急性病；落后于群众觉悟水平的尾巴主义也是错误的，因为它违反了领导群众前进进一步的原则，害了慢性病。

总之，一切从实际出发，就是承认人们的思想和认识必须以自然、社会的一切客观情况及其规律为依据，客观实际是第一性的，思想意识是第二性的。人们的正确思想既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自己头脑中固有的，而是在社会实践中从一切客观事实中抽取出来的。

①《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25页。

②《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第40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96页。

三、一切从实际出发，就是要从中国的国情出发

一切从实际出发，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就是要从中国的国情出发。

毛泽东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①旧中国不是一个独立的民主国家，而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在内部没有民主制度，而受封建制度的压迫；在外部没有民族独立，而受帝国主义的压迫；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都很落后。这就是旧中国的国情。中国共产党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路线、方针、政策就是根据这一国情确定的。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对中国国情的认识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经过了艰难的历程，其间还出现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他们所犯的错误，是与他们对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情的错误认识分不开的。毛泽东一贯注重对中国社会各阶级政治、经济状况的调查和分析，指明了中国社会的阶级结构及各阶级在革命中的地位，阐明了中国社会的性质及革命的任务和规律。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就提出了“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革命的首要问题；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初期，揭示了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极大不平衡性，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式的革命道路，并概括出党的领导、武装斗争和统一战线的三大法宝；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②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所以，认识旧中国的国情，经过了艰难曲折的过程。1962年，毛泽东在谈到认识客观世界问题时说：“在民主革命时期，经过胜利、失败，再胜利、再失败，两次比较，我们才

①《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第324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11页。

认识了中国这个客观世界”。^①对于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我们自己在很长时间内都认识不清楚，但是整个说来，中国这个客观世界，终究是由中国人自己认识的，不是由共产国际管中国问题的人认识的。

从中国国情出发，不仅是民主革命的理论基础，也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基础。建国前夕，毛泽东谈到党的战略策略所依据的社会经济状况时说：“中国的工业和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就全国范围来说，在抗日战争以前，大约是现代性的工业占百分之十左右，农业和手工业占百分之九十左右。这是帝国主义制度和封建制度压迫中国的结果，这是旧中国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性质在经济上的表现，这也是在中国革命时期内和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从这一点出发，产生了我党一系列的战略上、策略上和政策上的问题。”^②这一科学论断既是对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经验的总结，也是后来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的战略策略的必然依据。建国以后，我们党用三年的时间恢复了经济，又用三年时间完成了社会主义的三大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并从1953年开始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到党的“八大”，制定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划。经过十几年的建设，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经济体系。这一系列胜利和成就，都是遵循了从中国国情出发的。但50年代末期以后，党和毛泽东对中国经济形势和政治形势的估量出现了偏差，产生了急性病，在指导思想发生“左”倾错误。当时认为中国社会主义已经建成，共产主义已不是遥远的事情了。因而发动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等不符合客观实际的运动，并把党内对这些问题思想认识上的分歧和争论，夸大为政治上的“阶级斗争”。后来，错误地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严重地影响和

①《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25页。

②《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657～658页。

干扰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究其原因，就是因为当时毛泽东和党中央脱离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实际，离开了一切从中国国情出发所结出的苦果。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断定中国社会仍然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从这样一种国情出发，制定了实事求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政治路线，从而使党的路线再一次真正端正到从中国实际出发的基本点上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我国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内的真实国情。只要我们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真理同这样一种国情结合起来，进一步认识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道路和规律，并用以指导现代化建设的实践活动，就一定可以把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

第二第 坚持调查研究

毛泽东总结中国革命的丰富经验，从认识论和历史唯物论的高度，精辟地阐明了调查研究的意义、态度和方法，明确地指出调查研究应贯穿于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全部过程中，是最基本的认识方法。

一、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要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就必须坚持调查研究。调查研究是掌握一切真实情况的根本途径和基本方法。

毛泽东从他青年时代起到他参加并领导革命工作以后一贯注重对社会情况的调查研究，并把调查研究提高到唯物主义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高度来看待，把调查研究看成是能否掌握真实情况、正确制定和执行正确路线的根本保证。毛泽东所说的调查研究，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做指导，深入实际，深入群众，获取

真实材料，经过分析和研究，把握事物的本质和规律，从中引出必要的结论，用以指导我们行动的认识方法和工作方法。他再三强调，“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①对此，他作了全面的论述。

第一，调查研究是做到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根本途径。毛泽东说：“要了解情况，唯一的方法是向社会作调查”。^②必须深入社会实践第一线，通过调查研究，方能得到真实情况。只有掌握了真实情况，才能为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提供客观依据。陈云曾说：领导机关制定政策，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研究情况，最后讨论决定，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就够了。这就说明一切工作，要把调查研究摆在第一位。

第二，调查研究是寻找解决问题方法的重要手段。调查研究，不仅是掌握真实情况的根本方法，而且也是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的重要手段。调查研究包括调查和研究两个环节。调查可以了解情况；研究可以探寻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毛泽东说：“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③又说：“你对于那个问题不能解决么？那末，你就去调查那个问题的现状和它的历史吧！你完完全全调查明白了，你对那个问题就有解决的办法了。”^④说调查就是解决问题，当然不是调查本身就能把实际问题解决了，而是说通过调查获得详细而周密的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表及里、由此及彼的改造制作工夫，就能认识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并用以指导人们的行动，创造必要的条件，促成问题的解决。解决问题的方法存在于问题自身之中，对问题调查研究清楚了，解决问题的方法也就自然有了。毛泽东批评那些主观主义者，不做调查

①《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第48页。

②《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465页。

③《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第50页。

④同上，第49页。

研究，只是闭门冥思苦索地“想办法”、“打主意”是很愚蠢的，那是一定想不出什么好办法，打不出什么好主意的。

第三，调查研究是实现理论联系实际的必要桥梁。要达到主观和客观的统一，需要做到理论联系实际，而调查研究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必要桥梁。恩格斯说，要找到革命的策略，就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应用于本国的经济条件 and 政治条件。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了解这些条件”^①。毛泽东在应用马列主义指导中国革命过程中，特别强调只有通过调查研究，确实掌握中国的实际情况，才能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他把马列主义比喻为“矢”，把中国革命实际比喻为“的”，而调查研究，就是拿着“矢”去找“的”，或依据“的”去找“矢”。毛泽东说：“一切实际工作者必须向下作调查。对于只懂得理论不懂得实际情况的人，这种调查工作尤有必要，否则他们就不能将理论和实际相联系”。^②作实际工作的人要对自己所工作的环境作调查研究，认真读书，把经验上升为理论，找“矢”来射“的”；只懂得理论的人，要向实际作调查，把“矢”射向“的”。

第四，调查研究是转变党的作风的基础一环。调查研究是反对理论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的根本方法。毛泽东说：“实际政策的决定，一定要根据具体情况，坐在房子里面想象的东西，和看到的粗枝大叶的书面报告上写着的东西，决不是具体的情况。倘若根据‘想当然’或不合实际的报告来决定政策，都是危险的。过去红色区域弄出了许多错误，都是党的指导与实际情况不符合的原故。所以详细的科学的实际调查，乃非常之必需。”^③这是在总结中国革命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作出的科学论断。在中国革命过程中，“左”右倾机会主义所以犯错误，就因为他们反对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50页。

②《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467页。

③《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182页。

对社会实际的调查，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他们的思想方法，工作作风是主观主义的。毛泽东说：“不注重研究现状，不注重研究历史，不注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应用，这些都是极坏的作风。”^①“在全党推行调查研究的计划，是转变党的作风的基础一环”。^②可见，要克服主观主义，转变党的作风，最主要的是要做两件事：一是加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教育，反对党内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二是要加强调查研究。只有“努力作实际调查，才能洗刷唯心精神”^③，保持党的深入实际、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总之，坚持调查研究，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关于掌握情况、研究问题的一种科学方法，是关系到革命和建设事业成败的大问题，是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正确的根本。“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是毛泽东的一句名言，也是一条科学真理。

二、调查研究必须有正确的态度和科学的方法

毛泽东讲：“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④这就是说，为了做好工作，不仅要调查研究，而且要做正确的调查研究，而要做正确的调查研究，就必须有科学的态度和方法。

第一，搞好调查研究，必须用正确理论作指导。

毛泽东所说的调查研究，“就是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周围环境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和研究。”^⑤用马列主义作指导，是我们进行调查研究的指导思想和根本方法。我们要依据马列主义理论，对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党务等各方面

①②《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474、479页。

③《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第52页。

④《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13页。

⑤《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58页。

的动态进行详细的调查和研究，引出应有的和必要的结论，进而作出正确的决策，达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目的。毛泽东在这里特别强调坚持用马列主义作指导，是要把它当作进行调查研究的指导思想和根本方法，而不是把它当作万古不变的教条、包医百病的圣药。

第二，正确的态度是搞好调查研究的首要条件。

调查研究必须有客观的态度，切忌带有主观随意性。对客观实际做调查研究，也有一个是不是坚持唯物论的问题。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在理解现实世界时，不能有先入为主的怪想，而应该按照现实本身在人们面前所呈现的样子来理解它。毛泽东把这种原则引入调查研究，指出：“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①调查研究要从客观事实本身出发，要有老老实实的态度，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既不能夸大，也不能缩小。要从客观实际引出结论，而不能把自己的主观想象硬套到事实上，不要为了论证自己的某种观点，到实际中去摘取所需要的片面材料。不要怕听反对自己观点的意见，不要不看不爱看的事情，要敢于正视那些可能推翻自己观点的事实。

调查研究要有眼睛向下的决心，要有虚心向群众学习、甘当小学生的态度。调查研究的对象，主要是在基层工作的干部和人民群众。调查研究的内容，主要是干部和群众的社会实践和直接经验。生活在基层的干部和群众，他们每天都在同各种事物打交道，他们最了解真实情况，有丰富的直接经验。要向他们做调查，“第一是眼睛向下，不要只是昂首望天。没有眼睛向下的兴趣和决心，是一辈子也不会真正懂得中国的事情的。”^②“没有满腔的热忱，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没有求知的渴望，没有放下臭

①《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第49页。

②《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466页。

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①要搞好调查研究，必须同干部和群众交朋友，采取恭谨勤劳和同志式的态度，让他们了解自己的意图，把你当做好朋友，然后才能调查出真实情况来。

第三，科学的方法是搞好调查研究的重要条件。

毛泽东总结自己作调查研究的经验，论述了调查研究的基本方法。

一是“走马观花”，作面上的调查。作领导工作，要了解 and 掌握一般情况，必须对面上的情况有所了解。这种方法包括领导亲自到基层、到群众中去走一走，看一看的直接调查，也包括在短时间内翻阅各地的书面报告和统计材料，做到“心中有数”的间接调查。“走马观花”可以在短时间内了解全局的大致轮廓，但不能深入地把握事物的本质和规律。

二是“下马观花”，作典型调查。即从许多调查对象中挑选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点或几个点，进行具体的调查，获得第一手材料，然后加以分析、综合、从个别上升到一般，得出带有规律性的结论，用以指导工作。这种方法也叫做“解剖麻雀”、“种试验田”、“蹲点”等等。毛泽东认为调查的典型可以分为三种：“一、先进的，二、中间的，三、落后的。如果能依据这种分类，每类调查两三个，即可知一般的情形了。”^②在典型调查中，还有一种重点对象，更应当注重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毛泽东认为，调查研究，要抓住最有特点（即事物的主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的对象进行调查，以便真正把握事物的本质。他说：“材料是要搜集得愈多愈好，但一定要抓住要点或特点（矛盾的主导方面）。 ”^③他认为十样事物，调查了九样，只有一样没有调查，但如

①《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467页。

②《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27页。

③《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25页。

果你调查的九样都是一些次要的东西，把主要的东西却丢掉了，那么，仍然是没有发言权的。

三是开调查会，作讨论式的调查研究。无论是面上调查，还是典型调查，都有许多具体方法可以采用。毛泽东认为，开少数有经验的干部和群众参加的调查会，是最简单易行、最忠实可靠的方法。他指出，只有开调查会，“才能近于正确，才能得出结论。那种不开调查会，不作讨论式的调查，只凭（被调查人）一个人讲他的经验的方法，是容易犯错误的。”^①开调查会，要预先准备好调查纲目，挑选好参加调查会的人，人数要适当，主持调查会的人要根据纲目与大家一起讨论，以便把问题引向深入，进行必要的争论，再集中正确的意见，作出结论。那种只随便问一下，不提出中心问题在会上讨论的方法，也是不能得出近于正确的结论的。

四是采用各种有效的通讯手段，提高调查的效率。毛泽东认为，要提高调查研究的效率，必须充分利用现有的物质条件、先进的通讯工具和其它灵活多样的手段。他曾明确地指示各级党委，“充分利用无线电、有线电、电话、邮递、专人送信等项通讯方法”，“充分利用通讯社和报纸，密切地互相联系起来，以便掌握运动的动态，随时互通情报，交流经验”^②。现在，通讯设施更加现代化了，电视、通讯卫星、人工智能等等，都可以作为调查研究、传递信息的手段，都应该充分加以利用。

三、时时了解社会情况，时时进行社会调查

社会是发展的，革命事业是向前推进的，要使主观不断跟上客观形势的发展，调查研究必须反复不断地进行。毛泽东指出：“我们又相信事物是运动着的，变化着的，进步着的。因此，我们的调查，也是长期的。今天需要我们调查，将来我们的儿子、孙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第56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28页。

子，也要作调查，然后，才能不断地认识新的事物，获得新的知识。”^①

建国以后，我国社会向前发展，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②在50年代前期和60年代初期，党还比较注重调查研究，所以这两个时期党的路线、方针还比较正确。但50年代末期和6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忽视了对现实情况的调查研究，对于中国实际的底心里不太清楚了，所以党的路线和工作指导上犯了许多错误。我们长时期忙于抓阶级斗争，抓社会制度、生产关系方面的变革，没有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虽然也一再发出调查研究的号召，却离开了调查研究的客观态度，因而不能真正作好调查研究，这使我们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长时期未能很好认识，在行动上总是陷于盲目和被动。毛泽东曾经作过自我批评，说：我们党是有实事求是传统的，但是，解放以来，特别是最近几年，我们的调查作得少了，不大摸底了，大概是官做大了。我这个人就是官做大了，从前在江西那样的调查研究，现在就做得少了。这说明调查研究不是一劳永逸的。要保持工作上的正确指导，就必须始终坚持调查研究。他强调：“我们应当在今后一段时间内，积累经验，努力学习，在实践中间逐步地加深对它（指社会主义建设——引者注）的认识，弄清楚它的规律。一定要下一番苦功，要切切实实地去调查它，研究它。”^③他还要求“各级党委，不许不做调查研究工作。绝对禁止党委少数人不作调查，不同群众商量，关在房子里，作出害死人的主观主义的所谓政策”。^④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除了要继续应用传统的行之有效的调查研究方法外，还要有分析地借鉴和吸取现代西方国家的先进经验

①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21页。

②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29页。

③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582页。

和科学方法，充分利用现代化的信息手段，重视吸取现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加强对调查研究项目和内容的科学论证，以求更好地发挥调查研究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中的重要作用。

第三节 发扬自觉的能动性

发扬人的自觉能动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原理。主观认识是客观实际的反映，但这种反映不是消极的被动的直观，而是积极的、能动的活动。因此，毛泽东在把握主客观的关系时，既强调从实际出发，又特别强调发扬根据和符合客观事实的自觉能动性。

一、自觉能动性是人类独有的特点

“自觉能动性”的概念是毛泽东第一次提出来的，也称为“主观能动性”。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特别是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过程中，十分重视发挥人的自觉能动作用。中国革命长期处在情况复杂、斗争艰难、敌强我弱，又缺少外援的环境中。在这种情况下，要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除了要正确认识客观情况及其内部规律以外，还要求中国人民、中国革命军队发扬自觉的能动性。特别是在战争中，要战胜强大的敌人，就更加需要全体指战员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和英勇精神。在总结革命战争胜败两方面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等著作中，从军事理论和哲学理论上清算了“左”倾错误，形成了自觉能动性的思想，又在《论持久战》等著作中，全面论述了发扬根据和符合客观事实的能动性，形成了关于自觉能动性的系统理论，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自觉能动性原理。

什么是自觉的能动性？毛泽东说，一切事情都是要人去做，**“做就必须先有人根据客观事实，引出思想、道理、意见，提出计划、方针、政策、战略、战术，方能做得好。思想等等是主观的东西，做或行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都是人类特殊的能动性。这种能动性，我们名之曰‘自觉的能动性’，是人之所以区别于物的特点。”**^①毛泽东将自觉能动性（或特殊能动性）同一般能动性作了区分，并说明了自觉能动性的内容。

所谓能动性，是相对于受动性、被动性而说的。受动性、被动性是指在事物的相互作用中，一事物对它事物所给以自己作用的直接承受性。但任何事物对它物给以自己的作用都有一种反作用的特性。无机物存在着机械的反作用，低级生物界存在着刺激感应性的反作用。但这些反作用是对它物作用的直接反映，不能作出诸如迎接或逃避的主动反映。能动性则指在事物的相互作用中，某物对它物的作用不仅能作出直接的被动的反映，而且能主动地反作用于作用物，能作出或者接近或者拒绝它物对自己的作用。这不仅是一种直接的反作用，而且是一种间接的复杂的反作用。这种能动性是人和动物都具有的，这是一般的能动性。人还有远远超出于这种能动性的特殊能动性，也就是自觉的能动性。恩格斯说：**“一切动物的一切有计划的行为，都不能在自然界上打下它们意志的印记，这一点只有人才能作得到。一句话，动物仅仅利用外部自然界，单纯地以自己的存在来使自然界改变，而人则通过它所作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这便是人同其它动物的最后的本质的区别。”**^②这就是说，人的自觉能动性是有意识的、有目的的活动，而动物的能动性是本能的活动。人的自觉能动性在内容构成上，大致可以分为互相制约、互相影响的三部份：一是认识世界的能动性，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第228页。

② 《自然辩证法》，单行本第158页。

二是改造世界的能动性，三是精神、意志的能动性。

第一，人和动物不同，它有高度发达的大脑，具有理性思维能力，不仅能利用自己的感官去感知事物的现象和外部联系，而且能通过大脑的抽象思维活动，透过事物的现象和外部联系把握事物的本质和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毛泽东所说的“将丰富的感觉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造成概念和理论的系统”，这种“改造制作工夫”和他常说的“思索”、“开动机器”，就是大脑的理性思维活动或理性认识活动，它的产物就是“概念和理论的系统”，即抽象概念、判断、推理等思维活动的精神产品。概念和理论的系统不以具体的形象表现出来，人和动物共同具有的感觉不能把握它，它隐藏在现象的背后和深层，只有人的理性思维才能把握它。这就是人类认识世界的能动性。

第二，人不仅能认识客观世界的本质和规律，而且可以依据这种认识指导自己的行动(社会实践)，并且用自己的活动去改变世界。这就是人类改造世界的能动性。人们改造世界的能动性，是人类自觉能动性最集中的表现。这种能动性又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人类的实践活动是有意识、有目的活动；二是人类的实践活动能改变世界的原型，使之成为人类的利益服务。毛泽东说：“马克思说人比蜜蜂不同的地方，就是人在建筑房屋之前早在思想中有了房屋的图样。”^①说明动物的活动只是一种适应环境的本能活动，而人类的实践活动是受某种思想指导的有目的有意识的活动。同时人类的实践活动还能利用客观规律，改变世界的原型，以便为自己的目的服务。马克思说：“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②列宁说：“世界不会满足人，人决心以自己的行动来改变世界”。^③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48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6页。

③ 《列宁全集》第38卷，第229页。

人类社会当然有它自身独立的客观规律，但人类社会却是人类自己创造的；整个自然世界，在人的力量已经涉及到的领域，都是打上了人类认识和实践活动痕迹的人化了的自然。这是除开人类以外，任何生物所不能具有的能动性。

第三，人的精神、意志力等主观因素的能动性，也是人类特有的能动性，是人类自我控制的精神力量，包括人们的信念、理想、道德、毅力、情感、意志等。这些精神因素都属于社会意识范畴，按照马克思主义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观点，从根本上说，仍然是在一定社会生产方式基础上，通过不同渠道形成的。它对于人们的认识活动、实践活动、行为、心理，都能产生巨大的控制作用。如毛泽东常说的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国际主义精神、共产主义理想、爱国主义精神、集体主义精神、英勇顽强精神、英雄主义精神等等。他常说：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就是指的人的意志力。无产阶级的大无畏精神、英勇献身精神等等，对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胜利有着巨大的意义，特别是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在紧急关头，往往对于扭转局面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强调要保持革命战争年代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和拼命精神，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把革命工作搞好。革命者的无私无畏、艰苦奋斗、英勇牺牲的革命精神和行为，在我们革命和建设事业斗争史上，曾经谱写过许多发扬自觉能动性的壮丽的篇章。

人类认识的能动性、实践的能动性和意志的能动性，是互相制约、互相影响的。没有对客观世界本质和规律的正确认识，人们的实践活动就是盲目的，必然达不到目的；人们的意志力也将失去客观依据而陷入唯意志论。没有社会实践作基础，人们对世界的认识就不能产生和完成，意志力也就不可能表现为物质力量。没有意志力的控制，人类的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都难于进行和坚持。人类自觉的能动性，在战争或其它实际工作中，具体地表

现为主体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灵活性、计划性和科学预见性等等。毛泽东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著作中，对这些问题都有详细的论述。

二、自觉能动性和客观规律性

人皆有自觉能动性，关键在于如何对待自觉能动性同客观规律性、客观条件的关系。毛泽东说：“一切根据和符合于客观事实的思想是正确的思想，一切根据于正确思想的做或行动是正确的行动。我们必须发扬这样的思想和行动，必须发扬这种自觉的能动性。”^①所谓根据和符合于客观事实的自觉能动性，就是要求自觉能动性必须根据和符合于客观规律、客观条件。自觉能动性同客观规律、客观条件的关系，就其实质来说也就是主观和客观、能动性和受动性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是既对立又统一的。自觉能动性的发展，必然受到被认识、被改造的客观世界自身规律的决定和限制，也要受到一定历史条件下社会生产力、科学技术发展水平以及人们社会关系等客观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但是，人们在客观规律和客观条件面前又不是无能为力的。人们可以而且必须在既定的客观物质条件的基础上，通过人们的社会实践和主观努力，去认识和利用客观规律，去分析和创造必要的条件，促进客观事物的发展，变可能趋势为客观事实。

毛泽东围绕着人们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中，主观同客观这一对根本矛盾，论述了自觉能动性同客观规律性、客观条件的关系，揭示了发挥自觉能动性的辩证法。要发挥自觉的能动性，必须尊重客观条件。客观条件是人们一切活动的基础，是发挥自觉能动性的前提。毛泽东说：“任何人不可以无根据地胡思乱想，不可以超过客观情况所许可的条件去计划自己的行动，不要勉强地去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第228—229页。

做那些实在做不到的事情。”^① 没有客观条件这个“舞台”，人们是无法演出什么“活戏”来的。离开客观条件谈发挥能动性，只能是空想。但是，不能用固定不变的观点来看待条件，更不该做客观条件的奴隶。同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发展变化的一样，一切条件也是互相联系、互相转化，可以发展的。人们在承认条件、依据条件时，还要分析条件、掌握条件的特点和变化的规律，发挥主观努力去利用条件、组合条件，甚至创造必要的条件，从而促成事物的发展，达到自己的目的。

尊重客观条件，归根到底也就是尊重客观规律，按客观规律办事。毛泽东指出，规律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它具有客观必然性，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你承认它，它存在，发生作用；你不承认它，它亦存在，亦发生作用。人们发扬自觉的能动性，必须顺应客观规律，按客观条件、按客观规律计划自己的行动，不能违背客观规律。毛泽东说：“人们要想得到工作的胜利即得到预想的结果，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合于客观外界的规律性，如果不合，就会在实践中失败。”^② 但人们发挥自觉能动性可以认识客观规律，人们按客观规律去进行活动可以达到预想的目的。

总之，要正确对待和处理自觉能动性同尊重客观规律、重视客观条件的关系。企图超越客观物质条件所允许的范围，违反客观规律，片面夸大主观能动性，勉强去做那些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的事，是主观唯心主义、唯意志论的表现；借口条件不具备，或在客观规律面前坐等，保守观望，无所作为，认为这也不可能，那也办不到，否认和轻视自觉能动性的重要作用，是懒汉懦夫的世界观，是唯条件论的机械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毛泽东哲学思想，要求人们把发挥自觉能动性同尊重客观规律、客观条件，在实践的基础上自觉地统一起来。

①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上册，第4页。

② 《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第122页。

三、自觉能动性在一定条件下的主要的决定的作用

毛泽东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特别是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经验，充分论述了人的自觉能动性的重大作用，并提出自觉能动性在一定条件下，对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对促进或延缓事物的发展进程，可以起主要的决定的作用的论断。

1936年，毛泽东总结战争的经验教训时说：“战争的胜负，主要地决定于作战双方的军事、政治、经济、自然诸条件，这是没有问题的。然而不仅仅如此，还决定于作战双方主观指导的能力。”^① 1937年，他从哲学理论上进行了论述，说：“……当着如同列宁所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的时候，革命理论的创立和提倡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当着某一件事情（任何事情都是一样）要做，但是还没有方针、方法、计划或政策的时候，确立方针、方法、计划或政策，也就是主要的决定的东西。”“我们这样说，是否违反了唯物论呢？没有。因为我们承认总的历史发展中是物质的东西决定精神的东西，是社会的存在决定社会的意识；但是同时又承认而且必须承认精神的东西的反作用，社会意识对于社会存在的反作用，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这不是违反唯物论，正是避免了机械唯物论，坚持了辩证唯物论。”^②

毛泽东关于自觉能动性在一定条件下的主要决定作用的观点，有以下内容：

第一，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问题上，自觉的能动性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起主要的决定作用。这可以用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政党、领袖的历史作用和革命理论的创立，对革命进程所起的作用来说明。比如，中国民主革命由于“左”右倾机会主义者的错误领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第101页。

② 《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第166、167页。

导，遭到了挫折和失败，后来因为中国共产党有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核心，有了一条马克思主义的路线，经过全国人民的艰苦奋斗，使旧中国变成了新中国，创立了社会主义国家。这就说明，阶级、政党、领袖、革命理论等主观因素，在一定条件下对一个国家革命的进程和社会的发展，可以起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一直强调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坚持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他说：“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①这也说明领袖人物在历史上的伟大作用。

第二，自觉能动性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只有在一定的客观条件下才能发挥出来。这说明这种主要的决定的作用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也就是说在客观因素具备着变化的可能性的条件下，主观的努力、主观因素，在促成可能性变成现实方面可以起主要的决定作用。毛泽东说：“客观因素具备着这种变化的可能性，但实现这种可能性，就需要正确的方针和主观的努力。这时候，主观作用是决定的了。”^②在客观可能性具备的条件下，自觉能动性才对认识的完成，对社会实践的进行，对事物发展的进程(或加速或延缓)，起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可能性不具备，主观能动性再大，也无法创造出一个现实来。

这里必须明确，物质对精神的决定作用和在一定条件下精神对物质能动作用的“决定作用”，不是同一个层次，同一种意义上的决定作用。前一个决定作用是本原的、第一性意义上的决定作用，后一个“决定作用”是从反作用意义上、变客观可能性为现实的“决定作用”。二者不是平列的，亦不是互相冲突的，可以说后一个“决定作用”是对前一个决定作用的补充。这既坚持了唯物论，又坚持了辩证法，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的。

① 《邓小平文选》，第303—304页。

② 《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第239页。

四、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为发扬自觉能动性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自觉的能动性是人类所固有的。人类在地球上出现以来，一直在发挥着自己的能动性。然而在人类历史的不同发展阶段，自觉能动性的发挥程度和水平是不同的，所起作用的大小也是不同的。总的说来，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自觉能动性发挥的深度和广度越来越扩展，但在原始社会、奴隶制社会、封建制社会和前期资本主义社会，人的自觉能动性的发挥是有限的。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人类精神能力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类自觉能动性的发挥程度和水平越来越高，对改造世界，特别是对改造自然界，发挥着越来越大的推动作用。但是资本主义制度集中了人类有史以来的各种社会矛盾，并使它们空前明朗化、尖锐化，已经或将要更加严重地阻碍和束缚人类自觉能动性的进一步发展和发挥。

社会主义的确立，对人们自觉能动性的发挥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劳动人民成了国家的主人，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下，随着科学、文化、技术水平的提高，亿万人民群众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大大提高，主动性、创造性等得到了空前发挥。新中国建立以来，在短短的三十多年时间内，科学、技术、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并将为人类作出越来越大的贡献。这些都是社会主义条件下充分发挥人们自觉能动性的结果。然而，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自然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仍然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它不能被消灭，也不能被创造。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因为有马克思主义作指导，有先进的科学知识作为观察的手段，可以更正确地反映客观规律，但它仍不能违背更不能代替客观必然性。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历史说明，在一定时期和一定范围内，由于党的领导人片面夸大主观能动性，忽视客观规律的决定作用，使党的路线偏离了

客观规律，给党和社会主义事业造成损害。1959年，毛泽东在总结中国“大跃进”的经验教训时指出：规律是个学校，可以教育人，使人们逐渐聪明起来。我们党在50年代后期、“文化大革命”中所以会犯错误，主要就是没有处理好主观和客观、主观能动性同客观规律性之间的关系，夸大了主观能动性和主观意志的作用，因而，受到了客观规律的惩罚。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通过拨乱反正，正本清源，解放思想；破除迷信，克服了长时期以来对社会主义的僵化认识，清醒地认识到我国仍然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并对这个阶段的特殊规律有了越来越清楚的认识，相应地制定了比较符合这一客观实际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为正确地发挥自觉能动性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这对全面开创社会主义建设新局面，力争在本世纪末完成我党提出的伟大战略任务具有重大意义。

第四节 反对主观主义

尊重实际，尊重客观规律，坚持实事求是，实现主客观的统一，就必须反对主观和客观相分裂、理论和实践相脱离的主观主义。实事求是与主观主义是相对立的思想路线、思想方法。反对主观主义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丰富和发展。

一、主观主义是实际工作中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表现形态

主观主义是一种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因此实事求是同主观主义的对立，是两条哲学路线的对立。从本质属性来说，主观主义属于唯心主义哲学路线，但就其表现

形态来说，它们又有所不同。因为，主观主义一般并不公开否认“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的唯物主义原理，并不直接表现为哲学唯心主义的理论形态，而表现为实际工作中的唯心主义倾向。毛泽东认为，不仅实际工作中的唯心主义倾向是主观主义，而且实际工作中的形而上学思想方法也是主观主义。他说：“片面性、表面性也是主观性，因为一切客观事物本来是互相联系的和具有内部规律的，人们不去如实地反映这些情况，而只是片面地或表面地去看它们，不认识事物的互相联系，不认识事物的内部规律，所以这种方法是主观主义的。”^①

主观主义的基本特征是主观和客观相分裂，认识 and 实际相脱离。毛泽东说：“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②主观主义的思想方法，在实际工作中不可避免地要犯错误。但是，这并不是说所有工作上的失误都是由主观主义引起的。因为，人的认识是一个多层次的、曲折发展的过程，除去思想方法对认识有决定性影响以外，人们的认识还受其他许多因素的制约。从客观方面说，客观事物有一个发展过程，当它还没有充分展开的时候，人们就不可能清楚地认识它，同时，人们的认识还要受到一定的历史条件和科技水平的限制。从主观方面说，人们的认识还要受认识主体条件的局限，如实践经验不足，知识水平不高，认识能力不强等等，都会出现主观和客观相脱离的现象。因此，我们不能把任何错误都不加分析地说成是主观主义的错误，以防止冲淡和模糊对主观主义本质的认识，而必须从思想方法上抓住主观主义从主观出发、从本本出发这个要害，才能揭露主观主义的本质。

在我党历史上，主观主义者不注重对中国现实的调查研究，

①② 《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第153、134页。

不注重对中国历史的调查研究，不注重对马列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学习和在中国革命实际中的应用。在他们担负党的领导工作时，他们的路线、策略和方法不是根据中国实际制定的，而是坐在房子里凭空想象出来的。他们或者把自己的计划建筑在一厢情愿的基础上；或者完全不要预见和计划，成为一味盲干的鲁莽家。他们既不能认识中国这个客观世界，也就把改造中国这个客观世界的事情闹得一塌糊涂，使革命事业遭受了惨重的挫折和失败。毛泽东说：“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如果不懂得从改造世界中去认识世界，又从认识世界中去改造世界，就不是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一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果不懂得从改造中国中去认识中国，又从认识中国中去改造中国，就不是一个好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①又说：“我们的老爷之所以是主观主义者，就是因为他们的一切革命图样，……都不根据于客观实际和不符合于客观实际的”，“他们的图样不是科学的，而是主观随意的，是一塌糊涂的。”^②

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基本理论，对脱离中国革命实际的主观主义，从实践和理论上进行了揭露和批判。毛泽东的科学著作《反对本本主义》、《实践论》、《矛盾论》、《〈共产党人〉发刊词》、《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等等，都是在反对主观主义的斗争中写成的，对主观主义的错误进行了清算，从而批判了实际工作中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错误，坚持了党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阵地。

二、主观主义是一种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

主观主义或形式主义，是长期存在于党内和革命队伍内部的

^{①②}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485、486页。

一种不正派的学风，是一种反马克思主义的学风。它的实质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即根本违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

主观主义有多种多样的表现形式。在延安时期，毛泽东指出：当时主观主义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教条主义，一种是经验主义。

教条主义的特点，是轻视实践，片面地夸大理论的作用。教条主义者不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认真研究中国革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过去和现在，认真地研究中国革命的经验，从中得出合乎马克思主义的结论，作为中国革命的行动指南，并在群众的实践中去考验这些结论是否正确；相反，他们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质，把马克思主义书本上的若干词句当作千古不变的教条，到处生搬硬套。他们轻视实践经验，攻击理论联系实际是“狭隘经验论”。他们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自以为是、自高自大、夸夸其谈、高高在上，作官当老爷。毛泽东称这种人，只是“为了单纯地学理论而去学理论”^①，“只把兴趣放在脱离实际的空洞的‘理论’研究上。”^②这就完全阻碍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

经验主义的特点，是轻视理论，片面地夸大经验的作用。他们满足于自己的局部经验，企图把其“经验”当作框框到处套用，不懂得而且不愿意承认革命理论的重要意义，因而轻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并醉心于一时一地的一得之功和一孔之见，不能洞察客观事物的本质，通观客观过程的全貌，把局部经验绝对化，因而在行动上往往表现为偏执、狭隘、保守。毛泽东说：这种人“也不注意客观情况的研究，往往单凭热情，把感想当政策”。^③这些人不懂得经验是宝贵的，但它又是具体的、历史的，

^{①②}《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476页。

^③《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476页。

它要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有它的局限性。经验主义者看不到这一点，把局部经验当作普遍真理，从而堵塞了真理发展的道路。

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是“从不同的两极发生的東西”，但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片面性。那就是他们都违背了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割裂了理论和实践、主观和客观的相互关系，都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割裂开来，形成对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许多共同的错误的认识。所以，二者可互为条件、互相合作结合在一起危害革命事业。不过由于经验主义者的“经验”是局部的、狭隘的，他们对于全面性的问题缺乏独立的明确的见解，所以在同教条主义合作的时候，往往成为教条主义的附庸。

毛泽东指出，主观主义是一种反科学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只有打倒了主观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才会抬头，党性才会巩固，革命才会胜利。

主观主义的产生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和思想认识根源。

毛泽东指出，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这些东西在我们党内，是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中国是一个小资产阶级成份极其广大的国家，我们党是处在这个广大阶级的包围中，我们又有很大数量的党员是出身于这个阶级的，他们都不免或长或短地拖着一条小资产阶级的尾巴进党来。小资产阶级革命分子的狂热性和片面性，如果不加以节制，不加以改造，就很容易产生主观主义、宗派主义”。^①

主观主义的产生，还有深刻的认识论根源。从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关系来看，夸大感性认识就会重复“经验论”的错误，夸大理性认识就会陷入“唯理论”的错误。从认识运动的秩序来看，

^①《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509页。

就是割裂了认识真理的正常秩序。从认识运动的规律来看，人类认识往往要经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多次反复过程，才能实现。如果把认识片面化、绝对化，就不可避免地犯主观主义的错误。

三、反对主观主义是一项长期的任务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主观主义进行了长期的斗争，为党的思想建设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但是，反对主观主义不是一劳永逸的事情，而是思想理论战线和实际工作中的一项长期的根本任务。

首先，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主观同客观、理论同实践的矛盾会永远存在。恩格斯说：“一个事物的概念和它的现实，就象两条渐近线一样，一齐向前延伸，彼此不断接近，但是永远不会相交”。^①这说明过去、现在、将来，直至永远，只要人类存在，就总会有主观同客观的矛盾，总会有主观同客观的统一问题。如果不注重唯物论，片面地夸大主观能动性，不随时解决主观同客观的矛盾，就必然产生主观主义。一万年以后也会有主观主义存在，尽管其具体表现形式会有很大的不同。

其次，任何个人都很难避免犯主观主义错误。毛泽东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从理论上一直坚持反对主观主义，即使在他的晚年，在思想上和理论上，也仍然坚持反对主观主义。但在行动上却往往陷入主观主义的错误，背离了他自己一贯倡导的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根本原则。这同他晚年难于深入实际和接近群众，不能做好真正的调查研究是分不开的；也同他在一定程度上骄傲自满，思想僵化，不能再虚心听取批评和劝告，以及整个党和国家存在着家长制作风，个人迷信、干部职务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15页。

终身制等制度分不开的。这说明即使像毛泽东这样曾经在历史上长期同主观主义作过斗争的伟大领袖人物，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也难免产生主观主义的错误。哲学和自然科学告诉我们，世界在空间、时间上的发展是无穷的，无论何人，哪怕是伟大人物，他所涉足的领域都是很有限的。在他活动的领域内，由于客观的条件，特别是主观的努力，可能比他同时代的人站得高些、看得远些，但他的知识毕竟带有一定的局限性。如果因为客观原因，特别是主观原因，使他自己的思想停滞了、僵化了，他的思想不能同实践发展一起前进，就不可避免地犯主观主义的错误。任何人犯主观主义错误是难免的，但是，无产阶级政党及其领袖人物，应该依靠集体的智慧，避免犯全局性、长期性的主观主义错误。

最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仍然要防止和克服主观主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恢复和发展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恢复了理论联系实际、调查研究、群众路线、民主集中制等优良传统，并正在深入开展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方面的改革，50年代后期以来严重存在于党内的主观主义作风已经得到了很大克服。但是新的历史条件下，旧的主观主义还要继续克服，新的主观主义也需要防止和克服。长期以来存在于党和国家干部工作中假、大、空的坏作风仍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变。现在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坚持改革、开放两个基本点。但目前却仍然有相当数量的党员和干部不能把这两个基本点很好地结合起来。其中一部分人还没有从僵化和半僵化的状态中解脱出来，另有一部分人则存在着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倾向。可以说，这是新形势下主观主义的两种主要表现形式。后一种主观主义在强调改革开放的口号下，比较容易迷惑天真烂漫的青年学生，致使他们上当受骗，但在社会主义已经深入人心的中国，比较容易得到克服；前一种主观主义，因为打着“传统社会主义”的旗号，是一种比较难于克服的顽症，应该用更大的注意力克服

它。不过，只要我们学习历史上反对主观主义的经验，贯彻耐心说服、正面教育的方针，采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用实践作为衡量是非的标准，就一定能克服新形势下的各种主观主义，实现全党、全国人民的大团结，争取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胜利。

第三章

认识和实践相统一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是以实践为基础的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它的产生标志着人类认识史上的一次伟大革命变革。毛泽东非常重视认识论问题，他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继承、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他科学地阐明了实践及其基本形式；全面地论述了实践在认识中的地位和作用，深入地揭示了认识发展的辩证过程；创造性地提出和阐述了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这一认识论的中心问题。

第一节 实践是认识的基础

毛泽东在考察认识和实践的关系之前，首先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基本形式、基本特点及其相互关系，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实践观。

一、实践的科学含义和基本特点

马克思认为，实践是人们改造客观世界的“感性的活动”、“客观的活动”，同时它也体现了认识主体的能动性。^①他还指出：“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②列宁指出，实践是人

^{①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6—18页。

们有目的的物质活动。他说：“世界不会满足人，人决心以自己的行为来改变世界。”^①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的长期实践中，总结了新的经验，进一步发挥了马克思和列宁的思想。他指出：实践是人们“根据于一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以从事于变革客观现实”的活动。^②“思想等等是主观的东西，做或行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都是人类特殊的能动性。”^③在这里，毛泽东对实践概念的科学含义和实践的基本特点作了明确规定和阐述。

第一，指出了实践既不是纯主观的思维活动，也不是纯客观的实在本身，而是在主观思想指导之下的改造世界的客观活动。这不仅与唯心主义的实践概念根本不同，而且也与旧唯物主义实践概念划清了界限。

第二，强调了实践“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做或行动”，鲜明地突出了实践的能动性。这种能动性不仅表现在人们通过实践能动地认识世界，更重要地表现在人们通过实践能动地改造世界中。

第三，阐明了实践是广大人民群众改造自然和社会的实践，人民群众是实践的主体。所谓认识从实践中来，并受实践的检验，主要是从人民群众的实践中来，受人民群众实践的检验，这就突出了实践的社会性和群众性。

毛泽东关于实践含义和基本特点的科学规定，不仅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而且为我们党批判各种错误思潮，确立正确的思想路线，指导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提供了锐利的思想武器。

二、实践的基本形式及其相互关系

实践的形式问题，也是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中一个重要问题。

①《列宁全集》第38卷，第229页。

②③《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第135、228页。

马克思、恩格斯在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条件下，对实践形式曾作过多方面的论述。他们认为实践不仅包括生产实践和阶级斗争，而且也包括实验。列宁还认为，天文学上的观察、发现也是一种实践形式。毛泽东发挥了他们的思想，对实践形式及其相互关系进行了全面的精辟的论述。

首先，毛泽东从实践领域的广阔性出发，阐明了实践形式的多样性，并对实践的外延作了科学规定。他说：“人的社会实践，不限于生产活动一种形式，还有多种其他的形式，阶级斗争，政治生活，科学和艺术的活动，总之社会实际生活的一切领域都是社会的人所参加的。”^①这就是说，实践的形式是丰富多样的，实践的外延是极其广阔的。凡是社会的人所参加的社会实际生活的一切领域的活动，都是实践活动。

其次，毛泽东把实践形式作了科学概括和分类。多样的实践形式在社会实际生活中所处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因此，他把实践形式分为基本的和非基本的两大类。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社会实践的基本形式，其他社会实践活动是非基本的形式。后来，他再次强调社会的基本实践形式是建设社会主义三项伟大的革命实践，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这三大实践中来。

再次，毛泽东对三大基本实践形式的相互关系作了科学论证，并重点突出生产斗争。他认为“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东西”^②，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社会的其他一切活动都是在生产活动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如阶级斗争、科学实验、艺术和教育活动等等，无一不是在生产实践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并且归根到底都必须为生产实践服务。生产实践是和人类社会共始终的实践形式，它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也是人类认识的主要来源。

①《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第121页。

②同上书，第120页。

阶级斗争只是阶级社会中一项基本实践形式。在阶级社会中，人们的生产活动总是在一定的阶级关系中进行的，生产关系则集中表现为阶级关系。因此，阶级斗争对生产斗争实践和其他实践有着重要影响。

毛泽东认为科学实验也是一种基本实践形式。它作为相对独立的实践形式是近代社会化大生产的产物，并且随着近代和现代化的生产发展而日益发展起来，成为社会实践的一种重要形式。毛泽东所讲的科学实验首先是指自然科学实验，它是人们为成功地改造自然而进行的探索性和准备性的活动。它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获得某种物质成果，而是为了探求未知的客观过程及其规律。现在的科学实验已不限于自然科学，已扩展到社会科学。科学实验这种实践形式对生产实践和人类社会生活起着越来越大的推动作用。毛泽东把科学实验作为实践的基本形式之一并较早地明确提出来，确实是很有远见的。

毛泽东关于社会实践形式及其相互关系的思想，不仅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有关论述系统化和深刻化，在理论上作出了宝贵的贡献，而且对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任务就是大力发展生产力，促进经济的繁荣，这是全党全国人民的中心工作。正确处理好阶级斗争也很重要。阶级斗争虽然不是我国的主要矛盾了，但它并没有熄灭，在一定范围内还将长期存在，有时可能还会激化。因此，正确处理好阶级斗争仍然是社会主义时期的一项重要任务。科学实践对于我国现代化建设具有特别的重要意义。它不仅可以为我国提供先进的科学技术，而且也为我们提供先进的科学理论指导。实现科学技术、科学理论现代化是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可见，每一种基本实践形式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都起着独特的作用，都必须给予足够的重视。

三、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时，特别强调实践对认识的决定作用，认为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列宁指出：“生活、实践的观点，应该是认识论的首先的和基本的观点。”^①毛泽东进一步强调实践对认识的极端重要性，“把实践提到第一的地位，认为人的认识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②他从认识的来源、认识发展的动力、认识的真理性和认识的目的等方面，系统地全面地阐发了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一)实践是认识的来源

人的认识是从哪里来的呢？毛泽东说：“无论何人要认识什么事物，除了同那个事物接触，即生活于（实践于）那个事物的环境中，是没有法子解决的。”^③“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④“我们强调社会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意义，就在于只有社会实践才能使人的认识开始发生”^⑤。后来，他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文中，又简明而精辟地说：“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毛泽东在这里强调“一切”认识（知识、思想），“都是”或“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说明一切认识都是通过实践而产生的，实践是认识的唯一来源。

毛泽东在论述认识的来源时，还阐述了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的关系问题。人的认识只能来源于实践，这是就人类认识的整体而言的，但就个人而言，由于历史漫长的发展和无限的延续，个人生命、精力和能力的有限，没有可能也没有必要事事都要靠自己亲自实践去获得认识（即直接经验），这就需要学习前人和别人的知识（即间接经验）。学习间接经验是非常必要的。它可以使人们少走弯路，是缩短获得知识时间的有效途径；掌握间接经验还

① 《列宁选集》第2卷，第142页。

②③④⑤ 《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第122、125、126、129页。

能为人们获得直接经验指明方向、提高自觉性；还可以为进一步筛选和提炼直接经验提供理论指导。但是，掌握间接经验也离不开直接经验，直接经验是掌握间接经验的基础，也是鉴别间接经验的有力武器。从认识的来源来看，不论是间接经验还是直接经验，归根到底都是来源于实践。因为在我为间接经验则对前人或别人来说却是直接经验，所以从知识的总体来说，一切知识都来源于实践。离开实践的认识或知识就变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了。

毛泽东关于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的论述是很重要的，它不仅使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关于认识来源的理论得到了进一步完善和深化，而且对于我们克服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搞好改革开放、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具有指导意义。为了适应社会实践的需要，我们既要勇于实践，深入实际，获得丰富的直接经验；也要认真读书，向他人学习，掌握先进的科学理论，获得新的间接经验，把间接经验和直接经验有机地结合，从而使知识不断得到更新，使知识结构更加合理和优化。

（二）实践是认识发展的动力

毛泽东认为认识不但来源于实践，而且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实践是认识发展的动力。那么，实践为什么能推动人类认识的发展呢？这是因为：

第一，社会实践不断地向人们提出新的认识任务，推动着人们去追求、去探索、去总结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从而使人们的认识能够由不认识到认识、由片面到更多的方面、由低级到高级不断地丰富和发展。正如毛泽东所说：“人类社会的生产活动，是一步又一步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因此，人们的认识，不论对于自然界方面，对于社会方面，也都是一步又一步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即由浅入深，由片面到更多的方面。”^①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第121页。

第二、社会实践不断地为人们的认识发展创造和提供日益完备的认识工具和其他物质条件，从而大大地扩大了人们的认识范围，改善了人们的感官，推动了人们认识的发展和深化。毛泽东说，工具是人的感官的延长：锄头是手臂的延长，望远镜是眼睛的延长，身体五官都可以延长。由于现代科学的发展，人类创造越来越高级越复杂的工具，帮助人们向宇宙更广阔的领域更深的层次进军，获取越来越多的信息，把人们的认识推向更加崭新的阶段。

第三，社会实践的发展不断地锻炼和提高人们的思维能力和认识能力。这也是推动认识发展的重要条件。恩格斯说：“人的智力是按照人如何学会改变自然界而发展的。”^①毛泽东在《实践论》中以指挥员指挥战争的能力和干部的领导能力为例，深刻而生动地说明了人的实践能力、思维能力和认识能力不是天生的，而是在实践中锻炼和提高的。实践得越多，实践的能力越强，思维和认识能力也就越强。^②人类的思维和认识能力就是在长期的改造世界的实践中提高的。

（三）实践是检验认识真理性的唯一标准

关于认识的真理性标准问题，马克思指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具有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③恩格斯说：“对这些以及其他一切哲学上的怪论的最令人信服的驳斥是实践，即实验和工业。”^④列宁认为：必须把人的全部实践——作为真理的标准。毛泽东继承了他们的思想，并在此基础上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51页。

② 参看《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第128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6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1页。

进一步明确提出实践标准的唯一性。毛泽东指出，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检验人们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此外再无别的检验真理的办法。”^①1963年，毛泽东更加明确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标准的唯一性就排除了其他任何别的标准，即使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也不能作为检验标准，因为它本身是属于认识范畴，它的客观真理性也是在运用于实践的过程中体现出来的。同样，逻辑证明也不是检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而只是证明的手段，它本身的真伪仍然需要由实践检验和证明。

毛泽东还发挥了列宁关于实践标准的确定性和不确定性的思想，指出实践检验认识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一种理论学说，特别是社会历史领域中的理论学说的检验往往不是一蹴而就的，而需要经过较长的时间和多次反复的检验才能得到证明。对此，毛泽东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文中作了明确而又生动的阐述。

（四）实践是认识的最终目的

人类不是为认识而认识的，认识世界是为了改造世界，为实践服务。不为改造世界的实践服务的理论是没有用处的。毛泽东说：“马克思主义看重理论，正是，也仅仅是，因为它能够指导行动。如果有了正确的理论，只是把它空谈一阵，束之高阁，并不实行，那末，这种理论再好也是没有意义的。”^②又说：“无产阶级认识世界的目的，只是为了改造世界，此外再无别的目的。”^③毛泽东在这里再明确不过地指明实践是认识的最终目的。

四、用实践论的观点，阐明了天才问题的理论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曾先后从不同的角度和方面对天才问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40页。

② 《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第131页。

③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40页。

题进行过论述，但他们并没有把天才问题作为认识论问题提出来加以系统的阐发，这个任务是毛泽东完成的。1937年，在《实论》里曾谈到过天才问题；1970年，在反对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中，他又从实践论的高度揭示了天才问题的本质，从而在理论上作出了深刻论证。

毛泽东指出，天才问题是一个认识论问题。所谓天才，无非是比较聪明一点，才智高一点，反映客观事物的能力强一点。这种聪明才智属于知识的范畴，属于认识论的内容。但人的这种聪明才智，主要不是靠先天的生理素质，而是靠后天的学习和实践锻炼逐步形成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并不一般地否认个人在知识、才能上的差别，也并不否认人们在生理素质上的差异。良好的生理素质是后天发展的有利条件，但它只是为后天成才提供了可能性，它本身并不就是现实的天才。后天的实践条件和主观努力才是成才的关键。离开后天的实践，不要说聪明才能不会产生，就是连一般的认识也是不可能产生的。毛泽东说：“一个闭目塞听、同客观外界根本绝缘的人，是无所谓认识的”。^①实验证明，人的先天生理素质方面的差别是很小的。马克思说：“搬运夫和哲学家之间的原始差别要比家犬和猎犬之间的差别小得多，他们之间的鸿沟是分工掘成的。”^②人们在聪明才智方面的差别，主要是后天实践造成的。由于人们所处的时代条件、实践地位的不同，所参加的实践深度和广度的不同，各个人的主观条件的不同以及主观能动性发挥程度的不同，由此形成的人们的聪明才智也就不同。

毛泽东还指出，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才能和智慧也不是天生的，而是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他说：“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之所以能够作出他们的理论，除了他们的天才条件之外，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第12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24页。

主要地是他们亲自参加了当时的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实践，没有这后一个条件，任何天才也是不能成功的。”^①这里所讲的“天才条件”决不是说的“天生条件，而是相对于他们参加当时的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来说，在以前的实践中他们所形成的智慧和才能。但就才能的总体来说，都是来自实践。总之，任何天才包括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在内都是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所以，毛泽东指出：天才不是靠一个人靠几个人，天才是靠一个党，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天才是靠群众路线，靠集体智慧。

毛泽东关于天才问题的论述，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唯物史观相统一的思想。1970年，毛泽东在批判林彪的唯心论的先验论时指出：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人的认识（才能也属于知识的范畴）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的先验论，还是唯物的反映论？毛泽东科学地回答了这些问题，深刻地揭示了天才问题的本质。在认识论上，坚持并发展了实践是认识的基础的理论；在历史观上，坚持并发展了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的观点。这样，就把实践观点和群众观点、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和唯物主义历史观有机地结合起来。这一思想对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建设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第二节 认识的辩证过程

毛泽东运用唯物辩证法，系统地全面地考察了实践和认识这对矛盾的辩证运动，指出认识运动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发展过程，并揭示了这种辩证运动中各个阶段和总过程的特点和规律。

一、认识过程的两次飞跃

人的认识是怎样从实践中产生又在实践中发展的呢？列宁说：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第125页。

从生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维，并从抽象的思维到实践，这就是认识真理、认识客观实在的辩证途径。毛泽东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和发展了列宁的思想，科学地论述了认识辩证发展过程中的两个飞跃的思想。

(一)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能动飞跃

从感性认识能动地飞跃到理性认识，这一过程也就是由实践到认识，由物质到精神的飞跃。这是认识发展过程中的第一次飞跃。毛泽东认为，人的认识分为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两个不同的阶段。感性认识是人的认识的最初阶段，它是人们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过程中，客观外界事物作用于人们的感官(耳、目、鼻、舌、身)而产生的关于事物的现象的、片面的、外部联系的认识。这种认识由于它是和事物直接联系，因而具有直接性、生动性和多样性等特点。这是认识过程的初级阶段，然而又是必经的阶段。但这种认识有很大的局限性，它还没有达到对事物内部的、本质的、规律性的认识。因此，必须由此继进，把感性认识阶段提高到理性认识阶段。

理性认识是认识发展过程的高级阶段。理性认识是关于事物内部的本质的规律性的认识，因此，获得理性认识更为重要，是认识的真正任务。毛泽东说：“认识的真正任务在于经过感觉而到达于思维，到达于逐步了解客观事物的内部矛盾，了解它的规律性，了解这一过程和那一过程间的内部联系，即到达于理论的认识。”^① 理性认识一般表现为概念、判断、推理等形式。它具有间接性、抽象性和概括性等特点。可见，理性认识和感性认识是同一认识过程中两个不同质的阶段(或形式)。由感性认识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是认识发展过程中的一次质的飞跃。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第124页。

感性认识是理性认识的基础，离开感性认识，理性认识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感性认识有待于发展到理性认识。因为感性认识只解决事物的现象问题，理性认识才解决事物的本质问题。

毛泽东在论述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关系时，还批判了哲学史上割裂二者关系的“唯理论”和“经验论”的错误。唯理论“只承认理性的实在性，不承认经验的实在性，以为只有理性靠得住，而感觉的经验是靠不住的”。^①经验论则相反，“以为只有感性认识可靠，而理性认识是靠不住的，这便是重复了历史上的‘经验论’的错误”。^②这两种理论都不懂得认识的历史性和辩证性，虽然各有片面的真理性，但在认识的总体上都是错误的。毛泽东指出，我们党内犯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错误的同志的认识论根源，他们在思想实质上犯了同哲学史上唯理论者和经验论者同样性质的错误。

感性认识必须上升到理性认识，然而，感性认识怎样才能上升到理性认识呢？根据毛泽东的论述，必须具备三个条件：第一，社会实践的需要和推动。社会实践的需要不仅推动人们的认识产生，而且推动人们的认识发展，即由感性认识发展到理性认识。毛泽东指出：“任何过程，不论是属于自然界的和属于社会的，由于内部的矛盾和斗争，都是向前推移、向前发展的”。因此，“人们的认识运动也应跟着推移和发展。”^③又说：“社会实践的继续，使人们在实践中引起感觉和印象的东西反复了多次，于是在人们的脑子里生起了一个认识过程中的突变（即飞跃）”，^④便产生了理性认识。第二，要有丰富的和合乎实际的感性材料。毛泽东认为，“感觉的材料十分丰富（不是零碎不全）和合于实际（不是错

①②③ 《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第129—133页。

④ 同上书，第123页。

觉)，才能根据这样的材料造出正确的概念和论理来。”^① 第三，运用科学的思维方法进行改造制作的逻辑加工。毛泽东指出：“必须经过思考作用，将丰富的感觉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②。只有对感性材料进行分析和综合，科学的抽象和概括，才能使认识由感性上升到理性，达到对事物本质的规律性的认识。毛泽东的这十六字的科学抽象法是中国革命实践经验的总结，是反对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斗争成果的哲学概括。这从理论上进一步丰富和深化了列宁关于辩证法、认识论和逻辑学三者一致的思想。

（二）从理性认识到实践的能动飞跃

认识的辩证发展过程还表现为由理性认识到实践的飞跃，即由认识到实践、精神到物质的飞跃。这一次飞跃比第一次飞跃更为重要。毛泽东指出：“认识从实践始，经过实践得到了理论的认识，还须再回到实践去。认识的能动作用，不但表现于从感性的认识到理性的认识之能动的飞跃，更重要的还须表现于从理性的认识到革命的实践这一个飞跃。”^③ “这次飞跃，比起前一次飞跃来，意义更加伟大。”^④ 从认识到实践的飞跃之所以更重要、意义更加伟大，这是因为：

第一，人们在感性认识的基础上所获得的理性认识，是否正确，正确的程度如何，并没有受到实践的检验，得到实践的证实。只有通过第二次飞跃，把理论运用于实践，看它是否能达到预期的目的，一般说来，凡是达到预期的目的，这就是正确的理论，否则就是错误的理论。只有通过第二次飞跃，第一次飞跃是否正确才能得到检验和证明。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第129页。

② 《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第130页。

③ 同上书，上册，第131页。

④ 同上书，下册，第840页。

第二，理性认识回到实践中去，不仅受到实践的检验，而且得到进一步补充、丰富和发展。因为客观事物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往往不是一次能完成的。理性认识回到实践中去，必将使不正确的认识得到纠正，不全面的认识得到补充，不深刻的认识得到深化，从而推动认识进一步发展。

第三，认识回到实践中去，既是检验和发展深化认识的过程，也是理性认识指导实践的过程。这是认识更为重要的阶段，是整个认识过程的继续。这一思想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一个重要的新贡献。

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

人类认识史表明，人们认识客观规律总是要有一个过程。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要经过从不认识到认识，从不完全不深刻的认识，到比较完全比较深刻的认识，而且必须经过实践的验证、经过成功与失败的比较，在反复实践、反复认识中，才能使认识合乎客观规律。

（一）认识过程的多次反复

毛泽东说：“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①

那么，为什么人的正确认识往往不可能一次完成而必须经过多次反复的过程呢？这是因为：

第一，人的认识受客观对象的发展及表现程度的限制。作为认识对象的客体是具体的、多样的、复杂的，而且它的发展也有一个过程，甚至是无止境的。当着事物发展过程中各方面的矛盾及其本质还没有充分暴露的时候，人们还无法充分认识和掌握它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40页。

的发展规律，只有当其充分暴露时才有可能认识和把握它。要做到这一步，需要有一个过程。

第二，人的认识也受着科学技术条件的限制。人们在认识世界时，不仅受客观对象发展过程的限制，而且还受着当时的历史条件和科学技术条件的限制。当一定的科学技术条件尚不具备时，人们对客观对象的认识是会受到影响，甚至是根本不可能的。例如，在显微镜产生以前，人们对微生物就难以进行研究和认识；没有射电望远镜要考察和研究远距二百亿光年的星体那是无法想象的。现在人们对微观粒子认识，虽然已取得了可喜的成就，还有许多科学的假说虽已接近科学的判断，但由于实验条件不具备尚不能得到确认和作出科学的结论。

第三，从认识的主体来看，认识也受到个人实践范围、知识结构、水平、阶级立场、思想意识、思维方法和认识能力等诸多方面的限制。一般来讲，人们的文化知识结构越合理，思想觉悟越高，思想方法越科学，人们就越能从实践中从学习中获得正确的知识，反之亦然。由于这些主观方面因素的影响，因此人们要获得正确认识不得不经过多次反复的过程才能实现。

（二）人类认识是反复循环，无限发展的过程

人们对于—个具体事物或过程的认识，经过多次反复可以完成。而对于整个世界的认识则是一个无限反复和深化的过程。恩格斯说：“人的内部无限的认识能力和这种认识能力仅在外 部 被局限的而且认识上也被局限的个别人身上的实际存在二者之间的矛盾，是在至少对我们来说实际上是无穷无尽的、连绵不断的世代中解决的，是在无穷无尽的前进运动中解决的。”^①列宁也认为：“人不能完全把握＝反映＝描绘全部自然界、它的‘直接的整体’，人在创立抽象、概念、规律、科学的世界图画等等时，只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60—161页。

能永远地接近于这一点”。^①毛泽东继承并发挥了恩格斯和列宁的思想，在总结历史的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第一次明确地概括出人类认识运动的总规律或总过程。“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②在这里，毛泽东对人类认识运动的规律作了高度概括，具有非常丰富的内容。

第一，这一科学概括揭示出人类认识运动的总规律或总过程，使之具有更加明确简洁、更加完备的理论形态。这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关于认识是一个过程的思想的深化和升华。

第二，这一科学概括明确地揭示出认识与实践的矛盾是贯穿于人类认识过程始终，推动人类认识发展的基本矛盾。人类的认识运动就是认识与实践这一对矛盾不断产生又不断解决的过程。人类实践的发展没有止境，人类认识的发展也永远不会完结。人类认识运动正是在实践和认识矛盾的不断解决，又不断产生的过程中前进的。

第三，这一科学概括还揭示出人类认识运动的形式是循环往复曲折前进的过程。也就是说，人类认识运动从形式上看是无限循环，是重复，但不是简单循环、重复，而每一循环重复都比较地进到了高级的程度。人类认识就是在这个无限循环重复的过程中前进、深化的。

第四，这一科学概括还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再认识的概念。毛泽东认为社会实践是不断发展的，人们的认识也是不断前进的，再认识是人类认识运动中的普遍现象。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辩证发展过程。再认识是这个认识总过

① 《列宁全集》第38卷，第194页。

② 《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第136页。

程中的一个基本环节。实质上，人类的每一认识都可以说是再认识。因为人类的认识都是在实践的基础上不断更新的过程，每一具体认识都既是过去认识的结果，又是今后认识的起点。人类认识就是要不断发扬正确的认识，纠正错误的认识，抛弃过时的认识，补充新的认识，从而使之不断更新、深化和发展。

毛泽东关于再认识的思想，是我们党在民主革命时期正确认识中国的国情、社会性质和革命的发展规律，从而夺取革命胜利的理论指南，今天它仍然是我们党指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有力思想武器。党中央曾向全党全国人民发出号召：对社会主义进行再认识。

三、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

毛泽东在论述认识的辩证发展过程时，明确地概括出一条重要的科学结论，他说：“我们的结论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反对一切离开具体历史的‘左’的或右的错误思想。”^①毛泽东的这一科学结论是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重要发展和贡献。

第一，这一结论是对认识发展史的科学总结。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唯物主义者正确地回答了认识是主观对客观的反映，但他们都不懂得是在实践基础上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中国哲学史上关于知行关系曾长期争论不休，但它们也都没有给予科学解决。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分析了人类认识的发展史，认为主观和客观的矛盾是贯穿人类认识运动始终的基本矛盾。这一基本矛盾在实践过程中则表现为认识和实践、知和行的矛盾。它们在实践中产生又在实践中解决。人们的认识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得到发展的。也就是说，人的认识产生和发展的过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第135页。

程就是在实践的基础上，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矛盾不断产生又不断解决的过程亦即具体的历史的统一过程。

第二，这一结论是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本质特征的精辟概括。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是以实践为特征的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它认为认识的根本任务就在于在实践的基础上达到主观和客观、理论与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这个统一应当是具体的，也就是说，主观认识要同一定时间、地点、条件下的客观实践相符合相统一。这个统一，也应当是历史的，也就是说，主观认识要同不断变化发展着的客观实践相符合相统一。只有达到这种具体的历史的统一，人们才能获得真理性的认识，但把这种真理性认识运用于实际改造客观世界时，也总是要和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实践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必须和实践相结合的道理就在于此。由此可见，不论是正确地认识世界，还是有效地改造世界，都应当是使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达到具体的历史的统一。

第三，这一结论深刻地揭示党内两条不同政治路线的认识论基础。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曾出现过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给革命事业带来了极其严重的危害。这种错误路线其具体表现形式是不同的，但其认识论根源却是共同的，这就是毛泽东所指出的，它们“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也就是说，它们都是离开了主观和客观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路线，它始终坚持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这条正确的路线是以科学的社会实践为特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认识论为其理论基础的。可见，毛泽东所得出的结论，不仅深刻的揭露和批判了机会主义错误路线的认识论根源，而且还科学地阐明了党的正确路线的认识论基础。

第三节 通过实践发现、证实和发展真理

毛泽东在分析了认识运动的辩证过程的基础上，进一步揭示了人们认识真理的道路和真理发展的规律，从而对马克思主义真理观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在实践中不断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认为，实践是认识的基础，认识在实践中产生又在实践中发展。人的认识的任务和目的就在于在实践的基础上透过现象认识事物的本质，掌握事物发展的规律，从而获得真理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人们在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中进一步检验真理，发展真理。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永无止境，人们对真理的认识永远也不会完结。毛泽东指出：“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①毛泽东这一论述为我们指明了认识真理、发展真理的道路。

第一，为要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首先必须明确世界的发展是无限的，人的认识的发展也是无止境的。由不认识到认识、由不深刻不全面的认识到比较深刻比较全面的认识，这个过程也是由相对真理到绝对真理的过程。客观物质世界不论从宏观上还是从微观上讲都是无限的，这就决定了人们对它的认识也是无限的。人们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所取得的认识只具有相对真理的性质，但每一相对真理中都包含有绝对真理的颗粒，无数相对真理的总和就是绝对真理。毛泽东说：“马克思主义者承认，在绝对的总的

^①《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第135页。

宇宙发展过程中，各个具体过程的发展都是相对的，因而在绝对真理的长河中，人们对于在各个一定发展阶段上的具体过程的认识只具有相对的真理性。无数相对的真理之总和，就是绝对的真理。”^①又说：“全世界自古以来，没有任何学问、任何东西是完全的，是再不向前发展的。”“事情总是不完全的，这就给我们一个任务，向比较完全前进，向相对真理前进，但是永远也达不到绝对完全，达不到绝对真理。所以我们要无穷尽无止境地努力。”^②

我们党对中国革命和建设规律的认识过程，就是从不认识到认识、从不全面到比较全面的认识过程。毛泽东说：我们“对于在中国如何进行民主革命的问题，从一九二一年党的建立直到一九四五年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一共二十四年，我们全党的认识才完全统一起来。”^③“在民主革命时期，经过胜利、失败，再胜利、再失败，两次比较，我们才认识了中国这个客观世界。”^④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也是经过了胜利与挫折、成功与失误的多次反复才逐步认识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党由于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对于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越来越深刻，认识到我们现在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且找到了一条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是对社会主义再认识的一次巨大飞跃，也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创造性的贡献。但是，我们对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并没有完结，仍然需要继续努力探求，从而获得对社会主义发展规律更全面更深刻的认识。

第二，在认识和发展真理的前进过程中，要反对两种错误的倾向，一种是绝对主义，一种是相对主义。这两种错误倾向在哲

①《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第134—135页。

②毛泽东：《‘七大’工作方针》，1981年7月16日《人民日报》。

③④《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24、825页。

学史上都长期存在过，在我们党领导中国革命的长期实践中，也曾产生过类似于这两种错误的倾向。曾经是我们党内主要错误倾向的主观主义即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就是属于真理问题上的绝对主义。教条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革命导师的言论教条化，把苏联的经验、共产国际的决议神圣化，否认革命理论需要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需要在革命斗争的实践中进一步丰富发展；而经验主义者则把自己的经验绝对化，并夸大为绝对的普遍的东西。那种在“十年动乱”期间曾经存在着的把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割裂开来，否定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真理，而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所出现的怀疑和否定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可说是属于真理问题上的相对主义。

我们坚决反对这两种错误倾向。在真理问题上，在对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态度上，一定要坚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科学真理，是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的统一体，必须坚持它；同时，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也不是封闭的体系、停滞不前的，而是开放的科学体系，在和革命实践的结合中不断丰富发展的。正如毛泽东所说：马克思主义一定要向前发展，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不能停滞不前。停止了，老是那么一套，它就没有生命了。但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是不能违背的，违背了就要犯错误。

第三，为要不断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必须参加社会实践。实践是真理发展的源泉和动力，人们只有不断地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才能不断地去接触和发现实践中的新情况、新问题，积累大量合乎实际的感性材料；同时还要开动脑筋，解放思想，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去掌握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新知识，运用科学的思维方法，把获得的感性认识提炼、升华，使之成为带有系统性的科学理论，不断地丰富和发展人类的认识，为人

类认识的长河增添新的真理颗粒。

二、真理同谬误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

在谈到真理和谬误的关系时，马克思指出：“最好是把真理比做燧石——它受到的敲打越厉害，发射出的光辉就越灿烂。”又说：“真理通过论战而确立。”^①毛泽东总结了人类认识发展的历史经验和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战斗历程，明确地把真理同谬误“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作为真理发展的规律提了出来。他说：“正确的东西总是同错误的东西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真的、善的、美的东西总是在同假的、恶的、丑的东西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当着某一种错误的东西被人类普遍地抛弃，某一种真理被人类普遍地接受的时候，更加新的真理又在同新的错误意见作斗争。这种斗争永远不会完结。这是真理发展的规律，当然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规律。”^②毛泽东这一科学概括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这一概括深刻地阐明了真理同谬误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真理同谬误是人们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产生的一对矛盾。真理是人们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而谬误则是人们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歪曲的反映。它们之间是根本对立的。在一定条件下真理就是真理，谬误就是谬误。但是二者之间又不是绝对对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的。一方面，二者相互依存同处于认识运动的过程之中，真理是同谬误相比较而存在的。没有真理，无所谓谬误；反之，没有谬误也无所谓真理。另一方面，真理和谬误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真理都是具体的，总是受一定的空间、时间和条件的制约，如果把适用于一定时间和地点的真理当作教条，机械地把它搬用于另一个时间和地点，这样真理就会变成谬误。例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9页。

^②《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85页。

如，城市武装起义对俄国无产阶级来说是真理，但把它硬搬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来，就会变成了谬误。

谬误也可以转化为真理。但这不是说谬误本身可以转化为真理，而是从特定意义上讲的。一种情况，是从总结经验教训、启发人们认真思考，使之成为人们认识真理的必要条件的意义上讲的。毛泽东说：“错误和挫折教训了我们，使我们比较地聪明起来了，我们的事情就办得好一些。”^①又说：“吃一堑，长一智”，“我们走过许多弯路，但错误常常是正确的先导”，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另一种情况是，相对于一定的具体条件，本来是错误的东西，当条件变化以后，可能成为真理。例如，从1927年到1949年3月，我们党的工作重心是在农村，而城市中心论的观点是错误的。但在1949年3月，毛泽东说：“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②这时城市中心论则是真理。

由此可见，真理和谬误是相比较而存在的，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相互转化的。但转化的条件是非常重要的，转化的情况也是不同的，必须予以区别对待。认真地不断地研究客观过程和条件的变化，才能正确处理好真理同谬误的关系。

第二，这一概括进一步从人类认识发展史出发，提出和阐明了真理是同谬误相斗争而发展的。

不论是自然科学的真理，还是社会科学的真理，它们每前进一步都是通过和谬误进行斗争而实现的，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达尔文的进化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等等，在其产生和发展的途程中，都和宗教神学、剥削阶级偏见、人们的错误的传统认识进行过激烈的斗争，有的还付出了血的代价才取得胜利的。马列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687页。

②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654页。

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一科学真理，也是和地主资产阶级思想、各种机会主义的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一切真理的发展都是和谬误的斗争联系在一起的，斗争的结果，真理总是要战胜谬误的，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为真理的发展提供了比以往任何时代更为优越的条件和环境。这已为大家亲身感受到。但这决不是说在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之后，人们探求真理、坚持和发展真理的道路是平坦而无障碍了。由于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旧社会的习惯势力和剥削阶级的思想仍然继续存在并发生作用，以及认识上的种种原因，真理的发展也决不是风平浪静的，“压抑新生力量，压抑合理的意见，仍然是常有的事。”^①但是，作为真正的革命者，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坚信真理、维护和坚持真理，不畏艰险，百折不挠，为真理而奋斗，甚至为真理而献身。

第三，这一概括为人们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指明了方向。革命者要坚持真理，为真理而斗争。因为真理是符合客观事实和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是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一致的；同时，革命者也应当敢于正视并迅速改正自己的错误，因为错误总是和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相违背的，总是违背人民根本利益的。革命者在革命斗争中不可能不犯错误，“任何政党，任何个人，错误总是难免的。”^②我们搞革命和建设，总难免犯一些错误。问题是要犯得少些、小些，犯了错误能正视它、改正它，改正得愈迅速愈彻底愈好。当然也应当允许别人犯错误、改正错误。在帮助别人改正错误时，既要心正、也要方法对。要坚持毛泽东提出的“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只有如此，才能既弄清思想，又团结同志，达到继续前进的目的。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

①《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84页。

②《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687页。

会以后，我们党正确地总结了建国以来党在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过程中的经验教训，采取了果断而有效的措施，纠正了工作指导上的严重失误，平反了冤假错案，使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和政治生活又重新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

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作为阶级的剥削阶级已被消灭，但在社会意识形态领域中还存在着复杂的矛盾和斗争，如何正确地认识和处理这些矛盾，发展我国的科学文化事业，已成为摆在党和人民面前的一个重要问题。毛泽东在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以及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的基础上，自觉地运用真理发展的规律，明确地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正确方针。这一方针是毛泽东在1957年2月的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的）会议上的讲话中宣布的。它是发扬学术民主、繁荣我国科学文化的基本方针。

毛泽东认为，在我国社会中还存在着各种矛盾，科学文化领域中也存在着各种是非、真伪、风格流派等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不能采取粗暴的“扣帽子”、“打棍子”的办法，只能自觉地运用真理的发展规律，贯彻“双百”方针，在艺术上让不同的形式和风格自由发展、科学上的不同流派进行自由讨论、辩论，以便明辨是非、真伪，这样才有利于艺术的发展和科学的进步。事实证明，“双百”方针是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文化艺术和科学繁荣发展的方针。

“双百”方针也是我党领导国家的一项长期的基本方针。毛泽东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是一个基本性的同时也是长期性的方针，不是暂时性的方针。”又说：“领导我们国家可以采用两种不同的方法，或者说两种不同的方针，这就是放和收。”^①所谓放，

^①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14页。

就是放手让大家提意见，让人家敢于说话，敢于发表自己的看法，敢于批评特别是敢于批评领导机关和负责人；既允许批评的自由，也允许反批评的自由，允许争论；对于错误的意见，不能压服，以力服人；而是讲道理，以理服人，才能真正解决问题。实践证明，凡是这样做了，我们的科学文化事业就繁荣昌盛，我们的政治生活就安定团结，生动活泼；反之，凡是不贯彻或违背了“双百”方针，则是另一番景象，特别是林彪、“四人帮”横行期间，科学文化备受摧残，政治民主、学术民主完全被取消，实行封建的法西斯专政。

粉碎“四人帮”之后，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们党认真地总结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重新恢复并正确贯彻了“双百”方针，使社会主义的科学文化事业空前繁荣发展，民主生活空前活跃，形成了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四、改造主观世界同改造客观世界的关系

认识真理、坚持真理都离不开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活动。人们在改造世界的过程中，一方面，发现真理、验证和发展真理。另一方面，又运用真理为改造世界的实践服务。追求真理的目的就是为了改造世界。毛泽东说：“社会的发展到了今天的时代，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责任，已经历史地落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肩上。”“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改造世界的斗争，包括实现下述的任务：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①所谓改造客观世界，就是改造自然、改造社会，其中也包括改造一切反对改造的人们。所谓改造主观世界，就是改造自己的思想、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

为了有效地改造客观世界，首先必须改造主观世界，正确地

^①《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第135页。

认识客观世界。因为改造客观世界是以认识世界为前提、以一定的理论为指导的。这种认识 and 理论是否正确即是否符合客观实际，这是决定改造客观世界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因此，自觉地改造主观世界，改造认识能力和思想方法，提高理论水平，是非常重要的，是改造客观世界得以顺利进行并取得成功的可靠保证。

但是，主观世界的改造又离不开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活动，必须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过程中进行主观世界的改造。当然，改造主观世界的途径和办法不限于一种而是多方面的，比如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学习科学文化知识、自我修养，进行培训等等。但最根本的途径和办法还是参加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活动。因为认识来源于实践，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是推动主观世界改造的强大动力，是获得知识、增长才干、锻炼思维方法、提高道德情操的最好学校。同时，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过程中，人们既积累了成功的经验，也常常会有失败的教训，在某种意义上失败的经验更能教育人，人们从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比较中，可以锻炼和提高分析和认识能力。所以，主观世界的改造应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过程中进行，自觉地积极地参加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活动是改造主观世界的有效的根本途径。改造客观世界是无止境的，改造主观世界也是无止境的，活到老改造到老。

无产阶级政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人民群众，承担着改造客观世界和改造主观世界的双重任务。当前，我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为了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正在艰苦奋斗，努力改造客观世界，建设社会主义的高度物质文明；同时也在自觉地改造主观世界，建设社会主义的高度精神文明。这也是为将来过渡到共产主义创造条件。“世界到了全人类都自觉地改造自己和改造世界的时候，那就是世界的共产主义时代。”^①

^①《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第136页。

第四章

矛盾普遍性与矛盾特殊性相联结

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深刻地揭示了矛盾规律是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从分析矛盾的普遍性入手，接着系统地论述了矛盾的特殊性的学说，最后阐明了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提出了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关系是矛盾问题的精髓的著名论断，为马克思主义矛盾辩证法增添了新的篇章。

第一节 唯物辩证法的核心与矛盾的普遍性

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并贯串于一切过程的始终。矛盾规律是辩证法最根本的规律，它的内容是异常丰富多彩的。人类对矛盾规律的认识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地深入。

毛泽东综合了前人的成果，对矛盾规律的丰富内容及其在辩证法科学体系中的核心地位作了明确的、系统的说明。

一、矛盾规律是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

马克思、恩格斯批判继承了人类文化的优秀遗产，高度概括了自然科学的新成就，深刻总结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经验，创立了唯物辩证法，并写下了许多充满唯物辩证法思想的光辉巨著，奠定了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尽管他们在论证辩证法诸规律的客观性和普遍性的同时，没有“详细地考察这些规律的相互的内部

联系”^①，没有对矛盾规律在辩证法中的地位以及与辩证法其他规律的关系作明确的概括和论证，但是，他们对这些规律的内在联系，也进行了一定研究，并且提出了一些非常宝贵的思想。例如，早在1847年，马克思在批评蒲鲁东的政治经济学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方法时，就指出“两个相互矛盾方面的共存、斗争以及融合成一个新范畴，就是辩证运动的实质。”^②马克思的《资本论》就是矛盾规律的光辉运用。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的序言中指出，两极的既对立又统一是“构成辩证自然观的核心”^③。在《自然辩证法》中，他还说，“辩证的思维，不过是自然界中到处盛行的对立中的运动的反映而已。”^④

在唯物辩证法的发展史上，明确地把对立统一规律确定为唯物辩证法的核心并加以论证的是列宁。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和自然科学的发展，进化论的观念广泛地深入人们的头脑，除了公开的极端露骨的反动的唯心论之外，还出现了庸俗的进化论，出来对抗唯物辩证法。庸俗进化论否认事物发展过程中的质变和飞跃，否认事物内部矛盾是发展的根本原因，把发展看作不需要经过斗争、没有质变的单纯的量变。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鼓吹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谬论，就是以庸俗进化论为其理论基础的。这时辩证法同形而上学的斗争主要不是表现为是否承认发展和变化，而是怎样看待发展和变化，是否承认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在这种情况下，列宁深入研究了辩证法，特别是深入研究了事物的对立统一关系，明确地提出了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核心和实质。他明确指出：“可以把辩证法简要地确定为关于对立面的统一的学说。这样就会抓住辩证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85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11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4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34页。

法的核心，可是这需要说明和发挥。”^①在《谈谈辩证法问题》一文中又说：“统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以及对它的矛盾着的部分的认识……，是辩证法的实质”。^②

毛泽东在《矛盾论》等著作中，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思想。他明确指出：“事物的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③1957年1月，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关于辩证法，列宁说过：‘可以把辩证法简单地确定为对立统一的学说，这样就会抓住辩证法的核心，可是这需要解释和发展。’解释和发展，这就是我们的工作。”^④同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进一步指出：“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⑤在1965年他还强调指出：要抓住辩证法的核心，不要把辩证法的三个基本规律并列起来。他的这些见解是对矛盾规律是辩证法的核心理论的丰富和深化。

为什么说矛盾规律是辩证法的核心和实质呢？毛泽东对此作了系统的、深刻的论述。

第一，从两种宇宙观根本对立的高度，阐明了矛盾规律的核心地位。列宁阐明了两种发展观，他说：“有两种基本的（或两种可能的？或两种在历史上见到的？）发展（进化）观点：认为发展是减少和增加，是重复；以及认为发展是对立的统一（统一物之分为两个互相排斥的对立面以及它们之间的互相关联）”。^⑥列宁认为，两种发展观的根本区别在于：是否承认对立统一。毛泽东进一步发挥了列宁关于两种发展观的思想，他把辩证法与形而上学

① 《列宁选集》第2卷，第608页。

② 《列宁选集》第2卷，第711页。

③ 《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第137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45页。

⑤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66页。

⑥ 《列宁全集》第38卷，第408页。

看作是贯串整个人类认识史的两种根本对立的宇宙观，他阐明了整个哲学史除了贯串着唯物论与唯心论的斗争之外，还贯穿着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斗争。他说：“一讲哲学，就少不了这两个对子。”^① 他不仅指出了形而上学的基本观点就是用孤立的、静止的和片面的观点去看世界，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观点是用联系的、发展的和全面的观点去观察一切事物，而且进一步深刻指出，形而上学“简单地从事物外部去找发展的原因，否认唯物辩证法所主张的事物因内部矛盾引起发展的学说。”^② 这就告诉我们，辩证法和形而上学斗争的焦点就在于：是否承认事物的内部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从而说明了对立统一规律在辩证法中的核心地位。

第二：从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源泉和动力上，精辟地论证了矛盾规律是辩证法的核心。列宁指出：“要认识世界上一切过程的‘自己运动’、自生的发展和蓬勃的生活，就要把这些过程当作对立面的统一来认识。”^③ 毛泽东深化了列宁这一思想，他说：“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任何事物内部都有这种矛盾性，因此引起事物的运动和发展。”^④ 他引用了大量事实，系统地论证了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源泉和动力。为此，毛泽东还深刻地阐明了事物的内因和外因、根据和条件的辩证统一关系。他指出，事物的内部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一事物和他事物的互相联系和互相影响则是事物发展的第二位原因。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这就进一步论述了矛盾规律是辩证法的核心。

①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46页。

② 《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第139页。

③ 《列宁选集》第2卷，第712页。

④ 《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第140页。

第三，从矛盾规律同辩证法其他规律和范畴之间的关系上，指明了矛盾规律是理解辩证法其他规律和范畴的钥匙。列宁明确指出：只有对立统一的观点，“才提供理解‘飞跃’、‘渐进过程的中断’、‘向对立面的转化’、旧东西的消灭和新东西的产生的钥匙。”^①这是列宁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作出的重大贡献。但是，要确立对立统一规律在辩证法中的核心地位，极为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要详尽地阐明对立统一规律和其他规律及范畴之间的主从关系。毛泽东在《矛盾论》等著作中，详尽地阐述了这一关系，指明了矛盾规律是贯穿于其他规律和范畴的根本内容，是理解其他规律和范畴的钥匙。

毛泽东指出：“辩证法的核心是对立统一规律，其他范畴如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联系发展等等，都可以在核心规律中予以说明。”^②他在谈到矛盾规律与量变质变规律的关系时指出：“无论什么事物的运动都采取两种状态，相对地静止的状态和显著地变动的状态。两种状态的运动都是由事物内部包含的两个矛盾着的因素互相斗争所引起的。……事物总是不断地由第一种状态转化为第二种状态，而矛盾的斗争则存在于两种状态中，并经过第二种状态而达到矛盾的解决。”^③这就是说，量变与质变的关系是矛盾的对立统一关系，对立统一揭示了量变和质变的根本内容，而量变质变则把对立统一具体化了。在谈到否定之否定规律时，他说：“依事物本身的性质和条件，经过不同飞跃形式，一事物转化为他事物，就是新陈代谢的过程。任何事物内部都有其新旧两个方面的矛盾，形成一系列的曲折的斗争。斗争的结果，新的方面由小变大，上升为支配的东西；旧的方面由大变小，变成逐步归于灭亡的东西。而一当新的方面对于旧的方面取得支配地位

① 《列宁选集》第2卷，第712页。

②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47页。

③ 《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第174页。

的时候，旧事物的性质就变化为新事物的性质。”^①这一分析揭示了旧事物所以被否定，是由于事物内部新旧两方面矛盾斗争的结果，否定之否定的根本内容和实质就是事物的内部矛盾即对立统一，同时也指出了新事物战胜旧事物的必然趋势和事物发展过程的曲折性。毛泽东还指出：“至于各种范畴（可以有几十种），都要以事物的矛盾对立统一去说明。”^②就是说，现象和本质，内容和形式，必然和自由，可能和现实等等，都应在核心规律的指导下加以说明。

第四，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和认识论相统一的角度，论述了矛盾规律也就是认识的根本规律。列宁阐明了辩证法、认识论、逻辑学三者的一致性，指出辩证法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指出对立统一规律不仅是客观世界的根本规律，而且也是认识的根本规律。毛泽东十分重视列宁的思想，他论述了唯物辩证法是真正科学的论理学和认识论的基础，是研究具体科学的唯一确实的方法论。他深刻地说明了唯物辩证法既是客观世界的发展规律，又是认识、思想的发展规律；既是科学的世界观，又是科学的方法论。他说：“事物矛盾的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自然和社会的根本法则，因而也是思维的根本法则。”^③他还指出：“这个辩证法的宇宙观，主要地就是教导人们要善于去观察和分析各种事物的矛盾的运动，并根据这种分析，指出解决矛盾的方法。”^④他还说：“分析的方法就是辩证的方法。所谓分析，就是分析事物的矛盾。”^⑤这就从方法论的高度，精辟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中的最根本方法就是矛盾分析法，其他方面都处于从属地位。所谓认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第163页。

②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47页。

③ 《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第178页。

④ 《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第142页。

⑤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13页。

识世界，从根本意义上说，就是用对立统一规律的观点去认识事物的矛盾，即用矛盾分析法去分析观察矛盾；所谓改造世界，就是按矛盾不同性质，运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各种不同的矛盾，促成事物的转化，达到革命的目的。

毛泽东的多方面论述充分表明矛盾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当然，在强调矛盾规律是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时，决不能贬低、否认辩证法其他规律和范畴的作用。我们一方面要坚持矛盾规律在辩证法中的核心地位，另一方面又要努力做到全面地把握辩证法的科学体系。

二、坚持矛盾的普遍性，发扬彻底的辩证法

承认矛盾规律是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就内含着承认矛盾的普遍性。但是，矛盾的普遍性作为唯物辩证法的一个重要原理，还必须将它展开来加以阐述。

关于矛盾普遍性的原理，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中，有过很多论述。马克思曾指出：每一事物都包含着自身的对立面。恩格斯也说过：“运动本身就是矛盾。”^①列宁列举数学中的正数和负数以及微分和积分、力学中的作用和反作用、物理学中的阳电和阴电、化学中的原子的化合和分解、社会科学中的阶级斗争，来说明矛盾是客观地普遍地存在着的。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列宁在《谈谈辩证法问题》一文中，谈到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的分析时说过的一段话，他说：它“向我们表明这些矛盾和这个社会的发展，在这个社会各个部分总和中的、从这个社会的开始到终结的发展。”^②列宁的这段话告诉我们，矛盾不仅存在于一切事物之中，而且存在于一切事物的自始至终的发展过程之中。毛泽东在矛盾普遍性原理上的一个重要贡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60页。

② 《列宁选集》第2卷，第713页。

献，就是他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矛盾普遍存在的思想基础上，把矛盾的普遍性明确地概括为两个方面的含义：“其一是说，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其二是说，每一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①这就深刻揭示了矛盾无处不在、无事不在、无时不在；换句话说，矛盾处处有、事事有、时时有。矛盾即是运动，即是事物，即是过程，即是思想，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毛泽东对于矛盾普遍性含义的概括，更加明确和深化了这一概念，这对于反对形而上学，把辩证法贯彻到底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社会主义社会是否存在矛盾，在过去是有争论的。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党内团结的辩证法》等一系列著作中，针对国内外一些人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有矛盾，或者认为可以“找到”矛盾的错误说法，坚持和捍卫了矛盾普遍性的原理，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学说，批评和纠正了社会主义社会无矛盾的形而上学思想，坚持把辩证法贯彻到底。他说：“无论什么世界，当然特别是阶级社会，都是充满着矛盾的。有些人说社会主义社会可以‘找到’矛盾，我看这个提法不对。不是什么找到或者找不到矛盾，而是充满着矛盾。没有一处不存在矛盾，没有一个人是不可以加以分析的。如果承认一个人是不可加以分析的，就是形而上学。……总之，对立面的统一是无往不在的。”^②他进一步指出：对立统一规律“不论在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们的思想中，都是普遍存在的。矛盾着的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和变化。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不过按事物的性质不同，矛盾的性质也就不同。”^③毛泽东还精辟地论述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仍然是社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第143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98页。

③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66页。

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样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等重要思想，深刻指出矛盾仍然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两类矛盾的学说，为我们进一步揭示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规律指明了方向，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

毛泽东还指出：“对立面的统一是无往不在的。关于对立面的统一的观念，关于辩证法，需要作广泛的宣传。我说辩证法应该从哲学家的圈子走到广大人民群众中间去。”^①为了在人民群众中通俗宣传对立统一规律，毛泽东提出：“一分为二，这是个普遍现象，这就是辩证法。”^②什么是一分为二？一分为二就是对立统一的通俗的表述，它的含义是：矛盾着的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对此，毛泽东在1957年写的《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谈到真善美和假恶丑的关系时作了说明，他说：“在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统一体总要分解为不同的部分，只是在不同的具体条件下，内容不同，形式不同罢了。”并说：“它们之间的关系都是对立的统一，对立的斗争。”^③这和列宁在《谈谈辩证法问题》中所讲的“统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以及对它的矛盾着的部分的认识，是辩证法的实质”^④是一致的。决不能把一分为二简单地归结为优点和缺点、正确和错误之分，更不能把它歪曲为只讲斗争，不讲统一。我们对一分为二应该全面地、正确地去理解它、宣传它。

承认矛盾的普遍性，承认一切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我们在认识事物时就必须坚持矛盾分析的方法，必须坚持辩证法的两点论、两分法，反对形而上学的一点论、片面性。毛泽东指出：事物

①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98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98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16页。

④ 《列宁全集》第38卷，第407页。

(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军事、党务等等)总是作为过程而向前发展的。而任何一个过程,都是由矛盾着的两个侧面互相联系又互相斗争而得到发展。因此,“一个共产党人必须具备对于成绩与缺点、真理与错误这个两分法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思想。”^①毛泽东还针对一些人不讲辩证法,对事物不加分析的形而上学的片面性,指出:“其实,中国的东西也好,外国的东西也好,都是可以分析的,有好的,有不好的。每个省的工作也是一样,有成绩,有缺点。我们每个人也是如此,总是有两点,有优点,有缺点,不是只有一点。”^②毛泽东所阐发的“两点论”、“两分法”的思想方法,正为越来越多的干部和群众所掌握,成为他们认识事物、解决矛盾的重要思想武器。

第二节 矛盾特殊性理论的系统阐发

关于矛盾特殊性的思想,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一些精辟的见解。这主要体现在他们对具体问题的研究和分析中,体现在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指导中,他们并没有着重从理论上考察矛盾特殊性的原理,也未明确提出主要矛盾的概念。毛泽东在《矛盾论》中,创造性地阐明了矛盾特殊性的理论。

一、矛盾特殊性的学说

关于矛盾的特殊性,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曾经指出,不仅要揭露资本主义制度中实际存在的矛盾,而且要理解这些矛盾的根源和必然性,“从它们的特殊意义上来把握……特殊对象的特殊逻辑。”^③马克思的《资本论》,就是科学地分析资本主义制度这个“特殊对象的特殊逻辑”,分析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矛盾的

① 《加强互相学习,克服固步自封,骄傲自满》,第2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20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59页。

特殊性，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和资本主义灭亡、社会主义胜利的历史必然性。列宁针对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从方法论上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原则：“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①他还进一步指出：“共产主义者的任务，象在任何时候一样，也要善于把共产主义共同的和基本的原则应用到各阶级和各政党相互关系的特点上去，应用到向共产主义客观发展的特点上去，这种特点每个国家各不相同，我们应该善于研究、探求和揣测这种特点。”^②但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没有把矛盾的特殊性作为对立统一规律的重要内容，从理论上作出系统的概括和说明。

毛泽东在《矛盾论》中阐述矛盾特殊性的理论时，非常突出的一点，就是强调分析、论述和掌握事物矛盾的特殊性，必须在方法论上坚持“具体地分析具体情况”。世界上的一切事物、现象或过程及其矛盾的特点都是具体的，它们都各自具有其独特的、具体的存在形态，并都处在与周围事物、现象或过程的具体联系之中。所以，毛泽东指出，研究矛盾特殊性就是要研究“各个物质运动形式的矛盾，各个运动形式在各个发展过程中的矛盾，各个发展过程的矛盾的各个方面，各个发展过程在其各个发展阶段上的矛盾以及各个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各个方面，研究所有这些矛盾的特性，都不能带主观随意性，必须对它们实行具体的分析。离开具体的分析，就不能认识任何矛盾的特性。”^③从毛泽东的论述中，归纳起来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分析和把握矛盾的特殊性。

第一，要分析各种不同事物、各种不同物质运动形式中矛盾的特殊性。不同的事物、不同的物质运动形式，其内部包含有本

① 《列宁选集》第4卷，第290页。

② 《列宁选集》第4卷，第243页。

③ 《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第157页。

身特殊的矛盾，这种特殊的矛盾构成一事物区别于它事物的特殊本质，这就是世界上各种事物千差万别的内在根据。各门科学的研究对象不同，就是它们所研究的矛盾各有其特殊性。

第二，要以发展的观点来分析事物发展的不同过程中和不同阶段中的矛盾特殊性。每一事物、每一物质运动形式在其发展的不同过程中，矛盾也带有特殊性。事物不同的发展过程的性质，为其所包含的特殊的根本矛盾所规定。不仅新旧过程之间，而且在同一发展过程的不同发展阶段上，矛盾也有特殊性。根本矛盾规定过程的本质，根本矛盾没有消失，过程不会终结。但是，根本矛盾在其发展中或者采取了逐渐激化的形式，或者为根本矛盾所规定和影响的其他许多矛盾发生了变化，过程也会显出阶段性的差别。毛泽东把中国民主革命过程区分为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两大历史阶段，又把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区分为好几个阶段，具体地分析了不同阶段矛盾的特殊性，正确地制定了党在不同阶段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引导中国革命一步一步走向胜利。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它同样可以区分为若干不同的阶段，我国现在是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我们必须对这一阶段的矛盾特殊性进行具体分析，才能制定出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也才能深刻理解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正确性，从而提高执行的自觉性。

第三，要全面地分析矛盾诸方面的特殊性。在同一发展过程或阶段上，矛盾双方也各有其特殊性，为了从总体上把握矛盾的特殊性，必须揭示矛盾各方面的特殊性。毛泽东指出：“所谓了解矛盾的各个方面，就是了解它们每一方各占何等特定的地位，各用何种具体形式和对方发生互相依存又互相矛盾的关系，在互相依存又互相矛盾中，以及依存破裂后，又各用何种具体的方法和对方作斗争。”^①毛泽东具体分析了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及各个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第151页。

发展阶段上国共两党关系的特点，说明分析矛盾双方的特点对于正确指导实际斗争的重要意义。

列宁在概述辩证法的要素时，把观察的客观性看作是辩证法的第一要素^①，指出对概念的灵活性，“如果加以主观地应用=折衷主义与诡辩。”^②毛泽东继承和发挥了列宁的上述思想，阐明并特别强调必须用唯物主义观点去观察事物，坚持从实际出发，注重调查研究。他说：“不论研究何种矛盾的特性，……都不能带主观随意性，必须对它们实行具体的分析。”^③“马克思和恩格斯，同样地列宁和斯大林，他们对于应用辩证法到客观现象的研究的时候，总是指导人们不要带上任何的主观随意性，而必须从客观的实际运动所包含的具体条件，去看出这些现象中的具体矛盾、矛盾各方面的具体的地位以及矛盾的具体的相互关系。我们的教条主义者因为没有这种研究态度，所以弄得一无是处。我们必须以教条主义的失败为鉴戒，学会这种研究态度，舍此没有第二种研究方法。”^④与此相联系，他还强调必须全面深入地观察和分析事物及其矛盾，要反对片面性和表面性，并指出片面性、表面性也是主观性。

毛泽东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阐明了认识矛盾特殊性的重大意义。

第一，认识矛盾的特殊性，是认识事物的基础。毛泽东指出，从人类认识运动的正常秩序来说，总是从特殊到一般，又从一般到特殊，认识的出发点和归宿都是特殊。他指出：“人们总是首先认识了许多不同事物的特殊本质，然后才有可能更进一步地进行概括工作，认识诸种事物的共同的本质。当着人们已经认识了这种共同的本质以后，就以这种共同的认识为指导，继续地向着尚未研究过的或者尚未深入地研究过的各种具体的事物进行研究，

①② 《列宁全集》第38卷，第238、112页。

③④ 《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第157、159页。

找出其特殊的本质。这样才可以补充、丰富和发展这种共同的本质的认识，而使这种共同的本质的认识不致变成枯槁的和僵死的东西。”^①“左”倾教条主义者的错误就在于：一方面，他们不懂得只有研究矛盾的特殊性，才有可能认识矛盾的普遍性；另一方面，也不懂得在研究了矛盾的普遍性以后，还必须继续研究那些尚未研究过的或者尚未深入研究过的事物的特殊性。他们拒绝对具体事物做任何艰苦的研究工作，把一般真理看成是凭空产生的东西，把它变成人们所不能捉摸的纯粹抽象的公式。

第二，只有认识矛盾的特殊性，才能正确地解决矛盾。毛泽东指出：“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②例如，俄国十月革命走城市武装起义的道路是正确的，但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政治经济发展极端不平衡的大国，则只能走工农武装割据，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国情不同，革命的具体道路和方法也就不同。民主革命是这样，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也是这样。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也要根据中国当代的国情去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去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目标。

二、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的理论

矛盾的特殊性，从矛盾和矛盾双方的地位来说，有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的区别。这两种情形虽然也是矛盾特殊性的问题，但是，由于它们对于人们实践活动的成败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所以，毛泽东在分析矛盾特殊性时，把它们特别提出加以分析。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虽然没有明确提出主要矛盾和主要矛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第149页。

② 《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第150页。

盾方面的概念，但是他们在具体运用唯物辩证法分析实际问题的过程中，却充分体现了这方面的思想。马克思在解剖资本主义社会时，从纷繁复杂的矛盾中找出生产的社会性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是这一社会的根本矛盾，并指出这一矛盾的阶级表现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发展和激化，不可避免地引起无产阶级革命。他还论证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其他一些矛盾，都受这个根本矛盾所制约。恩格斯在1892年《致康·施米特》的信中指出：“为了达到伟大的目标和团结，为此所必需的千百万大军应当时刻牢记主要的东西，不因那些所谓的吹毛求疵而迷失方向。”^① 列宁也曾指出：“政治事变总是非常错综复杂的。它好比一条链子。你要抓住整条链子，就必须抓住主要环节。决不能你想抓哪个环节就故意挑哪个环节。”^② 这表明，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那里，已经有了抓主要矛盾的思想。

关于主要矛盾方面的思想，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理论研究和革命实践中就更加明显。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商品的价值与使用价值的矛盾时，指出价值起主导作用，在分析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时，指出生产力具有主导的作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谈到确定主要矛盾方面的重要性时，指出：“无产阶级和富有是两个对立面。它们本身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它们两者都是由私有制世界产生的。问题在于这两个方面中的每一个方面在对立中究竟占有什么样的确定的地位。只宣布它们是统一整体的两个方面是不够的。”^③ 列宁在《论合作制》一文中谈到随着实践斗争的发展，工作重心的改变时指出：“从前我们是把重心放在而且也应该放在政治斗争、革命、夺取政权等等方面，而现在重心改变了，转到和平组织‘文化’工作上面去了。”^④ 列宁还在分析苏联新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第270页。

② 《列宁选集》第4卷，第649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43页。

④ 《列宁选集》第4卷，第687页。

经济政策时期社会主义因素和资本主义因素斗争时，指出社会主义因素起主导作用，新经济政策虽然会引起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但不会导致苏维埃政权的蜕变和资本主义复辟。

毛泽东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思想，结合中国革命实践的经验，明确地把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作为唯物辩证法的一个重要原理，并对这一原理进行了系统的深刻的论证。

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以及主要矛盾方面和非主要矛盾方面的区分具有客观普遍性，在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类思维中，一切现实的矛盾和矛盾双方，都有主次之分的。毛泽东深刻揭示了矛盾发展的不平衡性是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的理论的客观基础。宇宙间的一切平衡都是相对的、暂时的，不平衡则是绝对的。因此，事物发展过程中所包括的各种矛盾的发展是不平衡的，不能平均看待，必须加以具体分析，区分其主要的和非主要的。同样，无论什么矛盾的双方，其发展也是不平衡的。有时对立着的双方似乎势均力敌，然而这只是暂时的和相对的情形，所以，对矛盾着的双方也不能平均地看待，必须区分其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毛泽东指出：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这两种情形，“都是矛盾力量的不平衡性。世界上没有绝对地平衡发展的东西，我们必须反对平衡论，或均衡论。”^①这就把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的理论放在坚定的唯物辩证法的基础上。一些人否认事物矛盾和矛盾双方必然有主次之分的观点，是违背一切平衡都是相对的和暂时的，不平衡是绝对的唯物辩证法的。

毛泽东系统地论述了主要矛盾的理论。他指出：在复杂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矛盾起着主要的、领导的、决定的作用，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这个矛盾就是主要矛盾。而其他矛盾则处于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第167页。

次要和服从的地位,这就是非主要矛盾。由于主要矛盾在事物发展过程中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因此,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① 万千的学问家和实行家,由于不懂得抓主要矛盾的方法,结果如堕烟海,找不到中心,也就找不到解决矛盾的方法。

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的区分,不是凝固的、僵死的,而是可变的,在一定的条件下,它们是可以互相转化的。随着主要矛盾的变化,革命和建设也就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因此,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必须随着形势的变化,及时地注意主要矛盾与非主要矛盾的转化,及时地转移自己工作的中心,提出新的任务、方针、政策和口号,以集中主要力量去解决新的主要矛盾。同时,必须十分注意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是互相联系、互相制约和互相作用的。主要矛盾对非主要矛盾固然起着决定的、领导的作用,但非主要矛盾反过来也会影响到主要矛盾的解决。所以,我们在全力抓住主要矛盾的同时,决不可忽视非主要矛盾。为了正确地顺利地解决主要矛盾,必须妥善地处理好各种非主要矛盾。

我们党在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实践中,杰出地运用了关于主要矛盾的理论,并很好地解决了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的关系问题。中国共产党人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和实践就是运用主要矛盾理论的光辉范例。在实际工作中,正确处理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也是我们必须遵循的一个重要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只有善于抓住主要矛盾,工作才有中心,才有重点,才有明确的主攻方向。毛泽东指出:“任何一级的首长,应当把自己注意的重心,放在那些对于他指挥的全局说来最重要最有决定意义的问题或动作上,而不应当放在其他的问题或动作上。”^②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97页。

② 《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第95页。

毛泽东还详细地阐明了主要矛盾方面的理论。他指出：“矛盾着的两方面中，必有一方面是主要的，他方面是次要的。其主要的方面，即所谓矛盾起主导作用的方面。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① 因此，要正确认识事物的性质，就必须研究矛盾双方中哪一个方面居于主要地位。

毛泽东以大量的事实有力地证明了矛盾的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的地位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的。这种转化“是依靠事物发展中矛盾双方斗争的力量的增减程度来决定的。”当这种力量的增减尚未改变双方主次地位的时候，事物处于量变阶段；当着力量的增减引起双方主次地位变化的时候，事物的根本性质就发生了变化。

矛盾主要方面的理论具有重要方法论意义。由于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的。所以我们在分析事物的矛盾时，必须抓住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这样就能把握事物的本质和主流。如果主次不分或主次颠倒，那就会混淆事物的性质，迷失前进的方向，就会犯错误。但决不是说矛盾的非主要方面对事物的性质和发展不发生作用，更不是说可以忽视矛盾的非主要方面。必须指出，在进行反对党内错误倾向的斗争中，要注意在反对一种主要倾向时，往往掩盖着另一种倾向。在反对右倾的时候，可能出“左”；在反对“左”倾的时候，可能出右。因此，反右时要防“左”，反“左”时要防右。毛泽东曾明确指出：在强调事物的本质和主流时，不能忽视非本质和非主流方面，必须逐一地将它们解决。在《论十大关系》中，他精辟地分析了重点和非重点的辩证关系，批评了那种把重点和非重点割裂开来、对立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第163页。

起来的形而上学观点，主张既要坚持两点论，又要坚持重点论，要把两点论和重点论紧密结合起来。

第三节 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 是事物矛盾问题的精髓

毛泽东系统阐发了对立统一规律的丰富内容，提出了关于事物矛盾问题的精髓的科学论断。这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发展史上的新贡献。

一、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辩证关系

矛盾普遍性和矛盾特殊性的关系，也就是共性与个性的关系。对此，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均有精辟的论述，并在自己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活动中作了杰出的运用。马克思在阐述政治经济学的方法时，从认识运动的过程与方法的角度揭示了一般与特殊的辩证关系。他把政治经济学的方法概述为两条道路。第一条是“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即从感性具体到理性抽象，从特殊到一般；第二条是“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即从理性抽象到理性具体、从一般到特殊。两条道路互相联结，就是具体—抽象—具体，即特殊—一般—特殊。《资本论》就是马克思运用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论述方法，和运用一般与特殊的辩证法分析矛盾、解决矛盾的光辉典范。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说：“事实上，一切真实的、详尽无遗的认识都只在于：我们在思想中把个别的东西从个别性提高到特殊性，然后再从特殊性提高到普遍性；我们从有限中找到无限，从暂时中找到永久，并且使之确定起来。然而普遍性的形式是自我完成的形式，因而是无限性的形式；它是把许多有限的东西综合为无限的东西。”^①他还明确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54页。

指出：要不研究个别的实物和个别的运动形式，就根本不能认识物质和运动；而由于认识个别的实物和个别的运动形式，我们也才认识物质和运动本身。可见，恩格斯在这里已经把从个别到一般、特殊到普遍的辩证认识过程，作为认识事物的必由之路。

列宁所处的时代，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时代要求马克思主义者要善于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各国的革命实践结合起来，把一般与个别结合起来，从而解决革命实践中提出的新问题，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列宁不仅谈到认识由个别到一般的辩证发展过程，而且还着重分析了个别和一般的辩证关系。他指出：“个别一定与一般相联系而存在。任何个别（不论怎样）都是一般。任何一般都是个别的（一部分、或一方面、或本质）。任何一般只是大致地包括一切个别事物。任何个别都不能完全地包括在一般之中等等。”^①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民主革命的过程中，从辩证法与形而上学两种宇宙观对立的角度，从哲学上总结了我党成立以来的革命经验教训，结合反对主观主义特别是反对“左”倾教条主义的形而上学思维方法，精辟地阐述了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相互关系，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上述思想。概括地说，其主要的有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它们是可以互相转化的。他说：“由于事物范围的极其广大，发展的无限性，所以，在一定场合为普遍性的东西，而在另一一定场合则变为特殊性。反之，在一定场合为特殊性的东西，而在另一一定场合则变为普遍性。”^② 这里所说的普遍性是指同一类事物所具有的共同矛盾或共同本质，所说的特殊性是指某一个（或某一类）事物区别于别的事物（或别一类事物）的特殊矛盾或特殊本质。

① 《列宁全集》第38卷，第409页。

② 《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第158页。

所以，这里所谓的普遍性和特殊性都是指某一一定的范围一定场合而言的。例如，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相对于整个宇宙说来，它是矛盾的特殊性，因为它是社会所特有的矛盾，在社会之外的无人居住的其他星球上是不存在这个矛盾的。如果相对于各个不同的社会形态说来，它又是矛盾的普遍性，因为它毫无例外地存在于一切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存在于一切社会发展过程的始终。任何一个矛盾，随着场合的不同，都会发生这样的相互过渡或相互转化。这就要求我们在观察和处理问题时，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如果不顾时间的发展、空间的不同、条件的变化，把只适合于一定场合、一定条件下的真理变成一种到处可以套用的公式或教条，那就要犯形而上学的错误。

第二，矛盾的特殊性和普遍性是互相联结的。每一个事物内部不但包含了矛盾的特殊性，而且还包含了矛盾的普遍性，任何具体事物都是普遍性和特殊性、共性和个性、一般和个别的统一体。一方面，个别中总包含着一般，总是同一般相联系而存在，这是由于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不是孤立存在的，总是与周围的其他事物相联系而存在。任何具体事物总是属于一类事物中的一个，它们不仅因为有其各自的特殊性而彼此互相区别，而且又因为有其共同的普遍性而互相联系。完全脱离于一般之外的个别，例如不具有任何颜色的树叶，不是狗的哈巴狗等等，是根本不存在的。在这个意义上，个别就是一般。另一方面，一般只能在个别中存在，共性总是寓于个性之中，不存在于任何个别中的一般，也是根本没有的。在这个意义上任何一般又都是个别的。所以，“当我们研究一定事物的时候，就应当去发现这两方面及其互相联结，发现一事物内部的特殊性和普遍性的两方面及其互相联结，发现一事物和它以外的许多事物的互相联结。”^① 要善于从特殊性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第158页。

中发现普遍性，从个性中概括出共性，同时又要善于在普遍性的指导下具体地分析特殊性，以便进一步丰富普遍性。

第三，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是有区别的，毛泽东指出：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的关系，就是矛盾的共性和个性的关系。一切事物和过程都有矛盾，这是共性，是无条件的，因而是绝对的；每一事物，每一过程的矛盾及其各方面都有其特点，这是个性，它的存在是暂时的、有条件的，因而是相对的。个别要比一般具体、丰富，它不能完全进入一般之中；一般要比个别深刻，它只能大致地包括、概括个别，而不能完全代替个别，就是说它只是个别的一部分、一方面，只是个别中的本质的东西。

根据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共性和个性的辩证关系的原理，在实际工作中，毛泽东提出一般与个别相结合，“解剖麻雀”，抓好典型等科学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这些内容将在本书第八章“唯物辩证的工作方法”中展开论述。

二、关于事物矛盾问题的精髓

毛泽东在深刻地阐明了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辩证关系之后，进一步指出：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这一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的问题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①毛泽东这一论断，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是一个崭新的概括，对唯物辩证法是一个重大贡献。

毛泽东关于矛盾问题精髓的思想，是他在领导中国革命的长期实践中，在和“左”、右倾机会主义斗争特别是在与教条主义的斗争中，概括和总结出来的。中国丰富的革命实践经验表明，要取得革命的胜利，必须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具体革命实践结合起来。但是，“左”倾教条主义者割裂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共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第160页。

性和个性、绝对和相对的辩证关系，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当作绝对不变的教条，完全脱离了当时中国的国情，脱离了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使中国革命遭到严重损失。毛泽东揭露了“左”倾教条主义者把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割裂开来的错误，突出地阐发了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辩证关系，提出了关于事物矛盾问题精髓的思想。

为什么说，这个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问题的精髓呢？这可以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去理解。

在理论上讲，这个问题贯串于矛盾学说的各个方面，是掌握矛盾学说的一把钥匙。矛盾规律是唯物辩证法最根本的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它包含着广泛的方面，涉及到许多问题。主要有：两种宇宙观、矛盾的普遍性、矛盾的特殊性、主要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对抗在矛盾中的地位等等。其中，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的关系问题象一条红线一样，贯串于矛盾规律的各个方面，矛盾规律中任何一个问题都离不开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共性和个性、绝对和相对关系的道理，都要用这一关于事物矛盾的问题的精髓来统率。例如，一切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都是自身的内部矛盾，这是矛盾的普遍性、共性和绝对性；但由于矛盾和矛盾方面的地位和作用不平衡性，而区分为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这又是矛盾的特殊性、个性和相对性。再如，矛盾的同一性是说，矛盾着的事物依一定的条件共居于一个统一体中，并能相互转化，这讲的是矛盾的特殊性、个性和相对性；然而，矛盾的斗争则是不断的，不论在它们共居的时候或互相转化的时候，都存在着斗争，这又是矛盾的普遍性、共性和绝对性。再如，一切矛盾都必须通过斗争才能解决，这是矛盾的普遍性、共性和绝对性；但解决矛盾的方法，即斗争的形式则因矛盾性质的不同而不同，这又是矛盾的特殊性、个性和相对性，等等。所以，我

们只有真正弄懂了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共性和个性、绝对和相对的辩证关系，才能真正把握矛盾学说的所有内容，才算真正懂得辩证法。如果不懂得这个关于事物矛盾问题的精髓，那就不懂得矛盾学说，也就不懂得辩证法。如果把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共性和个性、绝对性和相对性割裂开来，只承认矛盾的普遍性、绝对性，否认矛盾的特殊性、相对性，或者相反，那就只能离开辩证法而陷入形而上学。只有坚持两者的辩证统一，才能坚持辩证法。

从实践上讲，这个问题是认识矛盾和解决矛盾的关键。承认矛盾的普遍性、绝对性，对正确认识事物具有重大指导作用，但是，我们要真正认识事物，还必须在矛盾的普遍性、绝对性的原理指导下，去深入分析该事物的矛盾的特殊性。如果仅仅停留在认识矛盾的普遍性上，不再进一步具体分析该事物的矛盾的特殊性，那么我们对事物的了解只能是空洞的、抽象的。任何事物都是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辩证统一，所以我们观察问题认识事物时，就必须注意把这两方面结合起来，既要在特殊性当中去发现普遍性，又要在普遍性的指导下去研究特殊性。就人类认识运动的秩序来说，总是从认识个别的和特殊的事物开始，然后逐步地扩大到认识一般的事物，再以对一般事物的认识为指导进一步认识个别和特殊的事物。由于事物发展的无限性，因而人类认识运动也是一个无限的过程。毛泽东指出：“一个是由特殊到一般，一个是由一般到特殊。人类的认识总是这样循环往复地进行的，而每一次的循环（只要是严格地按照科学的方法）都可能使人类的认识提高一步，使人类的认识不断地深化。”^① 人类认识发展的正常过程，就是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互相联结、互相转化的过程。如果不懂得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这个事物矛盾问题的精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第149页。

髓，就不能正确了解人类认识运动的秩序，就不能正确认识矛盾和解决矛盾。

无产阶级政党在自己的革命实践活动中，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本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毛泽东多次讲过：马克思主义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革命和建设事业必须以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为指导；但是，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不是可以生搬硬套的公式，它必须同各个国家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创造性地加以运用。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是我们党的一贯的思想原则。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是正确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根本方法，把这个根本方法运用到革命实践中去，就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革命实践相结合。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一原则，从辩证法的观点来看，就是建立在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互相联结这个理论基础上的。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反映了事物矛盾发展的普遍规律，属于共性的方面；各国的具体实践体现了各国社会的特殊矛盾及其发展的特殊规律，属于个性的方面。如果只强调矛盾的特殊性，否认矛盾的普遍性，否认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的指导作用，就会导致违背四项基本原则，背离社会主义方向。如果只强调矛盾普遍性，否认矛盾的特殊性，不懂得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必须和具体实践相结合，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当作教条和公式，那就会犯教条主义的错误。只有懂得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共性和个性、绝对和相对的辩证关系，掌握关于事物矛盾问题的精髓，才能大大提高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自觉性。

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共性和个性、绝对和相对的辩证关系的道理，对于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着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邓小平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

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这里，“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建设社会主义”是矛盾的普遍性、共性、绝对性；而“我国的具体实际”和“中国特色”是矛盾的特殊性、个性、相对性。“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共性和个性，绝对性和相对性这个关于事物矛盾问题的精髓的生动体现。

第五章

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相结合

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是表明事物内部和事物之间普遍存在的既对立又统一的矛盾关系的哲学范畴。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及其相互关系的原理，是唯物辩证法矛盾学说的基本内容。毛泽东关于矛盾同一性和斗争性及其相互关系原理的研究，丰富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

第一节 矛盾的根本属性

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它们是矛盾的两种基本关系或基本属性。现实的矛盾无不具有这两种相辅相成的基本属性。否则，就不成其为矛盾。

一、矛盾的同一性

同一性是用于表述认识对象所具有的统一性或一致性关系的哲学范畴。对于同一性，形而上学和辩证法的看法是根本对立的。

形而上学所理解的同一性，不是矛盾的同一性。形而上学将同一性理解为事物与其自身绝对等同的关系； $A = A$ ，是形而上学同一性的基本原则，所谓“与自身绝对等同”或“ $A = A$ ”，就是说是则是、非则非，其余一切都是鬼话。它就是它自己，并且恒定地只能是它自己。比如，在形而上学看来，生命与死亡就是互不相

干而各自只与其自身绝对等同的现象；生命作为死亡的否定因素决不会包含在死亡自身当中，而死亡作为生命的否定因素亦不会包含在生命自身当中。这样，在对同一性的形而上学理解中，事物之间的普遍联系及向自己对立面转化的能动性都被一笔勾销了，事物运动的源泉和动力被移到事物的外部，事物自身则成为没有运动能力的“死物”。

从思维方法来看，形而上学对同一性的理解是由于他们停留在思维中的抽象阶段而没有进一步上升到具体阶段的缘故。所以，形而上学所理解的这种同一性又被称之为抽象的同一性。

辩证法所理解的同一性是矛盾的同一性。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批判继承黑格尔唯心辩证法的过程中，吸取了黑格尔对同一性的辩证观点，将同一性理解为对立面之间内在的、有机的、不可分割的联系，理解为对立面之间互相吸引的一种趋势。他们认为，事物是在普遍联系中存在的；只有在与对立面的联系当中，事物才能获得自身的规定性。比如，无论生命或死亡，这两种现象都只能从其对立面中获得自己的规定，失去其对立面就会同时失去自己。一切事物存在的完整根据，只在于它是包含着自己的对立面在内的矛盾统一体。一切事物只有在将其对立面作为自己的存在环节而包含在自身当中时，才可能有其存在。这样，包含着差异和对立，就成为矛盾的同一性与形而上学的抽象同一性相区别的根本点。恩格斯说：“与自身的同一，从一开始就必须有与一切别的东西的差异作为补充”^①，“差异性包含在统一性中，才具有真理性”。^②列宁也说：“任何具体的东西、任何具体的某物，……往往既是自身又是他物。”^③这种包含了差异和对立在其中的矛盾同一性，提供了对于事物自己运动的内部源泉和动力的理解，使辩证法将事物看作是活生生的有生命力的永恒发展的东西。从思

①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57、558页。

③《列宁全集》第38卷，第144页。

维方法来看，辩证法对同一性的理解已经由思维中的抽象阶段上升到了具体阶段。所以，辩证法所理解的这种同一性又被称之为具体的同一性。

毛泽东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矛盾同一性的基本观点，第一次将矛盾同一性的含义作了明确的规定。他说：“一切矛盾着的東西，互相联系着，不但在一定条件之下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而且在一定条件之下互相转化，这就是矛盾的同一性的全部意义。”^①展开来说就是：

第一，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每一种矛盾的两个方面，各以和它对立着的方面为自己存在的前提，双方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

毛泽东指出，每一矛盾中互相对立的双方都有着互相依存的关系，都不能离开其对立面孤立地存在。例如，生与死、上与下、祸与福、顺利与困难、剥削者与被剥削者等等，这些互相对立的方面各自都要以与其相对立的一方为自己存在和发展的前提。失去了对方，也就失去了自己存在和发展的条件。可见，对立双方各自存在和发展的根据，不但是在自身当中，而且还在自己的对立面当中，在自己与对立面的相互作用、相互规定的关系当中。对立面之间相互规定的关系是联结和吸引对立面的“纽带”，使本来“相反”的东西成为“相成”的东西。因此，任何事物的对立面尽管是与其自身相排斥的方面，但却是事物自身存在和发展的不可缺少的部分，因而是“与自身同一”的东西。

第二，矛盾着的双方依据一定的条件各向着其相反方面转化。毛泽东指出，矛盾的对立面不仅依据一定条件而互相依存，而且依据一定条件互相转化。这是矛盾同一性更为重要的方面。例如，生可以转化为死，死亦可以转化为生（因为不仅生命本身就是从非生命世界转化而来，而且一种生命有机体的死亡过程本身

^①《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第171页。

也是另一种生命有机体的诞生过程)；上可以转化为下，下亦可以转化为上；祸可以转化为福，福亦可以转化为祸；顺利可以转化为困难，困难亦可以转化为顺利；等等。为什么对立面在一定条件下的互相转化也是矛盾同一性的表现呢？这是因为：首先，这种转化不是随便向任何方向转化，而仅仅是对立面互相之间的转化。由于事物的对立面就是事物自身的一个存在环节，所以这种转化不过是事物与其自身保持同一的另一种存在状态，是事物自身发展过程中的另一状态。而且，在形成新的矛盾统一体中，事物过去的存在状态中的因素并没有完全消灭，而只是被当作新的存在状态的一个环节被保存了下来。例如，在某种生命有机体由生转化为死的过程中，生命恰恰构成了死亡的一个环节。因为没有新的生命形式的诞生，就不会有旧的生命形式的死亡。其次，在任何对立的两极之间都存在着由此达彼、亦此亦彼或非此非彼的中间过渡环节，它融合了两极之间的全部差异和对立，使两极之间的差异和对立在这里成为同一，才使对立面的转化成为可能。比如，在数学中，存在着融合无穷大和无穷小的两极对立的中间数“零”；在医学中，死亡有临床死亡和生理死亡之分，而临床死亡其实就是生命与死亡之间的亦此亦彼状态，即消除生命与死亡的对立界限的中间过渡状态。所以，事物在一定条件下向对立面转化，这恰恰是矛盾同一性最突出的表现。

毛泽东将同一性的内容明确规定为上述两个方面，就使唯物辩证法关于矛盾同一性的原理更加系统化条理化了。毛泽东强调对立面在一定条件下的相互转化是矛盾同一性更重要的方面，不仅在理论上突出了辩证法的矛盾同一性的差异性和变化性特点，而且在实践中对于革命者正确认识革命形势和革命前途，树立坚定的革命信念具有重要的作用。中国革命力量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直至胜利的曲折发展过程，正是矛盾双方在一定条件下的统一和转化的生动体现。

二、矛盾的斗争性

斗争性是用于表述认识对象所具有的排他性关系的哲学范畴，是指矛盾双方互相排斥、互相对立、互相否定的性质和趋势。对于斗争性，同样存在着形而上学和辩证法两种基本的不同看法。

形而上学所理解的斗争性并不是矛盾的斗争性。由于形而上学将同一性理解为事物与其自身绝对等同的关系，因而作为逻辑上的补充和要求，它不能不将斗争性理解为事物之间绝对相斥的关系。因为，事物与其自身的绝对等同就意味着，任何事物本身都是能够自我满足其存在和发展的，是能够在绝对自我封闭的状态下孤立自存的东西。所以，在它之外的一切其他事物的存在，或者是与其无关的，因而它们之间没有或不会发生任何联系；或者是制约其存在发展的根据和条件的异物，因而它们之间只能发生一种非此即彼、有此无彼的绝对相斥的关系。比如，“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科来蒂就认为，对立的“每一方都为自己而存在”，“每一方都无需涉及另一方”，因而“这是一种排除的对立，而不是包含的对立”。由于形而上学将同一性限制在事物之内，将斗争性限制在事物之外，认为同一性与斗争性是毫无关联的东西，所以它所理解的斗争性并不是矛盾的斗争性，而是抽象的斗争性。

辩证法所理解的斗争性是矛盾的斗争性。所谓矛盾的斗争性，这是指在一定条件下形成的某种统一体内部的对立面之间，存在着互相排斥、互相否定、互相离异、互相限制、互相分化的趋向、性质或关系。正如辩证法将同一性理解为包含着差异和对立的同一性一样，辩证法也将斗争性理解为存在于同一性之中并在对立面的同一关系中展开的斗争性。斗争性总是与同一性相联结而存在的。恩格斯说：“所有的两极对立，总是决定于相互对立的两极的相互作用；这两极的分离和对立，只存在于它们的相互

依存和相互联系之中”^①。因此，在辩证法看来，矛盾的斗争性与矛盾的同一性有着不可分离的关系。

毛泽东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观点。他用十分通俗的例子说明，辩证法所理解的矛盾斗争性既不是指事物之间毫无共通之处的绝对相斥的关系，也不是指一事物与其他任何事物都有着互相否定、互相排斥的斗争关系，而是指在一定条件下被某种特定的同一性关系统一起来的对立面之间才会产生的互相排斥、互相限制、互相否定的关系。他说，比如象“柴、米、油、盐、酱、醋、茶”这些东西，只有在厨师煮饭烧菜进行烹调的时候，才能被统一起来构成矛盾，它们之间才会形成互相排斥、互相否定、互相限制的矛盾的斗争性关系。毛泽东认为，一切有差别的东西只有在一定条件下统一起来，其差别才能展开上升为矛盾的斗争性。

要准确掌握毛泽东关于矛盾斗争性的思想，就要注意毛泽东关于矛盾斗争性的各种不同表述方式。毛泽东常常用“矛盾着的各方面”、“矛盾性的方面”、“矛盾的东西”等术语来表述对立面之间互相排斥的斗争性质或关系。比如，他在《矛盾论》中曾讲到：“在一定条件之下，矛盾的东西能够统一起来，又能够互相转化；无此一定条件，就不能成为矛盾，不能共居，也不能转化。”这里，两个分句中的“矛盾”的含义是不相同的：在前一个分句中，作为主语的“矛盾的东西”，是“对立的東西”的同义语。因为这里的“矛盾”一词，只能用“对立”或“斗争”来替换而不能用“对立统一”来替换；而在后一个分句中，“矛盾”作为“矛盾的东西”的宾语，指的是“对立面的统一体”。因为此处的“矛盾”一词，只能用“对立面的统一体”来替换而不能用“对立”或“斗争”来替换。

要准确掌握毛泽东关于矛盾斗争性的思想，还必须注意哲学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411页。

上斗争性概念的含义与社会生活中所使用的斗争性概念的含义的区别。“斗争”是从社会领域中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借用来的一个概念。但是，它作为具有一般意义的哲学范畴，同日常生活用语中的“斗争”有着质的区别。因此，不应把哲学上的斗争性概念同其他学科中的或生活中的“斗争”概念混同起来。

以上两点十分重要。过去，我们在实践中片面夸大阶级斗争和思想政治斗争的作用，究其理论根源就在于：一方面，混淆了矛盾同矛盾的斗争性的区别，把矛盾片面归结为斗争，把矛盾学说片面归结为斗争学说，用形而上学的斗争性代替了辩证法的矛盾的斗争性。另一方面，混淆了哲学的斗争性概念同其他领域中的斗争概念的区别，把矛盾的斗争性等同于日常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夸大阶级斗争和思想政治斗争的作用。因此，为了避免过去的错误，就必须掌握毛泽东关于矛盾斗争性的各种不同表述方式，严格区别哲学的斗争性概念同其他领域的斗争概念，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关于矛盾斗争性的思想。

三、一切事物矛盾关系的实质

矛盾的同一性之所以是包含了差异和对立的同一性，矛盾的斗争性之所以是同一性基础上展开的斗争性，这是因为它们都是矛盾的根本属性，同一性和斗争性互相依赖与包含的内在的有机联系，是一切事物内部和事物之间形成矛盾关系，构成矛盾统一体的根据。

矛盾是事物内部或事物之间发生的一种关系，这种关系既是对立的，又是统一的。所以简单地说，矛盾就是对立统一关系。对立关系和统一关系是一切矛盾关系的基本内容。事物内部的诸要素之间或事物与事物之间，只有同时具有这两方面的关系才是形成了矛盾关系。只有对立关系而无统一关系，或只有统一关系而无对立关系，都不能构成矛盾关系。矛盾之所以必有对立关

系,是因为构成矛盾关系的两个方面或两个要素本身是相异物,因而在其间的关系中必会产生出互相排斥、互相否定;互相分离的斗争性质。同样,矛盾中之所以存在统一关系,也是因为构成矛盾关系的双方本身有着共同的基础,存在着在一定条件下互为存在前提的同一可能性,从而形成统一关系。所以,矛盾中的统一关系是构成矛盾关系的双方具有同一性的表现。

但是,仅仅承认一切矛盾关系都包括对立关系和统一关系,还不能把握矛盾。只有把矛盾关系当作同一性和斗争性本身的对立统一关系来把握,才能深刻理解同一性和斗争性是矛盾的根本属性,从而把握住矛盾的实质。这是因为:首先,尽管对立关系和统一关系是一切矛盾关系的基本内容,却不是可以在时间和空间上互相分离的两种独立平行的关系。将矛盾关系区分为对立关系和统一关系两个方面,这只是人们为准确把握矛盾关系的基本内容而在思维中加以抽象分离的结果。在现实的矛盾关系中,它们是同一矛盾关系的互相反对的两个侧面,是同一矛盾关系表现出来的两种相反的性质。所以,要真实地把握矛盾关系,就不能把对立关系和统一关系理解为孤立独存的两个片面,而必须从思维中的抽象阶段上升到具体阶段,在对立中把握统一,在统一中把握对立。其次,通过对立关系和统一关系表现出来的同一性和斗争性,也是不可互相分离的。尽管同一性和斗争性是互相反对的,同一性不是斗争性,斗争性也不是同一性,但在现实的矛盾体系中,这两种互相反对的性质却只能以其对方的存在为自己存在的前提。没有同一,便没有斗争;没有斗争,也没有同一;同一只能是斗争中的同一,斗争只能是同一基础上的斗争。所以,同一性和斗争性的关系本身就是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认识矛盾,把握矛盾,根本上就是认识和把握同一性和斗争性本身的这种矛盾关系。这是一切矛盾关系的真谛,是辩证法和形而上学在认识同一性和斗争性问题上的根本区别。只有把同一性和斗争性的关系当

作对立统一关系来把握，才能真正理解同一性和斗争性是矛盾的根本属性，才能把握矛盾关系的实质。

毛泽东在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用“一分为二”这一中国哲学中的传统命题，对矛盾概念作了中国化的解释，不仅通俗易懂，而且言简意赅，深刻揭示出一切矛盾关系实质上就是对立面之间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的对立统一关系。因为，在毛泽东看来，“一”就是指矛盾是一个统一的体系，“二”就是指这个统一体系中包含着两个不同的方面或因素；“一”所以会分开为“二”，即统一体内部之所以会分为两个不同的方面，是因为这个统一体内部有着互相分离、互相排斥、互相否定的斗争性质；“二”所以会合成为“一”，即两个不同的方面或因素之所以又是统一的东西，是因为这个统一体内部又有着使对立双方互相吸引、互相依赖、互为存在前提的同一性质。所以，将矛盾解释为“一分为二”，也就是将一切矛盾关系本质上看作统一与对立、同一性与斗争性的关系，这就深刻地揭示了一切矛盾关系的实质。

矛盾是关系范畴而不是实体范畴。任何矛盾都是指两个实体之间形成的既互相肯定又互相否定的对立统一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矛盾和事物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因为事物这一概念通常都含有实体的意义。因此，要正确理解毛泽东关于矛盾就是“一分为二”，矛盾关系本质上就是“一”与“二”的关系的思想，避免把矛盾概念当作实体范畴，就必须真正搞清楚毛泽东关于矛盾即是事物这一说法的含义。

毛泽东提出矛盾即是事物，并不是要赋予矛盾概念以实体范畴的性质，而是强调说明：（1）对立统一关系是事物存在方式中最基本、最深刻、最普遍的关系；（2）矛盾分析法是认识事物的根本方法。这彼此相关的两点，说明矛盾即是事物的看法深得唯物辩证法的要旨。世界上千差万别、丰富多彩的各种事物，都处

在各种不同的对立统一关系之中，通过对立面之间的互相规定而获得了自己质的规定性。比如，一个人只有在男与女、长与幼、父与子、师与生等等对立统一关系之中，才会获得自己或男或女、或长或幼、或父或子、或师或生的质的规定；对立面不同，其质的规定性也不同。所以，一物与他物的区别，一物向他物的转化以及事物的丰富多样性，都是由事物与事物之间、事物自身各要素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引起的。有什么样的具体的对立统一关系，事物就有什么样的质的规定性。对立统一关系的具体内容发生了变化，事物的质的规定性就会发生相应的变化。这样，认识事物，把握事物的质的规定性的任务，本质上就是认识矛盾，把握事物具体的对立统一关系的任务。因此，矛盾即是事物这一看法，不仅没有赋予矛盾以实体范畴的性质，相反，它却更为深刻地揭示了事物自身的辩证性质，使矛盾这一概念直接具有了方法论的意义。

第二节 矛盾运动的内在机制

任何矛盾的双方始终存在着既互相斗争，又互相同一的这两种关系。正如毛泽东所说的：“在同一性中存在着斗争性”，“而斗争性即寓于同一性之中”。因此，任何离开斗争性来谈同一性，或离开同一性来谈斗争性都是错误的。辩证法要求在对立中把握同一，又要在同一中把握对立，坚决驳斥只讲同一否认斗争，或只讲斗争否认同一的形而上学。

一、同一性的有条件性

在任何矛盾中，对立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始终是联结在一起的，它们对于矛盾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但是，同一性和斗争性作为矛盾的两个正相反对的根本属性，它们各自的特点又是不相

同的。

同一性的基本特点就是它的有条件性或相对性。列宁曾指出：“对立面的统一（一致、同一、同等作用）是有条件的、暂时的、易逝的、相对的。”^①毛泽东也说：“客观事物中矛盾着的诸方面的统一性或同一性，本来不是死的、凝固的，而是生动的、有条件的、可变动的、暂时的、相对的东西，一切矛盾都依一定条件向它们的反面转化着。”^②为什么同一性是相对的、有条件的、暂时的和易逝的呢？这是因为：

第一，任何同一性、任何对立面的统一关系，都是具体的。只有在一定的条件系统中，事物自身或事物之间才能形成一定的同一性，如果没有一定的条件，或者说不参照于一定的条件系统，任何事物自身或事物之间就无所谓同一性，无所谓对立面的统一关系的问题。世界上既不存在绝对不能与任何他物形成同一性关系的事物，也不存在完全不需要任何条件就能与他物形成同一性关系的事物。无一定的条件，对立的双方就不能成为矛盾，不能共居，也不能转化。这就是同一性的有条件性和相对性。

第二，凡是有条件的东西就是暂时的和易逝的东西。任何条件都是在事物之间普遍的相互作用中产生的，同时也会在这种普遍的相互作用中改变和消失。因此，事物在一定条件系统中形成的同一性关系，始终是随着该条件系统的产生而产生、变化而变化、消失而消失的。一切过程都是有始有终的，一切过程的常住性是相对的。所以，有条件的和相对的同一性是暂时的和易逝的。

毛泽东十分重视对同一性的条件的研究。同一性的有条件性主要表现为：对立的矛盾双方因一定条件而呈现出互相依存和互相转化的状态。这是矛盾存在和发展过程中的两种基本状态。毛

① 《列宁全集》第38卷，第408页。

② 《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第171页。

泽东认为，前一种状态表现为对立双方的均势、相持、平衡，它决定着事物的发展处于量变阶段；后一种状态则表现为对立双方均势、相持、平衡的打破，它决定着事物的发展处于向他物转化的质变阶段。毛泽东在说明矛盾同一性的两种情形时，特别强调了矛盾双方转化的重要性。他认为，单说了矛盾双方互为存在的条件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是不够的，“更重要的，还在于矛盾着的事物的互相转化。”^①为此，他用了相当多的篇幅，举了大量的例子来阐明矛盾转化的理论。他说：“在这里，条件是重要的。没有一定的条件，斗争着的双方都不会转化。”^②任何矛盾的存在和发展都要经历对立面由互相依存向对立面转化这样两个基本状态。这就说明，同一性的有条件性，不仅从形成同一性的一般意义上来说是如此，而且从矛盾发展过程中的不同存在状态来说也是如此。因此，同一性始终是处于一定条件下的具体的同一性。

掌握同一性的有条件性的原理十分重要。首先，研究形成某种具体同一性的条件，即研究对立面“怎样能够是同一的，又怎样成为同一的，”是研究矛盾特殊性的基本内容。任何矛盾都是共性与个性的统一。要认识和把握矛盾，就必须在掌握矛盾的共性的基础上，着重分析矛盾的个性即特殊性。而矛盾之所以有特殊性，即各种具体的对立统一关系之所以不同，就是因为决定对立面“怎样能够是同一的，又怎样成为同一的”那些具体条件不同。只要逐一认识和抓住了那些决定形成某种同一性的具体条件，也就抓住了这种具体的对立统一关系赖以存在的特殊性，就能够找出解决该矛盾的办法。所以，认识矛盾的特殊性，本质上就是认识形成某种具体的同一性的条件性。其次，只有掌握了同一性是有条件的这一原理，才能将矛盾看作是活生生的变动和发展的过程。因为同一性的有条件性，根本上就是矛盾的具体性和条件性。任何矛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第169页。

②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94页。

盾都是具体的，都是由于一定条件的产生才发生的。因此，随着条件的变化，矛盾亦会发生变化。这就要求我们不能用僵死的一成不变的观点来看问题，而必须把一切问题都放到一定的条件系统中来认识和把握。

二、斗争性的无条件性

与矛盾同一性的基本特点相反，矛盾的斗争性的基本特点是无条件性或绝对性。

斗争性的无条件性并不是指斗争性处于具体的条件之外，绝对不需要任何条件。在斗争性问题上，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形而上学认为任何两个相异的事物之间都存在斗争关系，而辩证法则认为只有在构成了矛盾统一体的两个对立面之间，在它们的某种具体的同一性关系当中，才存在着斗争性。不仅斗争性是同一性存在的前提和条件，同一性同样也是斗争性存在的前提和条件。矛盾的斗争当然要受到具体条件的制约，具体的条件制约着斗争的形式和界限等。因此，在辩证法中斗争性的无条件性，是指矛盾斗争的存在不受任何条件的限制，在任何条件下矛盾双方相互排斥的斗争性都要贯彻下去，有矛盾就有斗争。

列宁曾经说过：“互相排斥的对立面的斗争则是绝对的，正如发展、运动是绝对的一样”。^①毛泽东把握了列宁这一论述的真实含义，他认为，斗争性起着推动事物运动发展的决定性作用，但事物的运动发展并不是斗争性单方面作用的结果，而是斗争性与同一性双方共同作用的结果。毛泽东认为，矛盾的斗争性的无条件性就是指斗争性贯穿于事物的量变和质变两种不同存在状态中，而不以决定事物采取何种存在状态的条件的变化为转移。他说：“事物总是不断地由第一种状态转化为第二种状态，而矛盾的

^① 《列宁全集》第38卷，第408页。

斗争则存在于两种状态中,并经过第二种状态而达到矛盾的解决,所以说,对立的统一是有条件的、暂时的、相对的,而对立的互相排除的斗争则是绝对的。”^①这样说,是因为:

第一,同一性的具体形式受条件的制约,斗争性不受这些条件的制约。同一性包括互相依存和向他物转化这样两种基本形式。这两种基本形式表现着矛盾发展过程的两种不同的存在状态。矛盾的存在采取哪一种同一性形式或哪一种状态,这是由具体的条件决定的,随条件变化而变化的。但是,无论在哪一种矛盾存在状态或同一性形式中,矛盾的斗争性始终都具有互相否定、互相排斥的性质。尽管在统一性的不同状态中,斗争性也存在差异,但这种差异只是量的差异而不是质的差异,即只是斗争性展开与否或发展程度的差异。由于同一性的具体形式要随条件的变化而变化,而斗争性却在这种变化中始终如一地保持着自己的唯一性质,不因条件变化而变化,所以说斗争性是无条件的。

第二,只有斗争性才能打破条件的制约,推动矛盾由互相依存的状态向对立面转化的状态过渡,并达到矛盾的最后解决。同一性的具体形式是因一定条件而产生的。因此,在统一性与条件的关系上,同一性是被动的,不能打破条件对它的制约。斗争性作为同一性的否定面,同时也就是决定矛盾处于哪一种同一状态的条件系统的否定面。因此,在斗争性与条件的关系上,斗争性始终是能动的。它不仅是推动矛盾由互相依存的状态向对立面转化的状态过渡的力量,而且是打破条件对矛盾存在状态的制约的力量。所以,斗争性是无条件的或绝对的。

掌握斗争性的无条件性原理十分重要。矛盾斗争性的无条件性和矛盾同一性的有条件性,这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不同侧面。同一性之所以是有条件的,正是因为斗争性是无条件的。同一性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第174页。

的有条件性中包含着斗争性的无条件性，同一性是活生生的具体的同一性。否则，同一性就是僵死的，就不可能因条件的变化而变化。所以，只有同时掌握斗争性的无条件性和同一性的有条件性的原理，才能把握和理解矛盾是事物运动变化发展的内在源泉的道理。

三、一切事物矛盾运动的源泉

世界上的事物无不处于一定的对立统一关系之中，并且在这种关系中获得自己有别于他物的质的规定性，成为某种特殊的事物。因此，一事物向他事物的转化，归根结底是其自身矛盾关系的转化；矛盾才是事物发展的源泉和动力。有条件的矛盾同一性和无条件的矛盾斗争性相结合，就构成了一切事物矛盾运动的内在机制；发展就是对立面的同一和斗争。在各种外部条件影响下，事物内部的对立面既相依赖又相排斥，既有条件地同一又无条件地斗争，使对立双方的力量处在此消彼长的变化过程中。一旦对立双方的力量发生了根本变化，它们各自的地位便会发生互相转化，于是新的矛盾统一体就会取代旧的矛盾统一体，使旧事物转化为新事物。

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相结合推动事物发展，这是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理，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一贯思想。列宁曾经指出：“发展是对立面的‘斗争’”，“发展是对立面的统一”^①。但是，要准确把握这一原理，就不能把同一性和斗争性的“结合”理解为互不相干的两个东西的机械相加。只有紧紧抓住同一性和斗争性不可分割的有机联系，从它们自身的对立统一关系上来理解它们的“结合”，才能真实把握事物发展的过程。毛泽东说：“有条件的相对的同性和无条件的绝对的斗争性相结合，构成了一切事物

^① 《列宁选集》第2卷，第712页。

的矛盾运动。”^①强调了事物的运动变化是由于它自身内部既统一又斗争、既相反又相成的矛盾关系所推动的。

尽管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相结合才能推动事物的发展，而且它们各自的作用也只有在双方的有机统一中才能实现。但是，同一性和斗争性在事物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却是不相同的。

矛盾同一性在事物发展中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对立面的互相依存是一切矛盾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毛泽东指出，矛盾同一性和斗争性的关系就是“相反相成”的关系。“‘相反’就是说两个矛盾方面的互相排斥，或互相斗争。‘相成’就是说在一定条件之下两个矛盾方面互相联结起来，获得了同一性。”

① 矛盾双方因为对立才统一，又因为统一才对立。斗争性是同一性的基础，同一性又包含着斗争性。矛盾的这两种属性是互相联结不可分割的。本来相异的事物之所以能够互相依存和必然会互相依存，这是因为只有在与对立面的互相依存当中，才能获得自身存在和发展的全部根据。对立双方通过互相依存着的统一体，互相吸取有利于自身的因素，在相互利用中相互促进，达到自身存在根据之发展和完善的目的。

现代系统论认为，任何系统的存在和发展都要取决于该系统与其周围环境，即与作为它的对立面的其他系统的相互作用。任何系统只有通过向周围环境的开放，向其他系统输出自己内部的熵，并从周围环境中输入负熵即信息，才能增强自身内部组织的有序性，提高自己生存和发展的能力；否则，就会萎缩和死亡。在这里，系统之间的关系，通过熵与负熵表现为对立统一关系；一系统内部的熵即为他系统的负熵。这就表明，任何系统只有通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第175页。

过与作为其对立面的其他系统的互相依存，实现了熵与负熵的相互作用，才能获得自身的存在和发展。

第二，对立面的互相转化规定了事物发展的基本趋势。事物的发展就是一物转化为他物。但是，转化为他物不是转化为任何别的东西，而是转化为自己的他物，即转化为自己的对立面。事物的对立面，作为该事物自身的一个存在环节，已经内在地包含在自身当中。因此，一物是在何种条件下与他物构成统一体的，是怎样成为统一体的，这就规定了事物发展的基本趋势。例如，生物的进化是在遗传和变异的矛盾运动中实现的，遗传和变异的相互贯通就规定着生物进化的基本趋势。总之，离开了对立面之间具体的同一性，就不能确定事物发展的基本趋势。

在充分肯定矛盾同一性在事物发展中的作用的同时，必须看到矛盾斗争性在事物发展中的作用。毛泽东认为，矛盾斗争性在事物发展中的作用，可以从量变和质变这两个过程来看。他说：“无论什么事物的运动都采取两种状态，相对地静止的状态和显著地变动的状态。两种状态的运动都是由事物内部包含的两个矛盾着的因素互相斗争所引起的。”^①

矛盾斗争性在事物量变过程中的作用，就在于它推动着矛盾双方力量的变化。矛盾发展的过程首先是对立双方力量的彼此消长过程，这一过程是由对立面的相互排斥所推动的。在对立面的斗争中，双方竞长争高，此消彼长，造成力量对比和发展的不平衡性和变化性，为对立面的转化、为事物的质变进行了量的准备，创造了现实的条件。例如，没有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以及由此引起的力量变化，就不可能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实现社会发展中的质变。所以，没有对立面斗争所引起的对立双方力量对比的变化，就不会有事物的质变。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第174页。

矛盾斗争性在事物质变过程中的作用更加明显。任何事物都是质与量的统一，因而一物要转化为他物，就必须突破将事物的质与量统一起来的原有的“度”。由于事物内部的矛盾发展，当达到使原有的统一体破裂的关节点时，即矛盾斗争性一旦突破这个关节点时，一物就向他物转化。总之，事物质变的过程，就是原来的矛盾统一体彻底分裂的过程，是矛盾斗争性彻底贯彻的过程。对立面的斗争终究要打破对立双方的互相依存，使旧的矛盾统一体瓦解，新的矛盾统一体产生，这就是辩证法的革命性质之所在。

唯物辩证法关于矛盾同一性和斗争性相结合推动事物发展的原理，要求我们在观察和处理问题时，必须把同一性和斗争性联系起来，要根据事物发展的不同阶段，具体地分析同一性和斗争性的作用，不能只强调一方面，忽视另一方面。只有这样，才能推进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

第六章

唯物辩证的范畴论

唯物辩证法是关于事物发展规律的学说，是关于人们对客观世界的活生生的认识论。它除了对立统一、质量互变和否定之否定这三条基本规律以外，还包括着反映事物发展过程中不同侧面的联系和关系的一系列范畴，诸如本质与现象、主流与支流、内容与形式、可能与现实、一般与个别、必然与自由等。这些范畴是对立统一规律的具体形态，它们与三个基本规律一起，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唯物辩证法的体系。毛泽东虽然没有专门论述范畴的专著，但他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从实际出发，纯熟运用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范畴理论，揭示了这些范畴的内在联系，增添了这些范畴的新内容；并提出了不少新的哲学范畴，赋予一些范畴的综合性的特征，从而进一步发展了唯物辩证法的范畴理论。

第一节 范畴的综合性特征

客观事物往往是一个多层次的、复杂的有机整体，因此，作为反映客观事物认识形式的范畴，总不是单一的、唯一层次的，而是复杂的、多种层次的。毛泽东从事哲学研究，正是从这个基本观点出发，提出了一系列的具有综合性特征的范畴，丰富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范畴理论。

一、什么是范畴的综合性特征

所谓范畴的综合性特征，是指毛泽东把许多哲学观点有机地统一起来，高度概括为某一个哲学范畴。这样综合性的范畴，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多义性，即不仅具有其他哲学概念、范畴所共同具有的特点，而且它自己本身包含着多种的相对独立的意义。例如：“实事求是”、“辩证矛盾”和“群众路线”这几个范畴，毛泽东在论述中，就具有多种的独立的意义，具有综合性的特征。

实事求是。毛泽东给实事求是所下的科学定义至少有三层含义：第一，求实，强调研究问题不要从头脑或原则出发，而要从客观实际出发，这体现了唯物主义的观点；第二，求是，强调研究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第三，理论与实际的统一。它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规律。由此可见，实事求是这个范畴内容极其丰富，它是唯物论和辩证法和认识论的有机统一。

辩证矛盾。即对立统一，它包含着三个层次的意义：第一，从统一中把握对立，即“一切事物都是可以一分为二的。”第二，从对立中把握统一，即在一定的条件下，相反的两个事物可以“合二而一”的。第三，从过程中把握对立统一。就是说，事物矛盾着的彼方与此方，无论是同时存在的，还是先后出现的，一般来说，它们总不可能转瞬即逝，而是在历史过程中纵向地存在着，因此体现出矛盾即是过程。

群众路线。这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科学体系中的极其重要的范畴，也包含着三个层次的意义：第一，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是唯物史观的重要原则。第二，群众的实践活动是认识的源泉，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是人类认识运动的根本途径，这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第三，“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是唯物辩证法的科学方法。

总之，唯物辩证法范畴具有多层次性、综合性的特征。掌握

范畴的这种特征是极为重要的。

二、范畴的综合性特征的客观依据

毛泽东哲学范畴的综合性特征，并非凭空想象出来的。它有着坚实的客观基础，是对客观物质运动、尤其是对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多样性的哲学概括。

自然界每一客观事物都是多样性的统一，其本身不仅包含着一系列特殊的规律，而且又同时包含着许多最普遍性的规律。一棵树作为植物，它自身含有植物运动的同化和异化的特殊规律，同时还包含着诸如原因与结果、必然与偶然、内容与形式、一般与个别等矛盾运动规律。事物中的普遍性规律是多样的，又是统一的。所谓统一，就是指它们不是各自孤立存在，而是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不是分隔在几个过程中，而是发生在同一过程中的。事物这种多样性统一反映到人们的思想中，就必然使概念、范畴、命题等带有综合性的特征。正如列宁指出的，“在任何一个命题中，好象在一个‘单位’（‘细胞’）中一样，都可以（而且应当）发现辩证法一切要素的萌芽，……而自然科学则向我们揭明（这又是要用任何极简单的实例来揭明）客观自然界也具有同样的性质，揭明个别向一般的转变，偶然向必然的转变，对立面的转化、转换、相互联系。”^① 列宁这句话包含两层意思：一是说任何一个命题都包含着一切辩证法的因素。他特意把“一切”二字打上着重号，旨在强调任何一个命题所包含的辩证法因素不只是一个，而是许多个。二是说任何客观事物都具有辩证统一性质。他把“任何”二字打上着重点，也是在强调客观事物辩证统一的普遍性。客观辩证法是主观辩证法的基础，主观辩证法是客观辩证法的反映。毛泽东哲学范畴的综合性特征，同列宁所讲的辩证法命题一样，都

^①列宁《哲学笔记》，第410页。

是对客观事物的多样性统一的哲学概括。

毛泽东哲学范畴的综合性特征，不仅是对自然界客观事物多样性统一的哲学概括，而且是对着复杂的社会实践活动的多样性统一的哲学概括。社会实践活动同样存在着一系列相对独立的多样性的统一。它既有社会实践主体的多样性，又有实践对象和实践手段的多样性。从社会实践的结构、层次来看，它至少包括以下五个方面：第一，物质生产实践；第二，革命实践；第三，精神生产的实践；第四，人类自身生产的实践；第五，服务性的实践。可见，社会实践活动也是一个多样性的统一体，毛泽东哲学范畴的综合性特征也是对社会实践活动的这一特点的反映。

人类思维最基本的形式就是分析和综合。所谓分析是指人们经过思维的抽象，透过事物的现象，抓住事物的本质，形成一个个概念、范畴等。但在分析中，这些概念、范畴各自还是孤立的。综合就是在分析的基础上，把一个个孤立的观念、范畴联系起来，统一为整体，达到思维的具体，从本质上再现事物的多样性统一。毛泽东哲学范畴的综合性特征，也是人们思维活动的过程的多样性统一的体现。当然，思维活动过程的多样性的统一是以客观事物的多样性统一为基础的。归根结底，都是对客观事物多样性统一的反映。

三、范畴综合性特征的意义

毛泽东哲学范畴的综合性特征，进一步丰富和深化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统一性原则。在旧哲学中，唯物论和辩证法、自然观和历史观都是相互分离或相互对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使它们统一起来了。统一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特点。列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两部分比作一块不可分割的整钢，还强调了逻辑学、认识论和辩证法是统一的。毛泽东哲学范畴的综合性特征，一方面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统一性原则的坚持；另一方面是在坚持中

中的一种创造。主要表现在：其一，它包含着新的统一性的内容，丰富了统一性的原则。例如，在“实事求是”这个范畴中，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无产阶级政党的工作方法、工作作风统一起来，融为一体，这是前所未有的；其二，进一步深化了统一性原则。例如，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相统一的论述都是比较原则的，而在“群众路线”这个范畴中，所揭示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与唯物史观的统一，就进一步具体化和深刻化了。其三，在统一性的形式上也有所创新。哲学统一性在以前主要是指体系而言，毛泽东哲学思想中除了从体系上坚持哲学的统一性以外，还以范畴形式来体现哲学的统一性，表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统一性，不仅通过体系表现出来，而且还通过它的“细胞”即范畴、概念表现出来。

毛泽东哲学范畴的综合性特征的重要意义还在于，为实际工作中正确运用哲学提供了科学的方法。客观事物中普遍规律的多样性统一要求我们在实际工作中运用哲学时，不能把各个哲学观点分割开来，而应该把它们综合起来解剖事物，综合起来指导我们的革命和建设的实际活动。毛泽东在这方面为我们做出了光辉的典范。我们在学习毛泽东著作尤其是军事著作时，就深深感到不论哪一篇著作其中包含的哲学观点都不只是一个、两个，而是许多个，并且这些观点是融为一体的。例如，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他阐明战争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战争的局部与全局、正确发挥主观能动性等哲学原理时就是这样。在《论持久战》一文中，他运用了质量互变规律、对立统一规律以及相信和依靠人民群众的唯物史观等。当他分析抗日战争发展的历史进程时，把量变和质变同矛盾的性质联系起来考察，提出了旧的量和质与新的量和质、向下的变化与向上的变化等新概念，这就把质量互变规律和对立统一规律综合了起来。翻开毛泽东著作，此类综合运用哲学的例子是不胜枚举的，而提出综合性的哲学范畴

则是他综合地运用哲学观点的一个重要方面。实践证明，这种做法充分发挥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与方法论相统一在指导实际工作上的重要作用。

第二节 范畴之间的内在联系

任何事物，由于内部矛盾又统一又斗争，都总不断地向前推移、向前发展的，人们的认识运动也跟着不断地向前推移和向前发展。因此，唯物辩证法范畴随着人们认识的深化必然不断地向前推移、向前发展，这就决定了唯物辩证法范畴之间存在着内部的紧密联系。而本质这个范畴在其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是联系其他范畴的核心和桥梁。

一、本质是一个最根本的核心范畴

本质这个范畴是一个最根本的核心的范畴，关于这一点，黑格尔站在唯心主义立场上，早就作出明确的规定。他在《逻辑学》的本质论中，指出：应当把形式与内容、整体与部分、必然性与偶然性、可能性与现实性、原因与结果等等都看作是属于本质范围的范畴。黑格尔还说，哲学的任务与目的在于认识事物的本质，而不应让认识停留在事物的直接性上。列宁肯定了黑格尔这一思想，指出“‘概念（认识）在存在中（在直接的现象中）揭露本质（因果律、同一、差别等等）——整个人类认识（全部科学）的真正的一般进程就是如此。’”^①毛泽东继承和发展了列宁这一思想，以本质这个范畴为中心，正确阐述了本质与其他范畴之间的内部联系，从而建立了唯物辩证法范畴的科学体系。

本质这个范畴之所以是一个最根本的核心的范畴，成为唯物

^①《列宁全集》第38卷，第355页。

辩证法其他范畴联系的中心,是因为它具有极其丰富的内容。本质就是矛盾,就是事物的特点、实质和内部联系。由于矛盾的差别性、多样性、复杂性及其在发展过程中的变化,就必然使本质这个范畴具有不同于其他范畴的内在规定性。本质这个范畴又反映了人们对事物实质的认识,从现象到一般的本质、再到深入的本质的深化过程,而且随着矛盾运动的发展又反映着本质这个范畴向其他范畴的发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要以本质为中心,才能正确理解唯物辩证法范畴之间的内部联系。

具体来说,有以下几点:

第一,本质是矛盾。所谓本质就是指事物比较稳定的方面,是事物外部表现形态的基础,它是由事物本身所包含的特殊矛盾构成的。例如,机械运动的本质,是由吸引和排斥的矛盾构成的;化学运动的本质是由化合和分解的矛盾构成的;生物运动的本质是由同化和异化、遗传和变异的矛盾构成的;社会运动的本质是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构成的,等等。正如毛泽东指出的:“任何运动形式,其内部都包含着本身特殊的矛盾,这种特殊的矛盾,就构成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特殊本质。”^①可见,特殊的本质与特殊的矛盾,普遍的本质与普遍的矛盾是同一层次。毛泽东在《矛盾论》一文中所提及的“共同的本质”和“特殊的本质”,就是指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

第二,本质是事物的特点、实质和内部联系。毛泽东在揭露顽固派的反动本质的时候,曾经指出,顽固派的反动叫嚣的本质就是顽固分子们的专制主义,他们在文化上的特点就是资产阶级的文化专制主义。这里所说的本质,就是指事物的特点。毛泽东又往往把事物的本质看成是事物的内在联系。他曾指出:“只有那些主观地、片面地和表面地看问题的人,跑到一个地方,不问环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第148页。

境的情况，不看事情的全体(事物的历史和全部现状)，也不触到事情的本质(事情的性质及此一事情和其他事情的内部联系)，就自以为是地发号施令起来，这样的人是没有不跌跤子的。”^①毛泽东还把本质与实质看成是同一层次的概念，他指出：我们看事情必须要看它的实质，不要为表面现象所迷惑。这里所说的实质，也就是本质的同义语。

第三，本质是新生力量发展的必然性。在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在分析革命力量和反革命力量的发展变化时，总是指出，反革命力量的优势只是暂时的现象。从本质上说，革命的力量总是占着优势的。这种对革命力量和反革命力量的深刻分析，说明了新生力量发展的必然性。例如解放战争时期，当着蒋介石以其四百余万的军事力量，加上接受了侵华日军一百万人的全部装备，还加上美国在军事上、财政上的巨大援助，发动了全国规模的反革命战争时，毛泽东就指出：“我们不但必须打败蒋介石，而且能够打败他。”^②“当着天空中出现乌云的时候，我们就指出：这不过是暂时的现象，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即在前头。”^③同时指出：“蒋介石军事力量的优势，只是暂时的现象，只是临时起作用的因素；美国帝国主义的援助，也只是临时起作用的因素；蒋介石战争的反人民的性质，人心的向背，则是经常起作用的因素；而在这方面，人民解放军则占着优势。”^④

第四，本质是现象的基础，现象是本质的表现。任何事物的本质都表现为现象，有时又表现为隐晦曲折的假象。本质与现象是统一的，正如列宁指出：“本质在表现出来；现象是本质的。”^⑤黑格尔也曾经说过：“本质表现在现象中，因此，现象不单纯是某种没有本质的东西，而是本质的显现。”^⑥当然，黑格尔所说的本质，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第128—129页。

②③④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626、627页。

⑤ 《列宁全集》第38卷，第278页。

⑥ 黑格尔：《逻辑学》，转引自《列宁全集》第38卷，第184页。

并不是客观事物的内在联系，而是“绝对现象”的本质。但现象不等于本质，特别是假象是对本质的歪曲反映。所以毛泽东指出：“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更深刻地感觉它。感觉只解决现象问题，理论才解决本质问题。”^①那些被假象掩盖的本质，更容易被人们所忽视，所以，我们必须注意区分真象和假象，透过事物的现象抓住事物的本质。

二、范畴是以本质为中心的相互联系的系统

范畴之间彼此不是孤立的，它们都是人们认识“自然现象之网”上的“纽结”，是纵横交错的，彼此之间有着错综复杂的联系，以本质为中心展开而形成相互交叉的范畴系统。

第一，本质与主流的内在联系。任何事物内部都包含矛盾的两个侧面，这两个侧面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有主要方面，也有非主要方面；有本质方面，也有非本质方面。在毛泽东看来，主流就是由事物本质决定的事物发展的基本趋势，支流就是由事物非本质决定的事物发展的非基本趋势。如果没有事物的本质方面，就不可能有主流；同样，如果没有事物的非本质方面，也就不可能有支流。实践证明，在实际工作中抓住了事物的本质，也就把握了事物发展的主流。因此，我们在认识事物时，必须正确区分本质与现象、主流与支流，着力抓住本质与主流。如果分不清主流与支流、本质与非本质，把支流误作主流，把非本质当作本质，就会迷失方向，犯大错误。

第二，本质与全局的内在联系。在全局和局部这对矛盾中，一般说来，全局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是起决定性作用的方面。在毛泽东看来，全局是贯穿局部的内在联系，是事物的全体和本质。因此，他在分析战争的时候，认为只有从战争的全局出发，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第125页。

在正确的战略原则指导下，才能保证战役和战斗的胜利，这种胜利对于解决整个战争的胜利有决定意义。他批评了那种认为战略的胜利取决于战术胜利的见解，指出这种意见没有看见战争的胜败主要的和首要的是全局和各个阶段关照得好或关照得不好。毛泽东的这些论述，有力的论证了全局高于局部，是关于事物本质的东西。可见，全局和局部这对范畴与本质存在着内在的联系。

第三，本质与内容的内在联系。客观事物的本质是由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的。这一点，毛泽东在《矛盾论》中说得十分清楚。他说：“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①事物发展的过程，就是以主要矛盾的双方为中心的反复斗争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事物的主要矛盾(本质)就表现为一定的具体内容以及相应的一定形式。例如，化学运动的主要矛盾是化合和分解，而化合和分解的过程，就体现为一定的化学元素的相互作用以及由此形成一定的分子结构。这里的化学元素就是内容，一定的分子结构就是形式。可见，内容与形式这对范畴同本质与现象这对范畴有着紧密的联系。本质与内容、现象与形式是同一序列的范畴。

第四、本质与现实的内在联系。客观事物发展的必然性，是由事物的内部矛盾决定的。必然性和本质属性是同一层次的概念。必然性是客观事物联系和发展中不可避免的趋向。这就是说，具有必然性的事物是一定会成为现实的。但是，在它成为现实之前还只是一种可能，它要经历由可能向现实的转化过程，可能性和现实性是揭示客观事物由可能向现实转化的这一发展过程的一对范畴。归根结底，这对范畴也是由事物的本质属性(内部矛盾)决定的。恩格斯在分析黑格尔哲学思想的合理内核时曾经指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第163页。

出：“现实的属性仅仅属于那同时是必然的东西。”“现实性在其展开过程中表明为必然性。”^① 这就是说，我们应当用辩证法 的思想来理解现实，不把现实看成僵死不变的东西，而把它看成一个由过去的可能发展而来，又向新的现实发展而去的不断发展变化着的过程。这个过程的内容、动力，就是事物内部所包含着的矛盾。可能性和现实性这对范畴，从一个侧面又表现了事物的本质属性。

第五、本质与一般的内在联系。个别和一般是揭示客观事物个性和共性相互关系的一对范畴。所谓个别，就是指单个的、特殊的事物，它是由事物内部的特殊矛盾决定的。所谓一般，就是指具有共同属性的一类事物，它是由这个事物与其他事物共同具有的普遍矛盾决定的。我们知道，客观世界是多种多样、千变万化的物质世界，是由形形色色的事物、现象和发展过程构成的，是万事万物相互联系、相互依赖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比如我们说，这是梨子，是因为它存在着与其他水果不同的形状、颜色、味道，这是个别。而“水果”这个概念，则是从梨子、苹果、香蕉等具体的果子中，把它们的共同属性概括出来的。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个别与一般的关系是事物特殊本质属性与这一事物和他事物共同具有的普遍本质属性的关系，即特殊矛盾与普遍矛盾的关系，也就是个性共性、相对绝对、矛盾特殊性和矛盾普遍性的关系。

第六，本质与必然的内在联系。必然性是规律性的体现。所谓客观必然性，就是指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固有的规律。不管人们认识与否，它总是独立于人们的意识之外而客观存在着的。它是客观事物联系和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一种趋势。不认识必然，就不会有自由。认识必然是自由的前提和基础。只有在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1页。

对必然的正确认识的基础上，根据对必然的正确认识进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由此可见，必然和自由是揭示事物的客观规律性以及人们对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和运用，它同样不能离开事物的本质属性，它也是由事物的内部矛盾决定的。

从上面分析可以看到，本质与现象、主流与支流、内容与形式、可能与现实等唯物辩证法范畴，虽然从不同的侧面和方面反映了事物、现象的普遍联系和全面发展，表现着各自的特殊性，但它们又有其本质上的共同点，就是：它们都是客观事物和现象普遍本质的反映，各对范畴都是既对立统一的关系，都以本质这个范畴为中心发生的相互错综复杂的联系，从而形成了唯物辩证法范畴的理论系统，而每个范畴都是这个理论系统“之网的网上纽结。”各对范畴之间不是孤立的，而且是紧密联系的。不仅如此，它们还同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发生联系，综合地发挥作用。

三、坚持范畴内在联系的意义

坚持唯物辩证法各对范畴之间的内在联系，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际上都有重要的意义。

第一，坚持范畴内在联系，就是坚持范畴问题上的辩证法。在肯定唯物辩证法各对范畴相对独立的前提下，充分估计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转化，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恩格斯曾经指出：“……两个哲学派别：带有固定范畴的形而上学派，带有流动范畴的辩证法派（亚里士多德、特别是黑格尔）；证明：理由和推断、原因和结果、同一和差异、外表和实质这些固定的对立是站不住脚的，由分析表明，一极已经作为胚胎存在于另一极之中，一极到了一定点时就转化为另一极，整个逻辑都只是从前进着的各种对立中发展起来的。”^①毛泽东关于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31页。

唯物辩证法范畴及以本质为中心联系的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范畴学说的继承和发展，有利于批判形而上学和诡辩论的范畴论。

形而上学和诡辩论从两个极端来歪曲范畴的辩证性质。形而上学把各个范畴看成是孤立的、静止的和凝固不变的东西，不仅范畴的数量和涵义是一成不变的，而且各个范畴之间是彼此孤立的，绝对对立的，它们之间不存在任何的联系，更不可能相互转化。诡辩论则抽掉各个范畴之间相互转化的条件，把范畴之间的相互转化歪曲成主观随意、变幻莫测的东西，否认范畴作为客观事物普遍本质的反映所具有的确定的内容。对于这种诡辩论的范畴观，列宁曾做过深刻的分析，指出：“概念的全面的、普遍的灵活性，达到了对立面同一的灵活性——这就是问题的实质所在。这种灵活性，如果加以主观的应用=折衷主义与诡辩。客观地应用的灵活性，即反映物质过程的全面性及其统一的灵活性，就是辩证法，就是世界的永恒发展的正确反映。”^①

第二，坚持范畴内在联系，有利于在实际工作中照顾全局，突出重点。唯物辩证法范畴，是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不可缺少的思想武器。人类的认识史证明，没有范畴，人们就不会有自觉的实践和科学的思维。正如恩格斯指出的：要思维就必须有逻辑范畴。^② 列宁则说：“在人面前是自然现象之网。本能的人，即野蛮人没有把自己同自然界区分开来，自觉的人则区分开来了。范畴是区分过程中的一些小阶段，即认识世界的过程中的一些小阶段，是帮助我们认识和掌握自然现象之网的网上纽结。”^③ 这就是说，范畴是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必不可少的工具。而要在实际工作中，充分发挥唯物辩证法范畴的工具作用，就不能把各对

①《列宁全集》第38卷，第112页。

②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33页。

③《列宁全集》第38卷，第90页。

范畴彼此地孤立起来。应当把唯物辩证法各对范畴看成是紧密联系的有机的整体,综合地发挥它们的作用,在思想上形成辩证思维的方式,才能在实际工作中做到既照顾全局,又突出重点。

第三节 范畴的成对系列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不仅提出了范畴的综合性特征,揭示了各个范畴之间的内在联系,而且纯熟地运用了马克思主义一系列成对的范畴,给予这些范畴增添了新的内容,从而进一步地继承和发展了唯物辩证法的范畴理论。在这里,我们对毛泽东提出的本质与现象、主流与支流、内容与形式、可能与现实、必然与自由等范畴试作简要的介绍。

一、本质与现象

本质和现象作为辩证法的一对范畴,黑格尔最早给予明确地说明。在《逻辑学》的本质论中,他深刻地把本质概括为同一、差别、矛盾。列宁在《哲学笔记》中,对黑格尔有关本质与现象的论述作了大量的摘录,肯定并进一步地发挥了黑格尔的合理思想,揭露了它的唯心主义的杂质。毛泽东在前人的基础上,通过总结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对本质与现象进一步作了深刻的说明。

本质和现象这对范畴是事物的内部联系和外部联系之间辩证关系在思维中的反映。毛泽东用对立统一的观点对本质作了规定,指出:事物的本质是由它本身所包含的特殊矛盾决定的。“任何运动形式,其内部都包含着本身特殊的矛盾。这种特殊的矛盾,就构成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特殊的本质。”^①只要事物发展过程的这种特殊矛盾还没有解决,其过程的本质就不会改变。本质作为事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第148页。

物的内部联系，是理性认识的对象。现象与本质不同，它是事物的外部联系和表面特征，是事物的本质在各个方面的外部表现，是感性认识的对象。毛泽东指出：“一切事物，它的现象同它的本质之间是有矛盾的。人们必须通过对现象的分析和研究，才能了解到事物的本质，因此需要科学。不然，用直觉一看就看出本质来，还要科学干什么？还要研究干什么？所以要研究，就是因为现象同本质之间有矛盾。”^①

基于本质与现象的对立和差别，毛泽东告诉人们：“我们看事情必须要看它的实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作入门的向导，一进了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这才是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② 否则，就会得出错误的结论。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初期，由于1927年大革命的失败，革命力量大为削弱，中国革命陷入了低潮，党内一些人因而产生了悲观失望的情绪，提出“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毛泽东在批评这种悲观论调时指出，这些人只知道观察当前事物的表面现象，而不知道观察事物的实质。如果认真分析中国社会内部错综复杂的矛盾，就可以洞察到全国都布满了干柴，很快就会燃成烈火，革命高潮的到来是不可避免的。他对于反动派的分析也是这样，总是指出，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从长远的观点和从本质上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

本质与现象不仅是对立的，而且是统一的。本质总是隐藏在现象的后面，通过现象表现出来。本质表现为现象，现象总是本质的不同程度的外部表现。因此，毛泽东反复指出，研究问题要从人们看得见、摸得着的现象出发，从分析事物的现象入手，揭露隐藏在现象后面的本质，这才是科学的方法。如果离开对事物现象的分析，研究和把握本质只能是一句空话。本质与现象的对

①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50～151页。

② 《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第40页。

立，使对本质的研究成为必要；本质与现象的统一，则使对本质的研究成为可能。毛泽东在《实践论》中透彻地论述了透过现象来抓住本质的方法：一是参加社会实践，因为只有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才能接触事物的现象，并且通过现象抓住事物的本质；二是借助抽象思维的力量，事物的本质与现象往往是交织在一起的，只有通过抽象思维的作用，将丰富的感性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功夫，才能正确地把握事物的本质。

毛泽东在强调要透过现象抓住本质的同时，又提醒我们一定注意区分真象和假象，“尽可能不要被假象所迷惑。”^①假象虽然也是表现着事物的本质，但它是从反面歪曲地表现事物的本质，是属于一种特殊的现象。列宁说：“假象=本质的否定的本性，”“假象的东西是本质的一个规定，本质的一个方面，本质的一个环节。”^②所以假象并不是主观的，而是客观的，但它从反面来表现事物的本质，具有迷惑人的特点，能够给人们的认识造成困难，以至使人们在实践中造成失误。

二、主流与支流

主流与支流是唯物辩证法的一对重要的范畴。对于这对范畴，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其哲学著作中虽然有所述及，但没有明确提出这对范畴的意义。毛泽东在总结中国革命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明确地提出这对范畴，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范畴理论的贡献。

主流与支流这对范畴，反映了事物发展过程中两种不同的趋向。在毛泽东看来，主流就是由事物本质决定的事物发展的基本趋向；支流就是由事物非本质决定的事物发展的非基本趋向。任

①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51页。

② 《列宁全集》第38卷，第137页。

何事物内部都包含主要、本质方面和次要、非本质方面。主流是由事物发展的主要方面、本质方面决定的；支流是由事物发展的次要方面、非本质方面决定的。可以说，主流与本质、支流与非本质是同等程度的范畴，两者密切相关，毛泽东也常常把它们放在一起运用。

主流与支流是统一物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侧面在人们思维中的反映，因此，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对立的统一。在毛泽东看来，主流与支流在事物发展中的地位是不同的，主流在事物发展中居于主导地位，支流则处于次要的被支配的地位。他在运用主流与支流这对范畴分析革命工作时，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他说：“在革命队伍中，要划清正确和错误、成绩和缺点的界限，还要弄清它们中间什么是主要的，什么是次要的。例如，成绩究竟是三分还是七分？说少了不行，说多了也不行。一个人的工作，究竟是三分成绩七分错误，还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必须有个根本的估计。如果是七分成绩，那么就应该对他的工作基本上加以肯定。把成绩为主说成错误为主，那就完全错了。”^①然而，主流与支流又是统一的，它们都是某一统一物两个侧面在人们思维中的反映。

既然主流代表事物的基本趋势，在事物发展过程中居于主导地位，我们在认识事物和处理问题时，就必须根据事物的本质，正确地区分主流与支流，着力抓住主流。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不仅反复告诫人们一定要注意区别事物的本质、主流方面和非本质、支流方面，着力抓住事物的本质和主流，而且在这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典范。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当美帝国主义加紧扶蒋反共步骤的时候，毛泽东就运用主流与支流这对范畴分析当时的形势，正确地指出：“现在的世界潮流，民主是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672页。

主流，反民主的反动只是一股逆流。目前反动的逆流企图压倒民族独立和人民民主的主流，但反动的逆流终究不会变为主流。”^①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毛泽东总是强调要注意抓住主流、抓错了一定跌跟斗。对于农业合作化运动，他充分肯定了广大农民的大方向，明确指出：“（1）广大农民是愿意在党的领导下逐步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2）党是能够领导农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这两点是事物的本质和主流。”^②

虽然主流代表着事物发展的总趋势，但支流对事物的发展也起着制约的作用。如果忽视了支流方面的问题，那它就有可能转化为对事物发展起主要作用的方面而阻碍事物的发展，甚至使事物在发展过程中出现暂时的倒退。因此，毛泽东在强调要抓住事物的本质、主流的同时，还反复告诉人们不能忽视非本质方面和非主流方面的问题，必须逐一地将它们解决。实际上，毛泽东在肯定我们工作取得的成绩是主要的时候，也总是注意揭露和改正我们工作中存在的缺点和错误。

三、内容与形式

一切事物都有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都是内容和形式的辩证统一。内容是指构成事物要素的总和，形式是把事物内容诸要素统一起来的结构或内容的表现方式。内容与形式这对范畴就是构成事物的诸要素与其表现方式的辩证关系在思维中的反映。关于这对范畴，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有明确的论述，而列宁在这方面的论述最多。列宁不仅论述了内容与形式矛盾运动的过程，提出：“内容和形式以及形式和内容的斗争。抛弃形式、改造内容。”^③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03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80—181页。

③ 《列宁选集》第2卷，第608页。

而且主张“改造、战胜和征服一切形式”、“掌握一切形式。”^①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结合实践的经验，对内容与形式这对范畴进行了深刻的阐述，对唯物辩证法范畴学说作出了贡献。

内容与形式是一对矛盾。在这对矛盾中，内容居于主导地位。内容决定形式，形式必须服从内容。有什么样的内容，就有什么样的形式。因此，毛泽东强调在观察和处理问题时，应当首先注意事物的内容，根据内容的需要来决定形式的取舍、改造和创新。在中国革命形式问题上，他根据中国革命的对象和内容，指出中国革命的敌人包括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敌人的力量异常强大，而且不给中国人民以和平活动的可能，中国人民没有任何政治上的自由权利。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革命的主要方法，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不能是和平的，而必须是武装的。”^②在评论文艺批评的标准时，他认为，作品的政治思想内容和艺术表现形式都很重要，但首要的、第一位的是应着眼其政治思想内容。他说：“任何阶级社会中任何阶级，总是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的。”^③他还尖锐地批评了那种不注意内容，只讲究形式的形式主义，强调在写文章、作报告、发表演说之前，必须深入实际作调查研究，使它们具有丰富的内容，反对“空话连篇，言之无物”、“甲乙丙丁，开中药铺”的形式主义。他说，这种形式主义是“最低级、最幼稚、最庸俗的方法。”^④“拿了律己，则害了自己；拿了教人，则害了别人；拿了指导革命，则害了革命。”^⑤

在内容决定形式，形式必须服从内容问题上，毛泽东还强调指出，随着事物内容的变化和发展，要自觉地改变旧形式，并

① 《列宁选集》第4卷，第256～257页。

② 《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第325页。

③④⑤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547、515、476页。

找到适合客观内容变化和新形式，决不能固守一种形式不变。他说：“马克思主义的原则，革命的组织形式应该服从于革命斗争的需要。如果组织形式已经与斗争的需要不相适合时，则应取消这个组织形式。”^①在这方面，毛泽东表现出了极大的创造性。他在指挥战争过程中，总是根据不同时期、不同阶段敌我力量对比的变化来确定战争形式的主次地位与变化。在《论持久战》一文中，他指出，随着中日双方力量对比的变化，战争的主要形式也要发生变化。第一阶段，运动战是主要的战争形式，游击战和阵地战起辅助作用；第二阶段，游击战成了主要的作战形式，运动战和阵地战则起辅助作用；第三阶段，运动战又上升为主要的形式，而辅之以阵地战和游击战。

内容决定形式，形式必须服从内容，并不等于说一种内容只能有一种形式，同一内容只能有相同的形式。毛泽东认为，同一内容可以表现为多种多样的形式，多种形式的相互作用，形成一股合力，能够更好地促进内容的发展。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一文中，他总结了我党的武装斗争历史，指出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我们党已经学会了独立的战争艺术，能够“把武装斗争同工人的斗争，同农民的斗争（这是主要的），同青年的、妇女的、一切人民的斗争，同政权的斗争，同经济战线上的斗争，锄奸战线上的斗争，思想战线上的斗争，等等斗争形式，在全国范围内或者直接地或者间接地配合起来。”^②没有这多种斗争形式的结合，中国革命就难以取得胜利。在谈到艺术和科学的发展时，他指出艺术上应有不同的形式和风格，科学上应有不同的学派，这是符合客观规律的现象。因此，不能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否则，会有害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因此，他强调，为促进科学的进步，为促进我国

① 《毛泽东同志国际问题言论选录》，世界知识出版社1956年版，第143页。

② 《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第313页。

的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必须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毛泽东不仅重视内容对形式的决定作用，同时也很注意形式对内容的反作用，注重选择适合内容的形式以促进内容的发展。在论述文艺作品的评价标准时，他指出不仅要有革命的政治内容，而且要有完美的艺术形式。我们的要求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缺乏艺术性的作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① 在如何运用马列主义指导我国的革命和建设问题上，毛泽东始终坚持马列主义的内容必须与我国的特点相结合，找到一种恰当的形式宣传、运用和推进马列主义。他反复阐明这样一个道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只有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取得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毛泽东把毕生的精力用以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结合，为创立具有中国特色和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做出了无与伦比的贡献。

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是极为复杂的。因此，对一切旧的形式不能随意地否定，应当进行具体分析。毛泽东指出，新内容与旧形式、旧内容与新形式的相互结合是常有的事。在讲到作战形式时，他指出，一般说来防御战是一种被动的作战形式，进攻战是一种主动的作战形式。但实行有计划战略退却，就可以“在被动的形式中具有主动的内容。”^② 因为积极的战略防御，可以保存实力，待机破敌，诱敌深入，准备反攻。相反，如果该退却的时候却硬要去仓卒应战，形式上似乎主动，实际上则是被动的。在谈到文艺问题时，他说：“对于过去时代的文艺形式，我们也并不拒绝利用，但这些形式到我们手里，给了改造，加进了新内容，也就变成革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547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07页。

命的为人民服务的東西了。”^① 这就是说，旧的艺术形式经过改造，可以表现新的内容。

四、可能与现实

任何事物都包含着肯定和否定两个因素。其中否定因素代表着这一事物由发展为他事物的方向，但在这一事物开始时，否定因素处于次要的地位，是一种潜在的力量，只是一种可能。由于肯定和否定两种因素经过斗争，当否定因素克服肯定因素的时候，这一事物就转化为他事物，可能性就变为现实性。可能性和现实性这对范畴，就是新事物由潜在状态向现实状态转化的过程在思维中的反映。列宁十分重视可能与现实的区别，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政策是以现实的东西，而不是以可能的东西为依据的。”^②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出色地运用和进一步地论述了这对范畴。

第一，毛泽东十分注意区分可能性与现实性、虚假的可能性与现实的可能性的界限。他指出：可能性同现实性是两件东西，是统一性的两个对立面。虚假的可能性同现实的可能性又是两件东西，又是统一性的两个对立面。所谓可能性，是指包含在现存事物中转化为他事物的发展变化的种种趋势，是潜在着的尚未实现的东西。所谓现实性，就是已经实现了的可能，是指当前存在着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事物。可能性可以转化为现实性，但可能性本身并不直接就是现实性，不能抹煞二者的差别。毛泽东反复指出，无产阶级政党在分析形势，制定方针、政策时决不能把可能性作为出发点，而必须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他说：“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一切共产党员所必须牢牢记住的最基本的工作方法。我们所犯的错误，研究其发生的原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532页。

② 《列宁全集》第35卷，第256页。

因，都是由于我们离开了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主观地决定自己的工作方针。这一点，应当引为全体同志的教训。”^①抗日战争结束后，共产党和国民党通过谈判签订了避免内战、和平建国的《双十协定》。这时，有人对蒋介石放松了警惕，认为和平已经实现，从此，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要由武装斗争转变到非武装的、议会的斗争了。毛泽东及时地告诫全党说：“已经达成的协议，还只是纸上的东西。纸上的东西并不等于现实的东西。事实证明，要把它变成现实的东西，还要经过很大的努力。”^②这就是说，纸上的东西，只是可能性，而不是现实性。

什么是虚假的可能性？毛泽东没有进一步明确地论述，但从他的整个著作中可以看出，所谓虚假的可能性，是以有无客观根据或客观根据是否充分为依据的。大致包括两种情况：一是没有任何客观根据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实际上是一种不可能性，无论如何是无法实现的东西。二是有一定的客观根据，但又不充分，在目前现实的条件下还不能转化为现实的可能性。只有到了将来具备了条件，才有可能变成现实。毛泽东在批判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时阐述了虚假可能性的这两种情况，说：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就在于“他们的思想超过客观过程的一定发展阶段，有些把幻想看作真理，有些则把仅在将来有现实可能性的理想，勉强地放在现时来做，离开了当前大多数人的实践，离开了当前的现实性。”^③

第二，毛泽东非常重视区分好的可能性与坏的可能性、顺利的可能性与困难的可能性的界限。他指出：“要想到事情的几种可能性，估计情况的几个方面，好的和坏的，顺利的和困难的，可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03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054页。

③ 《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第134页。

能办到的和不可能办到的。尽可能地慎重一些，周到一些。”^①又说：“事情的发展，无非是好坏两种可能。无论对国际问题，对国内问题，都要估计到两种可能。”^②由于事物内部矛盾的复杂性和不平衡性，事物发展过程中总是存在着多种的可能性，归根到底是好的或顺利的可能性与坏的或困难的可能性两种。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总是充分估计到这两种可能性。在抗日战争初期，当党内外一些人为日寇的气势汹汹所吓倒，对中国的前途失去信心，主观地片面地只承认亡国一种可能性时，毛泽东则指出亡国的可能性和解放的可能性都存在。他说：“我们和亡国论者不同，我们客观地而且全面地承认亡国和解放两个可能同时存在，着重指出解放的可能占优势及达到解放的条件，并为争取这些条件而努力。”^③在抗战胜利前夕，他再一次告诫全党，中国人民面前仍然存在着两种可能、两种命运。一个是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一个是仍然停留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分裂的、贫弱的旧中国。在全国解放后，他根据波浪式前进运动的辩证法，仍然反复说明这样一个道理。

毛泽东强调充分估计到事物发展存在两种可能性的目的在于，要人们去努力争取好的可能，防止坏的可能的发生。只有这样，才能对付突然事变，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他说：“向着最坏的一种可能性作准备是完全必要的，但这不是抛弃好的可能性，而正是为着争取好的可能性并使之变为现实性的一个条件。”^④从最坏处着想，向最好处努力，两者是辩证的统一。在实际工作中，只有对最坏的可能性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才能处于主动的地位，自觉地防止坏的可能性转化为现实的可能性；即使在坏的

①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9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52页。

③ 《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第208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42页。

可能性变为现实时，也不至于束手无策，乱了阵脚，而是能面对现实，找出原因，促使事物再向好的方面转化，使坏事变为好事。

第三，毛泽东强调了主观能动性在可能性转变为现实性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可能与现实是矛盾的两个方面，可能性要变为现实，需要一定的条件。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就是可能性转变为现实的重要条件，甚至是决定性的条件。因为由可能性转变为现实性，需要一定的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而客观条件的运用或创造，也离不开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一文中，以战争为例说明了这个问题。战争的胜负，固然取决于双方的军事、政治、经济、地理、战争性质、国际援助诸条件，然而，仅有这些还只是有了胜负的可能性，它本身并没有分胜负，要分胜负，还须加上主观的努力，这就是战争中的自觉的能动性。他说：“客观因素具备着这种变化的可能性，但实现这种可能性，就需要正确的方针和主观的努力。这时候，主观作用是决定性的了。”^①抗日战争胜利前夕，面对着两个中国之命运，毛泽东号召全党放手发动群众，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为着打败日本侵略者，建立一个光明的新中国而奋斗，也是充分肯定了主观能动性具有促使事物朝着好的方向转化的重要作用。当然，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决不是任意妄为，毫无根据地胡思乱想，而是要求正确地认识客观事物存在的规律和条件，并在这个基础上，合理地运用有利的条件，促使不利的条件向有利的条件方面转化，把可能性转变为现实。

五、必然与自由

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正确发扬自觉的能动性，实现主观和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第239页。

客观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不断地取得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胜利的过程，就表现为必然向自由转化、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跃的过程。必然与自由的关系，也是唯物辩证法的一对基本范畴，它揭示了人的实践、认识和客观规律性的辩证关系。人们通过实践去掌握客观规律、认识客观世界，再通过实践去利用客观规律、改造客观世界，不断地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过渡。

这对范畴，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范畴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任何一种社会形态代替另一种社会形态，都是社会形态本身内部矛盾发展的必然，而历史的必然性不过是人本身的实践活动和认识活动的统一罢了。列宁则深刻地阐述了认识客观世界和认识它的必然性是一致的。他指出：“尚未被认识的‘自在之物’在转化为已被认识的‘为我之物’，盲目的、尚未被认识的必然性、‘自在的必然性’在转化为已被认识的‘为我的必然性’。从认识论上说，这两种转化完全没有什么差别，因为它们的基本观点是一个，都是唯物主义观点……。”^①毛泽东在总结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科学地吸取以往思想家的优秀成果，对必然与自由这对范畴做了精辟的论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必然与自由的学说。

第一，毛泽东论述了必然与自由的辩证关系。关于必然与自由的辩证关系问题，恩格斯曾经指出：“自由是在于根据对自然界的必然性的认识来支配我们自己和外部自然界。”^②毛泽东深刻发挥了恩格斯的思想，进一步阐述了必然与自由的辩证关系。他说：“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只有在认识必然的基础上，人们才有自由的活动。这是自由和必然的辩证规律。所谓必然，就是客观存在的规律性，在没有认识它以前，我们的

① 《列宁选集》第2卷，第19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54页。

行动总是不自觉的，带着盲目性的。”^①这里，毛泽东既说明了什么是必然与自由，又阐述了它们的辩证关系。

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不认识必然，就不会有自由。他以“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指导为例，指出，“左”倾机会主义者不懂得必然和自由的这种辩证关系，所以，他们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不从中国的国情出发，不研究中国革命的具体规律，因而不可能取得指导中国革命的自由。他还把战争比作游泳，而把作为战争指导规律的战略战术比作游泳术。指出，一个聪明的指挥员，要能够在战争大海中畅游，不使自己沉没，而且使自己坚定地有步骤地到达彼岸，就必须正确地认识战争的指导规律。

认识必然是自由的前提或基础。但是，如果只是停留在对必然的认识上，那还不是真正的自由。认识必然只是取得自由的第一步，虽然是不可缺少的重要一步，但它还只是在思想认识的范围，还不是实际上的自由；而且，这种认识上的自由是真是假也还没有确定。只有当它超出思想认识的范围，在实践中得到验证之后，才能确定。可见，自由除了对必然的正确认识以外，还应当包括根据对必然的认识进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也就是说，自由不仅包括认识的自由，还包括实践的自由，而要获得这两种自由就不能离开对客观必然性（即规律性）的认识和运用。

第二，毛泽东论证了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跃的条件。所谓必然王国，就是指人们还不了解客观必然性，不能发挥自己的自觉能动性而受客观必然性的支配，处于被动的、不自觉的、盲目的境地。所谓自由王国，则是指人们正确地认识了客观必然性，并能够按照这种客观必然性的要求去改造客观世界，达到了自觉能动性和客观必然性的统一，因而能够在客观必然性面前处于自觉的、主动的境地。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33页。

毛泽东认为，自由不是神或什么别的东西恩赐的，而是争取得来的。就战争中的主动权或自由权而言，主动地位不是空想的，而是具体的。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需要一定的条件。需要什么条件呢？集中一点，就是要正确发挥自觉的能动性。自由和自觉的能动性既有明显的区别，又有紧密的联系。自由不等同于自觉的能动性，但它体现于正确发挥自觉的能动性的过程中，并且是人们自觉的能动性正确发挥程度的标志和结果。因此，人们要想在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中获得自由，实现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就必须通过正确发挥自觉能动性去争取。这是因为：一方面必然作为客观存在的规律性，具有普遍性、重复性和可知性，它固然能够为人们的自由提供客观基础，但是，它本身并不能直接给人们以自由。人们要把这种可能的自由变为现实的自由，还必须依靠正确发挥自觉的能动性。另一方面，必然作为人们自由的客观基础，它所提供的自由的可能性，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一视同仁的。但是，在它面前，人们实际获得自由程度的高低或大小，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还取决于人们的主观努力，特别是取决于人们正确的自觉能动性的作用的大小。事实证明，正确的自觉能动性作用越大，自由的程度就越高。具体来说，要实现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最主要的需要两个条件：

一是必须坚持反复的实践活动。毛泽东在总结我们党对中国革命和建设规律的认识经验时，曾经指出，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是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实现这个飞跃是一个反复的实践过程。他说：“先是不认识或者不完全认识，经过反复的实践，在实践里面得到成绩，有了胜利，又翻过斤斗，碰了钉子，有了成功和失败的比较，然后才有可能逐步地发展成为完全的认识或者比较完全的认识。到那个时候，我们就比较主动了，比

较自由了。”^① 我们对于民主革命的认识就是经历了胜利、失败、再胜利、再失败的两次比较，才真正认识了民主革命的规律。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我们曾经有很大的盲目性，要使这种盲目性变为自觉性，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过渡，我们一定要下一番苦功，切实地做好调查研究，努力学习，积累经验，在实践中逐步地加深对它的认识，弄清它的规律。

二是必须努力学习科学。在人们争取自由的过程中，科学起着重要的作用。毛泽东指出，科学是人们争取自由的一种武器。“人们为着要在社会上得到自由，就要用社会科学来了解社会，改造社会进行社会革命。人们为着要在自然界里得到自由，就要用自然科学来了解自然，克服自然和改造自然，从自然界里得到自由。”^② 从必然到自由是人们用自己的智慧和力量推动发展的。只有我们努力学习科学，根据对客观世界的科学认识去实践，才能达到目的。

第三，毛泽东强调了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是一个无限发展的过程。人们在实践中，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认识了必然，争得了自由，达到了自己的目的，这既是必然转化为自由的过程，也是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跃的过程。人们为争取自由的实践活动永远不会停息，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也是不会停止的无限发展的过程，这是毛泽东关于必然与自由问题的又一个重要思想。毛泽东指出：“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这个历史永远不会完结。在有阶级存在的社会内，阶级斗争不会完结。在无阶级存在的社会内，新与旧、正确与错误之间的斗争永远不会完结。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范围内，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③ 由于客观事物的发展

①③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33、845页。

② 《新中华报》，1940年3月15日。

变化是无限的，人类的认识和实践是没有止境的，因此，自由作为历史发展的产物，也总是相对的。人类不可能穷尽对必然的认识，也不可能达到掌握事物全部必然的所谓绝对自由的境界。无论何时何地，总存在着必然和自由的矛盾。所以，在人类面前永远会有必然王国，永远会有争取自由的斗争。人类历史不完结，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就永远不会完结，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是一个无限发展的过程。“因此，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论点，都是错误的。其所以是错误，因为这些论点，不符合大约一百万年以来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事实，也不符合迄今为止我们所知道的自然界（例如天体史，地球史，生物史，其他各种自然科学史所反映的自然界）的历史事实。”^①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45页。

第七章

唯物辩证的自然观

自然观是人们关于自然界的总看法和根本观点，同时又是人们认识和改造自然的方法论。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既是唯物的又是辩证的，它是对自然界本来面目的理解，不附加任何外来成分。毛泽东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自然观的基本观点，吸收了中国古代自然观的合理因素，概括了自然科学发展的最新成果，丰富了唯物辩证的自然观。

第一节 自然界的辩证发展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物质世界是客观实在的，又是具有内在矛盾和无限可分的，它坚决驳斥那种所谓有“最终的”物质实体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观点。

一、自然界一切都在运动变化发展中

马克思、恩格斯总结了自然科学的巨大成果，写下了许多论述自然辩证法的光辉著作。马克思的《数学手稿》，恩格斯的《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等著作，从多方面揭示了自然界的各种矛盾及其辩证发展规律。恩格斯指出：“没有运动的物质和没有物质的运动是同样不可想象的。因此，运动和物质本身一样，是既不能创造也不能消灭的。”^①又说：自然界、人类历史“是一幅由种种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99页。

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其中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动的和不变的，而是一切都在运动、变化、产生和消失。”^①列宁进一步指出：唯物辩证法是“最完整深刻而无片面性弊病的关于发展的学说，这种学说认为反映永恒发展的物质的物质的人类认识是相对的。”^②

毛泽东继承了恩格斯、列宁这个思想，指出：“除了运动的物质以外，世界上什么也没有”^③，而运动的物质是“在空间、时间中运动”^④。这就坚持和发展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然观。他认为，自然界是运动、变化 and 发展的。这种发展变化的根本原因，不在于事物的外部矛盾，而在于事物的内部矛盾。他在《矛盾论》一文中指出：“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主张从事物的内部、从一事物对他事物的关系去研究事物的发展，即把事物的发展看做是事物内部的必然的自己的运动，而每一事物的运动都和它的周围其他事物互相联系着和互相影响着。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任何事物内部都有这种矛盾性，因此引起了事物的运动和发展。”^⑤

毛泽东指出，自然界的发展变化是普遍的现象，从宏观物体到基本粒子都在不停地运动、变化和发展着。关于这个观点，毛泽东是一贯强调的。1964年8月，他在同科学家的谈话中，就从太阳到地球，从水的合成到细胞的产生，举了许多事例来说明自然界的运动、变化、发展的普遍现象。他说：一切个别的、特殊的东西都有它的产生、发展与死亡。每一个人都要死，因为他是产生出来的。人必有死，张三是人，张三必死。我们见不到两千年前的孔夫子，因为他一定要死。人类也是产生出来的，因此人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0页。

② 《列宁选集》第2卷，第442页。

③ 《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第147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14页。

⑤ 《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第139—140页。

类也会灭亡。地球是产生出来的，地球也会灭亡。不过我们说人类灭亡、地球灭亡，和基督教讲的世界末日不一样。我们说的人类灭亡、地球灭亡，是有比人类更进步的东西来代替人类，是事物发展到更高的阶段。^①

马克思主义哲学运动观认为，整个自然界是运动与静止的辩证统一。毛泽东坚持了这一观点，他在论证自然界绝对运动、变化、发展的同时，也谈到了相对静止的一面，他引用《庄子》的《天下篇》中的“飞鸟之景，未尝动也”的话：“世界上就是这样一个辩证法：又动又不动。净是不动没有，净是动也没有。动是绝对的，静是暂时的，有条件的。”^②

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认为，人们对自然界的认识是无穷无尽的。自然界本身是运动、变化、发展的，并且运动的形式是多种多样多层次的。毛泽东认为，人们对自然界的认识也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他说，我们对世界的认识是无穷无尽的。我们过去没有认识的东西，现在认识了。现在没有认识的东西，将来必定是可以认识的。他指出，世界上一切都在变。物理学也在变，牛顿力学也在变。世界上从原来没有牛顿力学到有牛顿力学，以后又从牛顿力学到相对论。这本身就是辩证法。如果我们的认识是有穷尽的，我们已经把一切都认识到了，还要我们这些人干什么？他还讲到，现在我们对许多事情都还认识不清，我们对太阳搞不十分清楚，从太阳到地球中间这一块地方现在也还搞不清楚，地球上的气候变化也不清楚，关于冰川问题还在争论，细胞产生之前究竟是什么？究竟怎样从非细胞变成细胞？许多事情认识不清楚，这就需要我们探索，去研究。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承认外部世界的客观存在，一切从实际出发，这是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前提。^③

①③ 参见周培源《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是科学的旗帜》，1978年9月10日《光明日报》。

②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13页。

毛泽东不仅提出了这些问题，而且非常关心这些问题的研究和解决。他曾多次邀请有关方面的科学家共同探讨天体起源、地球起源和生命起源这些方面的问题。为了研究地球原始状态的演化过程，毛泽东很重视化学元素演化史的研究。1964年8月，他在同科学家的谈话中讲到：《光明日报》上前两天有一篇文章，讲氢、氧化合成水要经过几百万年。北大傅鹰教授说几千万年。不知道《光明日报》那篇文章的作者同傅鹰讨论过没有？事后，有关同志问傅鹰教授，这个问题是在哪里讲的？傅鹰说是在讲义中提到的。可见毛泽东为了探寻自然界的发展变化的奥秘，连北京大学印发的讲义他都注意到了。

二、自然界的存在和发展是对立统一的

毛泽东用对立统一规律分析自然界，认为对立统一在自然界中也是个普遍的现象。他在《矛盾论》中就曾引用恩格斯和列宁的话，说明数学中的正数和负数，微分和积分；力学中的作用和反作用；物理学中的阳电和阴电；化学中的化合和分解等都是对立统一的矛盾关系。^①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又在分析具体科学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阐述了自然界对立统一矛盾的普遍性。他说：“化合物都是不同性质的东西的对立统一。”“比如水，是由氢和氧两种元素结合的。如果没有氧，光有氢，或者没有氢，光有氧，都不能够搞成水。”^②他还指出：“生物都有新陈代谢，有生长、繁殖和死亡。在生命活动的过程中，生与死也在不断地互相斗争、互相转化。”^③毛泽东不仅认为宏观世界和有生命的东西是对立统一的，而且看到了微观世界也是一个矛盾的世

① 参见《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第144—145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20页。

③ 同上书，第348页。

界。他说：“你看在原子里头，就充满矛盾的统一。有原子核和电子两个对立面的统一。原子核里头又有质子和中子的对立统一。质子又有质子、反质子，中子又有中子、反中子。总之，对立面的统一是无往不在的。”^① 科学发展的事实证实了毛泽东关于自然界矛盾普遍性的思想。我们周围的自然界，到处存在着对立统一的运动现象。例如机械运动中的“在”与“不在”、作用和反作用；物理运动中的吸引和排斥、电场和磁场、辐射与吸收；化学中的化合和分解；生命运动中的同化和异化、遗传和变异、兴奋和抑制等等。

毛泽东在看到自然界对立统一普遍性的同时，也注意到矛盾双方在自然界中的发展是不平衡的。他认为矛盾双方是有主有次的，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了事物的性质。他以原子为例指出：“一个原子分两部分，一部分叫原子核，一部分叫电子。原子核很小，可是很重。电子很轻，一个电子大约只有最轻的原子核的一千八百分之一。……原子核和电子的关系，也是对立统一，有主有次。”^② 原子核物理和化学科学证明，由于原子核是原子的质量中心，电子如星云绕核运行。原子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原子核决定的。

毛泽东在研究自然界矛盾问题的时候，还注意了矛盾斗争性在事物发展中的作用，他认为，自然界矛盾双方不断斗争，斗争的结果使矛盾双方在一定的条件下相互转化，从而使事物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矛盾的双方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也是个普遍现象。1957年1月27日，他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针对国际上反辩证法的思潮，以生和死相互转化为例，深刻阐述了自然界对立双方的相互转化的普遍性。他说：“生与

①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98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50—351页。

死不能转化，请问生物从何而来？地球上原来只有无生物，生物是后来才有的，是由无生物即死物转化而来的。生物都有新陈代谢，有生长、繁殖和死亡。在生命活动的过程中，生与死也在不断地相互斗争、互相转化。”^①

自然界的事物通过内部矛盾双方的斗争和对立面的转化不断变化发展，但发展的道路又不是直线的，而是曲折的发展、波浪式的前进。毛泽东说：“世界上的事物，因为都是矛盾着的，都是对立统一的，所以，它们的运动、发展，都是波浪式的。太阳的光射来叫光波，无线电台发出的叫电波，声音的传播叫声波。水有水波，热有热浪。”“这是事物矛盾运动的曲折性”。^②

三、自然界物质的无限性和无限可分性

关于自然界物质的无限性和物质无限可分的思想，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早就有所论及。恩格斯认为，时间的永恒性、空间的无限性是指：“没有一个方向是有终点的，不论是向前或向后，向上或向下，向左或向右。”^③他还指出：分子不过“是在分割的无穷系列中的一个‘关节点’”^④。在19世纪，还有些自然科学家错误地把原子当作“最终的”物质实体。恩格斯明确指出：“原子决不能被看作简单的东西或已知的最小的实物粒子。”^⑤从而驳斥了自然科学中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观点。此后不久，由于电子和放射现象的发现，完全证实了恩格斯的科学预见。

列宁总结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自然科学的新成果，批判了自然科学中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观点，捍卫了辩证唯物主义

①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48页。

② 同上书，第361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89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309页。

⑤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第247页，1971年版。

的物质观和物质无限可分性的思想。在 20 世纪初，由于电子的发现而引起自然科学物质结构概念的改变时，有些自然学科家便硬说电子是“最终的”物性实体，并认为已经穷尽了电子的一切特性，因而竟然宣称物质“消灭”了，物质概念“过时”了，唯物主义被驳倒了，等等。列宁指出：“新物理学陷入唯心主义，主要就是因为物理学家不懂得辩证法。”^①为此，他明确说：“电子和原子一样，也是不可穷尽的；自然界是无限的，而且它无限地存在着。”^②后来，现代物理学中有关质子、中子、介子、光子等基本粒子的相继发现，又完全证实了列宁的科学预见。

毛泽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概括总结了自然科学的最新成果，进一步丰富和深化了自然界无限性和物质无限可分的思想。他在同国外科学家交谈中，提出了宇宙存在着两方面的无限性的思想。他说：世界是无限的。世界在时间上，空间上都是无穷无尽的。在太阳系外有千千万万个恒星，它们组成银河系。银河系外又有千千万万个银河系。宇宙从大的方面看来是无限的。宇宙从小的方面看来也是无限的。^③

毛泽东不仅认为自然界是无限的，而且认为物质是无限可分的。他曾说，不但原子可分，原子核也可以分，电子也可以分，而且可以无限地分割下去。庄子讲“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这是对的。因此，我们对世界的认识也是无穷无尽的。^④毛泽东在同科学家的多次谈话中，反复强调和论证了物质无限可分的思想。例如，1955年1月，在专门研究我国原子能科学事业发展问题的会议上，当有的科学家谈到根据现有的科学研究，还只知道质子、中子是构成原子核的基本粒子时，毛泽东就

① 《列宁选集》第2卷，第267～268页。

② 《列宁选集》第2卷，第268页。

③④ 参见《毛泽东同志八十五周年诞辰纪念文选》（人民出版社），第232页。

说，我看不见得，质子、中子、电子还应该是可分的，一分为二，对立统一嘛！现在实验上虽然还没有证明，将来实验条件发展了，将会证明它是可分的。当时，这一看法引起了中外学者的惊异，许多人不相信。而事隔半年以后，美国科学家发现了“反质子”，一年以后又发现了“反中子”。事实完全证明了毛泽东的科学预见。^①又如，1963年毛泽东看到《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刊登的坂田昌一《关于基本粒子新观点的对话》的译文后，给予很大的重视。他在文章上划了许多圈圈、道道。1964年8月毛泽东在接见坂田时，对坂田的文章给了很高的评价，并说，坂田关于基本粒子不是不可分的思想，是站在辩证唯物主义立场上，就坂田昌一的文章提出的基本粒子可分的观点，毛泽东还单独召见我国有关科学家进行了长达三小时的座谈。1973年7月毛泽东在接见美籍中国物理学家杨振宁时，他问杨振宁：现在光量子能不能分？杨振宁说：这个问题现在还没有解决。毛泽东说到：物质是无限可分的。如果物质分到一定阶段，变成不可分了，一万年以后，科学家干什么呢？可见，毛泽东一直主张物质无限可分的思想来指导科学研究的。

我们说物质是无限可分的，但并不是机械的分割，而是指在不同层次不同条件下，根据不同的内容，采取不同的形式。毛泽东说：“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统一体总要分解为不同的部分，只是在不同的具体条件下，内容不同，形式不同罢了。”^②我们以分子作为宏观和微观的上下限交汇界限，向微观，有原子、原子核、基本粒子……等层次；向宏观，有物体、地球、太阳、太阳系、银河系……等层次，两极都是无限的。但在不同层次上分的方式、内容都是不一样的。

毛泽东关于物质内部矛盾性和无限可分性的思想，具有极为

① 参见《毛泽东同志八十五周年诞辰纪念文选》（人民出版社），第230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16页。

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在理论上，它坚持了唯物辩证法，把对立统一、一分为二的学说贯彻到底，破除了现代物理学研究中的形而上学唯心论思想。我国国际知名的物理学家钱学森曾说：“毛主席对物质无限可分性的问题，从唯物辩证法的高度，作了非常精辟的论述。毛主席预见了二十年后高能物理学的发展。”在实践上，它给粒子物理学的科学实验提供了哲学方法论。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我国物理学家60年代中期，提出了关于物质结构的“层子模型”理论，受到世界各国物理学家的高度重视。西方物理学家则提出了关于基本粒子结构的“夸克”学说。“夸克”大致相当于“层子”。从那时以来，这方面研究工作取得长足的进展。到目前为止，世界上各国科学家已经陆续发现数百种基本粒子，证实了毛泽东关于物质无限可分思想的正确性。虽然基本粒子的具体结构还有待科学家通过实验去发现和证实，但基本粒子仍然有结构的思想已被物理学界所接受。这样就沉重打击了把基本粒子看成是构成物质的“始原”，不能再分割了的形而上学观点，捍卫了唯物辩证的自然观，同时又推动了原子核物理学的发展。1977年，在美国夏威夷举行的第七届粒子物理专题国际会议上，美国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格拉肖建议，将现在称为“层子”或“夸克”的这一物质层次的组成部分，命名为“毛粒子”，以纪念毛泽东一贯认为物质有更深层次、物质无限可分的思想。1979年，美籍华人丁肇中教授领导的高能物理实验小组发现了“胶子”的踪迹，这表明层子也是有结构的，可能存在着更深的层次。

第二节 自然科学的辩证发展

哲学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学说，同其他各门具体科学一起，共同组成人类知识的体系。毛泽东指出：“什么是知识？自从有阶

级的社会存在以来，世界上的知识只有两门，一门叫做生产斗争知识，一门叫做阶级斗争知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就是这两门知识的结晶，哲学则是关于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①这说明了哲学与其他具体科学的关系，是一般与特殊的关系，两者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既不能相互割裂、也不能相互代替。

一、自然科学同生产实践的关系

毛泽东运用唯物辩证法的观点，分析了自然科学同生产实践的辩证关系。

首先，论证了生产实践对自然科学的决定作用。毛泽东指出：自然科学是生产斗争知识的结晶。恩格斯在分析自然科学的历史时曾指出：“科学的发生和发展一开始就是由生产决定的。”^②所以，在自然科学同生产实践的相互关系中，首先是自然科学依赖于生产实践。

生产实践决定自然科学的产生和发展。实践是一切知识的来源。人对自然规律的知识，来源于人类改造自然的生产实践。地球上开始有人类生活、有人类生产活动的时候，就有自然科学的萌芽。所以毛泽东在批评“中国历来没有自然科学”的错误观点时，指出：“这是不对的，中国自有人类生活以来都要吃饭，要吃饭就要进行生产，就有自然科学的萌芽，后来逐渐发达。”^③当生产实践发展到一定的阶段，生产经验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在这个基础上便产生了自然科学知识。同时，生产实践为自然科学发展提供了物质手段、资金和其他的必要条件。毛泽东着重指出：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73—77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23页。

③ 《新中华报》1940年3月15日。

“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东西。人们的认识，主要地依赖于物质的生产活动，逐渐地了解自然的现象、自然的性质、自然的规律性、人和自然的关系。”^①

从古代的自然科学来看，都是以直接的生产实践的经验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古代的农牧业生产活动需要观察天象、了解气候的变化，确定季节和历法，这就产生了古代的天文学。古代的数学是从丈量土地面积，衡量器物容积，计算牲畜头数，以及进行贸易实践的需要而产生的。古代力学则是由于建筑工程和手工业发展及航海实践的需要而形成和发展的。

从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来看，它也是在生产实践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15世纪以来的欧洲，工业生产有了巨大的发展，产生了很多力学上的（纺织、钟表制造、磨坊）、化学上的（染色、冶金、酿酒）以及物理学上的（眼镜）新事实，这些新事实提供了大量可供观察的材料。近代力学、化学、物理学是在研究生产的发展不断扩大的材料的基础上迅速发展起来的。所以恩格斯说：“如果说，在中世纪的黑夜之后，科学以意想不到的力量一下子重新兴起、并且以神奇的速度发展起来，那末，我们要再次把这个奇迹归功于生产。”^②

从现代的自然科学发展来看，同样不能离开现代化大生产的发展。现代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已使生产实践伸展到了地球内部、海洋深处、宇宙高空，为自然科学的研究工作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新资料，同时生产实践也向自然科学提出了大量新的问题。比如生产的发展迫切需要新的材料、新的工艺、新的能源、新的方法等等。生产向自然科学提供的这些新资料和新要求，说明它仍然是自然科学发展的动力，它促使大量新型科学部门的产生，促使自然科学向高、精、尖的方向发展。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第120—12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23页。

其次，阐述了自然科学对生产实践的巨大推动作用。毛泽东在论证自然科学依赖于生产实践的同时，又指出了自然科学对生产实践的巨大推动作用。他说：“自然科学是人类争取自由的一种武装。”“人们为着要在自然界里得到自由，就要用自然科学来了解自然，克服自然和改造自然，从自然里得到自由。”^①毛泽东对自然科学作用的这些精辟见解是同马克思讲的科学变成了“生产过程的因素”，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②的观点是一致的。

我们说科学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变成了人类在自然界里争取自由的武装，就是指科学渗透到生产力的诸要素中去，使生产力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不断提高到新的水平，从而推动社会生产实践的发展和提高。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通过技术发明的途径，把自然科学物化在劳动资料之中，创造出新的工具，使科学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马克思说：生产工具是“在机器上实现了的科学”^③。历史上生产工具的重大革新都是以自然科学理论的重大突破为先导的。正是由于科学在生产过程中的广泛运用，才发明了蒸气机、内燃机、发电机、电子计算机等先进的生产工具，使自然力大规模地投入生产过程，构成了巨大的社会生产力。

第二，通过学习和教育的途径，使自然科学知识转化为劳动者的智力因素，从而变成直接的生产力。劳动者是生产力中起主导作用的因素。劳动者的劳动力是体力和智力的总和。随着科学的进步和生产的发展，社会劳动不断增加其智力的成分，而减少了强度。劳动者掌握科学知识的多少，直接决定了他劳动能力的高低。具备科学知识较多的劳动

① 《新中华报》1940年3月15日

② 参见马克思《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190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分册，第421页。

者，就能够更好地使用生产工具进行生产，从而在生产中获得较大的自由。所以，劳动者一旦用自然科学知识武装起来，智力就会大大提高，改造自然的力量就会增强，科学也就转化为直接的生产力。

第三，通过采用新的科学技术，开发和利用新的自然资源，创造出新材料，使劳动范围扩大了，从而提高了社会生产力。自然科学的发展，不仅不断揭示出自然物质日益增多的可供利用的性质，使可能的劳动对象转化成现实的劳动对象，而且还创造出自然界未曾有过的新物质品种，形成人工的劳动对象。例如随着海洋科学的发展，海洋得到了充分的利用和开发，海洋变成了人类解决未来能源、材料、食物的巨大源泉；再如，随着有机化学的发展，人们制造出塑料、人造纤维等大量人工劳动对象。这样，就扩大了劳动对象的范围，使人类能够更充分更有效地利用自然资源，推动生产实践的发展，科学也就转化为直接的生产力。

正因为科学技术对生产实践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所以毛泽东非常重视自然科学的发展和运用，他说：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须打好。过去我们打的是上层建筑的仗，是建立人民政府、人民军队。建立这些上层建筑干什么呢？就是要搞生产。搞上层建筑搞生产关系的目的是为了了解放生产力。现在生产关系是改变了，就要提高生产力。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①

二、自然科学同阶级斗争的关系

如前所述，自然科学是在人类改造自然的实践活动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从根本上说，社会生产和在生产基础上分化出来的

^① 参见龚育之等著：《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111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年版。

科学实验决定着自然科学的发展。但是，自然科学又存在于社会环境之中，它是由社会的人去利用和研究的。因此，在阶级社会里，自然科学又必然受到阶级斗争和社会制度的影响和制约。关于自然科学同阶级斗争的关系，毛泽东指出：“自然科学分两个方面，就自然科学本身来说，是没有阶级性的，但是谁人去研究和利用自然科学，是有阶级性的。”^①

首先，自然科学本身没有阶级性。这是因为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是自然界，它反映的是自然界的规律，不反映人们的社会关系和阶级关系。自然规律在人类社会出现以前就存在着，与阶级利益和阶级关系没有直接联系。

坚持自然科学本身没有阶级性这一观点极其重要，它是关系到自然科学发展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问题。自然科学是生产斗争知识的结晶，是人类共同创造的财富，它是不分国家，民族、阶级的。任何人或任何阶级都有可能发现自然规律，掌握和应用自然科学。自然科学的一切成果可以为不同性质的国家所利用。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技术也可以被社会主义国家所利用。所以，我们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必须也应该吸收各个国家包括资本主义国家在内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为我所用。相反，给自然科学贴上“政治”、“阶级”的标签，必然导致拒绝历史遗产，排斥外国的先进科学技术，这是不利于自然科学发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

其次，对自然科学的研究和利用带有阶级性。虽然自然科学本身没有阶级性，但是自然科学要靠人去研究，谁去研究和利用自然科学，那是带有阶级性的。自然科学家，作为社会的人，在阶级社会里，总是属于一定的社会阶级的。所以，他们都是从一定的阶级立场和世界观出发，根据一定社会需要来研究自然科学

^①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44页。

的。这样，研究者的阶级意识和世界观就可能渗透到自然科学体系里面去。例如，牛顿的《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等书，确实渗入了某些资产阶级的意识和偏见。当然这不是本质的、主要的东西。因此，对自然科学的研究是受阶级立场制约的，是有阶级性的。至于对自然科学的应用阶级性就更明显了。毛泽东早在建国前夕就指出：“美国确实有科学，有技术，可惜抓在资本家手里，不抓在人民手里，其用处就是对内剥削和压迫，对外侵略和杀人。”^①同是原子能科学，帝国主义或是用它来剥削压迫本国人民，或是对外搞核扩张、核讹诈；而我国则用于社会主义建设，为民造福，对外反对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核扩张、核讹诈，保卫世界和平。关于这一点，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正直有识的自然科学家也是承认的。著名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就说过：“科学是一种强有力的工具。怎样用它，究竟是给人带来幸福还是带来灾难，全取决于人自己，而不取决于工具。刀子在人类生活中是有用的，但是也能用来杀人。”^②

再次，社会制度对自然科学的发展有较大的影响。自然科学作为一种社会历史现象，总是存在于一定的社会之中，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发展，因此，社会制度、阶级关系对自然科学的发展有较大的影响。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奴隶主和封建贵族过着腐朽的寄生生活。他们轻视劳动，忽视生产，鄙视科学，并且利用宗教，给科学研究设下重重禁区，严重阻碍了科学的发展。同封建地主阶级相比，资产阶级是比较重视科学的。为了推翻封建制度，建立资本主义政权，他们运用科学去发展生产和批判宗教神学。这就在客观上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创造了条件。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对近代自然科学的产生和发展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但是，资产阶级毕竟是剥削阶级，他们有时为了垄断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84页。

② 《爱因斯坦文集》第3卷，第56页。

价格谋求高额利润，而不愿意对庞大的工业设备实行更新，甚至花高价把科学专利发明买下来锁进保险柜里禁闭起来，显然这对科学的发展是不利的。针对这些情况，毛泽东指出：“自然科学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却阻碍了它的发展，所以要改进这种不合理的社会制度。”^①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人民成了国家的主人，科学技术才真正属于人民，为人民的利益服务。社会主义社会克服了以往一切剥削制度的弊端，从而为科学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条件和广阔的天地，使科学技术飞速向前发展。

三、自然科学同哲学的关系

自然科学同哲学有着内在的本质联系。恩格斯指出：“自然界是检验辩证法的试金石，而且我们必须说，现代自然科学为这种检验提供了极其丰富的、与日俱增的材料，并从而证明了，自然界的一切归根到底是辩证地而不是形而上学地发生的。”^②又说：“蔑视辩证法是不能不受惩罚的。无论对一切理论思维多么轻视，可是没有理论思维，就会连两件自然的事实也联系不起来，或者连二者之间所存在的联系都无法了解。”^③列宁也明确指出：“新物理学陷入唯心主义，主要就是因为物理学家不懂得辩证法。”^④还说：“自然科学方面的最新发现，如镭、电子、元素转化等，不管资产阶级哲学家们那些‘重新’回到陈旧腐烂的唯心主义去的学说怎样说，却灿烂地证实了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⑤他们都深刻地说明了哲学与自然科学内在的紧密联系。毛泽东则把哲学看作是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并阐明了哲学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极端重要性。

首先，哲学是关于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这就

① 《新中华报》，1940年3月15日。

②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2、482页。

④⑤ 《列宁选集》第2卷，第267、442页。

是说，自然科学是哲学的重要基础之一，是推动哲学发展的革命力量。哲学发展史表明，各个时代的各种哲学，不仅同社会政治生活有着紧密的联系，而且总是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反映着那个时代的自然科学发展水平。原始的朴素唯物主义和自发的辩证法思想，反映了古代的萌芽状态的自然科学水平；17、18世纪欧洲的机械唯物主义，反映了当时自然科学处于分门别类收集材料阶段的状况；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辩证唯物主义，是总结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经验的结果，同时也概括了19世纪自然科学发展的最新成果，如细胞学说、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以及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等。所以，恩格斯说：“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①至于唯心主义哲学，则是以“歪曲的方式”反映自然科学发展水平的。列宁曾经讲过：“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哲学没有任何的单独存在的权利，它的材料分布在实证科学的各种不同的部门中间。”^②这就说明，自然科学是哲学赖以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基础，离开了自然科学，哲学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是一样，必须时刻倾听自然科学实践的呼声，并要对自然科学已经出现的最新成果进行新的哲学概括和总结，以补充、丰富和发展自己，否则就有落后于时代的危险。

其次，自然科学的研究和发展离不开哲学思想的指导。近代科技史表明，任何自然科学重大成果的取得，实际上都是自觉地或不自觉地运用唯物论辩证法的结果。因此，毛泽东是十分强调搞自然科学的人学习辩证法的。他指出：“自然科学方面也有许多唯心论。”^③他还语重心长地说：“我劝同志们要学哲学。”“有了辩证唯物论的思想，就省得许多事，也少犯许多错误。”^④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4页。

② 《列宁全集》第1卷，第396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44页。

哲学对自然科学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科学工作者要受哲学观点的支配。自然科学研究是一种复杂的认识活动，它要进行观察、观测、考察和实验，它要分析事实，进行思考和逻辑推理，形成概念和理论，这就离不开理论思维，就很自然地与哲学发生紧密的联系。自然科学家自觉地接受哲学的指导，就能在科研过程中少走弯路，取得更大的成就。我国数学家杨乐、张广厚，用辩证法指导函数分布论的研究，在较短的时间内，首先求得“亏值”与“奇异方向”数之间关系的公式，取得了世界先进水平的可喜成果，就是一个有力证明。目前，我国是科学技术比较落后的国家，要尽快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必须用唯物辩证法指导科学研究，才能较快地取得科研成果。

再次，在哲学对自然科学指导作用问题上，要反对两种错误倾向。一种倾向是“取消论”；另一种倾向是“代替论”。早在1942年，毛泽东就指出：“马克思主义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文艺创作中的现实主义，正如它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物理科学中的原子论、电子论一样。”^②毛泽东的这一论述，既指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各门具体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具有普遍指导作用的一面，又指出了自然科学有其特殊的矛盾性，因而不能被哲学代替的一面。对于“取消论”，恩格斯也曾经进行过批判，他说：“不管自然科学家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他们还是得受哲学的支配。问题只在于：他们是愿意受某种坏的时髦哲学的支配，还是愿意受一种建立在通晓思维的历史和成就的基础上的理论思维的支配。”“那些侮辱哲学最厉害的恰好是最坏哲学的最坏、最庸俗的残余的奴隶。”^③至于“代替论”，是江青反革命集团大肆宣扬的。他们说什

①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45页。

②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552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33页。

么“自然科学的基础理论就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的基础”。江青反革命集团鼓吹哲学“代替论”，其目的就是取消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的研究，干扰、破坏我国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

四、我国自然科学发展的方针和道路

在自然科学发展过程中，由于自然界存在着矛盾，人的认识过程更是充满着矛盾，所以，各种观点、理论、学派的创立以及它们之间的激烈争论是经常发生的。这是人类认识过程中的一类特殊矛盾。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正确解决这类矛盾，有利于推进科学事业的发展。毛泽东运用唯物辩证法的观点，总结了国际、国内科学发展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提出了我国发展科学事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这是解决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科学发展中内部矛盾的唯一正确方针。

从矛盾的复杂性看，由于自然界的物质运动中的矛盾是错综复杂的，并且矛盾的暴露有一个过程。人们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方面，采取不同的方法去揭示自然界的奥秘，产生彼此不同的、甚至相反的认识，这是符合认识的辩证法的，对此不能采取形而上学的“非此即彼”的态度。科学发展史上大量事实证明，许多长期互相矛盾的观点，常常是互相联系、互相补充、互相促进的，而不是彼此绝对排斥的。在物理学发展史上，对光的本质认识的微粒说和波动说就争论了几百年，最后波粒二象性理论的创立，才结束了双方的争论，真正科学地揭示了光现象的本质。历史证明，微粒说和波动说尽管是对立的，但二者都有正确的方面，又有不足的一面。同时，由于认识过程中的矛盾的复杂性，科学史上新的正确的东西，开始时常常是不完善的，因而容易受到许多人的非难、指责，甚至往往被看成是极端荒谬的。毛泽东总结了这些历史经验，指出：“为了判断正确的东西和错误的东西，常常需要

有考验的时间。历史上新的正确的东西，在开始的时候常常得不到多数人的承认，只能在斗争中曲折地发展。”^①因此，在自然科学中应该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使各个不同的理论学派都可以充分发表自己的观点，真理愈辩愈明。

从矛盾的性质看，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自然科学中各种观点、理论、学派之间的矛盾是认识上的是非问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范围，因此只能通过自由讨论的方法去解决，通过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该采取简单的粗暴的方法去解决。在这方面，国际国内都有过深刻的经验教训。50年代初，苏联在遗传学领域里米丘林学派与摩尔根学派的争论中，曾错误地把摩尔根学派宣布为“唯心主义的”、“资产阶级遗传学”，并采取行政手段加以粗暴的干涉，严重地窒息了学术空气，阻碍了科研的发展。当时，我国生物学界也盲目追随苏联，片面强调米丘林学说，压制和打击了摩尔根学派，一度挫伤了支持摩尔根学派观点的学者的积极性。为了繁荣和发展我国的科学文化，毛泽东及时总结了这些教训，并根据辩证法的观点深刻地指出：“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利用行政力量，强行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我们认为会有害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该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②他还主张，对于科学上的理论争论问题，“应当保持慎重的态度，提倡自由讨论，不要轻率地作结论。”^③应当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这是促进“科学进步的方针。”^④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84页。

②③④《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83—784页。

毛泽东不仅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而且指明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走自己的发展我国科学技术的道路。毛泽东说：“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①但是，独立自主不是闭关自守，自力更生不是盲目排外。科学技术是人类共同创造的财富。我们强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走我国自己发展科学技术的道路的同时，也主张学习外国的先进科学技术，作到“洋为中用”。毛泽东说：我们对“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②，“自然科学方面，我们比较落后，特别要努力向外国学习。但是也要有批判地学，不可盲目地学。”“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对外国的科学、技术和文化，不加分析地一概排斥，和前面所说的对外国东西不加分析地一概照搬，都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都对我们的事业不利。”^③毛泽东的这些思想指明了发展我国科学技术的正确道路。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49页。

②③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40、742页。

第八章

唯物辩证的工作方法论

马克思主义认为，重要的问题不在于用哲学去解释世界，而在于用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去能动地改造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历来十分重视唯物辩证法在方法论上的意义。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化为科学的方法论，提出了一整套完整的行之有效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不仅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宝库，而且形成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特色。

第一节 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体

任何哲学都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是科学的世界观，也是科学的方法论，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体。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正是二者一致的具体体现。

一、世界观和方法论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有什么样的方法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产阶级的科学世界观，也是无产阶级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法论。马克思指出：“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① 恩格斯认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5页。

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①他还把唯物辩证法称为“我们最好的劳动工具和最锐利的武器”^②。列宁则更明确地提出：“马克思的哲学是完备的哲学唯物主义，它把伟大的认识工具给了人类，特别是给了无产阶级。”^③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的这些论述，清楚地说明了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一致性。毛泽东继承并进一步发挥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观和方法论一致性的思想。他认为，世界本来是发展的物质世界，这是世界观；拿了这样的世界观转过来去看世界，去研究世界上的问题，去指导革命，去做工作，去从事生产，去指挥作战，去议论人家的长短，这就是方法论，此外并没有什么单独的方法论。他还说，所谓方法，无非就是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是互相结合的，思想方法不对头，工作方法也就不对头。工作方法的实质是思想方法的问题，是世界观的问题。正确的科学的工作方法，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毛泽东关于“哲学就是认识论”的重要论断和学习哲学“以研究思想方法论为主”的思想，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世界观与方法论一致性思想的集中体现。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全部内容都体现了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

二、提高领导艺术，讲究工作方法

毛泽东最善于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运用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工作，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并具体化为一整套唯物辩证的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同时，又最善于把实际工作中的方法问题提到世界观的高度来加以解决。他经常提出，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问题，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方法问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40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39页。

③ 《列宁选集》第2卷，第443页。

题，而且是一个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问题，是一个党性的问题，世界观问题。他强调说：“我党一切领导同志必须随时拿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领导方法去同主观主义的和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相对立，而以前者去克服后者”，“必须广泛地深入地提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领导方法”。^①

早在党的建立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作为中国最早最出色的马克思主义者之一，已经比较清楚地认识到掌握马克思主义工作方法对于中国革命的重要意义。他不但强调对于社会客观情况调查研究的重要性，而且亲自进行许多深入的社会调查，写出《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科学著作，出色地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方法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基本状况作了科学的分析，从而初步解决了中国革命的对象、动力、领导力量、性质和前途等问题，为党制定中国民主革命的总路线奠定了基础。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适应新形势和新任务的需要，开始对党在实践中所创造的工作方法和经验进行科学总结，写出了《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反对本本主义》、《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等具有重要方法论意义的著作，把工作方法问题提到党的重要议事日程上来，号召全党注意工作方法。指出，我们是革命战争的领导者、组织者，又是群众生活的领导者、组织者。因此，在这里，工作方法的问题，就严重地摆在我们的面前。他说：“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② 对于一切工作，“如果仅仅提出任务而不注意实行时候的工作方法，不反对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57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25页。

官僚主义的工作方法而采取实际的具体的工作方法，不抛弃命令主义的工作方法而采取耐心说服的工作方法，那末，什么任务也是不能实现的。”^①毛泽东的这些论述，生动、形象而又透彻地说明了工作方法的极端重要性，说明了共产党人应该采取的工作方法。这些论述表明毛泽东思想关于工作方法的理论已经基本形成。

抗日战争时期，为了彻底肃清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的领导方法，提倡和实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领导方法，毛泽东于1943年6月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的决定这个著名文件，这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化为唯物辩证的工作方法的典范。它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理，系统总结了党的领导工作的经验，阐述了包括一般和个别相结合、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统一领导与分工负责相结合等工作方法在内的科学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此后，毛泽东在解放战争时期又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健全党委制》、《常委会的工作方法》等文件，从而逐渐形成了一整套唯物辩证的科学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更加注重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的研究。他曾多次强调领导方法、工作方法对于执政党的重要性，指出，领导方法很重要。要不犯错误，就要注意领导方法，加强领导。在1958年初，他总结了新的实践经验，提出了《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目的是想在工作方法方面求得一个进步，以适应已经改变了的政治情况的需要。在1959年4月，党的八届七中全会上，他又讲了工作方法，指出，必须有好的工作方法。为此，他还写了《工作方法十六条》。1961年，党和毛泽东重提调查研究，号召要搞实事求是年，对工作方法问题又进行新的强调和进一步丰富。他说，不调查研究，不走群众路线，主观决定问题，工作就要失败。同时，结合新的形势任务又提出了许多重要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

毛泽东所倡导的唯物辩证法的领导方法、工作方法的内容十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26页。

分丰富，形成了包括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等最基本方法在内的一整套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这些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成为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完成革命和建设任务的重要保证，鉴于本书其他有关章节对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矛盾分析、调查研究等最基本的方法已有较多阐述，这里主要介绍由上述最基本方法派生出来的几种以“结合”为特征的重要方法。

第二节 分析和综合相结合的方法

人们在进行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分析形势，思考问题的时候，都要进行分析与综合。不过有的自觉，有的不自觉。自觉地运用分析与综合相结合的方法，是正确认识事物的一种科学方法。毛泽东曾以人们对延安的认识为例，生动地说明了在观察基础上的分析和综合相结合的方法。他还把这种方法称为“四面受敌法”，认为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研究中国社会的一种基本方法。

一、分析和综合必须是客观的、全面的

所谓分析，就是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把事物的整体分解为部分，把一个复杂的事物分解为几种简单的因素，对它们加以分别研究；所谓综合，就是按照客观事物的各个部分之间的有机联系，从总体上把握客观事物，把对象的各个方面、各种因素结合起来，对它们加以综合研究。由于客观事物都是矛盾的统一体，因此，分析，最基本的是对事物矛盾的分析；综合，最基本的是对事物矛盾的综合。分析矛盾，就是分析事物矛盾中各个方面的特点；综合矛盾，就是把事物矛盾的各个方面，按照它们的内在联系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对事物矛盾总体的认识。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主要地就是教导人们要善于去观察和分析各种事物的

矛盾的运动，并根据这种分析，指出解决矛盾的方法。”^①

人们要从总体上把握客观事物的本质，就必须首先对它的各个部分逐一地加以考察，这就要运用分析的方法。如果不把事物的整体进行分解。不了解各个部分的性质和状况，就不能清晰地认识事物的整体。列宁指出：“如果不把不间断的东西割断，不使活生生的东西简单化、粗糙化，不加以割碎，不使之僵化，那么我们就不能想象、表达、测量、描述运动。”^②毛泽东也指出：“为要暴露事物发展过程中的矛盾在其总体上、在其相互联结上的特殊性，就是说暴露事物发展过程的本质，就必须暴露过程中矛盾各方面的特殊性，否则暴露过程的本质成为不可能。”^③“只有从矛盾的各个方面着手研究，才有可能了解其总体。”^④这就告诉我们，认识客观事物离不开分析的方法。

但是，人们的认识不能停留在分析上，还必须进行综合。由于分析只着眼于事物的局部的研究，人们运用分析方法所获得的认识，还只是对于事物的某个片断、侧面和局部的认识，不是对于事物整体的认识。如果只有分析而没有综合，就容易把人们的认识局限在事物的某个部分、片断或侧面，人们对于一个事物的各个组成部分的了解就会变成孤立的、静止的、死板的东西，人们就不能形成关于这一事物的整体的认识。因此，为了认识事物的整体，就要把从分析中所得到的关于该事物各个方面的认识综合起来，就要运用综合的方法。只有把分析与综合恰当地结合起来，才能从研究中得出符合客观实际的正确结论。

毛泽东是出色运用分析与综合相结合方法的典范。运用分析与综合造成概念和理论系统，以达到真理性的认识，在毛泽东的许多著作中都有很好的体现。比如，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279页。

② 《列宁全集》第38卷，第285页。

③④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86页、287页。

策略》一文中，从问题的提出开始就运用了分析与综合的方法，通过对目前形势各个方面、各种因素的深刻分析，揭示了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这一当时形势的基本特点；然后又以这个基本特点的矛盾展开为前提，继续运用分析与综合的方法，进一步分析了在当时形势下中国社会各阶级的态度，分析了中国民族革命营垒的情形，也分析了反革命营垒的情形；最后综合上述这些分析得出了必须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结论。这个例子充分说明，科学的分析是科学综合的前提。毛泽东在注意正确分析问题时已经注意到运用正确的综合，从而使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

分析和综合相结合的方法，是实事求是这一根本方法的具体体现，是调查研究中必须运用的主要方法。我们要“从客观存在着的实际事物出发，从其中引出规律，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就要象马克思所说的详细地占有材料，加以科学的分析和综合的研究”^①。分析和综合相结合的方法，就是分析矛盾、综合矛盾的方法，它又是对立统一规律作为方法论的运用和体现。因此，运用这一方法，必须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坚持实事求是、矛盾分析的根本方法。这就是说，我们对事物矛盾的分析与综合，必须是客观的全面的。它包括：分析与综合所依据的材料必须是客观的，又是全面的；分析与综合必须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不带任何主观随意性；分析与综合不能片面抓住事物矛盾中的某一方面、某一联系，必须全面研究它的各个方面，各种联系。只有客观地全面地分析与综合，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二、分析与综合相结合的具体方法

毛泽东提出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透过现象看本质、分清主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57页。

流和支流、弹钢琴、胸中有数等工作方法，都体现了分析与综合相结合的道理，因而也都可以说是分析与综合的具体方法。

第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从具体事物矛盾的各个方面着手研究以了解其总体的方法。这里虽然侧重讲的是分析，但也包含着综合。掌握这一方法，就是既要分析事物矛盾的各方面的特殊性，又要将对矛盾各方面特殊性的认识综合起来，以把握事物矛盾的整体，把握矛盾各方面在总体上的相互联系的特殊性，制定适合不同事物矛盾特点的具体解决矛盾的方法。就是说，首先要有精细的正确的分析，然后才能作出正确的综合。

第二，透过现象看本质，是从对事物的现象的分析入手达到对事物本质的认识的方法。它要求我们，认识任何事物都要既深入分析该事物大量的现象材料，分析现象与本质的多方面的联系，又要将对现象和本质的分析综合起来，以达到把握事物本质和规律的目的。就是说，只有通过深入的分析与综合，才能透过现象认识事物的本质，透过现象看本质的过程，也是分析与综合相结合的过程。

第三，分清主流与支流，是从事物发展的主流与支流的分析与综合中抓住事物发展主流的方法。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主流与支流，人们认识任何事物都不但要了解支流的东西，更要了解主流的东西，了解主流与支流的关系。只有这样才能抓住事物发展的本质。要分清主流与支流，就要进行分析与综合。

第四，“弹钢琴”的方法，是围绕中心工作而同时开展其它方面工作，以求协调发展的方法。要弹好“钢琴”，首先必须对整个“琴键”及各个部分的不同地位和作用有一个全面的深入的认识，以便在分清主次的基础上，使各个手指协调动作，从而奏出好的音乐，取得预想的工作成绩，这仍然离不开分析与综合。

第五，“胸中有‘数’”，是说对情况和问题一定要注意到它们的数量方面，要有基本的数量的分析。任何质量都表现为一定的

数量，没有数量也就没有质量。强调要学会“胸中有‘数’”的方法，正是因为许多人往往不懂得注意事物的数量方面，不懂得注意基本的统计，主要的百分比，不懂得注意决定事物质量的数量界限，一切都是胸中无“数”，结果就不能不犯错误。这个方法正是基于对事物数量与质量两个方面的分析和综合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因此，也是分析与综合的具体方法。

总之，只有把分析与综合结合起来，对事物矛盾做出客观的、全面的分析与综合，才能正确运用矛盾分析方法，从而正确认识客观事物，保证工作的胜利。

第三节 一般和个别相结合的方法

一般和个别相结合的方法，是毛泽东把唯物辩证法关于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共性与个性辩证关系的基本原理运用于党的实际工作，而提出的一个科学工作方法。它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一党的群众路线基本方法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实现群众路线的重要步骤，是共产党人无论进行任何工作都必须采取的科学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

一、一般和个别相结合与党的群众路线

一般和个别辩证关系的原理在实际工作中的运用，就是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的工作方法。所谓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就是“从许多个别指导中形成一般意见（一般号召），又拿这一般意见到许多个别单位中去考验（不但自己这样做，而且告诉别人也这样做），然后集中新的经验（总结经验），做成新的指示去普遍地指导群众。”^①它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方法的组成部分，是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55页。

不论任何单位，不论进行任何工作，都应普遍采用的方法。

毛泽东指出：“任何工作任务，如果没有一般的普遍的号召，就不能动员广大群众行动起来。但如果只限于一般号召，而领导人员没有具体地直接地从若干组织将所号召的工作深入实施，突破一点，取得经验，然后利用这种经验去指导其他单位，就无法考验自己提出的一般号召是否正确，也无法充实一般号召的内容，就有使一般号召归于落空的危险。”^①这就是说，在实际工作中，根据上级的一般指示进行一般号召是必要的。否认一般号召的指导作用，满足于狭小范围和部门的个别工作，就会犯经验主义的错误，这样的领导者就将成为盲目的不完全的不清醒的领导者。但是，一般号召又必须与个别指导相结合。因为离开个别指导，不仅无法检验一般号召的是否正确，不能使一般号召得到丰富和发展，而且还会使本来是正确的号召失去具体的丰富的内容，变成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空洞的抽象的口号和公式，就会犯教条主义的错误，这样也就无法进行普遍的指导。一般的重要性只是在于它对同类事物具有普遍指导意义，它能指导我们对具体事物进行具体分析，而不能代替这种分析。我们在研究具体问题，仍然要从特殊（或个别）开始，而不能从一般开始。因此，我们党特别强调，不论做什么工作，在没有取得具体经验以前，都不要一下子全面铺开，而应该选择若干个个别单位先行试验，取得经验后再逐步推广，这样才能把工作做好。

在实际工作中采取从个别指导到一般号召，又从一般号召到个别指导的工作方法，是把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紧密结合起来的正确途径，体现了人们认识事物从个别到一般，又从一般到个别的辩证发展过程，体现了认识发展的辩证法。首先，所谓从许多个别指导中形成一般意见，作为一般号召，从认识的秩序来说，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52页。

就是由认识个别的和特殊的事物，逐步地认识一般的事物，把握许多事物的共同本质。这个一般号召的形成，同从个别到一般的认识过程是一致的。正如毛泽东指出：“任何领导人员，凡不从下级个别单位的个别人员、个别事件取得具体经验者，必不能向一切单位作普遍的指导。”^① 其次，发出一般号召之后，紧接着就要深入个别单位作具体指导，也就是要以已经认识的一般事物的共同本质为指导，继续认识尚未认识的其他具体事物。这个具体指导的形成，同从一般到个别的认识过程也是一致的。如果满足于一般号召，不作个别的具体的指导，就要犯官僚主义的错误。同时，一般与个别相结合的方法，又体现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公式。因为，无论从个别到一般，还是从一般到个别，都离不开领导和群众这两头，都要求领导人员深入群众，实现领导人员与广大群众的紧密结合。

二、一般与个别相结合的具体方法

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的方法具有丰富的内容和形式，已经成为广大干部经常运用的重要工作方法。

第一，“解剖麻雀”法，也就是做典型调查。从解剖一两只麻雀而认识所有麻雀的共同生理结构，通过深入调查了解几个城市、乡村而认识社会的一般状况，就是从个别中找出带有普遍性、规律性的东西，然后又以此指导全面，这正是把一般与个别相结合的方法。

第二，分类指导法。就是在区分相同与不同类事物矛盾的基础上，对同类事物的矛盾采取相同的方法去解决，对不同类事物的矛盾采取不同的方法去处理，这也是把一般与个别结合起来的重要工作方法。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53页。

第三，“抓两头，带中间”的方法。任何地区、部门、单位的工作，其发展总是不平衡的，总有先进、中间、落后三种情况。先进和落后总是少数的，中间状态总是多数的。抓先进的典型，可以带动中间和落后，推动全面工作；抓落后的典型，使落后变先进，也可以促进中间和先进。在实行个别指导时，强调抓好先进和后进两种典型，以带动大多数，这也正是一般与个别相结合。

毛泽东指出：“在任何一个地区内，不能同时有许多中心工作，在一定时间内只能有一个中心工作，辅以别的第二位、第三位的工作。”^①紧接着又说：“领导人员依照每一具体地区的历史条件和环境条件，统筹全局，正确地决定每一时期的工作重心和工作秩序，并把这种决定坚持下去，务必得到一定的结果，这是一种领导艺术。”^②这是运用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关系的原理，提出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体现了领导和群众、一般和个别相结合的原则。

此外，诸如“典型试验，逐步推广”、“蹲点跑面”、“一切经过实验”等，也都可以说是一般和个别相结合的工作方法。

第四节 民主和集中相结合的方法

民主集中制，即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根本组织原则，也是我们在进行调查研究、总结工作经验、贯彻群众路线过程中必须采取的一个重要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毛泽东阐述了民主集中制原则的方法论意义，明确提出了“先民主，后集中，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领导同群众相结合”的方法。

一、民主和集中及其关系

所谓民主，就是让大家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行使自己的民

^{①②}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571、572页。

主权利，所谓集中，就是集中大家的正确意见，在集中正确意见的基础上实行集中统一领导。

民主和集中是辩证统一的。民主是集中的前提和基础，没有广泛的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群众不敢讲话，大家不能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集中正确意见，实行集中领导，就无从谈起，集中也就失去了实际的内容；集中是民主的深化和保证，没有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形成的正确意见作指导，民主就不会有正确的方向，也不可能保证实现。离开民主的集中和离开集中的民主都是错误的。我们党和国家的民主集中制，就是在民主的基础上的集中与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的制度。它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是民主与集中的统一。这就是说，我们的集中制是建立在民主基础上，不是离开民主的，不是个人专制主义；我们的民主制，不是没有领导的民主，不是极端民主化和无政府状态。民主和集中相结合的制度，实际上就是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的制度，就是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的制度。它反映了领导与群众、上级与下级、个人与社会之间的正确关系，反映了党的群众路线。

二、民主和集中相结合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

民主集中制作为党和国家的根本组织原则，对于人们来说是不陌生的，但把它作为一个重要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却有许多人不是很清楚的。有些人把民主与集中对立起来，看成互不相容的东西，认为强调民主就会削弱集中，强调集中就会压制民主。因此，在实际工作中，就常常出现或者把“集中”变成“家长制”，搞“一言堂”，一个人说了算；或者把“民主”变成否认集中领导，搞无政府主义、分散主义和自由化。这些人不能正确认识和处理民主与集中的关系，因而也就不能了解和运用民主和集中相结合的工作方法，就必然会造成工作中的失误。毛泽东把民主集中制

原则与坚持实事求是、调查研究，以及贯彻群众路线联系起来，深刻阐述了它对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方法论意义。

毛泽东指出：“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正确地总结经验。没有民主，意见不是从群众中来，就不可能制定出好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这是因为，“我们的领导机关，就制定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这一方面说来，只是一个加工工厂。”“工厂没有原料就不可能进行加工。没有数量上充分的和质量上适当的原料，就不可能造出好的成品来。”^①而广大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则正是这种加工原料的唯一来源，所以，“如果没有民主，不了解下情，情况不明，不充分搜集各方面的意见，不使上下通气，只由上级领导机关凭着片面的或者不真实的材料决定问题，那就难免不是主观主义的，也就不可能达到统一认识，统一行动，不可能实现真正的集中。”^②因此，只有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充分发扬民主，通过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方法，通过系统的周密的调查研究的方法，对工作中的成功经验和失败经验，作历史的考察，才能找出客观事物所固有的而不是人们主观臆造的规律，才能制定出适宜的方针、政策、办法，从而成功地改造客观世界。在这里，毛泽东正是把民主和集中相结合作为一种重要的认识方法和工作方法加以提出与阐述的，并把它与坚持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群众路线紧密结合起来，作为实现党的正确领导的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这无疑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毛泽东所以把民主集中制看作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不可缺少的重要方法，是因为在我们党的实际工作中，进行调查研究，实行群众路线与坚持民主集中制具有某些一致性。这种一致性，不仅表现在它们有着共同的对象和目的，即都是要面向群众，到群众中去寻求真理和实现真理，以便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19页。

②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19—820页。

而且表现在它们有着大体一致的工作过程和认识过程。领导者发扬民主、从群众中集中正确意见的过程，就是向群众作调查研究的过程，也就是从个别到一般，或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过程；而领导者实行集中领导，把从群众中集中起来的正确意见拿到群众中坚持下去的过程，则是继续向群众作调查研究的过程，是把领导者的观点、思想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向群众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实践的过程，也就是实行调查和研究相结合、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过程。民主集中制与调查研究、群众路线的这种一致性，充分显示了民主集中制作为马克思主义领导方法、工作方法在认识论上的意义。采取民主和集中相结合的方法，是我们在实际工作中坚持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重要保证。离开民主讲集中与离开集中讲民主，都只能导致认识上和行动上的错误。只有充分发扬民主，同时实行正确的集中，把民主和集中紧密结合起来，才能真正坚持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

三、实现民主和集中相结合的方法

几十年来，我们党在实行民主和集中相结合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许多行之有效的具体方法，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在总结过去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又提出了一些新的方法，这些方法主要有：

第一，广开言路，充分听取群众的意见。就是要搞“群言堂”，让群众讲话，让大家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不搞“一言堂”，一个人说了算，“一锤子定音”。这是一个民主作风问题，也是一个工作方法问题。邓小平说：“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①只有广开言路，才能广泛听取到群众的意见，才能有正确的集中统一的领导，而要真正做到广开言路，

^① 《邓小平文选》第134页。

就必须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

第二，正确对待不同意见。古人说：“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就是说要全面看问题，正确对待不同意见。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工作方法。人民群众提出的意见，当然有对的，也有不对的，有的可能是真理，有的可能带有片面性，甚至错误。只有将各种不同意见充分发表出来，使认识中的矛盾得到充分暴露，然后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进行分析、比较，才能从中得出正确的结论。邓小平指出：“党的领导就是要善于集中人民群众的正确意见，对不正确的意见给以适当解释。”^①对于不同意见，多数人的要听，少数人的也要听，因为真理有时也可能在少数人一边。

第三，经常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民主和集中的矛盾，领导者同被领导者的矛盾，国家机关某些工作人员的官僚主义作风同群众的矛盾，这些矛盾，一般地说来，都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的基础上产生的，是人民内部的矛盾。对于这种矛盾，只能用讨论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一句话，只能用民主的方法，让群众讲话的方法来解决。邓小平说：“应该让群众有充分的权利和机会，表达他们对领导的负责的批评和积极的建议，但是‘大鸣大放’这些做法显然不适宜于达到这个目的。”^②开展经常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是发扬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的重要途径，也是实现民主和集中相结合的重要方法。

第四，实行集体领导与分工负责相结合。我们要发扬民主，但同时需要集中；我们强调集体领导，但同时必须把分工负责的制度建立起来。邓小平指出：“各级党委要真正实行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要明确哪些问题应当由集体讨论，哪些问题应当由个人负责。重大问题一定要由集体讨论和决定。决定时，要严格实行少数服从多数，一人一票，每个书记只有一票

① 《邓小平文选》第135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221页。

的权利，不能由第一书记说了算。”^①就是说，集体领导解决重大问题，某一件事、某一方面的工作归谁负责，必须由他承担责任，责任要专。这样，既可以避免个人说了算、权利过分集中的弊病，又有利于提高工作效率。

第五节 统一性和独立性相结合的方法

在各项工作中，要坚持独立自主原则，正确处理上下、左右之间的关系，必须正确认识 and 对待统一性与独立性的关系。毛泽东总结了我们党在这方面所积累的经验，把唯物辩证法关于统一性和独立性辩证统一的原理运用于党的各项实际工作，提出了统一性和独立性相结合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掌握这一科学工作方法，对于培养和锻炼各级领导干部独立思考、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有效地发挥他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正确处理全局与局部、宏观与微观的关系，掌握工作主动权，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统一性和独立性及其关系

所谓统一性，就是事物各方面的一致性、全局性、整体性，在处理上、下级关系上，就是下级要服从上级的集中统一领导；所谓独立性，就是事物各方面的差异性、局部性，不统一性，在处理上、下级关系上，就是上级要允许下级有适合自己情况和特点的独立活动，有独立自主之权。

统一性与独立性反映了事物全局与局部的辩证统一关系。首先，二者是互相区别的，统一性代表着事物发展的全局性、整体性的利益，独立性代表着事物发展的局部的、部分的利益。其次，

^① 《邓小平文选》第300页。

二者又是互相联系，缺一不可的，统一性不能离开独立性，独立性也不能离开统一性。再次，二者也可以互相转化，这就是：在一个较小范围内是统一性的东西，放到较大的范围就成为独立性的东西；反之，在一个较大范围（相对于更大范围来说）是独立性的东西，放到较小的范围就成为统一性的东西了。毛泽东曾用非常通俗的语言生动地阐述了统一性和独立性的辩证统一关系。他说：“统一性和独立性是对立的统一，要有统一性，也要有独立性。比如我们现在开会统一性，散会以后有人散步，有人读书，有人吃饭，就是独立性。如果我们不给每个人散会后的独立性，一直把会无休止地开下去，不是所有的人都要死光吗？个人是这样，工厂和其他生产单位也是这样。各个生产单位都要有一个与统一性相联系的独立性，才会发展得更加活泼。”^①可见，统一性和独立性是密切联系，相辅相成的，二者不可偏废，必须结合起来。

二、统一性和独立性相结合与独立自主原则

统一性和独立性的辩证关系要求，任何事物、任何工作，都既要有统一性，又要有独立性，不能只强调一个方面，忽视另一个方面。比如，在统一战线中，各个党派、团体，既要坚持统一，又要保持独立；在处理上、下级关系时，既要有下级服从上级的集中统一的领导，又要有上级允许下级按照具体情况的独立思考和行动；在处理全局和局部关系问题上，既要强调服从大局、照顾大局的需要，又要不丢掉局部，兼顾局部的利益，等等。就是说，都要把统一性和独立性结合起来，使二者得到兼顾。

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在处理统一战线问题和军事指挥等问题时，就深刻阐述并出色运用了统一性和独立性相结合的方法。在统一战线问题上，毛泽东指出：“没有问题，统一战线中的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27页。

独立性，只能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如果认为它是绝对的，就会破坏团结对敌的总方针。但是决不能抹杀这种相对的独立性，无论在思想上也好，在政治上也好，在组织上也好，各党必须有相对的独立性，即是说有相对的自由权。”^① 因此，“我们的方针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② 在抗日游击战争的军事指挥问题上，毛泽东也提出了要坚持在统一的原则下独立自主解决问题的方法。他说：抗日游击战争的指挥关系，“一句话，就是：战略统一下的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具体地说，就是“一般的方针集中于上级；具体的行动按照具体情况实施之，下级有独立自主之权。”“越是地区广大，情况复杂，上下级距离很远，这种具体行动就越应加大其独立自主的权限，越应使之多带地方性，多切合地方情况的要求，以便培养下级和地方人员的独立工作能力，应付复杂的环境，发展胜利的游击战争。”^③ 又说：“应该集中的不集中，在上者叫做失职，在下者叫做专擅，这是任何上下级关系上特别是在军事关系上所不许可的。应该分散的不分散，在上者叫做包办，在下者叫做无自动性，这也是在任何上下级关系上特别是在游击战争的指挥关系上所不许可的。”^④ 只有既坚持上级的集中统一领导，又允许下级的正当的独立自主之权，才能正确地解决这个问题。

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毛泽东更加强调要使我们的干部学会运用统一性和独立性相结合的方法。1956年，在《论十大关系》中，他不仅从原则上深刻阐述了统一性和独立性的辩证关系，而且针对当时我国在经济体制方面存在的某些统得过多过死的弊病，进一步提出了解决中央和地方，中央、地方以及各生产单位之间矛盾的正确方针。指出：“把什么东西统统都集中在中央或省市，不给工厂一点权力，一点机动的余地，一点利益，恐怕不妥。”^⑤ “应

①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90、505页。

③④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05～406页。

⑤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27页。

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这对我们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比较有利。”^① 虽然，由于种种原因，主要是“左”的指导思想的影响，过去一个时期党没有能够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毛泽东在这里所强调的一些思想，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为改变过去那种过分集中统一的僵化的经济体制模式所作的努力，为我们正确运用统一性和独立性相结合的方法提供了良好条件。

历史经验表明，在实际工作中正确运用统一性和独立性相结合的方法，把统一性与独立性恰当地结合起来，并不是轻而易举的。它不仅要求我们要从思想理论上真正弄清楚统一性与独立性的辩证关系，巩固应有的统一性，保证正当的独立性，划清必要的统一性与统得过死的界限，划清正当的自主权与闹独立性的界限，而且要求我们密切联系各个时期、各项工作的具体实际，具体分析 and 解决统一性与独立性之间的具体矛盾，采取与之相适应的具体办法。总之，就是要做到：“可以和应当统一的，必须统一，不可以和不应当统一的，不能强求统一”^②；反对只要统一性、不要独立性，或者只要独立性、不要统一性；也反对只向上边争独立性，不给下边以独立性，只要求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不尊重别人的独立性，甚至以自己的独立性去干涉、妨碍别人的独立性等等错误偏向，正确处理好上下、左右之间的关系。

三、统一性和独立性相结合的具体方针、方法

党和毛泽东在处理统一性和独立性关系方面提出过不少具体的方针和方法，主要有：

第一，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

^{①②}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29、731页。

领土辽阔的大国，各地的自然条件和经济条件悬殊很大，情况千差万别，全国各地所有的经济活动都要由中央统一管理，显然办不到，也办不好。因此，毛泽东提出“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必须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各地都要有适合当地情况的特殊”，不仅“中央要注意发挥省市的积极性，省市也要注意发挥地、县、区、乡的积极性”^①，毛泽东在这里所强调的有了地方的独立性才能更好地巩固中央的统一性的思想，正是把统一性和独立性恰当结合起来的一种方法。

第二，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利益。国家、集体和生产者个人三者的关系，是处理统一性和独立性、全局与局部关系中经常会遇到的一个突出问题。从根本上说，又是一个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的关系问题。我们要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就要不断增加积累，以便扩大生产规模，加快建设速度，这就要求群众以集体利益、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利益，眼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但是，我们在重视国家建设的时候，也不能忽视集体和个人的利益，必须兼顾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这两个方面，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的利益。“国家和工厂，国家和工人，工厂和工人，国家和合作社，国家和农民，合作社和农民，都必须兼顾，不能只顾一头。无论只顾哪一头，都是不利于社会主义，不利于无产阶级专政的。”^②这也是统一性和独立性相结合的具体体现。

第三，树立“全国一盘棋”的思想。就是要使每个单位、每个人都能正确处理全局和局部的关系，树立全局观念，全国人民共同努力，共同下好全国这盘大棋。这就要求我们每个单位和个人都要从整个国家的利益、全国人民的利益出发考虑和处理问题；同时，正确处理全局与各个部分、各个方面的关系，正确处理目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这仍是一个统一性和独立性相结合的问题。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29～731页。

②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29页。

第九章

社会基本矛盾和两类社会矛盾

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创立，并由列宁发展了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是推动人类社会由低级向高级发展之动力的原理，是唯物史观的基石。毛泽东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思想，首次把这两对矛盾概括为“社会基本矛盾”，精辟地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性质和特点。并在此基础上，把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从政治上区分为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两类矛盾，明确指出敌我矛盾是极少数，大量的是人民内部矛盾。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完整地提出了正确区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学说，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

第一节 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

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是多层次的复杂的矛盾体系。在这个矛盾群体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仍然是基本矛盾。而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及其他矛盾，都是社会基本矛盾的不同表现和具体展开。

一、社会基本矛盾理论的历史发展

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同任何其它理论一样，有它产生、发展和逐步完善的过程。这个理论最初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来的。

早在1845年至1846年他们合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包含着这样的思想内容。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一当人们自己开始生产他们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时候（这一步是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他们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人们生产他们所必需的生活资料，同时也就间接地生产着他们的物质生活本身。”“而生产本身又以个人之间的交往为前提的。这种交往的形式又是由生产决定的。”^① 这就是说，在社会生产发展过程中必定存在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不仅如此，马克思恩格斯还指出：“在过去一切历史阶段上受生产力所制约、同时也制约生产力的交往形式，就是市民社会。”^② 市民社会“在一切时代都构成国家的基础以及任何其他的观念的上层建筑的基础。”^③ 这就是说，在社会生活中，也始终存在着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

马克思在1859年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上述内容作了完整而深刻的阐述。他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④ 这就是说，在社会生活中必然存在着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三个层次；生产关系作为生产力诸要素的结合形式与生产力构成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生产关系的总和作为经济结构与上层建筑构成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只要人类社会存在，就一定有这两对矛盾，它们是贯穿社会始终的。马克思在该文中还指出：“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页。

②③ 同上，第41、41—42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2页。

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①。”这就告诉我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是推动人类社会从低级形态到高级形态发展的根本动力。马克思恩格斯运用这一理论，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科学地论证了资本主义灭亡和社会主义胜利的历史必然性，阐明了无产阶级的伟大历史使命，为无产阶级革命奠定了理论基础。

列宁在领导俄国革命的实践中，不仅证明了这一原理的正确性，而且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这一理论。列宁在谈到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时指出：“他所用的方法就是从社会生活各种领域中划分出经济领域来，从一切社会关系中划分出生产关系来，并把它当做决定其余一切关系的基本的原始的关系。”^②“只有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高度，才能有可靠的根据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做自然历史过程。”^③列宁的这两个归结告诉我们，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始终存在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只有抓住这两对矛盾，才能够认清社会的本质。列宁正是运用这个理论分析了帝国主义时代的社会现象，揭示了帝国主义的基本特征，指出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夜，并提出社会主义革命可以首先在一国胜利的科学论断。列宁在领导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的最初年代，对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特点作了初步探讨，指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对抗将会消失，矛盾仍然存在。”^④

斯大林在革命实践中，也很重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2—83页。

②③ 《列宁选集》第1卷，第6、8页。

④ 列宁：《对布哈林〈过度时期的经济〉一书的评语》第12页，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

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他在《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等著作中，对它们的性质及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进行了较全面深入的论述。但是，斯大林在理论上有一个大的失误，就是他长期错误地认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已经“完全适合”，不再有矛盾了。直到他逝世的前一年，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一书中，在谈到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之间“完全适合”的同时，才认识到如果政策不对头，调节得不好，还是会出问题，还会有矛盾。然而，他还是没有认识到正是这种矛盾的不断产生和解决才是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向前发展的动力。并没有把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当作全面性的问题提出来。

毛泽东根据马列主义的基本观点，总结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特别是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分析了我国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的社会状况，科学地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①这样就克服了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的错误认识，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理论。

首先，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毛泽东第一次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概括为社会的基本矛盾。如前所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对这两对社会矛盾都非常重视，甚至进行过较全面深刻的分析和论述，但由于历史条件所限，他们都没有把这两对矛盾概括为“社会基本矛盾”，早在1937年，毛泽东在《矛盾论》中，就提出了“社会的基本矛盾”这个概念，并首先提出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作为社会的基本矛盾。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毛泽东重申“社会基本矛盾”这一范畴，反映了人们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67页。

对社会的认识进一步深化。他从发展观的角度，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概括为“社会基本矛盾”，从而能够更好地揭示出社会这个有机体的全貌和发展的动因。

其次，毛泽东提出了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在一定条件下对生产力、经济基础起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在《矛盾论》中，毛泽东就说：“诚然，生产力、实践、经济基础，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谁不承认这一点，谁就不是唯物论者。然而，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这些方面，在一定条件之下，又转过来表现其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这也是必须承认的。”^①当然，毛泽东提出的在一定条件下表现为主要的决定作用的“条件”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条件就是“当着不变更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不能发展的时候，生产关系的变更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当着政治文化等等上层建筑阻碍着经济基础的发展的时候，对于政治上和文化上的革新就成为主要的决定的东西了。”^②

最后，毛泽东具体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科学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内容、特点和发展规律。并且明确地指出社会基本矛盾普遍地存在于一切社会形态之中，即使“将来全世界的帝国主义都打倒了，阶级消灭了，……那个时候还有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的矛盾。”^③

二、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内容和特点

毛泽东科学地指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然而社会主义是一种崭新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同以往一切社

①② 《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第166—167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18—319页。

会的基本矛盾相比，有着根本不同的性质和特点。

从矛盾的性质看，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非对抗性的矛盾。毛泽东在谈到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同旧社会的基本矛盾，例如同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的根本区别时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表现为剧烈的对抗和冲突”，“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是另一回事，恰恰相反，它不是对抗性的矛盾。”^①

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包括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关系，人与人之间的互相合作关系，以及“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和由此决定的交换和消费关系。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中，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既代表了生产力发展要求，又是社会生产资料的主人。这就从根本上克服了资本主义社会所固有的生产的社会化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对抗矛盾。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包括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制度和法律，以及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它是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即经济基础所制约并为其不断完善和发展服务的，它充分体现了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者的利益。尽管从局部和某些环节上看，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还存在着某些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部分，需要不断地进行局部的调整 and 改革，但从整体上看，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已不再是变革生产关系以解放生产力，而是在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下保护和发展生产力，使“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②这些都充分说明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的非对抗性质。

从矛盾的特点看，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在基本适合情况下的局部不适合的矛盾。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它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但是，它又还很不完

①②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67页。

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除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的这种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以外，还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①

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是基本适应的。从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看，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消除了旧社会生产资料和劳动者相脱离的弊病，劳动者成了生产资料的主人。劳动者生产的目的不再是为了少数剥削者的利益，而是为了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需要。这样就能充分调动劳动者在生产中的主动性、责任心和积极性。同时，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消灭了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使社会生产能够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这就使人力、物力和财力能得到充分合理的利用。从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方面看，改变了旧社会那种剥削与被剥削、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建立了同志式的互相合作的关系。这就使劳动者能够心情舒畅地以主人翁的态度对待劳动，使劳动者的积极性、创造性和集体智慧能够得到充分发挥。从个人消费品的分配方面，实行了“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消灭了旧社会“劳而不获”的不合理的剥削制度，这样就有力地调动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

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也是基本适应的。从政治上讲，无产阶级的国家制度和法律，是建立、维护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强有力的工具。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保卫国家和集体财产，保卫人民的合法权益。它还实行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制，把对人民实行民主和对敌人的专政结合起来，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力，因而能够充分调动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无产阶级政党是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领导力量，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根据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和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68页。

政策，调整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关系，使上层建筑各个方面更适应经济基础发展的需要，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从思想上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能自觉反映经济基础的要求，它对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起着巨大的积极作用。马克思主义是关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发展普遍规律的科学，是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这种科学的理论一旦武装了群众的头脑，指导了群众的实践，就会变成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巨大物质力量。

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除了相适应的一面，也还有相矛盾的一面，不相适应的一面。

从所有制看，社会主义的生产资料公有制是一种崭新的制度，但还很不完善，有许多问题需要根据生产力的发展状况和层次不断地调整和完善。另外还存在着全民所有制同集体所有制之间、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同个体经济之间的矛盾。这些问题和矛盾处理不好，都可能影响生产力的发展。从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看，由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还存在“三大差别”，人们的体力、智力还不能得到全面的发展，还不能立即消灭旧的社会分工的束缚。因此，在人民中间还存在着领导者、管理人员、技术人员、直接生产者等相对固定的分工，这些关系如果处理不好，就会影响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不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从分配方面看，如何处理积累和消费的比例是个复杂的问题，不容易一下子搞好，只强调消费，或者只强调积累，都会影响生产力的发展。在贯彻“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时，如何既不搞平均主义，又不搞过分悬殊，既贯彻物质利益原则，又加强思想教育，这些问题和关系都是要在实践过程中逐步解决的。

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也有不适应的方面。关于这一点毛泽东明确指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存在，国家机构中某些官僚主义作风的存在，国家制度中某些环节上缺陷的存在，又是

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相矛盾的。”^①

综上所述，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是既相适应，又相矛盾。相适应是基本方面，相矛盾是非基本方面。正是这种相适应又不相适应的矛盾，推动着社会主义社会向前发展。

三、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解决方法

毛泽东在谈到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解决方法时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不是对抗性的矛盾，它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② 这就是说，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旧社会的矛盾由于性质不同，解决的方法也就不同。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和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是背道而驰的。这个矛盾，在阶级关系上表现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抗；在生产上表现为个别部门生产的有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对立。这些矛盾在资产阶级私人占有制范围内不管怎样进行调整，也不能得到根本解决，必须以公有制代替私有制，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根本要求。而资本主义的私人占有制是资产阶级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资产阶级不会自动放弃剥削，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他们必然利用资产阶级国家政权和意识形态的力量维护资本主义的私人占有制。所以，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不能由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来解决，只能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才能解决。

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则不同，它是非对抗性的，是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之间基本相适应条件下的矛盾，是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矛盾。因而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就不需要从根本上改变这种制度，而是通过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69页。

②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67页。

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自行调节、发展和完善，不断地得到解决。

毛泽东提出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解决的思想，不仅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而且为我国的实践所证实。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在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领域中进行的一系列改革，就是以这一思想为理论依据的。以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为理论依据的体制改革，将在第十七章关于“体制改革与社会基本矛盾”一节中展开论述。这里从略。

社会主义社会就是在自身调整过程中，逐步解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的。当然，社会主义社会的自我调整、完善和发展，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需要经历一个从低级到高级、从不成熟到比较成熟的逐步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在旧的矛盾解决之后，还会出现新的矛盾，又需要人们去加以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就是在不断地调整 and 改革中前进的。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我们今后必须按照具体的情况，继续解决上述的各种矛盾。当然，在解决这些矛盾以后，又会出现新的问题、新的矛盾，又需要人们去解决。”^①

第二节 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

一、社会主义社会两类社会矛盾理论的提出和发展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理论，有个不断明确、逐步深化的发展过程。

马克思和恩格斯生活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没有经历过社会主义社会的实践，但他们对社会主义的矛盾还是作了有益的探讨和科学的预见。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一文中指出，社会主义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69页。

社会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社会主义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在社会主义社会，由于生产力发展程度的限制，只能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而“按劳分配”中存在着形式上的平等，事实上的不平等。要解决这些矛盾，主要靠发展社会生产力。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等著作中，谈到过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城市和乡村之间的矛盾及其解决办法。马克思和恩格斯这些论述，包含着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萌芽。

列宁生活在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转变时期，这时资本主义已走向衰退，社会主义正在兴起。列宁在领导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前后，也对社会主义的矛盾进行了探讨和分析。他在《国家与革命》等著作中，分析了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制度的合理性和局限性，论述了社会主义条件下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和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等问题。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在《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等后期著作中，对社会主义条件下工人阶级内部的矛盾，工人阶级同农民的矛盾，社会主义制度和官僚主义的矛盾等作过一些具体分析和研究。列宁的这些思想，无疑地包含了对社会主义两类矛盾的天才见解。但由于列宁没有亲身经历过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的实践，所以他不可能把两类社会矛盾问题，特别是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作为重大理论课题，进行全面研究。

斯大林在领导苏联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过程中，人民内部矛盾逐渐显露和突出出来，两类矛盾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斯大林对此从理论上也作过一些说明。1930年，斯大林在一封信中，把苏联国内矛盾区分为“结合内部的矛盾”（即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之间的矛盾）和“结合外部的矛盾”（即工农劳动群众同国内富农阶级之间的矛盾）。他还对这两种矛盾的区

别、联系以及处理方法作过一些分析。斯大林指出，这两种矛盾是“两种不同的东西”，不能混淆起来。对于工人阶级同劳动人民群众首先是和农民群众的矛盾，“不是使内部矛盾尖锐化，而是缓和并解决这些矛盾”，“随着工业化的增长，即随着无产阶级在国内的力量和影响的生长，这种矛盾将日益缓和并顺利解决。”而无产阶级和富农阶级的矛盾则不同，“在我们还没有消灭富农阶级以前，这种矛盾是会日益增长并尖锐化。”^① 斯大林这些论述对尔后人们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两类矛盾有着重要意义。但斯大林对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认识又有缺乏辩证法思想的一面。主要表现在1936年苏联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斯大林在一个长时期内，认为苏联国内没有矛盾了，只有政治上、道义上的和谐一致。一旦社会上出现了矛盾和问题，就把它的根子归结为外部因素的作用，认为是外国资产阶级走狗、代理人的破坏。这样就必然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把党内的和人民内部的许多矛盾当敌我矛盾处理，导致肃反扩大化等严重错误。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人民1949年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1956年又完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毛泽东坚持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观点，科学地分析了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的各种社会矛盾，总结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特别是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的经验教训，提出了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的学说。

1956年12月29日，经毛泽东修改发表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中，首次明确提出和阐述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一对概念。1957年1月，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又作了论述。他说：“怎样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

① 参见《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20—22页。

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是一门科学，值得好好研究。”^① 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他进一步指出：“在我们的面前有两类社会矛盾，这就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类矛盾。”^② 又说：“为了正确地认识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这两类不同的矛盾，应该首先弄清楚什么是人民，什么是敌人。”^③ 毛泽东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具体地历史地考察了人民和敌人这两个概念的内涵，指出它们是一对历史的范畴，“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的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④ 就我国的具体情况来说，在抗日战争时期，一切抗日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而日本帝国主义、汉奸、亲日派则都是人民的敌人。在解放战争时期，美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即官僚资产阶级、地主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都是人民的敌人；而一切反对这些敌人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则属于人民范围。在建设社会主义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而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则都是人民的敌人。分清人民和敌人，是正确处理表现在人与人关系上的社会矛盾的首要前提。

社会主义社会的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类矛盾。按照毛泽东的分析，这两类社会矛盾的不同性质表现在“敌我之间的矛盾是對抗性的矛盾。人民内部的矛盾，在劳动人民之间说来，是非對抗性的；在被剝削阶级和剝削阶级之间说来，除了對抗性的一面以外，还有非對抗性的一面。”^⑤ 所以有这种性质上的不同，是由于这两类社会矛盾是在不同的基础上产生的。

①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57页。

②③④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57页。

⑤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58页。

敌我矛盾是人民同各种敌对分子之间根本对立基础上的矛盾。极少数社会主义的敌对分子从各方面进行敌视和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罪恶活动，因此，人民群众同他们的矛盾是對抗性的。与此相反，人民内部矛盾是人民范围内各阶级、阶层、社会集团内部以及他们相互间的矛盾，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基础上的矛盾，所以，矛盾双方的一致性主要的基本的方面。

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是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但它们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相互转化的。敌我矛盾可以转化为人民内部的矛盾。我们对打倒的剥削阶级分子通过长期的教育改造，变为自食其力的社会主义公民，就是敌我矛盾转化为人民内部矛盾的表现。人民内部矛盾也可以转化为敌我矛盾。毛泽东说：“在一般情况下，人民内部的矛盾不是對抗性的。但是如果处理得不适当，或失去警觉，麻痹大意，也可能发生对抗。这种情况，在社会主义国家通常只是局部的暂时的现象。这是因为社会主义国家消灭了人剥削人的制度，人民的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①当前我国人民内部由于历史上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在各方面遗毒的影响，以及国际资本主义势力、某些敌视我国社会主义的势力的拉拢腐蚀，使得某些社会成员和我们党和政府内的个别成员腐化变质，蜕变为腐化变质的犯罪分子，这就是人民内部矛盾转化成敌我矛盾的表现。

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我国政治生活的主题

毛泽东认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就是说在社会主义社会，人民内部矛盾上升为主导的突出的地位。社会主义国家在处理人与人在社会各方面关系的问题时，以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为主要内容。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64页。

毛泽东指出：“人民内部的矛盾不是现在才有的。”^① 这就是说，无论在以往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旧社会，还是在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的新社会，都存在着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它们的区别只是在于新旧社会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所处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同的。

在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里，例如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以及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组成的革命统一战线内部，虽然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复杂矛盾，但面对着根本对立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残酷剥削和压迫，首要的问题就是团结起来，反抗和推翻国内外反动阶级的统治，建立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自己的新政权。所以，这个时期敌我矛盾始终占着主导和突出的地位，是当时政治生活的主题。至于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统一战线内部的各种矛盾即人民内部的矛盾，虽然也要认真对待，妥善处理，但它始终不会、也不可能占主导地位，而只能处于次要和服从的地位。

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夺取了政权并消灭了剥削制度进入社会主义以后，社会生活中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情况。剥削阶级作为完整的阶级消灭了，阶级斗争虽然还存在，但主要表现为广大人民群众同极少数敌视和破坏社会主义事业的敌对分子的斗争，这种斗争只是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社会上大量存在和需要解决的是各式各样、错综复杂的人民内部的矛盾。这时敌我矛盾降到了次要和服从的地位，而人民内部矛盾上升为主要的突出的地位，成了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如前所述，虽然肯定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这一点并不是毛泽东最先提出来的。但是，把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作为重大的理论问题和现实的问题突出地提出来，进行全面、深入、系统地研究和论述，并区分为敌我矛盾和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58页。

人民内部矛盾两类，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还是第一次，这应该说是毛泽东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作出的独特贡献。

社会主义社会人民内部矛盾之所以处于主导和突出的地位，是和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主要矛盾密切相联系的。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早在1956年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就曾指出：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①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里，又进一步科学地把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概括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是对党的八大制定的正确路线的继续和发展。这就是说，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全党和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把我国从落后的农业国尽快地变为先进的工业国，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人民内部矛盾是多种多样的，当然，它们产生的根源也是多方面的，有经济方面的，也有政治思想和认识方面的。但引起人民内部矛盾的最深刻最主要的根源则在经济方面。只有社会生产力发展了，社会财富丰富起来，人民内部的许多矛盾和实际问题，如升学问题、就业问题、工资问题、住房问题等，才能得到较好的解决。所以说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的直接的主要根源。

这里需要搞清的就是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以及人民内部矛盾三者的关系问题。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决定着社会主义社会的性质、面貌和发展，它也制约和决定着社会主义

① 参阅《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人民出版社）。

社会的主要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矛盾。而我国当前的社会主要矛盾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则是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本质特征的集中表现。而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既是人民内部矛盾的直接主要根源，又具体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这就是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主要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关系。正因为如此，只有积极调整不适合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某些环节，使生产力得到高度的发展，才能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从而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人民内部的各种矛盾。另一方面，正确处理好人民内部的各类矛盾，又会反过来促进主要矛盾的解决，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从而进一步推动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所以，当前我们搞好改革，大力发展生产力，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的需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这些都是一致的。当然，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最终通过人与人的矛盾即人民内部矛盾表现出来，这样正确处理好人民内部矛盾就成了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了。

三、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方针和方法

毛泽东不仅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而且还深入细致地分析了我国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所存在的人民内部矛盾的种种表现，并提出了解决这些矛盾的原则和方法。

人民内部矛盾包含的内容十分广泛，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毛泽东指出，所谓人民内部的矛盾，包括工人阶级内部的矛盾，农民阶级内部的矛盾，知识分子内部的矛盾，工农两个阶级之间的矛盾，工人农民同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民族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等等。我们的党和国家是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但是它同人民群众之间也有一定的矛盾，这种矛盾包括国家利益、集体利

益同个人利益之间的矛盾，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之间的矛盾，民主同集中的矛盾，领导同被领导之间的矛盾。此外，在不同地区之间，不同部门、不同行业、不同民族，甚至不同年龄的人们之间也有矛盾。如经济发达的地区同经济发展比较落后地区之间的矛盾，工业与农业间的矛盾，工业内部轻重工业间的矛盾，工业、交通和能源间的矛盾，生产、建设和流通相互间的矛盾，生产建设同科学文化教育间的矛盾，以及文化科学领域中的矛盾，汉族同少数民族之间的矛盾等等。所以，在我国目前条件下，人民内部矛盾是一个有多种类型、多种层次、错综复杂关系的庞大矛盾群。

如前所述，在社会主义社会，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是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因而解决矛盾的原则和具体方法也不同。毛泽东指出：“我们历来就主张，在人民民主专政下面，解决敌我之间的和人民内部的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采用专政和民主这样两种不同的方法。”^①即用专政的方法解决敌我矛盾，用民主的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

所谓专政方法，即镇压和强制的方法，就是运用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机器，按照法律的程序，对敌视和蓄意破坏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敌对势力、严重犯罪分子，依法拘捕，依法治罪，判处徒刑，剥夺其政治权利等，强迫他们从事劳动并在劳动中改造他们成为新人。

所谓民主的方法，即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和疏导的方法。毛泽东把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民主方法具体化为一个公式，叫做“团结——批评——团结”。讲详细一点，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②。”这是我党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历史经验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65页。

②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63页。

的总结，包含着丰富的辩证法思想。这个公式中的第一个团结是愿望，是出发点。在人民内部讲团结，是这个公式的灵魂，有没有团结的愿望和动机，是能否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基本前提。当然，讲团结不是不要批评和斗争，不是主张一团和气。恰恰相反，人民内部不管是政治上、思想上以及其他方面的矛盾，只要是带有某种原则性的，都有一个是非的问题。为此，必须进行积极的思想斗争。当然，开展批评斗争也要实事求是，合情合理，不能无限上纲。第二个“团结”是目的，就是通过批评和斗争，用正确的东西克服错误的东西，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因此，团结是开展批评或者斗争的起点和归宿，批评和斗争是否正确，归根到底要看它是否达到了新的团结。

用民主的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是一个总原则，总方法。而人民内部矛盾是多种多样又错综复杂的，因而用民主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时，还必须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毛泽东针对人民内部矛盾多样化的状态和特点，把用民主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这个原则具体化为一系列的具体方针和方法。这就是：解决人民内部在政治、思想认识上的矛盾，实行“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坚持说服教育的方法；而解决人民内部在物质利益方面的矛盾，应根据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原则，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利益，正确处理以国家为代表的人民长远利益和生产单位的集体利益以及劳动者个人的目前利益之间的矛盾；解决人民群众同政府机关的矛盾，要采取民主集中制的方法。同时，必须不断改革旧的、过时的和不合理的体制，建立某些必要的制度，完善社会主义民主生活；对于科学文化领域中的矛盾，采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毛泽东说：“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①对于共产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84页。

党和民主党派的矛盾，应在爱国和拥护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前提下，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在汉族和少数民族的矛盾关系上，实行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各民族共同繁荣的原则，既要反对大汉族主义，又要反对地方民族主义，等等。

当然，在用民主的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同时，还必须辅之以社会主义法制。在人民内部有些人触犯了党纪国法，这就不能仅限于批评和自我批评，还要绳之以党纪国法，有的还要坐班房。毛泽东说：“人民为了有效地进行生产、进行学习和有秩序地过生活，要求自己的政府、生产的领导者、文化教育机关的领导者发布各种适当的带强制性的行政命令。没有这种行政命令，社会秩序就无法维持，这是人们的常识所了解的。这同用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①

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深入发展和我国统一大业的逐步进行，人民内部矛盾还将以新的内容和形式表现出来。我们应当重视研究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努力学会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尤其是要学会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对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有着重要的意义。正如毛泽东指出的，“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较易于克服困难，较快地建设我国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党和国家较为巩固，较为能够经受风险。总题目是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和正确地处理敌我矛盾。方法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②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62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56—457页。

第三节 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

在阶级社会中，社会的基本矛盾集中表现为对立的阶级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被消灭以后，阶级斗争虽然已不是主要矛盾，但仍占有重要的地位。它主要表现为广大人民群众同极少数破坏社会主义制度的形形色色的敌对分子的斗争。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社会主义社会在一定范围内还存在着阶级斗争

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问题，在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党的“八大”就明确指出：“虽然还有阶级斗争，还要加强人民民主专政，但其根本任务已经是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国内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①毛泽东1957年2月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也精辟指出：“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但是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并提出现在的任务是，“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②这说明，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我国的主要任务不是搞阶级斗争，而是向自然开战，发展社会生产力。阶级斗争虽然没有完全结束，但已降到从属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和文化中的地位。令人遗憾的是此后不久，毛泽东背离了党的“八大”正确路线和他自己的正确思想，重新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视为社会主义社

① 参见《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人民出版社）。

②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69—770页。

会的主要矛盾，重提“以阶级斗争为纲”。理论上的失误，酿成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直至“文化大革命”的悲剧。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通过拨乱反正，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我党对社会主义社会初级阶段的阶级斗争问题有了更清醒的认识，作出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分析和合乎实际的论断。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在剥削阶级作为阶级消灭后，阶级斗争已经不是主要矛盾。由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影响，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既要反对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观点，又要反对认为阶级斗争已经熄灭的观点”。这是对我国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形势的唯一科学概括。

关于我国一定范围内的阶级斗争的主要表现，党的十二大报告作了明确的回答，报告指出：“现在，还有形形色色的敌对分子从经济上、政治上、思想文化上、社会生活上进行着蓄意破坏和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活动，我国现阶段的阶级斗争，主要表现为人民同这些敌对分子的斗争。”这些敌对分子包括：原有的和新生的反革命分子、敌特分子；严重破坏社会主义制度的犯罪分子；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新剥削分子；极少数继续坚持反动立场的剥削阶级残余分子和其他反社会主义分子。这些形形色色的敌对分子进行活动的目的和结果是危害社会主义事业的，他们的利益同人民的利益、社会主义的利益是根本对立的。所以，人民同他们的斗争仍然是一种阶级斗争。

我国在消灭了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之后，阶级斗争之所以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是有其深刻的国内和国际根源和条件的。第一，历史上剥削阶级的各种影响，特别是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遗毒，具有相对独立性，它不可能随着私有制和剥削阶级的消灭而立即消失。剥削阶级的腐朽思想会腐蚀我们的党员、干部和群众，使其中的一些人蜕化变质，成为新剥削分子、新反革命分子。第

二，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处在初级阶段，还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它既不可能完全防止某些社会成员的腐化变质现象，也不可能杜绝极少数剥削分子和敌对分子的产生。第三，剥削制度虽然在大陆上消灭了，但作为我国领土一部分的台湾、香港、澳门等地区还存在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剥削阶级思想必然通过各种渠道向内地进行渗透和发生影响。第四，我们还处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之中，外国资本主义势力以及某些敌视我国社会主义的势力还会对我国进行侵蚀和破坏。随着对外开放，同外国的经济和文化交往的增多，资本主义的腐朽思想和生活方式也会通过各种渠道输进我国，腐蚀人们的心灵。总之，阶级斗争是一种国内外相联系的国际现象，只要世界上还存在着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社会主义国家里就会有阶级斗争的反映，我国的阶级斗争就不可能完全消除。

二、两类社会矛盾和阶级斗争

社会主义社会的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同阶级斗争问题，既有区别又存在着错综复杂的联系。搞清楚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同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的关系，对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特别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有着重要的意义。

社会主义社会的敌我之间的矛盾，是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群众同根本对立的阶级、阶层和社会势力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都属于阶级斗争的范围。只不过不同的历史时期，斗争的对象、内容和特点不同罢了。

社会主义社会人民内部的矛盾同阶级斗争的关系比较复杂。一般来讲，大部分人民内部矛盾同阶级斗争没有必然的联系，因而不属于阶级斗争的范围。只有特定时期特定条件下少量的人民内部矛盾，属于阶级斗争范围或者具有阶级斗争的性质和影响，必须进行具体分析，否则，就容易犯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错

误。因此，必须正确认识我国社会内部大量存在的不属于阶级斗争范围的各种社会矛盾。

从1949年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到1956年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这一时期，我国人民内部矛盾除了包括工农等劳动人民内部的矛盾外，还包括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民族资产阶级同工人阶级之间有着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这种矛盾无疑是属于阶级斗争的范围的。特别是1953年后开始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矛盾成了这一阶段的主要矛盾。尽管如此，在我国条件下，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这是因为民族资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它有革命性的一面，又有妥协性的一面。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它有剥削工人阶级取得利润的一面，又有拥护宪法、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①

在我国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剥削阶级作为完整的阶级被消灭了，民族资产阶级的绝大多数成员转变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工人阶级同他们对抗性的一面也即随之消失。从此，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人民内部的矛盾不再包含属于阶级斗争范围的内容。但是在人民内部的矛盾中，仍有少量的矛盾带有阶级斗争的影响和反映。例如近些年来，有的人由于受到资本主义思想的侵蚀和影响，羡慕资产阶级自由，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搞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等。一般说来，我们同这些人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但这种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资产阶级腐蚀和无产阶级反腐败阶级斗争的反映。

随着我国统一大业的逐步进行和“一国两制”设想的付诸实践，阶级斗争和人民内部矛盾的关系又会有新的变化。在“一国两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58—759页。

制”的情况下,人民内部矛盾将更多地具有阶级斗争的性质,这是因为在“一国两制”条件下,港、台等地区仍然存在有资产阶级,不仅他们与当地工人阶级的矛盾有明显的阶级斗争性质,而且这些资产阶级与大陆上以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劳动人民之间的矛盾也具有阶级斗争的性质,由于这些地区资本主义制度的思想影响,大陆上的某些人民内部的矛盾将具有更多成分的阶级斗争的影响和反映。

三、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特点

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的阶级斗争,是不同于以往的一切剥削阶级社会的一种特殊形态的阶级斗争,它有许多新的特点。

第一,阶级斗争的基础不同。历史上的阶级斗争都是根源于剥削制度本身,是一定生产关系下派生出来的作为阶级的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的对立和斗争。在社会主义社会,由于消灭了生产资料私有制,消灭了剥削制度,也就消灭了产生阶级对抗的基础。因此,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不是根源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本身,而主要是历史上的阶级斗争在新条件下的继续。正如邓小平指出的,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是一种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或者说是历史上的阶级斗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特殊形式的遗留。”^①

第二,阶级斗争在社会生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在阶级社会中,阶级斗争是社会的主要矛盾,它制约着社会结构中的其他矛盾。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剥削阶级作为阶级消灭以后,阶级斗争已经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的需要同落后的社会

^① 《邓小平文选》,第155页。

生产之间的矛盾。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必须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因此，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必须服从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任务。

第三，阶级斗争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不同。在阶级社会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集中表现为阶级和阶级之间的斗争。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原有的生产关系同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时，占统治地位的剥削阶级总是要竭力维护已经过时的生产关系，代表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先进阶级和劳动人民为打破统治阶级的反抗而必须进行夺取政权、变革旧的生产关系的激烈斗争。所以，在阶级社会中，这种革命的阶级斗争就成了社会历史发展的主要直接动力。而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由于社会基本矛盾的性质和情况的变化，阶级斗争已经不是社会发展的主要直接动力。不过，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由于它服从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所以，在一定范围内，在一定程度上它还能对社会发展起推动作用。

第四，阶级斗争的范围不同。以往的阶级斗争是全社会规模的，在经济、政治、思想各个领域全面展开并占主导地位。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阶级斗争只存在于一定范围内。所谓“一定范围”，是指在我国社会主义社会诸种矛盾中，阶级斗争性质的矛盾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并且不占主导地位，而大量存在于经济、政治、思想文化领域中的矛盾已经失去了根本利益对立的阶级对抗的性质，不属于阶级斗争的范围，而是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人民内部矛盾。

第五，阶级斗争的方式和方法不同。阶级社会里的阶级斗争，都是各个阶级围绕着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变革而展开的生死大搏斗，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为着自己的彻底解放必须浴血奋战，目的是夺取政权。因此，斗争形式是短兵相接，暴力对抗，武装

斗争是这种对抗性斗争所采取的最高形式。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掌握了国家机器，这时资产阶级还拥有赖以剥削工人的经济实力，还有思想文化方面的优势。无产阶级为巩固自己的政权，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必须发动强大的政治攻势。因此，阶级斗争有时要以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运动方式来进行。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作为阶级的剥削阶级已经不复存在，对于残余的剥削势力和形形色色的敌对分子不再需要进行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运动，而是依靠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的力量，以法律为准绳，按照司法程序来解决在一定范围的阶级斗争问题。

第六，阶级斗争的发展趋势不同。在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里，随着社会基本矛盾的激化，阶级斗争发展的总趋势是越来越激烈，最后引起社会革命。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是人类历史上“最后的斗争”，这种斗争尽管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但从发展的总趋势看，是逐步缩小、减弱和缓和，直到最后消亡。

正确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状况、根源和基本特点，既可以同以前社会的阶级斗争区别开来，又可以和未来彻底消灭了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共产主义社会区别开来。坚持这个科学的认识，就既要反对认为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已经熄灭的观点，又要反对把阶级斗争人为夸大，重犯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只有正确认识和处理好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才能制定出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才能更好地区分和处理好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步伐。

第十章

领导和群众相结合

毛泽东指出，我们共产党人进行任何工作，都必须实行领导和群众相结合，把领导的积极性和群众的积极性结合起来。领导如果不与群众相结合，就会一事无成。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原理，创造性地运用于我们党的全部活动中，不仅提出和坚持了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的群众观点，阐明了无产阶级领袖和人民群众的关系，而且确立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科学的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从而形成了中国共产党人在唯物史观中独具特色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创造历史的理论。

第一节 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领导和群众相结合，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基本的领导方法。但它决不只是个领导方法问题，从根本上说，它首先是个世界观问题，是如何看待人民群众历史作用的问题。所以，要实行领导和群众相结合，首先就要树立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而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正是奠立在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基础之上的。

一、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

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第一次科学地阐明了人

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决定作用。他们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根本原理出发，认为社会发展的历史，从根本上说，就是生产发展的历史，是生产方式的新陈代谢的历史。因此，确认从事物质资料生产的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决定力量。毛泽东继承和发挥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思想，用更加明确的语言指出：“历史是人民创造的。”^①“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②

人民群众是一个历史范畴。毛泽东说：“人民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的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③在阶级社会里，人民群众这一范畴，包括对历史发展起促进作用的一切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而其中从事物质资料生产的劳动人民群众，则始终是社会人口的大多数，始终是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主力军。因而，他们是人民群众的主体。

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伟大作用，首先表现在，人民群众的主体劳动人民群众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人类社会赖以生存的物质资料，正是由他们创造出来的。没有劳动人民群众，人类社会根本不能存在，更谈不上社会历史的发展。

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伟大作用，还表现在人民群众是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是科学文化发展的源泉。人类科学文化成果的产生和发展，则是对人民群众的智慧、经验的总结、概括和提高。况且，在劳动人民当中也直接涌现出许多优秀的科学家、思想家和艺术家。正如毛泽东所说：“社会的财富是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自己创造的。”^④

人民群众又是社会发展和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人民群众是

① 转引自1967年5月25日《人民日报》。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32页。

③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57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27页。

社会实践活动的主体，当然也是推动社会发展变化的决定力量。任何变革社会的革命，都是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进行并获得成功的。

总之，人民群众既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又是社会变革和推动历史前进的决定性力量。他们是认识世界的主体，也是改造世界的主体。因此，要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有效地改造世界，要推动人类历史前进，就一刻也不能离开人民群众。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根本原理。

二、群众观点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

群众观点是实行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出发点和归宿。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原理，结合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创造性地概括出的群众观点，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具体说来，主要有如下几点：

第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点。一切为了人民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是无产阶级政党的全部工作的根本宗旨，也是每个共产党员和干部想问题，办事情的出发点和归宿点。毛泽东明确指出，一切为了人民群众，是我们从事一切活动的根本出发点和归宿。他说：“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利益工作的。”^①“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组的利益出发；……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②我们的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为人民服务的“勤务员”，是人民的“公仆”，要高度自觉地为人们兴利除弊，为人民造福。不得也不应当非法谋求任何私利和特权，做官当老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终生为人民的利益而奋斗，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奋斗，是一切共产党员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05页。

② 同上，第995～996页。

和干部的天职。

第二，一切向人民群众负责的观点。我们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人民的利益，都必须向人民负责。毛泽东说：“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每句话，每个行动，每项政策，都要适合人民的利益，如果有了错误，定要改正，这就叫向人民负责。”^① 要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力求不犯或少犯错误，免得使人民的利益受到损害。还必须了解，“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② 因为，人民的利益，就是党的利益，除了人民的利益之外，党再无自己的特殊利益。所以，对人民负责就是对党负责，对人民不负责就是对党不负责。把向人民负责和向党负责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是错误的。

第三，相信人民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观点。要做到一切为了群众，一切向群众负责，离不开一切依靠群众。相信人民群众能够自己解放自己，这是群众观点的一个基本内容。毛泽东反复强调指出，人民群众是真正伟大的，人民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要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只要我们相信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都能够克服，任何敌人都压不倒我们，而只会被我们所压倒。人民群众的解放，只有人民群众自己起来斗争和争取，才能获得。任何恩赐的观点，代替群众斗争的观点，都是错误的。当然，相信人民自己解放自己，并不是不要领导，崇拜自发性。恰恰相反，人民群众的解放必须依靠自己的先锋队，在先锋队的指导下，组织起来，自觉地进行斗争，才能取得胜利，并保持、巩固和发展这种胜利果实。

第四，向人民群众学习的观点。虚心向人民群众学习，遇事同群众商量，这也是群众观点的重要内容。毛泽东曾经谆谆告诫我们，要甘当群众的小学生，虚心向群众学习。因为，群众的知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026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96页。

识、经验是最丰富、最实际的，群众的创造能力是最伟大的。他说：“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① 他十分强调，一切共产党员和领导干部，“为了教育群众，首先要向群众学习，”^② “先做学生，然后再做先生”。^③ 只有经常地真心实意地向群众学习，吸取、集中群众的智慧，才可能做出正确的决策，才能正确地发号施令。在全面开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里，自觉地勤奋地向群众学习，包括向工农群众学习，向知识分子学习，向专家学习，向一切有经验的人学习，显得更加重要。这应当成为一种制度，形成一种风气。

总之，正如刘少奇所说：“一切为了人民群众的观点，一切向人民群众负责的观点，相信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观点，向人民群众学习的观点，这一切，就是我们的群众观点。”^④ 简单地说，就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的观点。^⑤ 实践表明，有无正确的全面的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能否和最广大人民群众保持最密切联系，这是能否实行正确领导、实行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前提条件。“只有有了坚固明确的群众观点，才能有明确的工作中的群众路线，才能对群众实行正确的领导。”^⑥

三、正确把握领袖和群众的辩证关系

马克思主义在肯定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同时，也承认杰出人物特别是无产阶级领袖在历史发展上的重大作用。因此，正确把握领袖同群众的关系，是坚持和贯彻马克思主义的人民群众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48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15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31页。

④⑥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54页。

⑤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创造历史原理的一个重要问题。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历史活动是人民群众的事业”^①，“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任何时代，人民群众都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同时，任何一个时代，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都需要有自己的领袖来发起、组织和领导，这样才能形成一个阶级的行动和有组织的伟大力量。否则，要取得革命斗争的胜利是根本不可能的；胜利了要巩固胜利成果，建设新社会也是不可能的。正如列宁所说：“历史上任何一个阶级，如果不推出自己善于组织运动和领导运动的政治领袖和先进代表，就不可能取得统治地位。”^②

可见，要正确地把握领袖与群众的相互关系。首先，应当明确，群众的斗争需要领袖。历史上的任何杰出人物、领袖人物都是适应人民群众革命斗争的需要而产生的，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伟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创造出这样的人物来。”^③这就是说，人民群众要谋求自身的解放，就必须有自己的革命领袖来领导。从这个意义上讲，群众离不开领袖。

其次，领袖必须依靠群众，领袖人物的重大作用一点也离不开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这是因为：其一，领袖的智慧和力量来源于人民群众。领袖只有始终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同群众保持密切联系，才能发挥其重大的历史作用。可以说，领袖在历史上的作用大小、好坏，归根到底取决于同人民群众的关系，要看他们能否与人民群众相结合以及结合的程度如何来决定。任何杰出人物、领袖人物一旦离开了群众，就将一事无成，且必定要垮台。其二，领袖毕竟是少数人，他们的作用再大，也大不过人民群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04页。

② 《列宁选集》第1卷，第210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50页。

众，况且，他们的作用只有通过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才能表现出来。毛泽东说过：“事业是多数人做的，少数人的作用是有限的，应当承认少数人的作用，就是领导者、干部的作用，但是，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作用，有了不起作用的还是群众。干部与群众的正确关系是，没有干部也不行，但是，事情是广大群众做的，干部起一种领导作用，不要夸大干部的这种作用。”^①

无产阶级领袖是适应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革命斗争的需要而产生的，他们在推动革命事业和社会发展中的历史作用是其他任何阶级的领袖无法比拟的。所以，人民群众热爱无产阶级的领袖，自觉维护领袖的权威和声望，是具有高度政治觉悟的表现，是对党的利益、阶级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的热爱表现。人民需要自己的领袖，也需要领袖的权威。社会主义不但不废除权威，而且更加需要权威的领袖和领袖的权威。

在领袖和群众的关系问题上，我们反对把领袖和群众割裂开来和对立起来的形而上学观点，要注意反对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夸大领袖的作用，把领袖神圣化，搞个人崇拜；一种是否认领袖的作用，否认一切权威，宣扬自发论的观点和搞无政府主义。我们要坚决按《决议》所指出的原则去做：“一定要树立党必须在群众斗争中产生的德才兼备的领袖们实行集体领导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一定要维护党的领袖人物的权威，同时保证他们的活动处于党和人民的监督之下。”^②

第二节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我们党和毛泽东认为，要真正实行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不仅要树立正确的群众观点，解决依靠群众的问题，还要解决如何依

①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51页。

②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靠群众的问题，切实掌握“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

一、“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正确依靠和领导群众的科学方法

领导者和领导机关要实行正确的领导，从根本上说，就是要坚持群众观点以及“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毛泽东指出：“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①又说：“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以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见，这是基本的领导方法。”^②邓小平说：“党的领导工作能否保持正确，决定于它能否采取‘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方法”。^③“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是实行正确领导的基本方法，也是实行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根本保证。

第一，从群众中来，化群众意见为领导意见。从群众中来，就是将群众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化为科学的领导意见。也就是通过调查研究，集中群众的智慧和经验，摸清群众的愿望和需要，以形成切合实际的正确方针、政策、计划和办法。我们常说，有事同群众商量，商量的目的，首先就是实现这种转化。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人们的认识来源于社会实践，而社会实践归根到底是人民群众的实践。离开“从群众中来”，领导者的认识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领导者或领导机关的一切正确的决策和办法，归根到底，只能来源于从事社会实践的广大人民群众。毛泽东指出：“我们的领导机关，就制定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这一方面说来，只是一个加工工厂。大家知道，工厂没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54页。

② 同上，第855页。

③ 1956年党的“八大”作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

有原料就不能进行加工,没有数量上充分的和质量上适当的原料,就不可能制造出好的成品来。”^① 领导者的头脑,只起一个加工厂的作用,其原料或半成品只能来自人民群众的实践。

应当指出,亲身实践着的广大人民群众的意见,从总体上说,是丰富的、全面的和接近客观实际的,但就群众中每个成员的意见来说,由于人们在实践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社会经历、文化水平、认识能力和思想方法不同,因而他们的意见或认识也就不尽相同。其中,既有正确的,也有不正确的;既有感性的,也有理性的;既有分散的、无系统的、片面的,也有较为集中、系统、全面的,等等。“从群众中来”,不是群众意见简单的堆积,也不是群众说什么就做什么,而是群众的正确意见的高度升华。所以,要实现“从群众中来”的过程,需要掌握两个相互联结的主要环节:其一,领导者必须深入群众,倾听各方面的意见,掌握全面的和真实的材料。同时,还要到群众中去亲自参加实践,亲身体验生活,以便获得一些直接经验,以有利于更好地理解 and 正确集中来自群众的意见和材料;其二,必须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将已取得的材料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科学加工、提炼和深化,对来自群众的各种意见进行分析综合,实行正确集中,使之形成正确的深刻的和系统的领导意见,并以此制定出合乎民意、顺应民情、符合客观实际的方针、政策、计划和办法来。

第二,到群众中去,化领导意见为群众实践。到群众中去,就是把集中起来的领导意见化为群众自觉的实践活动。也就是把吸取群众意见而形成的方针、政策、计划和办法,拿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思想 and 自觉行动,并在群众的实践中加以检验和发展。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19页。

“到群众中去”要有一个过程。由于领导的意见是群众正确意见的高度升华，它既同某些群众的错误意见相对立，又同每个人的正确意见相区别。因此，要使广大群众都能自觉地接受它、实行它，需要经过一个艰苦的工作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领导者的任务，就是一方面要善于采取各种有效的形式和方法，对群众做好宣传解释工作，使制定出来的正确的方针政策等，能为广大群众所接受和掌握，并付诸实施。毛泽东说：“善于把党的政策变为群众的行动，善于使我们的每个运动，每个斗争，不但领导干部都能懂得，而且广大群众都能懂得，都能掌握，这是一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艺术。”^① 另一方面要善于收集群众执行政策中的意见，总结群众实践过程中的经验，并运用这些经验来检验既定的方针、政策、办法的正确性，使之进一步修改、补充、完善和发展。可见，“到群众中去”的过程，既是实行政策的过程，又是检验和进一步完善、发展政策的过程。

第三，“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一个循环往复、不断发展的过程。任何一项正确的方针、政策、计划和办法的形成和实施，都不可能只通过“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一个具体过程就能完成的，而往往需要经过多次反复才能完成。而且，客观事物和群众的斗争实践是不断地变化发展的，新情况、新问题、新经验不断地出现，因而领导者的认识和领导机关制定方针政策等，也在不断地提高、完善和发展。要不断地走群众路线，不断地总结群众的经验，集中群众的智慧，形成正确的意见，以指导行动。所以，“从群众中来，再到群众中去”是一个无限循环的认识的过程，而且一次比一次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正如毛泽东所指出：“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14页。

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①毛泽东的这段论述,对“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方法做了精辟的概括。

总之,“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过程,是一个不断总结群众经验,集中群众智慧的过程。党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之所以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就在于它是在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不断反复的过程中产生、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我们可以把这个过程,概括为“群众——领导——群众”这样一个简单的公式。

毛泽东不仅系统地阐述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而且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实践观点和唯物史观的群众观点有机地结合起来,把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路线和认识论的公式“实践——认识——实践”和群众路线的“群众——领导——群众”这个公式统一起来(当然不是把这两个公式简单的等同),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同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紧密结合起来,使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科学原理化为实际的工作方法,这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大独创性贡献。

二、坚持群众路线,必须采用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的方法

毛泽东指出,在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到群众中坚持下去的过程中,必须采取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的方法。这方面的内容在工作方法一章中有所论述,这里从实施群众路线角度再做些简要叙述。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54页。

毛泽东认为，实施“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一基本的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始终贯串着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的方法。“从群众中来”的过程，是领导者从群众实践的个别指导中形成一般意见或一般号召的过程。“到群众中去”的过程，是领导者把一般号召付诸实施，到群众实践中作具体指导，并检验和丰富一般号召的过程。正确的领导意见只有在“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的过程中才能形成和实施，而要在集中和坚持的过程中形成和贯彻正确的领导意见，又必须采取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的方法。

一般号召之所以需要同个别指导相结合，其原因在于一般虽然来自个别，对进一步认识个别有指导作用，但一般不能包括一切个别的所有特性，只概括个别的共性。一般号召再好，在贯彻到个别中去时，也需要具体经验，需要把它化为具体的计划、方案、办法，才易于被群众掌握和照着去做。所以，领导者或领导机关有必要选择自己领导的一、两个单位，将一般号召的工作任务付诸实施，做出样子，总结出典型经验，然后运用这种经验去指导其他单位。这样做不仅对提高干部、群众的认识有重大的示范作用，而且还可以取得领导经验，丰富领导的认识。不然的话，就会使一般号召停留在嘴上、会上和纸上，而不会落实到实际工作中去。

可见，无论从群众中集中起来，还是到群众中坚持下去，都需要一般和个别相结合，把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结合起来。否则就不可能形成和贯彻正确的领导意见，不可能正确地实行群众路线的方法。

“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的方法，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关于共性与个性相结合的原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关于认识个别与认识一般相结合的原理在实际工作中的具体运用和体现，是一个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科学的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

三、民主集中制是保证正确依靠和领导群众的有效手段

要在领导工作中切实贯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原则，还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实行和健全民主集中制。所谓民主集中制，就是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与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没有广泛的人民民主，集中无从谈起，也失去实际内容；集中是民主的深化和保证，没有集中，民主就不会有正确方向，也不可能保证实现。民主和集中的正确结合，反映了领导和群众之间的正确关系。

毛泽东指出：“先民主，后集中”，^①“没有民主，不可能有正确的集中”。^②又说：“没有民主，意见不是从群众中来，就不可能制定出好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③领导者或领导机关的正确决策，只能是建立在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地听取和正确集中群众的意见和智慧的基础之上。离开或缺少民主的集中，意见不是来自群众，不可能制定出正确的方针、政策、计划和办法，因而也就不可能实现正确的领导。同样，离开或缺少集中的民主，对群众的各种意见缺乏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分析。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那就失去了领导的作用。而领导如果不能集中群众的正确意见，有力地指导群众，也会脱离群众。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从领导方法来说，只有从群众中来，才能到群众中去。没有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制，既不能实行真正的从群众中来，也不能实行真正的到群众中去。”^④

总之，在“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整个过程中，要始终贯彻民主与集中相结合的方法，既要有高度的民主，又要有高度的集中，坚持民主和集中的辩证统一。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16页。

②③ 同上，第819页。

④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2月6日），《红旗》1987年第4期。

四、把群众路线与群众运动区别开来

群众路线和群众运动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范畴。无论在认识上还是在实践中我们都不应当将它们混同起来，看成是没有差别的一回事。无疑，我们在一切工作中必须走群众路线，但不是也不应当事事、时时、处处都搞群众运动。因为群众运动只是群众路线的一种形式，而不是它的唯一形式。把群众路线的方法归结为群众运动，等同于群众运动，以为只要走群众路线，就非搞群众运动不可，这既是对群众路线、也是对群众运动的误解。实践证明，这种看法和做法是不正确的。

我们在民主革命中，是依靠放手发动群众和组织群众，通过群众性的革命运动，才取得胜利的。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行各项改革，显然，不能再沿用革命时期搞群众运动的做法了。适应社会主义建设新的历史条件，党中央明确指出，必须坚持走群众路线，但不搞群众性的政治运动。我们应当从实际出发，运用毛泽东关于放手发动群众和依靠群众的正确思想，努力探索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如何认真贯彻群众路线以及开展群众运动的适用范围、内容和不同形式，以便把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顺利推向前进。

第三节 共产党的路线，就是人民的路线

毛泽东在延安《解放日报》改版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共产党的路线，就是人民的路线。”^①这一概括揭示了党的群众路线，就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本质特征。

^① 毛泽东：《在延安〈解放日报〉改版座谈会上的讲话》，转引自《解放军报》，1968年7月17日。

一、实行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具体方法

实行领导和群众相结合，除以上谈到的基本方法外，还有一些具体方法，也应予以掌握和运用。

第一，说服教育，典型示范。这是使领导与群众相结合的重要的领导方法。运用这个方法的出发点，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从这个根本观点出发，我们在一切工作中，都要善于把领导的主张、政策交给群众，说服群众，让群众自己下决心，而不是领导代替群众下决心，命令群众干这件事那件事。毛泽东说：“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①如果领导的主张、意见不正确，当然得不到群众的拥护；如果领导的主张、意见是正确的，群众暂时还不理解、不赞成，就要耐心等待，进行说服教育，不能强迫群众去执行。

领导群众的基本方法是说服，这是领导工作应当遵循的基本方针。说服教育，就是讲道理，作分析，从群众的觉悟水平出发进行启发引导。为此，尤其值得重视的是典型示范，即善于运用典型，以实际的榜样进行示范，使群众相信，并乐意照着去做。

第二，团结积极分子，提高中间分子，争取后进分子。毛泽东说：“任何有群众的地方，大致都有比较积极的、中间状态的和比较落后的三部分人。”^②这无论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都是如此。实行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方法，一个很重要的条件是，要有一批由积极分子组成的骨干力量。积极分子的觉悟早，自觉程度高，把他们团结起来，就有了发动群众的骨干。领导者要善于团结积极分子，依靠他们的模范行动和桥梁作用，去提高中间状态的群众，进而影响和争取落后的群众，这才能像滚雪球那样，越滚越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97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53页。

大，把越来越多的群众发动起来，也才能经常地具体地使领导和广大群众紧密结合起来，推动各项事业不断向前发展。

第三，关心群众生活，照顾群众利益。这既是坚持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不可缺少的内容，也是坚持群众路线的一个重要的领导原则和领导方法。早在1934年毛泽东就指出：“要得到群众的拥护么？要群众拿出他们的全力放到战线上去么？那末，就得和群众在一起，就得去发动群众的积极性，就得关心群众的痛痒，就得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的问题，盐的问题，米的问题，房子的问题，衣的问题，生小孩的问题，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我们是这样做了么，广大群众就必定拥护我们”。^①毛泽东所阐述的这个深刻道理，在过去革命战争时期证明是正确的，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同样是真理。应当懂得，我们正在为之奋力建设的并使之不断完善和发展的社会主义制度，只有切实使人民从中得到了好处，人们才会支持这种制度。邓小平同志说：“领导就是服务”，为人民服务，为基层服务，为“四化”服务。我们的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者，在注意抓好生产的同时，也应当关心群众的生活，注意解决群众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对于群众生活中的各种实际问题，凡是经过努力能够解决的，都要根据需求和可能想方设法逐步予以解决，这应当是各级领导不可推卸的责任。

第四，多谋善断。关于实行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方法，毛泽东还指出，作为一个领导者，要“多谋善断”，不要“少谋武断”或“少谋专断”。这是领导作决策的一个重要方法。多谋善断，重点在谋，谋是为了断。谋是基础，只有多谋，才能善断。什么叫多谋？就是要兼听多方面的意见，与多方面商量，向多方面作调查，与群众对话。我们有的领导者喜欢听与自己相同的意见，因而与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第62页。

相同的意见谋得多，而与相反意见谋得少；与干部谋得多，与群众谋得少，这样，了解情况就不全面。多谋，就要兼听上下左右的意见，兼听正面的和反面的意见，特别是反面的意见应该耐心地听。不仅要与身边的干部谋，更要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谋；不仅与相同的意见的同志谋，更要注意与不同意见的同志谋。同时在谋的过程中，要反复慎重考虑，多设想几种可能性，要从最坏处着想，向最好处努力。什么叫善断？就是在谋的基础上，善于判断，善于下决心。谋的目的，就是为了断。该断要断，机不可失，要当机立断，不要优柔寡断。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始终处于主动地位，确保工作不断取得新的胜利。

第五，集体领导和分工负责。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领导，不单指领导者个人，更是指领导集体。为了保证领导工作的正确，避免或减少工作中的失误，领导工作必须实行集体领导的原则，要发挥各级领导班子的集体智慧和力量。同时，集体领导又必须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对于实行这个领导原则，毛泽东指出：“党委制是保证集体领导，防止个人包办的党的重要制度”。^① 强调“党委书记要善于当‘班长’”，^② 要摆正书记同委员之间的关系。制定工作的方针、政策以及重大问题的决策，必须经过党委集体讨论，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作出决定，决不能书记一个人说了算。邓小平同志也说：“各级领导，都必须实行集体领导分工负责。”^③ 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统一的。集体领导是个人分工负责的前提、基础和保证；个人分工负责又能加强和提高集体领导的水平，把事情办得更好。正如毛泽东所指出：“必须懂得，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这样两个方面，不是互相对立的，而是互相结合的。”^④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34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30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246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41页。

第六，“对话”是领导密切联系群众的好形式。“对话”就是面对面地谈问题。对话的双方平等相处，推心置腹，有问有答，有来有往，既有针对性，又生动活泼。为了密切领导与群众的联系，促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发展，党中央特别倡导和重视建立领导与群众协商对话制度，要求各级领导要发扬“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优良传统，提高领导机关活动的开放程度。为此，要分别在国家、地方和基层的不同层次上开辟各种协商对话的渠道。各级主要领导干部要经常主动地用“请进来”或“走出去”的方法，及时地把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向群众作宣传解释，解答他们关心的问题，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接受他们合理的批评建议，同群众一起平等地讨论问题，沟通思想，交流看法，以形成领导和群众之间互相理解、互相信赖的良好关系。这既是健全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内容，也是改进领导作风的重要措施。

第七，把“上情”和“下情”结合起来。作为领导者怎样才能创造性地做好领导工作？具有决定意义的在于能不能吃透“上情”，明了“下情”，并善于实现两者的有机结合。所谓“上情”，就是我们党在一定时期的总路线、总任务、总目标，党和国家颁布的有关政策、法令、指示以及上级领导机关的工作部署和要求等。吃透了这些“上情”，我们才能把握住工作的方向和要求，真正做到“议大事、懂全局、管本行”。所谓“下情”，就是自己的工作对象、工作环境和各种相关的情况。明了“下情”，是做好领导工作的基础。事实证明，只有情况明，才能决心大，方法对。要真正做到明了“下情”，一是要确立明了“下情”是领导工作基础的观念；二是要确立调查研究是明了“下情”的基本途径；三是要确立明了“下情”不是一次完成、一劳永逸的认识。“下情”是不断变化的，因此，要明了“下情”，就要不断地进行调查研究。在吃透“上情”和明了“下情”的基础上，要紧的是在“上情”与“下情”的结合上下功夫，这是领导者创造性工作的关键。如果我们的各级领

导者能够自觉地把“上情”与“下情”紧密地结合起来，善于把党中央或上级的指示和本地区、本单位、本部门的具体情况相结合，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创造性地、正确地执行党中央和上级的指示，就能在领导工作中有所作为，把各项工作做得有声有色。

二、坚持领导和群众相结合，必须反对不正之风

坚持领导和群众相结合，实现领导和群众的最佳结合，必须坚决反对和纠正在某些领导干部中存在的不正之风。因为，不正之风是一种严重的腐蚀剂，它损害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损害党和社会主义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和声誉，它的最大危害是脱离人民群众。如果领导者脱离了群众还不坚决纠正，怎么谈得上同群众相结合呢？

当前，在少数干部中存在的不正之风有种种表现，诸如以权谋私、索贿受贿、走后门、拉关系、铺张浪费、请客送礼、吹吹拍拍、空话连篇不办实事，等等。但影响最坏、群众意见最大的是以权谋私的问题。就是有些领导干部和工作人员，根本忘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他们利用党和人民给予的权力和工作条件之便，千方百计为自己或亲属谋取私利和特权，甚至徇私枉法。对少数干部中滋长着的这种腐败现象，广大人民群众对之深恶痛绝。对此，除加强思想教育外，还必须按照党纪、政纪和国法，认真加以查处，决不可宽容姑息。

纠正不正之风，要从党内抓起，从党员领导干部抓起，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作出表率。事实告诉我们，一个地区、一个部门的风气好坏，同领导者能否以身作则密切相关。在那些领导干部以身作则的地方和单位，即使过去的风气很不好，也能在不长的时间内改变面貌，一旦出现了新的不正之风，也能及时纠正；而在那些歪风邪气大量存在，又长期得不到纠正的地方和单位，则往往同那里的领导者没有带好头有关。为了卓

有成效地纠正各种不正之风，很有必要突出地提出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以身作则的问题。邓小平同志指出，端正党风，是端正社会风气的关键，每个党员干部都能以身作则，我们的一切事情就好办了。

三、坚持领导和群众相结合，必须反对官僚主义

坚持领导和群众相结合，实现领导和群众的最佳结合，必须反对和消除官僚主义。官僚主义作风是剥削阶级思想和旧社会衙门作风的一种反映，是旧社会遗留给新社会的一种祸害，它的基本特征就是脱离实际、脱离群众。沾染上官僚主义作风的人，不是把人民给予的权力去为人民服务、不是把自己看成是人民的“公仆”，而是把自己看成是人民的主人，高居于人民群众之上，当官做老爷。在工作中，他们不是按照群众路线去办事，而是背弃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的方法。他们不深入实际，不作调查研究，不了解下情，对实际情况若明若暗；他们不关心群众的疾苦，不倾听群众的呼声，不了解群众的真正意见、要求、思想和感情；他们只有一般号召，不作具体指导，不作检查，也不认真总结群众实践的经验，因此不可能正确集中群众的经验和意见，也无从知道自己的所谓“指示”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不正确的。他们习惯于高高在上和发号施令，或以个人感想代替党的政策，或凭主观的好恶和想像代替客观实际，有时表现为右倾保守，思想落后于实际；有时表现为急躁冒进，强迫命令。有的严重的官僚主义领导，对党对人民的事业极端不负责任，玩忽职守、失职渎职，给党和国家造成巨大的损失。显然，官僚主义的领导窒息社会主义民主，挫伤和压抑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创造性和主动性。不克服官僚主义，势必从根本上破坏党和群众的关系、领导和群众的关系，导致人民政权不应当出现的某种腐败现象，这对改革、开放，对“四化”建设的危害极大。

毛泽东说：“官僚主义的领导方式，是任何革命工作所不应有的，经济建设工作同样来不得官僚主义。要把官僚主义方式这个坏家伙抛到粪缸里去。”^①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一再告诫我们要警惕和防止官僚主义。在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也反复强调要反对和消除官僚主义。邓小平同志1980年8月18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讲话中，深刻揭露和批判了官僚主义的表现及其危害，指出：“官僚主义现象是我们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广泛存在的一个大问题。它的主要表现和危害是：高高在上，滥用权力，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好摆门面，好说空话，思想僵化，墨守陈规，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办事拖拉，不讲效率，不负责任，不守信用，公文旅行，互相推诿，以至官气十足，动辄训人，打击报复，压制民主，欺上瞒下，专横跋扈，徇私行贿，贪赃枉法，等等。”^②这是对官僚主义者绝妙的画像。官僚主义是群众路线的死敌，是我们社会主义事业的大敌。我们要真正贯彻群众路线，实现领导和群众的最佳结合，加快改革、开放和四化建设前进的步伐，就必须坚决反对和消除官僚主义的恶劣作风。对于严重失职的官僚主义者，“要给以必要的处分，直至撤职和开除党籍。”^③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10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287页。

③ 《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党员必读》第8页。

第十一章

党的建设的辩证法

无产阶级政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为指导建立和发展起来的。恩格斯曾说：“我们党有个很大的优点，就是有一个新的科学的世界观作为理论的基础”。^①这个新的科学世界观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以这个科学世界观来指导无产阶级政党的建设，阐明党的自身建设的矛盾和问题，揭示它的成长和发展的辩证法，就是无产阶级的建党学说。邓小平在谈到毛泽东思想中的建党学说时指出：“在这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讲得不多，列宁有个完整的建党学说。……把列宁的建党学说发展得最完备的是毛泽东同志”。^②接着，他概括地叙述了毛泽东建党学说的历史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完整的建党理论，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它进行认真学习和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一节 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

毛泽东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建党理论，吸取列宁的建党学说和经验，联系中国的实际，在延安时期形成了完整的建党学说。邓小平指出：“毛泽东同志对于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党，党的指导思想思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18页。

②《邓小平文选》第41页。

想是什么，党的作风是什么，都有完整的一套”。^①而贯串于这个学说始终的，就是要正确处理好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的矛盾。

一、党的思想建设

党的思想建设，就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党，改造和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坚持用共产主义思想体系教育党员。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以新的科学的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为自身建设的理论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在谈到保持无产阶级政党的纯洁性时，曾明确指出，如果其他阶级的人入党，“首先就要求他们不要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等等的偏见的任何残余带进来，而要无条件地掌握无产阶级世界观”。^②列宁则指出：“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③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从我党的实际情况出发，不仅特别重视党的思想建设，而且正确解决了党的思想建设的基本内容和基本方法，形成了具有我党特色的党的思想建设理论。

毛泽东认为，党的思想建设的基本内容，就是在全党进行普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加强无产阶级思想，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早在党的创立时期，毛泽东就明确指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④后来，他又说：“在担负主要领导责任观点上说，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⑤毛泽东本人就是系统地掌握马克思

①《邓小平文选》第41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73—374页。

③《列宁选集》第1卷，第242页。

④《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5页。

⑤《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第287页。

列宁主义理论，并把它同中国革命实践密切结合的伟大典范。

毛泽东还认为，改造党内小资产阶级思想，是我党自身建设的中心环节。在党的“七大”报告中，他指出：“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① 进行思想教育，改造党内非无产阶级思想，必须反对和纠正党内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1942年，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的演说中指出：“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这就是我们的任务”。^②

为了掌握党的思想教育这个中心环节，基于对党的思想状况的科学分析，毛泽东提出了共产党员首先要在思想上入党。这是把党的思想建设放在首要地位的具体体现。所谓思想上入党，就是一个共产党员，要自觉地树立为中国革命，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人生观；要真正从思想上确立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自觉地反对和排除一切非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要树立坚强的党性观念，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用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锻炼自己，改造自己。不这样，就不能充当革命和建设的领导者，也不能算是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为此，毛泽东又具体要求每一个党员都要学习白求恩“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共产主义精神，学习张思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学习鲁迅的榜样，做人民大众的“牛”，为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二、党的组织建设

党的组织建设，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组织原则和制度，把党建设成为一个能够保证完成党的历史使命的团结统一的战斗集

①《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95页。

②《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488页。

体。具体说来,就是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解决好党的组织的纯洁性与群众性、民主与集中、自由与纪律、个人与组织、领导与群众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干部的培养和选拔等问题。

毛泽东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指出中国是一个小资产阶级成份极其广大的国家,工业无产阶级不多,“为了克服困难,战胜敌人,建设新中国,共产党必须扩大自己的组织,向着真诚革命、信仰党的主义、拥护党的政策、并愿意服从纪律、努力工作的广大工人农民和青年积极分子开门,使党成为一个伟大的群众性的党”。^①十月革命以后,马列主义在世界广泛传播,不但无产阶级日益觉醒,而且大批小资产阶级分子接受马列主义,向无产阶级靠拢,愿意放弃其原有立场,要求加入无产阶级政党。中国也是这样。因此,毛泽东提出大胆发展党的组织的方针,注意吸收逐渐无产阶级化的非无产阶级出身的人入党,使党成为一个伟大的群众性的党。同时,毛泽东又强调保持党的无产阶级纯洁性。他指出:“必须采取谨慎地发展党的组织的方针,必须坚决地阻止投机分子入党,妥善地洗刷投机分子出党。必须注意有步骤地吸收觉悟工人入党,扩大党的组织的工人成份”。^②在党的组织发展问题上,“大胆发展”和“谨慎发展”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二者不可偏废,否则就是党的组织建设中的形而上学。毛泽东把这两个方面紧密地结合起来,保证了党的组织的群众性和纯洁性。

无产阶级政党不是许多党员简单的数量的总和,也不是各级地方组织的松散的联合会,而是全体党员按一定的原则组织起来的统一的有机体,是党的领导者和被领导者的结合体,是党的首脑(中央)、党的各级组织和广大党员群众的统一体。党员数量的结合不是党的组织,还必须按民主集中制组织起来,才能成为党

①《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第276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0页。

的组织。有了这种组织就会产生新的力量。无产阶级的力量就在于组织。历史证明，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党在组织上就发展，就统一；违背了这个原则，党的组织就受到损失。

党的民主集中制，包括民主和集中两个方面。它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是二者的辩证统一。党内民主，就是党员有管理党的事务和发表意见的权利。党内集中，就是党员的意志和行动的一致。毛泽东说：“民主对集中而言，自由对纪律而言。这些都是一个统一体的两个矛盾着的侧面，它们是矛盾的，又是统一的，我们不应当片面地强调某一个侧面而否定另一个侧面。”^①这就是说，民主是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没有绝对的民主；集中是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没有绝对的集中。这种民主集中制，集中反映了党内各种关系：党的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的关系；党的上级组织与下级组织的关系；党员个人与党的组织的关系等。因此，民主集中制并不是民主制和集中制的任意结合，而是无产阶级政党特有的民主精神和集中精神的有机结合和高度升华。在党内，民主和集中是互为前提，互相促进的。只强调民主，反对集中，只要个人自由，不要组织纪律；或者离开民主只讲集中，搞家长制、一言堂，个人说了算，领导者独断专行，都是对民主集中制的践踏。

贯彻党的民主集中制，一方面要在党内实行高度民主，最充分地发挥广大干部、党员的革命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另一方面，每个党员个人都要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少数服从多数，全党服从中央。全党都要坚持这“四个服从”，在政治思想上同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在新的历史时期，为了进一步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保证党内政治生活正常化，党中央又作了许多新的规定，如要求进一步确立民主集中制的观点，实行集体领导和个人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62页。

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强调在党的纪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有任何超越党纪之外的特殊党员；等等。这一切既使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实行得到比过去更为严格的保证，又是对党的民主集中制的丰富和发展。

干部问题，是党的组织建设的重要问题之一。干部队伍的状况如何，对于党的自身建设以及革命事业的发展，关系极大。毛泽东历来强调，党的干部路线是“任人唯贤”，反对“任人唯亲”。选拔和使用干部，基本条件是德才兼备。他还十分重视新干部的培养，认为我们党如果没有广大的新干部同老干部一致合作，我们的事业就会中断，轻视新干部的培养工作是不正确的。他还认为，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我们党迫切需要一支又红又专、精力充沛的宏大的干部队伍。邓小平也指出：“要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前提下，使我们的干部队伍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并且要逐步制定完善的干部制度来加以保证。”^①不然，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就会变成一句空话。

三、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的关系

毛泽东运用对立统一原理，阐述了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的相互关系，指出党的思想建设是基础，组织建设是保证，只有思想上一致，才能有组织上的统一。他说：“我们的党，我们的队伍，虽然其中的大部分是纯洁的，但是为要领导革命运动更好地发展，更快地完成，就必须从思想上组织上认真地整顿一番。而为要从组织上整顿，首先需要在思想上整顿，需要展开一个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②

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是建设一个集中统一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两个重要方面。这两个方面虽然各有自己的侧重点，但是它

① 《邓小平文选》第286页。

②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553页。

们是互相联系、互相促进，不可偏废的，在这两个方面中，思想建设占主要地位，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毛泽东特别强调思想建设对组织建设的重大作用。只有加强党的思想建设，从思想上整顿党，才能达到全党在马列主义基础上的真正的团结和统一，使我们党更加巩固和发展。党的思想建设，无论对于整个党的组织，还是对于每个党员来说，都是根本性的、头等重要的，是一项基本的、长期的任务。

毛泽东也十分重视党的组织建设的作用。他说：“红军所以艰苦奋斗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的原因。”^①有了正确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之后，就需要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没有正确的组织路线和德才兼备的干部队伍，再好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也是不能实现的。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组织路线是保证政治路线贯彻落实的。”“中国的稳定，四个现代化的实现，要有正确的组织路线保证，要有真正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性强的人来接班才能保证。”^②总之，加强党的组织建设，认真整顿党的组织，是加强党的思想建设，提高党员的马列主义水平，增强党的战斗力的保证。

党的发展史表明，在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的关系中，首先要着重注意思想上建党，同时注意组织上建党的方针，才能把党建设成为坚强的纯洁的无产阶级政党。这正确反映了党的建设中的客观辩证法。

第二节 党内团结和党内斗争

无产阶级政党要保持坚强的战斗力，就必须保证党内团结，这种团结不仅是指纲领上和策略上的一致，而且是指组织上的纯洁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64—65页。

②《邓小平文选》第178页。

统一。党的团结统一是党的生命，是夺取革命和建设事业胜利的根本保证。但是，党的团结是有原则的，它必须是也只能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团结，而这种团结也必须通过正确的党内斗争才能获得。

一、党内团结和党内斗争的辩证统一

党内团结和党内斗争是党内政治生活中两个相反相成的方面，二者是辩证统一的。党内团结是开展党内斗争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而党内斗争是实现党内团结的手段和途径。这是无产阶级政党自身建设和发展的辩证法。

党内团结问题历来是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十分重视的一个问题。马克思曾指出：“国际的一个基本原则——团结。如果我们能够在一切国家的一切工人中间牢牢地巩固这个富有生气的原则，我们就一定会达到我们所向往的伟大目标。”^①列宁也认为，“保持党的统一和实现无产阶级先锋队意志的统一，是保证无产阶级专政胜利的基本条件。”^②

我们党历来教育全党要加强团结，一种是党内的团结，一种是党和人民的团结，这是战胜艰难环境的无价之宝，其中又特别强调党内团结，把党的团结看作是夺取革命胜利的“最基本的条件”和“最重要的基础”，是党的生命。毛泽东指出：“只有经过共产党的团结，才能达到全阶级和全民族的团结，只有经过全阶级全民族的团结，才能战胜敌人，完成民族和民主革命的任务。”^③

党的团结所以是革命事业胜利的基本保证，这是因为，其一，无产阶级政党是无产阶级事业的领导核心，只有这个核心是团结的，才可以由此达到全阶级全民族的团结，组成浩浩荡荡的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180页。

②《列宁选集》第4卷，第479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56页。

革命大军去战胜敌人。其二，党的团结是执行党的正确路线的保证。党的领导是否正确，关键看它实行什么样的路线。当党的正确路线确定以后，在付诸实施的时候，只有几个领袖人物的实践是不行的，必须动员全党的力量共同奋斗。只有党自身是团结的，才会有统一的意志，统一的行动。如果党内派别林立，四分五裂，很难设想能真正的贯彻党的路线。其三，无产阶级政党在领导革命斗争的征途中，总会遇到极其尖锐的斗争和异常复杂的环境。只有党是团结统一的，才会增强党的战斗力，才能防止敌人企图分裂、瓦解革命队伍。所以，对于无产阶级政党来说，团结就是生命，就是力量，就是胜利。

然而，我们讲党内团结，不是无原则的团结，而是有原则的团结，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团结，并且认为，党内斗争是实现党内团结的手段和途径。毛泽东深刻指出：“我们主张积极的思想斗争，因为它是达到党内和革命团体内的团结使之利于战斗的武器。”^①在这里，毛泽东阐明了党内斗争是解决党内矛盾达到团结的一个重要手段。而讲团结，也就意味着有不团结的因素存在。不克服这些不团结的因素，就达不到团结的目的。我们不能在错误的基础上讲团结。毛泽东说：“按照辩证唯物论，思想必须反映客观实际，并且在客观实践中得到检验，证明是真理，这才算是真理，不然就不算。”^②刘少奇也说：“要去克服别人不正确的原则，要去转变别人的思想，……需要经过艰苦的说服教育工作与各种复杂的斗争，经过相当长时期的教育与斗争及革命实践，才能够得到的。”^③这就是说，讲团结就是要服从真理，修正错误。恩格斯说得好：“看来大国的任何工人政党，只有在内部斗争中才能发展起来，这是符合一般辩证发展规律的。”^④这是加强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第180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97页。

③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194—195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32页。

无产阶级政党建设所必需的。

为了形成党内有原则的团结，毛泽东一方面指出，共产党人在工作中有缺点错误，应当不怕自我批评，有缺点就公开讲出是缺点，有错误就公开讲出是错误，一经纠正之后，缺点就不再是缺点，错误也就变成正确的了；另一方面，他又提倡在同志之间开展批评，主张思想要交锋，批评要尖锐，思想斗争要中肯。他要求批评错误要不讲情面，不怕得罪人，不要把棱角磨掉。他曾经说：“牛为什么要长两只角呢？牛之所以长两只角，是因为要斗争，一为防御，二为进攻。”“我看还是长两只‘角’好，因为这是合乎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有一条，叫做批评和自我批评。”^①这个比喻是风趣的、生动的。

但是党内的批评也不应该离开党内的团结，党内团结是开展党内斗争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毛泽东认为，党内斗争是手段，不是目的。它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党内团结，并通过这种团结去战胜任何困难，去夺取革命和建设的胜利。为此，毛泽东强调指出：“如果在主观上没有团结的愿望，一斗势必把事情斗乱，不可收拾，那还不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那还有什么党的团结？”^②刘少奇也指出：“一切过火的批评，夸大人家的错误，滥给别人戴大帽子，都是不对的。党内斗争不是斗得愈厉害愈好，而应有适当限度，应讲求适当，‘过’与‘不及’都是要不得的”。^③毛泽东在强调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同时，总是反复指出，批评和自我批评都要实事求是。他指出，批评应该是严正的、尖锐的，但又应该是诚恳的、坦白的、与人为善的；党内批评要防止主观武断和批评庸俗化，说话要有证据，批评要注意政治，要及时的批评，不要老是爱好事后的批评，等等。这些对增强党内团结都是十分重要的。

①②《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56、369页。

③《刘少奇选集》上卷，第211—212页。

为了正确地进行党内斗争，以毛泽东为杰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总结了我党长期斗争的历史经验，尤其鉴于王明机会主义者在党内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错误作法所造成的恶果，并根据党内矛盾的特殊性，明确提出了用团结的方法、辩证的方法解决党内矛盾的方针。这就是著名的“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这就是党内团结和党内斗争的辩证统一，是党内矛盾运动的辩证发展规律。

二、开展两条战线斗争，防止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

在处理党内矛盾，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和错误倾向时，必须以唯物辩证法为指导，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注意反对“左”右两种错误倾向。什么叫“倾向”？这是在评价党的方针政策时，所使用的一个特殊概念。它是指在某个时期或某类问题上，对于党的正确的方针政策的偏离而言。这种偏离不是局部的、偶然的，而是带有全局性的、必然性的东西。

党内常常发生“左”和右的两种错误倾向。对于什么是“左”，什么是右，毛泽东曾经指出：“什么叫‘左’？超过时代，超过当前的情况，在方针政策上、在行动上冒进，在斗争的问题上、在发生争论的问题上乱斗，这是‘左’，这个不好。落在时代的后面，落在当前情况的后面，缺乏斗争性，这是右，这个也不好。……我们要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既反对‘左’，也反对右。”^①

早在30年代中期，毛泽东在总结中国革命成功与失败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明确指出，一方面要同“左”倾机会主义作斗争，另一方面又要同右倾机会主义作斗争。指出，“不同这些危害革命和革命战争的有害倾向作斗争，并且彻底地克服它们，正确

^①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52页。

路线的建设和革命战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①刘少奇也说：“必须向这两方面斗争，才能保持我们党的无产阶级性质。如果不这样，如果只进行单方面的斗争，如果我们疏忽对任何一方面的警戒与斗争，非无产阶级思想就可以、而且一定从我们疏忽的一方面来进攻党，那就不能保持党的纯洁与独立，不能巩固党。”^②在党内团结和斗争问题上，“左”的倾向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右的倾向是“一潭死水，一团和气”，这都要不得。它们的错误就在于：一个是离开团结讲斗争，一个是离开斗争讲团结，都走了极端。而它们所讲的斗争和团结，都不是马克思主义所讲的斗争和团结，搞的都是唯心主义形而上学，是同辩证法背道而驰的。

在反对党内错误倾向的斗争中，毛泽东还提出了一个合乎辩证法的新思想，就是一种倾向常常掩盖着另一种倾向。他认为，在反倾向的斗争中，首先要善于捕捉主要的错误倾向。但主要错误倾向不应当抽象地去规定，而应当依据具体条件的变化进行具体分析。这种具体条件包括阶级斗争形势的变化、反对错误倾向的历史，也包括革命的深入程度、群众所受锻炼的多少等等。例如，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毛泽东说：“关于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在芦沟桥事变以前，党内的主要危险倾向是‘左’倾机会主义，即关门主义。这主要是因为国民党还没有抗日的缘故”。“在芦沟桥事变以后，党内主要危险倾向，已经不是‘左’倾关门主义，而转变到右倾机会主义，即投降主义方面了。这主要是因为国民党已经抗日了的缘故。”^③关于解放战争时期的土地改革运动，毛泽东则说：“土地改革在群众尚未认真发动和尚未展开斗争的地方，必须反对右倾；在群众已经认真发动和已经展开斗争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70页。

②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180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361页。

的地方，必须防止‘左’倾”。^① 关于军队打仗，毛泽东又说：“军队在打胜仗的时候，必须防止‘左’倾；在打败仗或者未能多打胜仗的时候，必须防止右倾”。^② 等等。

总之，在反倾向斗争中，必须善于观察事物变化发展的复杂情况，及时掌握事物存在和发展过程中的各种倾向，敏锐地及时地抓住主要倾向，从实际出发，有“左”反“左”，有右反右，万万不可不看时机、条件、重点，而去盲目瞎干。毛泽东指出：“反对党内‘左’右倾向，必须依据具体情况决定方针”。^③ 邓小平在《关于反对错误思想倾向问题》的谈话中指出：“解放思想，也是既要反‘左’，又要反右。三中全会提出解放思想，是针对‘两个凡是’的，重点是纠正‘左’的错误。后来又出现右的倾向，那当然也要纠正”。^④ 这就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辩证法。

毛泽东不仅强调要善于抓住主要倾向，而且还运用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相互转化的原理，强调在反对主要倾向的同时，要注意防止可能发生的另一种错误倾向。他说，反对陈独秀的“一切联合，否认斗争”的右倾投降机会主义，掩盖了王明的“一切斗争，否认联合”的“左”倾机会主义。纠正了王明的“左”倾，又掩盖了王明的右倾。他总结了我党几十年的发展史，指出，在反对右倾的时候，有可能出现“左”倾；在反对“左”倾的时候，有可能出现右倾。实践表明，反右容易出“左”，反“左”容易出右。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这是带规律性的现象。因此，在反倾向的斗争中，一定要注意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反右防“左”，反“左”防右。这是我们党在反对错误倾向斗争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经验，是唯物辩证法在党内团结和斗争问题上的具体体现。

①②③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63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334页。

三、对犯错误的同志应采取分析态度

要正确处理党内团结和党内斗争的关系，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看待党内同志犯错误和如何同犯错误的同志搞好团结的问题。我们党运用唯物辩证法的两点论、两分法，科学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下，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我们党找到了正确处理党内矛盾的方法和途径，这就是“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从而使全党在马列主义基础上达到了空前的团结，使党的思想进一步无产阶级化。延安整风以后，我们党又多次自觉地运用延安整风精神，解决党内矛盾，进行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使党进一步迅速而又健康地得到发展，成为伟大的无产阶级政党，成为全国人民坚强的领导核心。可以说，这是唯物辩证法光辉胜利的篇章。

历史的经验表明，无论是一个政党或者一个人，错误总是难免的。因为世界上的事情是复杂的，矛盾是多种多样的，仅仅就缺乏经验这一点，就难免要犯错误，更不要说其他复杂的原因了。列宁说：“只有什么事情也不干的人，才不会犯错误”^①。毛泽东也认为，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即使圣贤，也还有过嘛！他说：“任何政党，任何个人，错误总是难免的”。^②事实正是这样，在我们党内没有一贯正确、从不犯错误的党员和干部，包括党的领袖人物在内。

既然错误是难免的，且又往往是在某些问题上发生的，因此，对错误就要采取分析的态度。只见错误，不见正确，或只见正确，不见错误，都是形而上学的“一点论”。对错误和正确采取折衷主义的态度，同样是形而上学的。因此，当有的同志犯了错误，我

①《列宁选集》第4卷，第609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69页。

们在指出他的错误的同时，也应指出他的优点和长处，帮助他振奋起来，勇于改正错误；而当有的同志取得一定的成就，自以为了不得，头脑发热时，除肯定其成绩外，也要指出其存在的不足之处，甚至某些缺点和错误，以及这些错误将会带来的危害，使他保持清醒的头脑。这就是有重点的两点论，才是合乎辩证法的。

毛泽东在《学习与时局》中，总结了党内开展斗争的经验教训，着重指出：“对于任何问题应取分析态度，不要否定一切”^①。他说：“我们许多同志缺乏分析的头脑，对于复杂事物，不愿作反复深入的分析研究，而爱作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的简单结论”。^②指出今后应该改变这种状况。在他看来，骄傲往往是犯错误的先导。他以我们党的历史为例，指出：“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③他列举了1927年上半年、1930年、1931年、和1938年曾经四次由于大的骄傲，自以为了不得，犯了胜利时骄傲的错误，使革命遭到巨大损失以至失败，其思想根源，都是肯定一切，成为自己的思想包袱。但是，犯了错误则容易否定一切。鉴于历次错误路线占统治地位时期，从否定别人一切，到最后否定自己的严重教训，所以，毛泽东重申，对于任何问题应取分析态度，学会分析事物的方法，养成分析的习惯，不可由于某人犯错误，就否定他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

毛泽东认为，为了彻底了解我党历史经验，避免重犯错误，同时为了能够团结一切同志，共同工作，因此，过去对于错误路线的斗争是完全应该的。但其方法有缺点：一是，没有使干部在思想上彻底了解当时错误的原因、环境和改正错误的办法，以致后来又可能重犯同类性质的错误；二是，太着重了个人的责任，未能团结更多的人共同工作。毛泽东着重指出，对于历史问题的

①②③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574、575、584页。

处理，“不应着重于一些个别同志的责任方面，而应该着重于当时环境的分析，当时错误的内容，当时错误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借以达到既弄清思想又团结同志这样两个目的”。^①

总之，对犯错误的同志取分析态度，就是“一只手跟他作斗争，一只手跟他讲团结。斗争的目的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原则，这叫原则性，这是一只手。另一只手讲团结，团结的目的是给他一条出路，跟他讲妥协，这叫做灵活性。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这是一种对立面的统一”。^③这种唯物辩证法的两点论方法，对于我们今天仍有指导意义。

第三节 党内矛盾的根源和实质

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但它并不是生活在真空中，它也是一个社会，一个充满着矛盾斗争的统一体。毛泽东指出：“党内不同思想的对立和斗争是经常发生的，这是社会的阶级矛盾和旧事物的矛盾在党内的反映”。^④这是对党内矛盾产生的原因和性质所作的原则的、科学的规定。

一、党内矛盾的根源

为什么党内不同思想的对立和斗争是经常发生的呢？这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

我们党从中国的具体情况出发，对这一问题作了具体分析。指出，由于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小资产阶级极其广大的国家，但是，在中国不能有强大的小资产阶级政党，因此，就有

①②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574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98页。

④ 《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第145页。

大批的小资产阶级革命民主分子向无产阶级队伍寻求出路，使党内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分子占了大多数。此外，即使工人群众和工人党员，在中国的经济条件下，也容易染有小资产阶级的色彩^①。这些人由于思想上还没有入党或没有完全入党，所以他们往往以自己的本来面貌改造党，使党和人民的事业蒙受损失。在我党历史上多次发生的反对“左”右倾错误的斗争，就是小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矛盾斗争的反映。

毛泽东历来认为，中共党内发生的矛盾和斗争，主要来自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部分来自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他在1929年起草的“关于古田会议的决议”，1945年主持起草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及1956年党的八大预备会议上所作的《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的讲话中，都指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是党内错误思想和错误倾向的社会根源。建国前夕，他根据国内主要矛盾将要发生变化的情况，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中，曾告诫全党同志要警惕人们用糖衣炮弹的攻击，指出：“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②。提出“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③1953年8月，他在《反对党内的资产阶级思想》为题的讲话中，进一步提出了要在党内开展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问题。在1956年底至1957年初，鉴于党内资产阶级思想的滋长，他又指出：“现在有些干部争名夺利，唯利是图”。“他们不是比艰苦，比多做工作少得享受，而是比阔气，比级别，比地位。这类思想在党内现在有很大的发展，值得我们注意”。^④

① 参见《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43页。

②③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28—1329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30—331页。

毛泽东在强调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党内的思想影响的同时，也指出过封建思想的影响。早在1945年4月，他就指出，党内存在着无产阶级思想和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矛盾，在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中包括着地主阶级的思想影响。^①

党内矛盾，除了社会根源外，还有思想认识上的根源。主要表现为，主观和客观、认识和实践的矛盾，这是任何人都会遇到而无法回避的矛盾。在共产党人中，由于社会出身、教育程度、工作经历、理论水平、实践经验的差异，自然会形成不同的思想方法，对事物产生不同的认识，表现出不同的思想倾向等等。在实践中解决主观与客观矛盾时，存在着两种可能性，一是正确，一是错误。所谓正确，就是“主观与客观相适合”^②，所谓错误，就是“主观跟客观实际不相符合”。^③在对客观事物的反映中，历来就存在着先进与落后、革新与守旧、比较正确与比较不正确之间的矛盾。毛泽东认为，在思想方法方面，实事求是和主观主义是相对立的。主观主义的错误，不仅现在有，将来还会有，即使一万年以后还会有。而主观主义是实际工作中的唯心主义，是人们犯错误的思想根源。这说明，党内矛盾和斗争是难免的，不足为怪的。

值得指出的是，在如何看待党内矛盾根源问题上，曾盛行过一种观点，即认为党内矛盾都是社会阶级斗争的反映。这种观点，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实践上是有害的。因为，它完全背离了唯物论，背离了辩证法。

对于无产阶级政党内部的矛盾斗争，包括某些重大的原则争论。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曾作过许多精辟的分析，其中包括阶级斗争方面的原因。特别是列宁，对当时各国党内的机会主义思潮，既分析了它产生的时代背景、认识原因，也分析了它产生的阶级

^①参见《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56页。

^{②③}《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95、297页。

根源。但是，无论是马克思、恩格斯，还是列宁，都没有把党内矛盾进行阶级分析的方法普遍化，并不认为党内思想分歧都是阶级斗争的反映。斯大林曾经把无产阶级政党内部矛盾的根源归结为两种情况：其一，是在阶级斗争的环境中，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思想对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使用压力；其二，是工人阶级的庞杂性，工人阶级内部存在着各种阶层。^①他曾说：“我们党的队伍里的种种脱离列宁路线的倾向，也就是垂死阶级反抗的反映”。^②斯大林的这一说法，显然把党内矛盾的阶级分析普遍化、绝对化，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

斯大林的这种错误观点曾经直接影响到我们的党。“党内斗争是党外阶级斗争的反映”，曾成为从理论上说明党内斗争的一种流行的公式。不过，民主革命时期，遵义会议前后的情况有所不同。在王明“左”倾路线统治党的领导机关时，不仅在理论上完全接受了这个观点，而且在党内斗争的实践中机械地搬用苏联党的做法。对党内不同意见的分歧，轻率地看成是“敌人在共产党内的政治影响”，“不自觉地执行敌人在共产党内部的政治奸细作用”（王明语）。并且在党内斗争中，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这种做法对我们党造成了极大的损害。在遵义会议以后，在毛泽东领导下，我们党总结了“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斗争中的经验教训，在以后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我们党在处理党内矛盾时，总是按照“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去进行，并没有一概把党内矛盾看作是“阶级斗争的反映”，没有把问题简单化。然而，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特别是1959年以后，毛泽东由于对国内的阶级斗争和党内斗争问题的错误估量，在党内矛盾的认识和处理上日益走向错误的方向，日益把“党内矛盾是社会阶级斗争的反映”的观点绝对化。曾错误地认为党内斗争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

① 参见《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10—11页。

② 《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307页。

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并提出了所谓“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毫无根据地断言：“资产阶级就在党内”，党内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因而，错误地发动了“文化大革命”，造成了十年内乱，使党和国家遭到了严重的损失。

诚然，应当看到，党内的思想分歧，党内的矛盾斗争，是一种十分复杂的社会现象，必须进行具体分析。在存在着阶级斗争的条件下，党内的有些思想分歧、有些矛盾和斗争，是同社会上的阶级斗争有比较直接的联系，这确实是社会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我们不应否认这种情况。但是还应当看到，这只是党内矛盾的一部分情况。大量的党内矛盾和斗争，是属于根本目标、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思想认识上的矛盾。而且即使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也不是阶级斗争本身，它根本不同于社会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而在社会主义阶段，在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不存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为中心任务的条件下，应当说，党内意见分歧更多的是在建设问题上的认识和处理方法上的分歧。所以，对于党内矛盾和思想分歧，要作谨慎的分析，区分不同的情况正确地加以处理，切忌把问题简单化。

二、党内矛盾的实质

毛泽东曾经指出，党内在大量干部中存在的矛盾是：“党内无产阶级思想和非无产阶级思想（其中有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甚至地主阶级的思想，而主要是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之间的矛盾，即马克思主义思想和非马克思主义思想之间的矛盾”。^①这就揭示了党内矛盾的实质。这里所说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不是指书本上的词句，而是指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只有这样的马克思主

^①《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08页。

义，才能成为党和人民百战百胜的强大的思想武器，才是无产阶级思想之根本。刘少奇也指出：“在我们党内，最本质的矛盾，就是无产阶级思想和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矛盾，其中最主要的是无产阶级思想与农民、小资产阶级思想的矛盾”。^① 党内所发生的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原则分歧，都是党内矛盾的表现。这些矛盾的实质，基本上都是思想斗争。党内所开展的各种斗争，归根到底，就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对非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斗争。

为什么说党内斗争基本是一种思想斗争呢？第一，党内斗争的客观实际情况表明，党内经常发生的矛盾和斗争，一般都是同志间在为共产主义共同奋斗的过程中产生的思想认识上的分歧和矛盾，而不是根本利害的冲突。它们表现为正确与错误、先进与落后，无产阶级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之间的矛盾和斗争。这些都属于思想认识问题，是党内矛盾斗争的主要内容。第二，从思想分歧和政治分歧的关系来看，同志之间的思想上的矛盾和斗争，有时会发展到政治上的分歧，在某些情形下甚至发展到党内组织上的分歧，但基本上仍然是正确与错误之间的矛盾斗争，归根到底是两种思想、两种世界观的斗争。这些矛盾乃是由于革命和建设事业本身的复杂性和党内成员所处的实际地位、实践经验、知识水平和认识方法等等不同所造成的。至于“文化大革命”，这是一场内乱，是在特定条件下的党内斗争。这场斗争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所利用，他们阴谋夺取最高权力。他们同党的矛盾，完全是另外一种性质的问题，它根本不是属于党内斗争的问题，而是一种敌我斗争问题。这种情况在党内是极少的，只是在特殊历史条件下才有可能发生。

当然，党内矛盾也同其他一切矛盾一样，不是凝固不变的，而是有条件的、可变的。在一定条件下，非对抗性矛盾可以转化

^①《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27页。

为对抗性矛盾。党内正确和错误的矛盾，在开始时，或在个别问题上，并不立刻表现为对抗的。但是，随着斗争的发展，这种矛盾就有可能发展为对抗。这在国际共运史上和我们党的发展史上都曾经发生过。因此，为了防止这种转化的发生，毛泽东曾经指出：必须具体研究各种矛盾斗争的情况，“党一方面必须对于错误思想进行严肃的斗争，另一方面又必须充分地给犯错误的同志留有自己觉悟的机会”。^①

至于那些混进党内的个别敌人和后来蜕化变质成了敌人的分子，他们同党的矛盾，是一种以党内形式出现的党外问题。因为这些人在其政治面目尚未暴露之前，还主要是以思想斗争的形式出现的；而当我们还未识别他们的时候，一般地说，也只能采取党内斗争的方式同他们进行斗争。但一旦确认其是阶级敌人，那么斗争性质就发生根本变化，就要按照敌我矛盾问题进行严肃处理，直至将他们清除出党。

总之，正确认识党内矛盾的根源和性质，是正确处理党内矛盾、巩固与发展党的团结统一的前提，也是我们革命和建设事业取得成功的基本保证。为此，我们要发扬党内团结和党内斗争的优良传统，把我们党建设得更好。

^①《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第177页。

第十二章

统一战线的辩证法

统一战线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各个不同历史阶段，为了实现自己的战略任务，同其他的阶级、阶层、党派、团体以及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结成的政治联盟。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集中了全党的智慧，出色地运用唯物辩证法来解决极其困难和复杂的问题，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革命同盟军问题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创立了统一战线的完整理论和策略原则，为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增添了新的光辉。

第一节 社会的主要矛盾与统一战线 中各种社会势力的相互关系

中国共产党运用矛盾学说，特别是关于主要矛盾的理论分析革命和建设各个时期的形势，规定了不同时期统一战线的任务和内部结构，正确处理了统一战线中各种社会势力的相互关系，取得了革命的成功。

一、社会主要矛盾决定着统一战线的任务和内部结构

我们从历史分析的角度来说明这个问题。

我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

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而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在这一矛盾中居首要地位，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最凶恶的敌人。这一主要矛盾就规定了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革命统一战线的基本任务，这就是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外争民族独立，内争人民民主，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建立独立、民主、自由的新中国。然而，由于近代中国是许多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统治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所以社会的主要矛盾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各个历史时期具体表现又不相同，统一战线的具体任务也不一样。例如，抗日战争时期，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具体表现为中华民族同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统一战线的任务是集中全力打击日本帝国主义，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而解放战争时期，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则具体表现为人民大众同美帝国主义及其支持下的国民党反动派的矛盾，统一战线的任务是打击美帝国主义及其支持下的国民党反动势力，解放全中国，建立人民民主的新国家。

因此，我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就规定着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统一战线的基本结构，这就是由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四个阶级组成革命统一战线。但是，由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各个历史时期社会主要矛盾的具体表现不同，因此统一战线内部的阶级结构也发生着某些变化。例如，抗日战争时期，主要矛盾具体表现为中华民族同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因此统一战线的内部结构，不仅包括了上述四个阶级，还包括了英美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另外，由于我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即一方面有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另一方面又有对革命敌人的妥协性，在特殊的情况下，民族资产阶级有可能暂时离开革命统一战线。例如，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民族资产阶级曾附合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转入了反革命营垒。但是，我

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规定了民族资产阶级不是民主革命的对象，因此，当它暂时转入反革命营垒，也绝不能把它列入革命对象，它仍然是工人阶级争取、联合、团结的对象。事实证明，只要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正确，民族资产阶级就一定会较快觉醒过来，重新进入革命统一战线。

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和土地改革在全国完成以后，我国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矛盾。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统一战线的主要任务是为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1956年底，我国基本完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标志着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这时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统一战线的主要任务就是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因为统一祖国的大业尚未完成，统一战线还担负着统一祖国的重任，故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统一战线的基本任务可简要地概括为“统一祖国，振兴中华”。

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规定了资产阶级已成为革命的对象。但由于我国特殊的国情，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除了具有对抗性的一面外，还有非对抗性的一面，这就有可能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和平改造，采取“赎买”政策，民族资产阶级仍然留在统一战线内。社会主义时期的统一战线，已经成为由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人们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组成的，包括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在内的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

既然社会的主要矛盾规定着统一战线的任务和内部结构，那么抓准社会的主要矛盾就非常重要，这是关系统一战线工作成败的大问题。我们党的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什么时候抓准了社会的主要矛盾，统一战线的任务就明确，统一

战线的内部阵线就分明，统一战线在革命和建设中的作用就得到充分发挥，如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相反，什么时候社会的主要矛盾搞错了，没有抓准，那么，统一战线的任务和方向就会搞错，统一战线的内部阵线就会造成人为的混乱，其范围就会缩小或夸大，统一战线工作就要遭受破坏，如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和“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取得的重大成就，其中突出的一点就是抓准了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从而正确地规定了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统一战线的任务和内部结构，使新时期的统一战线蓬勃发展。

二、一条战线，两种联盟

在我国统一战线中，长期来存在着两种联盟：一种是工人阶级同其他劳动人民的联盟，另一种是劳动者同非劳动者的联盟。两种联盟的相互关系是统一战线辩证法的重要内容。

两种联盟反映两种矛盾。第一种联盟主要包括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其中主要是工农联盟，城市小资产阶级也是工人阶级可靠的同盟军。这种联盟中劳动者阶级之间的矛盾，是在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非对抗性的矛盾。第二种联盟主要是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我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两面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它有革命性的一面，又有妥协性的一面，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它有剥削工人阶级取得利润的一面，又有拥护宪法、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①因此，工人阶级同它的矛盾，除了对抗性的一面外还有非对抗性的一面。这种联盟，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还包括劳动者同一部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结成的暂时联盟，二者之间的矛盾，也有非对抗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58——759页。

性的一面，但对抗性的一面是主要的。两种联盟反映的两种矛盾，其根本的区别就在于有没有对抗性的一面。

两种联盟是相辅相成的。第一种联盟是统一战线的基础和主体，在我国革命和建设起着主力军的作用。第二种联盟是统一战线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在革命和建设事业中起着重要的辅助作用。两种联盟是紧密联系的有机整体，互相依存，相辅相成。第一种联盟的巩固和壮大能够帮助民族资产阶级等中间势力看到出路和希望，从而支持工农等劳动大众，较积极、稳定地同工农等劳动大众合作。第二种联盟的巩固和扩大，使革命势力更加强大，敌人更加孤立，有利于第一种联盟的巩固和发展，有利于对敌斗争的胜利进行。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践充分证明，什么时候统一战线中的两种联盟合作得好，整个统一战线就巩固和发展，敌人就陷入孤立，革命斗争就胜利发展。反之，革命就必然遭受挫折和损失。

“一切矛盾都依一定条件向它们的反面转化着”^①，在一定条件下，统一战线内部的两种联盟也会相互转化。第二种联盟向第一种联盟的转化，是顺乎历史潮流的必然趋势。因为工人阶级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者，是最进步的阶级，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反映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工人阶级及其政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就是要积极创造条件实现这种转化。在我国，工人阶级及其政党为了实现这种转化，首先领导人民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然后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从我国的实际出发采取和平“赎买”的方式改造了民族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在我国大陆消灭了资产阶级。原来的民族资产阶级成员，绝大部分都改造成为社会主义劳动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使原来的第二种联盟转化为第一种联盟。第一种联盟向第二种联盟的转化，则是一种反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第171页。

常的转化。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必须努力防止这种反常的转化。

三、一个目标，民族团结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由56个民族组成。我国的统一战线，就民族而言，是多民族组成的统一战线，是多民族的多样性的矛盾统一。

我国的民族矛盾，包括汉族与各少数民族的矛盾，也包括各少数民族之间的矛盾，而主要是汉族与各少数民族的矛盾。民族矛盾，就是各个历史时期各民族之间的对立统一。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也是民族发展的基本规律。民族矛盾诸方面的统一性、一致性，使我国各民族能够结成和维护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它是中华民族团结的基础。而各民族的团结，又是整个中华民族前进的基本保证。正如毛泽东所说：“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① 因此，在各民族的对立统一体中，我们要强调统一性，即巩固和加强民族团结，这是我国各民族的同一目标。民族矛盾诸方面的相互排斥和斗争，就民族关系史上的具体事件而言，有的是积极的，有的是消极的，也有兼备消极和积极两个方面的。但是就民族发展的总体而言，它是各民族在中华民族这个统一体中互相比较，竞高争强，除旧布新，不断前进的动力。因此，我们应正确地处理民族矛盾，尽力使斗争性朝着有利于各民族发展的方向前进。

在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我国仍然存在着民族矛盾。其主要原因：1. 各民族之间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生活习惯等方面的差异仍然存在，由经济文化等发展不平衡所造成的事实上的不平等仍然存在。这是民族矛盾存在的根本原因。2. 旧社会统治阶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57页。

级所造成的民族隔阂的影响和民族主义残余仍然存在，以及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还会在民族问题上反映出来。因此，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在民族问题上的根本任务，就是要自觉运用民族发展的基本规律，正确处理民族矛盾，从而巩固和增强民族团结，尽量避免在民族问题上自发的或人为的破坏作用。为此，中国共产党制定了一系列正确处理民族矛盾的方针、政策。这主要是：1. 坚持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各民族共同繁荣。这是正确处理民族矛盾、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方针。民族平等是民族团结的前提，民族团结又是实现民族平等的保证。而坚持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的根本目的是实现各民族的共同繁荣。2. 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这是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它有利于实现各少数民族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和义务，有利于更好地发挥各少数民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创造性，有利于增强各民族的团结和共同繁荣。3. 加强民族团结的教育，坚持不懈地反对民族主义。在各民族的干部和群众中，大力宣传各民族相互依存、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宣传民族团结的重要性。在反对民族主义的斗争中，主要是反对大汉族主义，同时也要反对地方民族主义。此外，对国内极少数敌对分子和国际上的敌对势力，在民族问题上的破坏活动，要坚决予以打击。

宗教问题在少数民族中，是和民族问题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因此，我们在宗教问题上能否处理得当，对于国家安定和民族团结，对于发展国际交往和抵御国外敌对势力的渗透，对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

宗教信仰自由，是中国共产党同宗教界爱国人士建立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的前提。中国共产党必须认真贯彻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指出：“根据信教自由的原则，中国解放区容许各派宗教存在。不论是基督教、天主教、回教、佛教及其他宗教，只要教徒们遵守人民政府法律，人民政府就

给以保护。信教和不信教的各有他们的自由，不许加以强迫或歧视。”^① 建国后，“宗教信仰自由”载入国家根本大法——宪法。

政治目标的一致，是中国共产党同宗教界人士建立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毛泽东说：“共产党员可以和某些唯心论者甚至宗教徒建立在政治行动上的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但是决不能赞同他们的唯心论或宗教教义。”^②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大多数的宗教界人士，有爱国主义思想，在政治上有一定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因此在反帝反封建这个大的政治目标一致的基础上，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同宗教界爱国人士建立和发展了爱国统一战线。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宗教界爱国人士仍然热爱祖国，拥护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因此在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政治目标一致的基础上，工人阶级及其政党仍然同宗教界爱国人士保持并发展着爱国统一战线。在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广大教徒和宗教界爱国人士，对内拥护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祖国统一，对外反对霸权主义、帝国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在我国的爱国统一战线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宗教信仰自由和政治目标一致，体现了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同宗教界爱国人士的对立统一。思想上唯心论同唯物论是对立的，而政治目标则是统一的。思想上的对立、不一致是矛盾的次要方面，政治目标上的一致是矛盾的主要方面。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着事物的性质，因此政治目标上的一致就成为工人阶级及其政党有可能同宗教界爱国人士长期建立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的主要根据。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93页。

② 《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第398页。

四、一党领导，多党合作

我国的政党，除了中国共产党外，目前还有八个民主党派：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致公党、九三学社和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的关系也是一种对立统一关系，含有丰富的辩证哲理。

（一）统一与独立的辩证关系。

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的统一性，主要可归结为四个共同：1. 共同的政治纲领，当前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2. 共同的行动纲领，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和国家在不同时期的总任务，当前就是新时期的总任务。3. 共同管理国家，这主要表现在：各民主党派的代表同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在各级人民“政协”和“人大”中，共同协商和决定国家的大政方针；在各级人民政府中，担任各种职务的各民主党派成员和中国共产党党员，亲密合作。共同贯彻执行国家的大政方针和各项政策。4. 共同享有在国家宪法赋予的权利和义务范围内的政治自由、组织独立和法律上的平等地位，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和活动，处理自己的内部事务。这四个“共同”，使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结成了巩固的统一体，成为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亲密友党。

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除有共同点外，还有不少差别，这主要可归结为三个“不同”：1. 性质不同。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各民主党派现在都是各自所代表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为主体的政治联盟。2. 发展对象的条件和范围不同。中国共产党是以全国各民族、各界人民中的先进分子为发展党员的对象。各民主党派则是以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群众中的有代表性的中、上层人士为发展对象。3. 在革命和建设中所起的作用不同。中国共产党主要是起领导作用，

各民主党派主要是起“监督”作用。由于存在着这些差别，所以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都应保持自己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中国共产党尤其要保持自己鲜明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保持组织上的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性质。同时，中国共产党应切实尊重各民主党派的独立性，放手让各民主党派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充分发挥它们的积极性。

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的统一性和独立性，也是相辅相成的。共同性、统一性越是增强，就越能互相信任、互相尊重，充分发挥各自的积极作用。独立自主的作用发挥得越好，整个统一战线的事业就越是兴旺发达。所以，在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的相互关系上，既要维护统一性，又要保持独立性，二者不可偏废。

（二）领导与被领导的辩证统一。

中国共产党是统一战线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我国的统一战线只有坚持工人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能有统一的意志和行动，把革命和建设事业搞好。

然而，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既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又是亲密合作的友党关系。中国共产党对各民主党派的领导是政治领导，主要通过中国共产党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来实现。各民主党派在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过程中，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还发挥着积极的协助作用，体现了领导与被领导的辩证统一。这与欧美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两党制”或“多党制”根本不同，那些国家的“两党制”或“多党制”，“是资产阶级互相倾轧的竞争状态所决定的，它们谁也不能代表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①一般说来，它们在执行资产阶级宪法，维护资本主义制度这一

^① 《邓小平文选》，第231页。

点上，是基本一致的。因此，它们轮流执政，基本上是“换汤不换药”。但是，它们又着重代表着不同的资产阶级垄断集团的利益，这就决定了它们之间为了争权夺利，必然要激烈争斗。相互倾轧。它们之间是“在朝党”同“在野党”的关系，是执政党同反对党的关系。我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派合作，则是领导与被领导的亲密合作的友党关系。

（三）协商与监督的辩证统一。

政治协商是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共同议政的重要方式，政治协商的内容很广泛，诸如国家的大政方针、国家机构人选、群众的意见和建议、外交事务、党派团体之间的合作等等。“政治协商的好处在于既能实现最大多数的人民的民主权利，又能尊重占少数地位的人民的民主权利，在经过充分协商之后，使各方面的政见在基本上达到适当的集中和统一。”^①

互相监督，首先是共产党请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监督。毛泽东说：“为什么要让民主党派监督共产党呢？这是因为一个党同一个人一样，耳边很需要听到不同的声音。”^②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实践进一步证明，各民主党派对中国共产党和国家政府进行民主监督，提出的批评意见和改进工作的提案，大多数都很中肯和切实可行，得到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国家的重视、采纳，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起了很好的作用。当然各民主党派也应接受中国共产党的监督，从而保证它们更好地发挥作用。

协商与监督是辩证的统一。协商于前，才能形成正确的统一意志和是非标准，才有互相监督的需要和可能。监督于后，才能保证统一意志的贯彻落实，并为以后的协商准备充足的内容和条件。

① 李维汉：《统一战线问题与民族问题》，第160页。

②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90页。

五、一个国家，两种制度

用“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科学构想来解决香港、澳门、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统一，这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从我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充分尊重历史，尊重现实，照顾各方，深思熟虑，总结历史经验而逐步形成的。它体现了原则性和灵活性的辩证统一。

“一国两制”主要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1. 只能有一个国家，坚持国家主权不可分割，在国际上只能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中国。这是“一国两制”的前提。2. 在一个国家范围内，存在两种性质不同的社会经济、政治制度，即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我国大陆这个主体实行社会主义制度，我国较小的一部分（港、澳、台地区）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双方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和平共处”，谁也不吃掉谁。

“一国两制”是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产物。在香港、澳门、台湾问题上，一方面如实地承认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的事实，在国际上只能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中国。另一方面又照顾到香港、澳门、台湾的历史和现状。从历史上看，港、澳、台问题都是历史遗留问题，只能逐步加以解决。从现实看，港、澳、台目前实行着与大陆根本不同的社会制度，即资本主义制度，而且由于那里有些有利条件，经济尚比较稳定和繁荣。在国际上，它们分别由英国政府、葡萄牙政府管辖和美国政府的支持。面对这样的历史和现实，采取通过在相当长时期内实行“两种制度”并存的方案，达到统一祖国的目的，既切合实际，又有利于“振兴中华”。

“一国两制”又是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观察处理我国社会政治问题的生动体现。“一国两制”是矛盾的对立统一。“两制”即我国大陆的社会主义制度同我国的港、澳、台地区的资本主义

制度，构成矛盾的对立面，这个矛盾的对立面的双方，在都承认只有一个中国的条件下结为统一体。通过“两制”在一定时期里同时并存，实现祖国的统一。对立面的双方即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共处在一个统一体中，谁也不吃掉谁。矛盾的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统一性和斗争性相结合，推动着“振兴中华”大业的发展。“一国两制”也体现了质量互变规律。“一国两制”的逐步实现，是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这不仅表现由双方签署协议到正式实施协议要有一个过程，而且这些地区实行“一国两制”后，又要开始新的量变，并逐步发展到新的质变，也要有一个过程。如果质变的条件还不成熟，过早的变动，就要犯“左”的错误。相反，如果质变的条件已经成熟，该变而不变，就要犯右的错误。因此一定要把握好质量统一的“度”。“一国两制”还体现了否定之否定或螺旋式前进的规律。毛泽东说：“社会的运动总是采取螺旋形前进的”^①。中国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最终目标是在全中国和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制度。但是，现在我们又实行“一国两制”，这就是运用了螺旋式上升或波浪式前进的发展规律。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实现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是前进、上升的发展。承认资本主义制度在我国一定地区、一定时期的合法地位，同它“和平共处”，是“曲线”、“螺旋式”或“波浪式”。这两方面结合起来，就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辩证发展过程。

第二节 统一战线的策略原则的辩证法

在统一战线工作中，制定和执行正确的政策、策略，是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的一个重要问题。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在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把唯物辩证法运用于指导统一战线工作，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统一战线策略思想。

^①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46页。

一、又联合又斗争的原则

统一战线内部各种社会势力的又联合又斗争，是统一战线内部关系的基本特征，它是统一战线存在和发展的一条基本规律，也是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在统一战线中必须坚持的一条基本原则。

第一，联合与斗争同时并存，相辅相成。统一战线中各种社会势力的联合与斗争，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是同时并存、相辅相成的。联合是有斗争的联合，斗争是在联合行动中的斗争。毛泽东说：矛盾的“斗争性即寓于同一性之中，没有斗争性就没有同一性”。^①统一战线的政策，“既不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又不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而是综合联合和斗争两方面的政策。”^②只要联合而不要斗争，或只要斗争而不要联合，都是错误的。

然而，兼顾联合与斗争的两个方面，又不是不讲重点。要随着事物的变化和矛盾力量发展的不平衡，有时侧重强调联合，有时侧重强调斗争。例如，抗日战争初期，国民党的蒋介石集团在联共抗日上表现出一定的积极性，因此中国共产党强调同其联合、团结，肯定和鼓励其抗日的积极性，同时对其不敢发动群众的片面抗战路线进行适当的批评、斗争。而当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的蒋介石集团采取了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这时中国共产党就强调同其反共活动进行斗争，但同时注意联合、团结。

第二，联合与斗争的程度和方式应以不同对象而异。联合与斗争的性质基本有两种：一种是劳动人民之间的在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联合与斗争。例如，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工农之间的联合与斗争，工人阶级同城市小资产阶级之间的联合与斗争，等等。一种是劳动人民同可以合作的非劳动人民之间的联合与斗

^{①②} 《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第175、412页。

争。例如，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联合与斗争，在一定历史时期工人阶级同一部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联合与斗争。联合与斗争的基本形式有四种：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和思想文化的形式。由于联合与斗争的性质不同，因此斗争的程度和形式也不同。

劳动人民之间的联合与斗争。由于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因此联合始终是主要方面，斗争则是次要方面。斗争的形式主要是思想文化斗争，采取批评教育的方式。这是因为，个体农民和个体手工业者等小资产阶级，他们具有两重性：一方面他们是劳动者，同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因此工人阶级能够同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等劳动者建立巩固的联盟；另一方面他们又是小私有者，小私有者的经济地位决定了他们政治思想上的弱点和局限性，这就同工人阶级发生矛盾。工人阶级及其政党为了带领他们为共同的利益而奋斗，就必须对他们的弱点、缺点进行经常性的批评教育。这从广义上说也是斗争。

劳动人民同可以合作的非劳动者之间的联合与斗争，最基本的是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合与斗争。对于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既要善于根据其革命性的一面积极团结、联合他们，同时又要对他们的动摇性、妥协性的一面作斗争。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工人阶级及其政党根据当时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继续在政治上同它保持联盟，采取和平“赎买”的方式，对其进行改造。总的说来，这种斗争是属于人民内部的阶级斗争，斗争的形式是政治的、经济的和思想文化的和平斗争，不采取军事的、流血的斗争形式。

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劳动人民同一部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结成暂时的联盟，这时二者之间的又联合又斗争的情况非常复杂。例如，抗日战争时期，劳动人民同英美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又联合又斗争。当时中国共产党针对英美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两面

性，采取了革命的两面政策：对其尚能抗日、尚不愿在根本上破裂国共合作的方面，采取团结、联合的政策；对其反共反人民、暗中同日本侵略者搞妥协活动的方面，采取孤立、斗争的政策。又联合又斗争，该联合的就联合，该斗争的就斗争。斗争的目的是为了联合抗日。斗争要十分注意策略，为此党和毛泽东提出了同其斗争的策略原则——“有理，有利，有节”。所谓有理，就是在每一具体斗争中，要斗得有理，道理和正义在我们方面。所谓有利，就是斗争的主、客观条件要对我们有利，不斗则已，斗则必胜。所谓有节，就是斗争要有节制，要适可而止，以不破裂统一战线为前提。

第三，新时期统一战线中的又联合又斗争。又联合又斗争作为一个策略原则，在我国大陆剥削阶级已经消灭的情况下，一般地说来就不应再强调坚持这一策略原则。但是，由于统一战线内部仍存在着各种矛盾，有矛盾就有斗争。因此，从广义上仍应坚持又联合又斗争的原则。在我国大陆，统一战线中人民内部的矛盾和斗争，大量的不属于阶级斗争范畴，必须采取不同于阶级斗争的方法加以解决。然而，我们还应看到，在统一战线的一定范围内还有阶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反映，在某种条件下阶级斗争还可能激化，这就必须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正确地进行阶级斗争。

就全国而言，随着“一国两制”构想的实现，爱国统一战线中当然还包括港、澳、台地区的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还有社会主义制度同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差别，这就必然会有相应的联合与斗争，要求工人阶级及其政党针对新的情况，正确地实行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

二、既统一又独立的原则

中国共产党人在统一战线中坚持的既统一又独立的原则，其

基本含义就是，在坚持统一战线、不破裂统一战线的前提下，保持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毛泽东说：“我们的方针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①其实质是坚持工人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它是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完成当前任务和长远任务的重要保证。因此，既统一又独立的原则是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在统一战线中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

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体现了统一战线中各种社会势力的统一性与独立性的辩证关系。所谓统一性就是指统一战线中的各阶级、阶层、党派、团体，在思想、政治和组织等方面具有的共同点、共同利益和要求，因而能互相团结、联合行动。所谓独立性，是指统一战线中的各阶级、阶层、党派、团体，在思想、政治、组织等方面具有的不同点、不同利益和要求，因而有独自的存在和作用。由于有统一性，所以它们就能够共处在一个统一体中。由于有独立性，所以在统一体中就存在着矛盾和斗争。没有统一性就没有独立性，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如果不能依据历史发展的需要同其他社会力量团结合作、统一行动，自己就没有独立存在和发展的余地，更不可能实现远大理想，也就根本谈不上什么独立性。反过来说，没有独立性也就没有统一性，这正如刘少奇所说，“若是无产阶级自己还不能独立或取消自己的独立，那就不能联合别人，只能供别人利用。”^②没有独立性的统一性就是混一，对工人阶级及其政党来说，就必然导致模糊自己鲜明的政治旗帜，涣散自己的战斗集体，那么也就失去了建立统一战线的意义，可见，统一性与独立性是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

在实践中，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必须以唯物辩证法为指导，才能正确坚持统一战线中既统一又独立的原则。这主要应把握以下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05页。

②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49—50页。

几点：1. 要服从于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斗争。例如，抗日战争时期，中日民族矛盾始终是主要矛盾，日本帝国主义是我们的共同敌人，坚持统一战线中的既统一、又独立，就具体表现为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的一致性，就是要使统一战线中的阶级斗争服从于抗日的民族斗争，在有利于抗日斗争的前提下，巩固统一性，坚持独立性，把统一性和独立性所起的作用一致起来。2. 要实行互谅互让原则，求同存异。求同即坚持统一性，存异即坚持独立性。求同存异就体现了统一性和独立性的对立统一。3. 要合理安排人事，这是坚持既统一、又独立原则的重要组织保证。例如，抗日战争时期，各抗日根据地的参议会中坚持由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等各方面的代表人物组成。各抗日根据地政府实施“三三制”政权（共产党员、非党进步人士、中间派人士各占三分之一）。这就从组织上保证了统一战线中工人阶级以及各种社会势力的统一性和独立性。

三、具体分析、区别对待的原则

“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在于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①在具体分析的基础上区别对待。没有区别就没有政策，只有对统一战线中的各种社会势力进行具体分析、区别对待，才有可能制定和执行正确的政策、策略。

如何对统一战线中的各种社会势力进行具体分析、区别对待呢？首先，从全局进行分析。工人阶级及其政党根据各个历史时期的形势和任务，分析统一战线中的各个阶级、各种社会势力在革命和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从而制定和执行不同的政策。其次，对每一个局部进行分析。就一个阶级来说，还存着在不同的阶层、不同的社会集团，也需进行具体分析，区别对待。例如，新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第151页。

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国的农民阶级大致分为富裕中农、中农和贫农三个阶层。中国共产党正是根据农民阶级不同阶层的特点，制定了“依靠贫农，团结中农”的政策。再次，对各种社会势力进行综合分析。在综合分析的基础上，找出其特点，然后分成若干层次，从而制定出不同的政策和策略。在这方面，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有独特的建树。抗日战争时期，在对各种社会势力综合分析的基础上，区分为“进步势力”、“中间势力”和“顽固势力”三个部分，并确定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策略总方针。把统一战线精细地区分为左、中、右三种势力，并根据这种区分提出区别对待的原则，这是对马列主义策略思想创造性的发展。

为了巩固和扩大统一战线，工人阶级及其政党不仅要善于分析和区别对待统一战线内部的各种社会势力，而且还要善于分析和区别统一战线外部的各种势力，善于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最大限度地孤立各个时期的主要敌人。列宁曾明确指出：“要战胜更强大的敌人，只有尽最大的力量，同时必须极仔细、极留心、极谨慎、极巧妙地一方面利用敌人之间的一切‘裂痕’，哪怕是最小的‘裂痕’，……另一方面要利用一切机会，哪怕是极小的机会、来获得大量的同盟者，尽管这些同盟者是暂时的、动摇的、不稳定的、靠不住的、有条件的。”^①毛泽东根据中国社会的客观实际，指出统治我国的各帝国主义国家及依附于它们的各派反动势力之间存在着一系列矛盾，它们之间的矛盾是大狗小狗、饱狗饿狗之间的争斗，“我们要把敌人营垒中间的一切争斗、缺口、矛盾，统统收集起来，作为反对当前主要敌人之用。”^②毛泽东把这一策略思想归结为十六个字，即“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③中国共产党正是在这一策略思想的指导下，在抗日战争时

① 《列宁选集》第4卷，第225页。

②③ 《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第72、412页

期，把英美帝国主义同日本帝国主义区别开来，把中国的英美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同亲日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区别开来，利用它们之间的矛盾、缺口、争斗，在国内建立和维护了同英美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一定程度的联合。在国际上，逐步建立和维护了同英美等国一定程度的联合。从而成功地运用了“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策略原则。

在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工人阶级及其政党仍应对统一战线中的各种社会势力做具体分析。我们党正是在具体分析的基础上，科学地把新时期的统一战线区分为两种联盟，对每一种联盟的成员作具体分析、区别对待，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新时期的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加快“统一祖国，振兴中华”的步伐。

总之，在把唯物辩证法运用于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面，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总结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宝贵经验，把革命统一战线誉为我党的三大法宝之一。我们要从新时期的实际出发，正确运用统一战线的理论和策略，从而使统一战线在实现新时期总任务的过程中更好地显示这一“法宝”的威力。

第十三章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辩证法

毛泽东比较系统地分析和研究了社会主义建设中各方面的矛盾问题，探索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诚然，党和毛泽东由于缺乏经验和“左”的指导思想，致使社会主义建设遭受到这样或那样的挫折和失误，但不能由此而忽视、贬低甚至否定毛泽东的理论贡献。应当看到，他把辩证法运用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了重大成绩，并奠定了社会主义建设辩证法的基础。今天，根据新情况，新问题，进一步研究这一课题，对社会主义进行再认识，对加速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无疑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第一节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与客观经济规律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辩证法是建立在从客观实际出发，科学地分析我国基本国情这一唯物主义原则基础上的。因此，从中国国情出发，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客观规律，揭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与客观经济规律的关系，是毛泽东社会主义建设辩证法的基本原则。

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必须从中国国情出发

早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指出：“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① 全国解放前夕，毛泽东针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第324页。

对党内关于经济政策的糊涂思想，分析了我国当时的基本国情后指出，中国近代工业在抗战前大约是百分之十左右，农业和手工业占百分之九十左右。他说：这“是在中国革命的时期内和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① 并强调指出，谁要忽视或轻视这些客观实际，谁就要犯右倾和“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全国解放后，毛泽东又多次强调社会主义建设一定要从中国国情出发。他在许多著作中对我国国情作了多方面的深入分析，概括起来主要是：第一，我国有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但它刚刚建立还不完善。第二，我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久，这是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有利条件，但也有困难。第三，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80%的人口在农村，农民的情况如何，在政治上经济上影响极大。第四，我国原来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底子薄，经济文化落后，工农业不发达，文化科学水平低。从发展观点看，这种“一穷二白”的情况，既是我们进行建设的有利条件，更是我们面临的困难。

从我国国情出发，是认识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的基本前提。国情，是一个较复杂的概念，它包括一个国家的历史条件、现实状况、自然环境、人口、科技文化水平、生产力状况以及社会制度诸方面的因素和这些因素间的相互制约关系。而所谓经济规律，也就是人们在生产过程中所形成的经济关系的运动规律，它是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各种经济现象之间内在的、本质的必然联系。经济规律是潜藏在国情内部的东西。由于各个国家的国情不同，因而除了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外，还有与本国国情相适应的特殊经济规律。毛泽东不仅重视研究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而且特别注重研究由中国国情决定的特殊的经济规律。因此，他在领导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发展工农业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657—658页。

方面，没有机械地完全照搬外国的做法，而是从中国实际出发，探索了中国自己的道路。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也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并积累了一些很宝贵的经验。

国情是一个复杂的、处于变化状态的客观现象，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的发展阶段上国情是变化的。人们对国情的认识是一个由浅入深的辩证发展的过程，而每次认识的深化和飞跃都必须经过实践。因此，毛泽东特别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在探索和认识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中的意义。他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和我们主观认识之间的矛盾，这需要在实践中去解决。”^① 他反复强调全党同志深入实践，逐步地加深对客观经济规律的认识。毛泽东的这些思想，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今天，它对于我们进一步认识在一个原来经济文化落后的农业大国，怎样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规律，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仍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②

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必须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

认识客观经济规律的目的，全在于正确地掌握和应用它来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必须遵循社会主义经济所固有的客观的经济规律。

首先，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必须遵循社会主义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马克思、恩格斯曾经预言过社会主义社会将实行计划经济。列宁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在俄国付诸实践贯彻了这一思想。后来斯大林明确地把有计划按比例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97页。

②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页。

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提了出来。毛泽东同意斯大林的观点,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必须遵循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进行。1952年8月,我国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刚一结束,毛泽东就指出:“经过两年半的奋斗,现在国民经济已经恢复,而且已经开始有计划的建设了。”^① 1957年,他又进一步指出:“在客观上将会长期存在的社会生产和社会需要之间的矛盾,就需要人们时常经过国家计划去调节。我国每年作一次经济计划,安排积累和消费的适当比例,求得生产和需求之间的平衡。”^② 社会主义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是社会主义大生产以及公有制存在和发展的客观要求。从本质上说,任何以分工为基础的社会生产特别是社会化大生产,客观上都要求在各个部门之间按照一定的比例分配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否则社会再生产就不能顺利进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由于私有制和社会化生产之间的矛盾,使全社会生产处于无政府状态,不能按计划进行。只有社会主义公有制才从根本上解决了这一矛盾,建立了以计划经济为特征的国民经济体系。这是因为,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社会的生产无政府状态就让位于按照全社会和每个成员的需要对生产进行的社会的有计划的调节。”^③

毛泽东认为,根据社会主义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的要求,在制定国民经济计划时,搞好综合平衡是极端重要的。所谓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就是根据客观经济规律,对各部门、各地区和再生产各方面的因素和比例关系统筹兼顾,全面安排,合理布局,正确地确定和保持社会生产和社会需求之间的平衡,使生产资料的生产和生产建设的需求、消费资料的生产和人民生活的需求相适应。当然这种平衡是相对的,暂时的,由平衡发展到不

①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69页。

②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69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19页。

平衡，经过调整又达到新的平衡。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那样：“所谓平衡，就是矛盾的暂时的相对的统一。过了一年，就整个说来，这种平衡就被矛盾的斗争所打破了，平衡成为不平衡，统一成为不统一，又需要做第二年的平衡和统一。这就是我们计划经济的优越性。”^①毛泽东还强调指出，实现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必须反对提出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做到计划留有余地。计划指标的确定要从实际出发，加强调查研究，绝不能脱离客观可能性毫无根据地加码、翻番，追求高指标。毛泽东说：“任何人不可以无根据地胡思乱想，不可以超越客观情况所许可的条件去计划自己的行动，不要勉强地去做那些实在做不到的事情。”^②在这方面，我们曾经有过深刻的教训。1958年的“大跃进”是搞高指标、瞎指挥、刮浮夸风的最典型事例，结果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遭受严重挫折和损失。

毛泽东在阐明社会主义经济在平衡和不平衡的对立统一中向前发展的基础上，又强调正确确定国民经济内部各部门的主要比例关系的重要性。因为国民经济能否按比例发展，取决于主要比例关系是否符合客观实际，是否协调。社会生产两大部类的比例，农、轻、重的比例，农业和工业的比例，生产和建设的比例，积累和消费的比例等等，都是国民经济中的主要比例关系。要使社会主义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协调发展，必须对这些方面“统筹兼顾，适当安排。”关于这些思想，将在第二节做具体论述。

其次，毛泽东强调指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仍然应当保留和发展商品生产，要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还存在不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呢？这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社会是不存在商品生产的。十月革命胜利后，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69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24页。

列宁在俄国以马克思、恩格斯这一思想为指导进行了实践，结果证明行不通，只好实行新经济政策恢复商品生产。30年代又兴起商品经济“消灭论”、50年代的“限制论”。斯大林虽然有所突破，提出“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概念，但斯大林在理论上仍然不承认全民所有制内部存在商品交换关系，不承认生产资料是商品。在我国也存在类似于苏联的状况。毛泽东针对我国1958年大跃进中刮起的“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和反对商品生产、否定价值规律的观点，指出有些同志企图避开商品生产和价值法则，“这是对马克思主义不彻底、不严肃的态度”，“是不承认客观法则的表现。”^①在他亲自主持制定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中明确指出，继续发展商品生产对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是一个“重大的原则问题”，“企图过早地取消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过早地否定商品、价值、货币、价格的积极作用，这种想法是对于发展社会主义建设不利的，因而是错误的。”毛泽东还针对中国的实际说：中国是商品生产很不发达的国家，现在又很快地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同商品交换还要发展，这是肯定的。因此，为了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必须“有计划地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②毛泽东的这一思想，不仅对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观点来说是一个重大突破，而且比起斯大林来说也是一个重大发展。但是，毛泽东始终没能完全克服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不相容的传统观念而把二者有机的统一起来。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根据我国的国情，才进一步明确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必须坚持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的方针。十二届三中全会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改革计划体制，首先要突破把计划经济同

① 转引自《党史研究》1987年第1期，第9—10页。

② 转引自《党史研究》1987年第1期，第10页。

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明确认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①这一科学论断，彻底摒弃了把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错误观点，准确地概括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的关系，即既是计划经济又是商品经济，二者在公有制基础上有机统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党中央这一科学论断的提出不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丰富和发展。

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下既然还存在着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价值规律就必然发生作用。1959年3月，他在第二次郑州会议讲话中指出：价值法则是客观存在的经济法则。我们对于社会产品，只能实行等价交换，不能实行无偿占有；社与队、队与队、社与国家之间，在经济上必须遵循等价交换原则。那种“一平、二调”的共产风，是根本否定价值法则的。要教育县、社两级特别是公社这一级干部，使他们懂得价值法则，等价交换，这是个客观规律，客观法则，违反它，要整得头破血流。后来，毛泽东在这一份报告的批示中进一步强调：“算帐才能实行哪个客观存在的价值法则，这个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否则一切都不可能。”^②

毛泽东把价值规律比作一个伟大的学校，给我们以巨大的启示和教益。尽管毛泽东对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认识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在实践中也有过失误，但在经过总结教训后，他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基本上坚持了上述观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坚持并发展了毛泽东的正确思想，在经济体制改革中，坚决实行按经济规律办事，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并自觉运用价值

① 《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第17页。

② 转引自《党史研究》1987年第1期，第10页。

规律对旧的计划体制进行改革，大力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尽管我们今天对价值规律的认识较之以前深刻得多了，但毛泽东关于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作用的论述，对于我们深入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充满生机的经济体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再次，坚持按劳分配是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重大原则问题。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个人消费品的分配原则是不同的。社会主义社会个人消费品实行按劳分配原则。所谓按劳分配，就是社会按照劳动者向社会提供的劳动的数量和质量，分配给劳动者相应数量的、经过社会必要扣除之后的个人消费品，实行等量劳动领取等量产品的原则，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马克思说：“每一个生产者，在作了各项扣除之后，从社会方面正好领回他所给予社会的一切。他所给予社会的，就是他个人的劳动量。……他以一种形式给予社会的劳动量，又以另一种形式全部领回来。”^①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坚持和贯彻了按劳分配的原则，并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进一步作了具体论述。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个人消费品的分配原则，也是社会主义经济规律之一。毛泽东认为，对个人消费品实行按劳分配原则，不是由什么人的主观愿望决定的。归根到底是由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状况和生产关系的性质决定的。坚持按劳分配原则，是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个重大的原则问题。1958年，毛泽东针对“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尖锐地指出，这是剥夺农民。1962年他主持制定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进一步明确指出：农村人民公社必须坚持和贯彻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多劳多得，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0—11页。

劳动者不得食的原则。

第二，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必须奖勤罚懒，反对平均主义。平均主义和按劳分配是根本对立的思想和原则。斯大林曾说：“平均主义的根源是个体农民的思想方式，是平分一切财富的心理，是原始的农民‘共产主义’的心理。平均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是毫无共同之处的。”^①早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针对红军中的错误倾向严肃地批判了绝对平均主义，指出平均主义的来源及其纠正的方法。毛泽东说：“就是在社会主义时期，物质的分配也要按照‘各尽所能按劳取酬’的原则和工作的需要，决无所谓绝对的平均。”^②进入社会主义时期后，曾有人主张把工人的工资同农民的收入平均一下，拿一部分给农民。毛泽东针对这种“不患寡而患不均”，企图离开农民自己的劳动、通过平均主义来增加农民收入的错误观点严厉指出：“把工人的工资同农民的收入平均一下，拿一部分给农民，那不是要毁灭中国的工业吗？这样一拿，就要亡国亡党。”^③

第三，贯彻按劳分配原则，必须加强思想工作。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的分配制度和社会主义的经济规律。由于缺乏经验、分配制度不够完善以及人们物质利益和认识方面的原因，在执行按劳分配的过程中必然会产生这样或那样的矛盾和问题。因此，加强思想工作是十分必要的。毛泽东曾提出：“政治工作同必要的按劳分配要结合，我看这是个好东西。”^④他的这一观点，贯穿着深刻的辩证法思想。一方面，只有坚定地贯彻按劳分配原则，才能使劳动者从自己的切身利益上感受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从而激发劳动积极性。另一方面，只有加强思想政治教育，

① 《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105页。

② 《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第32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13、288页。

④ 转引自叶剑英《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

也才能使劳动者正确认识和对待在按劳分配原则贯彻中存在的问题，不片面地为个人利益斤斤计较，提高觉悟，振奋精神，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力量。

第二节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与各种经济关系

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毛泽东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以及外国的经验教训，提出并论述了社会主义建设中带有全局性的十种关系。他指出：“这十种关系，都是矛盾。世界是由矛盾组成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我们的任务，是要正确处理这些矛盾。”^①通过对这十种矛盾的阐述，他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中各种经济矛盾的辩证法。

一、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

马克思把社会生产划分为两大部类：第一部类是生产资料生产，第二部类是消费资料生产，并指出两大部类保持合理的比例，是实现社会再生产的条件。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是生产的部门结构中非常重要的一对关系。它们是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重工业是进行生产资料的生产，而轻工业和农业主要是进行消费资料的生产，它们分属国民经济两大部类。但在社会生产过程中，重工业向轻工业和农业提供重要的生产资料，而农业、轻工业则向重工业以及整个社会提供消费资料。双方互相依存，互相推动、以求共同发展。毛泽东从矛盾双方的辩证统一中，揭示了两大部类在国民经济系统中的比例关系，为两大部类以及整个国民经济协调发展指明了道路。

毛泽东指出，农业与工业的关系，当然以重工业为中心，优先发展重工业，因为“重工业是我国建设的重点。”^②“没有工业，

①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88页。

②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21页。

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①只有迅速发展重工业，以更多更先进的技术设备和材料来武装农业、轻工业、交通运输业等各部门，才能使国民经济转移到现代化大生产的技术基础上，从根本上改变我国“一穷二白”的面貌。那么怎样才能加快发展重工业呢？毛泽东说：“我们现在发展重工业可以有两种办法，一种是少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一种是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②前一种办法是形而上学的办法，后一种是辩证的方法。用辩证的方法调整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比例，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一可以更好地供给人民生活的需要，二可以更快地增加资金的积累，因而可以更多更好地发展重工业。”^③毛泽东不仅全面论证了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和加快发展消费资料生产的辩证统一关系，而且具体阐述了实现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的必要条件和正确途径，打破了在这个问题上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形而上学观点。

辩证法不仅教导人们认识矛盾的对立统一关系，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要求人们在实践中处理好这种关系。在我国情况下，就工业特别是重工业和农业的关系来看，由于二者公有化性质不同，生产的技术条件不同，工业同农业之间客观上存在着先进和落后的矛盾。为了解决这一矛盾，毛泽东一贯强调发展国民经济要工农业同时并举，使二者保持适当比例，不致因工农业太不平衡而产生严重问题。为了划清在这个问题上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界限，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了一个重要思想，这就是，在一定条件下为了更好地突出发展重点，反而要向它的对立面（非重点）用力。他提出，要想更多更好地发展重工业，必须多发展一些农业和轻工业。这样不仅不削弱重工业，反而更好地保证和促进了重工业，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81页。

②③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22页。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农业就是工业。”^①这种辩证的思想方法，是与那种直线式的、僵化的形而上学观点根本对立的，是唯物辩证法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

二、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

我国解放前仅有的一点工业，百分之七十集中在沿海各省，这是历史上形成的一种不合理状况。全国解放后，在工业的合理布局问题上，毛泽东辩证地分析了发展内地工业和发展沿海工业的关系，提出了充分利用沿海工业，大力发展内地工业，平衡工业发展布局的方针。这些适合我国情况，充满辩证法思想的观点，对我国工业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在今天仍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从我国工业布局的实际来看，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也是矛盾的两个方面。由于历史的原因，沿海工业比较发达，内地工业比较落后。要从根本上改变我国工业落后的状况，应该把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使其在相互促进中各自得到发展。毛泽东说：“沿海的工业基础必须充分利用，但是，为了平衡工业发展的布局，内地工业必须大力发展。”^②在这两者的关系中，大力发展沿海工业是发展内地工业的基础。因为沿海工业的发展可以为内地工业提供资金、机械设备以及技术力量等等，支援和促进内地工业的发展。反过来，内地工业的发展又促进沿海工业的发展。建国以后，我们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支援和发展内地工业做了不少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一些省市，已经成为各具特点的新的工业基地。但是，在很长一个时期，我们对发展沿海工业重视不够，致使沿海工业长期处于设备陈旧、场地狭窄，交通拥挤，环境污染严重等状况。这样，沿海工业长期积累的技术、人才、资金等作用不

①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61页。

②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23页。

能充分发挥，严重影响了我国工业发展的步伐。

为了使我国工业得到全面而较快的发展，毛泽东反复强调要充分利用沿海工业的设备能力和技术力量，采取积极的态度加快沿海工业的扩建、改建，也可以建立一些新的厂矿，其中有些可以是大型的。毛泽东说：“好好地利用和发展沿海的工业老底子，可以使我们更有力量来发展和支持内地工业。如果采取消极态度，就会妨碍内地工业的迅速发展。所以这这也是一个对于发展内地工业是真想还是假想的问题。如果是真想，不是假想，就必须更多地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特别是轻工业。”^①毛泽东历来注重抓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但又不忽视次要矛盾和矛盾的次要方面。在工业建设的布局上，既强调大力发展内地工业，又要求“好好地利用和发展沿海的工业老底子”，并用“真想”和“假想”这一鲜明、生动、深刻的概念来说明内地工业和沿海工业的关系问题。这实际上也是讲对发展工业的动机与效果的方法论。单有发展内地工业的愿望和动机是很不够的，还必须有良好的效果。因为，我们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动机和效果的统一论者。因此，实现内地工业的大发展，必须优先发展沿海工业。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首先在东部沿海的一些城市建立了经济特区，经济特区的发展进一步促进了内地经济的发展。实践证明，这种经济发展的战略决策是正确的。国家“七五”计划确定把我国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三个经济地带，提出正确处理东部沿海、中部、西部三个经济地带的关系，加速东部沿海地带的发展，把加强传统工业和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大力开拓新兴产业。发展知识密集型产业和高档消费品工业以及高、精、尖、新产品做为重点，加快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和经济开放区的建设，使其成为向全国传送新技术、提供咨询和信息的基地。同时，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24页。

把能源、原材料建设的重点放到中部，并大力发展中部同东、西部地带的横向经济联系。积极做好进一步开发西部地带的准备工作。在此基础上，把东部沿海的发展同中、西部的开发结合起来，做到互相支持，互相促进。这些战略决策，在理论和实践上，是对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关系思想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

三、国家、集体和个人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们从事生产活动的动机和目的，就是为了获得物质利益。人们的生产关系或经济关系，首先是作为利益表现出来。毛泽东把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经济利益划分为国家、集体和个人三个层次，指出这三个方面就是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形成的物质利益关系。在这三者的关系中，国家和集体利益是劳动者的共同利益，是劳动者个人利益的源泉和保证；而劳动者个人利益则是国家和集体利益的基础和最终归宿。因此，社会主义社会中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之间的物质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但也存在着差别和矛盾，由此形成了经济利益的一致性和差别性的矛盾运动。毛泽东运用对立统一规律正确地阐述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统一性和独立性、全局和局部的辩证关系，第一次科学地揭示了国家、集体和个人之间的物质利益矛盾运动及其规律，提出正确解决这些矛盾的方法和途径。他在《论十大关系》等著作中，精辟而系统地论述了调节各方面经济利益关系的基本原则，概括起来主要是：

第一，坚持统一性和独立性、全局和局部的辩证统一，是正确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物质利益关系的理论基础。经济利益上的差异，就是经济利益上的矛盾。但这是社会主义经济利益整体内部即“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的基础上的矛盾，”^①体现着统一性与独立性、全局和局部的关系。毛泽东针对中央权利集中

过多和在某些方面对生产单位和个人的物质利益有所忽视的情况指出，不能把什么东西都集中在中央或省市，“各个生产单位都要有一个与统一性相联系的独立性。”同时，也要给他们一定的物质利益，“要更多地注意解决他们在劳动和生活中的迫切问题。”^②对于农业生产单位，毛泽东说：“要在不违背国家的统一计划 and 政策法令下保护自己一定的灵活性和独立性。”^③只有这样，才能调动生产单位和劳动者个人的积极性，使国家、集体和个人这三者协调一致地充满活力地向前发展。

第二，解决国家、集体和个人之间矛盾的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适当安排”。毛泽东说：“不能只顾一头，必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个方面。”^④“我们历来提倡艰苦奋斗，反对把个人物质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同时我们也历来提倡关心群众生活，反对不关心群众痛痒的官僚主义。”^⑤在处理国家与工人、农民的关系上，毛泽东提出，随着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工资也需要逐步调整。他多次强调，不能剥夺农民，不能把农民搞得很苦，在政策上要兼顾国家和农民的利益。毛泽东说：“我们的方针是统筹兼顾、适当安排。”^⑥无论在什么问题，都要从全体人民的统筹兼顾这个观点出发，反对任何小圈子主义。

第三，国家、集体和个人之间的物质利益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人民内部矛盾的重要方面，对这些矛盾的认识和解决有一个过程，必须根据实践，经常调节，不断解决。毛泽东根据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性质和特点，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并且把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的矛盾看作是人民内部矛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58页。

②③ 同上，第726—727页。

④ 同上，第775页。

⑤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26页。

⑥ 同上，第783页。

盾的经济内容及其在生产 and 需要、积累和消费等方面的具体表现。由于正确认识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社会主义实践中一个长期任务，因而解决国家、集体和个人之间的矛盾也是一个过程。毛泽东说，对这三个方面，“必须处理适当，经常注意调节其中的矛盾。”^①这就不仅揭示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社会矛盾的经济实质，而且指出了解决这些矛盾的长期性，为我们深刻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经济结构的特点和经济利益矛盾的运动规律，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

四、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

从根本说，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关系问题，也就是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的关系问题。这种关系主要表现在：一方面，经济建设的发展为改善人民生活创造物质基础；另一方面，人民生活的改善和提高，又进一步激发广大人民进行经济建设的积极性，促进经济的发展。因此，它们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但在具体实践中，在用于经济建设的积累资金和用于改善生活的消费基金之间，常常存在着矛盾。这种矛盾是国家的整体利益同劳动者个人利益、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之间的矛盾，必须用辩证的方法妥善解决。

要发展经济建设，必须增加积累基金。积累是扩大再生产的源泉，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条件。尤其象我们这样一个“人口多，底子薄”的农业大国，要在本世纪内建成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更需要执行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方针，努力节约资金，以加快经济建设发展。如果经济建设发展缓慢，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就不可能提高。因此，在解决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的矛盾时，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75页。

首先讲统一性，教育人民群众自觉地坚持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利益，眼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

但是，讲统一性，重视国家经济建设，绝不能不讲独立性，忽视人民生活。社会主义生产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在经济建设不断发展的基础上，努力改善人民生活，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体现。陈云说：“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必须兼顾，必须平衡。”^①毛泽东总结苏联的严重教训，尖锐指出：“你要母鸡多生蛋，又不给它米吃，又要马儿跑得好，又要马儿不吃草。世界上那有这样的道理！”^②总之，“一要吃饭，二要建设”，是指导我们经济工作的一项基本方针。这个问题是关系到全国人民的大问题，必须在全党全国人民中反复进行教育。

由于事物矛盾的特殊性，在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关系上，需要根据不同时期矛盾的特殊性来确定解决矛盾的方法。毛泽东指出，要根据丰收年和灾荒年的不同情况，经常调整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积累和消费的比例。“丰收年多积累一点，灾荒年或者半灾荒年就不积累或者少积累一点。就是说，积累是波浪式的，或者叫做螺旋式的。”^③毛泽东多次教育干部不能只顾国家利益而忽视群众的个人利益，同时也对片面强调生活福利、忽视艰苦奋斗的倾向进行了严肃批评，强调从实际出发，正确处理好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问题。

五、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

在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上，毛泽东一方面指出要加强国防建设，另一方面又强调加强国防建设的基础是加强经济建设，

① 《陈云同志文稿选编》，第21页。

②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28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61页。

二者是辩证统一的关系。毛泽东说,“我们一定要加强国防建设,因为还有敌人,我们还受敌人欺负和包围。”^①我们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那么怎样才能发展国防建设呢?毛泽东说:“为了加强国防建设,一定要首先加强经济建设”,“只有经济建设发展得更快了,国防建设才能够有更大的进步。”^②

那么,为什么说加强国防建设一定要首先加强经济建设呢?这是因为:首先,只有经济发展了,才能为国防提供充足的粮食、衣服、生活日用品等物质资料,特别是重工业的加速发展,才能为国防提供钢铁、机械、能源、原材料等先进的技术装备。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没有强大雄厚的经济实力,就没有巩固的国防。其次,只有经济发展了,才能促进教育、文化、科技事业的发展,从而为国防建设补充大量的有社会主义觉悟、有科学文化知识的专门人才,为国防科学和国防工业输送大批技术力量,促进国防建设迅速发展。因此,毛泽东说,我们应该把军政费用降到一个适当比例,增加经济建设费用,这是一个战略方针的问题。

经济建设虽然是国防建设的基础,但国防建设的发展反过来又能保障和促进经济建设的发展。生产技术发展史表明,许多科学技术上的发明、创造,首先是由于国防建设和战争的需要引起的。许多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等往往先在国防工业部门产生或首先采用,然后逐步推广到农业、民用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等部门。因此,我们应该努力使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保持充分合理的发展,使二者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①②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25页。

第三节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与人的主观因素

毛泽东认为，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必须根据中国的具体国情，尊重客观经济规律，要发挥符合客观实际的主观能动性。这就要求我们尊重实际、尊重群众，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自觉能动性，去夺取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伟大胜利。

一、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

毛泽东曾说：“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①人之所以最宝贵，就在于人具有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自觉的能动性。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坚持正确路线的指导，充分把人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的符合客观实际的自觉能动性，就能创造出前所未有的人间奇迹来。

毛泽东运用对立统一学说，把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各种复杂因素，从总体上区分为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从而揭示了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辩证性质。他认为，在社会发展中，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是相互排斥、相互对立的。积极因素是推动事物发展的力量，消极因素是阻碍事物发展的力量。人类社会的发展，就是通过两种因素的矛盾运动而实现的。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也存在这两种对立的因素。在全国总人口中，赞成社会主义的积极因素占绝大多数，处于主导的、支配的地位，这是我们事业取得胜利的基本保证。不赞成、破坏和反社会主义的消极因素只占总人口的极少数。但他们能量不小，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破坏作用是不可低估的。毛泽东还指出，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的存在是长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01页。

期的，即使到了共产主义社会，“还会有先进和落后的矛盾，人们之间还会有斗争”，^① 不过斗争的性质不同罢了。

然而，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不但相互排斥、相互对立，而且在一定条件下相互依存、相互转化。毛泽东指出：“什么是国内外的积极因素？在国内，工人和农民是基本力量。中间势力是可以争取的力量。反动势力虽是一种消极因素，但我们仍然要做好工作，尽量争取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在国际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都要团结，不中立的可以争取为中立，反动的也可以分化和利用。”^② 在我们革命队伍中间，也会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而产生消极因素，这是积极因素向消极因素转化。因此，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不是凝固不变的，而是可变的，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转化的。我们要努力做好工作，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调动一切直接的和间接的力量，调动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毛泽东深刻指出：“我们一定要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③

二、自力更生和学习外国

毛泽东运用对立统一规律科学地分析了中国和外国的关系，深刻阐明了社会主义建设既要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又要发展对外交流，向外国学习。毛泽东说：“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

①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19页。

②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21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88页。

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①

唯物辩证法关于事物“自己运动”的观点以及内因和外因的关系的原理，是坚持自力更生和对外开放的最基本的哲学基础。唯物辩证法肯定事物运动的力量源泉在事物自己内部，认为宇宙间任何事物的运动都是“自己运动”。但事物的自身运动又离不开外部条件，离不开同它周围其他事物的相互联系。毛泽东说，事物的发展“是事物内部的必然的自己的运动，而每一事物的运动都和它的周围其他事物互相联系着和互相影响着。”^② 他根据唯物辩证法的原理，结合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阐明了坚持自力更生和学习外国的辩证关系。这些思想主要是：

第一，在自力更生和对外开放这对矛盾中，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这一矛盾中起主导作用的方面。早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指出：“我们的方针要放在什么基点上？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叫做自力更生。”^③ 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后又特别强调这一思想。他把自力更生做为基本点，强调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按照本国的实际，依靠本国人民的辛勤劳动和聪明才智，充分利用本国的资源，发挥自己的优势，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自己找出适合自己情况的建设道路。毛泽东说，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整个地说来，是由中国人认识的，而不是靠外国人去认识的。我们学习外国的东西要把它改变成中国的东西，“应该越搞越中国化，而不是越搞越洋化。”^④ 邓小平也说：“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⑤

第二，坚持自力更生的方针，并不排斥学习外国。由于大工

① 转引自周恩来同志在四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6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030页。

④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52页。

⑤ 《邓小平文选》，第372页。

业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形成，各个国家在经济和科学技术等方面互相联系、互相影响的作用越来越大。我们应该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充分利用外部条件的促进作用进行经济建设，那种闭关锁国，拒绝利用外援、外资和外国的技术，无异于作茧自缚，是十分有害的。毛泽东说：“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①邓小平也说：“独立自主不是闭关自守，自力更生不是盲目排外。科学技术是人类共同创造的财富。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长处，学习人家的先进科学技术。”^②因此，那种把自力更生和对外开放对立起来，认为强调自力更生就不必要再实行对外开放的思想是错误的。从经济意义上说，所谓对外开放，是指把本国的经济发展同国际市场和世界经济联系起来，积极参加国际经济活动。正确地坚持对外开放的方针，不仅不会削弱自力更生，而且可以更好地促进自力更生。因为对外开放，有助于打开界限，激励自力更生的意志和信心；有助于增强我们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能力，加快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步伐。

第三，坚持学习外国，实行对外开放，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照搬。毛泽东曾批评有些人就象《法门寺》里的贾桂一样，感觉事事不如人，在外国人面前卑躬屈节，直不起腰。他一再强调，在对外开放过程中，我们一定要“用脑筋想一下，学那些和我国情况相适合的东西，即吸取对我们有益的经验。”^③我们在经济上发展同各国的贸易关系，利用外资，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发展同各国的科学和文化交流，但对“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但是，这并不妨碍我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40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88页。

③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98页。

们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①邓小平也指出：“我们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积极扩大对外交流。同时，我们保持清醒的头脑，坚决抵制外来腐朽思想的侵蚀，决不允许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在我国泛滥。”^②坚持这种正确的学习态度，正是对自力更生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充满信心的表现。只有正确地实行对外开放，才能反过来巩固、促进独立自主、自力更生。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根据三十多年来的经济建设实践，从新的高度提出了坚持自力更生和扩大对外经济技术交流的战略方针，大大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关于坚持自力更生和对外开放辩证关系的思想。

三、革命精神和科学态度

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正确处理好自力更生和学习外国的关系，就必须把革命精神和科学态度结合起来。从根本上说，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革命精神和科学态度的辩证统一，也就是主观和客观的辩证统一。正确认识 and 解决这一关系，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成败的关键问题。

所谓革命精神，是指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顽强的意志，高尚的情操，冲天的干劲，自觉的组织纪律性，以及大公无私的集体主义精神和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上说，就是人的自觉能动性，它是主观领域的东西。毛泽东在八届二中全会上曾赞扬我们的战士不吃老百姓的苹果这种自觉的纪律性和艰苦奋斗精神时说：“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就是由这里头出来的。”^③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倡导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42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72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29页。

要发扬这种革命精神。中国的国情，使我们在经济建设实践中会遇到不少困难和障碍，这就需要有不怕牺牲、不怕困难、不怕失败的坚强意志和勇于奋斗的精神。毛泽东多次勉励广大青年和全体人民团结奋斗，用自己的双手创造出一个富强的国家。他说：“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给我们开辟了一条到达理想境界的道路，而理想境界的实现还要靠我们的辛勤劳动。”^①后来又号召全党全国人民“要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②

但是，发挥人的自觉能动性，鼓起干劲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又必须以科学态度为前提。所谓科学态度，就是尊重客观规律，从实际出发，正确把握事物之间的必然联系，坚持科学分析方法，使自己的思想和行动与客观必然性相符合。毛泽东说：“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③我们应当努力学习，积累经验，在实践中逐步认识它的规律性。为了掌握经济规律，毛泽东强调指出：“一定要下一番苦功，要切切实实地去调查它，研究它。”^④对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经验作历史的考察，从中找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所固有的而不是主观臆造的规律。

坚持革命精神和科学态度、主观能动性和客观规律的高度统一，是贯穿在毛泽东理论和实践中的一条红线。毛泽东形象地用“热”和“冷”来比喻革命精神和科学态度的关系。他说：“冲天的干劲是热。科学分析是冷。”“头脑要冷又要热，又是统一性的两个对立面。”^⑤毛泽东的经济辩证法，始终贯彻着革命精神和科学态度、发挥主观能动性和尊重客观规律、革命干劲和科学分析、热和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81页。

② 同上，第800—801页。

③④同上，第829页。

⑤ 同上，第808页。

冷的辩证统一。他在《论十大关系》等著作中，反复强调把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革命精神，但又深刻分析了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要求人们以科学态度认识和利用客观经济规律。同时，毛泽东还指出，革命精神和科学态度的辩证统一，是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的。他说：“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的认识，必须有一个过程。必须从实际出发，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从有较少的经验，到有较多的经验，从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到逐步地克服盲目性、认识客观规律、从而获得自由，在认识上出现一个飞跃，到达自由王国。”^① 在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践中，坚持毛泽东的这些思想，同样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那826页。

第十四章

思想政治工作的辩证法

毛泽东在长期领导中国革命的实践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物质和精神、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的理论，应用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社会实践，对思想政治工作作了大量研究，提出了一系列关于思想政治工作的理论和原则，从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

第一节 破和立的统一

在具体论述思想政治工作之前，先讲破和立的辩证法。搞清楚这个问题，对我们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特别是对帮助人们树立新观念，破除旧观念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毛泽东晚年提出一个原则性的说法，叫做“先破后立”，“破字当头，立在其中”。因此，过去我们讲哲学，论及破与立的关系时，总是讲“先破后立”。现在看来，这种讲法有片面性。

社会实践证明，破和立是辩证的统一。破中有立，立中有破。事物在发展过程中，有时表现为“先破后立”，即“破字当头，立在其中”；而有时则表现为“先立后破”，即“立字当头，破在其中”。

一、先破后立

“先破后立”，即“破字当头，立在其中”，不能说毫无道理，它是破和立辩证关系的一个方面。人们在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中，

往往是先推倒旧事物，创立新事物；破除旧观念，树立新观念。我们党在民主革命时期，领导全国人民经过浴血奋战，打倒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反动统治，然后才建立起社会主义新中国。建国后，我们破除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然后才建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在社会意识形态方面，破除了地主资产阶级的旧观念，然后才能逐步树立起社会主义新观念。从现实生活来看，旧事物旧观念总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总是顽强地束缚新事物新观念的诞生和发展。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新事物和新观念的产生及发展，是“破字当头，立在其中”。

毛泽东晚年提出的“先破后立”、“破字当头，立在其中”的原则，至今还是适用的，我们决不能放弃这个原则。问题在于怎样“破”？我们讲的“破字当头，立在其中”，是说“破中有立”，不是只破不立；也不是再搞什么“大批判开路”。把“破”简单地理解为“政治斗争”是有片面性的。“破”有政治斗争之含义，但不只是政治斗争，它大量地表现为说服教育，批评和自我批评。对旧思想、旧观念不抵制、不批评，新思想新观念就立不起来，正气树不起来。不破除旧的规章制度和旧的习惯势力，新的规章制度，新的社会秩序无从谈起。如，“一大二公”的传统观念，不先予以破除，就不能建立国营经济为主体的多种生产关系体制，使之与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不破除闭关自守的封闭型的旧观念，就不能自觉地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同样，不破除平均主义的旧观念，也就不可能认真地贯彻“按劳分配”的原则，通过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途径，达到全国人民共同富裕的目的。一句话，原来的旧观念、旧习惯、旧规章，不先破除，新观念、新秩序、新规章就难于建立起来。很显然，这种破是与立联系在一起的，破是为了立，破就内含着立，决不是“只破不立”。

当然，我国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了，但是，各种刑事犯罪分子还存在，各种各样的破坏分子还存在，他们采取各种手

段，破坏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他们是我们前进的严重障碍，对他们所进行的斗争也是“破”，不进行这种“破”，社会主义制度就立不住。对反动的、腐朽的旧观念不破除，新观念不仅立不起来，就是立起来，也难于存在和发展。

所以，我们在改造客观世界的斗争中，在破除旧观念树立新观念的过程中，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还应坚持“破字当头，立在其中”的原则。

二、先立后破

事物的发展还往往表现为“先立后破”，“立字当头，破在其中”。就是说，人们在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中，往往先建立一个新事物，然后推倒旧事物；先树立一种新观念，而后破除旧观念。拿思想工作来说吧，我们国家已经消灭了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已经不占优势，我们全党全国的总的政治任务已经是一心一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包括思想文化领域中的斗争，不能只是强调“破字当头”。主要是应当坚持正面教育和引导，宣传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进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及道德的教育，关心群众生活，帮助群众解决实际困难。特别是表扬好人好事，表彰社会主义的英雄人物。所有这些，对人们自觉地抵制剥削阶级思想的腐蚀和影响，树立共产主义道德观念有很大作用。这就是“立字当头，破在其中”。

在当前体制改革中，在现代化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时代，我们更要坚持“先立后破”，“立字当头，破在其中”的原则。比如，在人们的生产方式方面，一家一户，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在我国已经存在几千年了，它与现代化大生产相比，当然是落后的，但是急于破除行吗？实践证明不行。当我国生产力发展还达不到一定水平，科学技术发展还达不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落后的小农式的经营方

式是很难消灭的，人们的小农式的经营观念也是很难消除的。我们要改变这种落后的经营状况和观念，正确的途径是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和发展现代化的经营方式。现代化，机械化的经营方式在还未建立起来之前，就急于破除小农式的经营方式，急于破除在人们头脑中存在几千年的小农式的经营观念，是很难办到的。

马克思、恩格斯早在一百多年前讲的“两个决裂”的任务，怎样实现呢？与传统的所有制决裂，一般来讲容易做到，我们依靠政权的力量，努力发展生产力，在彻底消灭了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之后，就算基本上实现了。而实现与传统观念决裂，是非常艰巨的，单靠强制的办法，批判斗争的办法不行。主要应依靠积极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办法，发展文化科学教育事业，宣传和树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不断地提高人们的文化科学水平和共产主义道德观念，进而抵制剥削阶级思想对人们的影响，这样才能不断地破除旧观念，与旧的传统观念决裂。这也就是“立字当头，破在其中”。可以说，新的观念不树立，旧的观念破不了。不发扬光大共产主义思想，不宣传共产主义的好人好事，一天到晚地搞大批判，什么“八亿人民都抓上层建筑”、“在上层建筑中实行全面专政”等等，这只能使人心神不安，旧思想批不倒，新观念树不起来。这已为社会实践所证明。

当然，这决不是说对少数敌对分子不进行斗争了，也不是说对少数以权谋私，搞不正之风的人不进行揭露了。我们是说，只要不超出法律许可的范围，就不要采取批判斗争的方法。这是我们几十年来的经验教训。

三、破和立的统一

破和立的关系，是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的。破中有立，立中有破。我们讲“立字当头”，决不是不要破；同样，我们说“破字

当头”，也决不是不要“立”，而是要正确处理破和立的辩证关系。在当前的经济、政治体制改革中，有许多陈规旧制要破除。但是，这种破，要服务四化建设这个“立”，要有利于生产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破旧制和立新制，破旧观念和立新观念要紧紧密结合，决不允许只“破”不“立”，搞什么“破”了再说。

所以，在当前的全面改革中，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在“破”和“立”的关系方面，应当坚持两条：一是“先破后立”，即“破字当头，立在其中”；二是“先立后破”，即“立字当头，破在其中”。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里，由于消灭了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坚持第二条原则比第一条显得更为重要。这就是破和立的辩证法。

第二节 政治和经济统一

关于政治与经济的关系，列宁作过明确概括：“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①。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引用列宁这段话时指出，这是我们对政治和经济关系的基本观点。

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

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是指政治是阶级的经济利益的集中表现。经济即物质生产总是为了人们的某种物质利益而进行的。例如，资本主义生产是为了追求剩余价值，获取最大限度的剩余价值是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社会主义生产是为了不断地满足广大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满足这种需要是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的经济利益。所谓政治就是这种不同阶级的经济利益的集中表现。因为对立的阶级之间的经济利益是冲突的，所以政治也就是各个阶级之间基于经济利益的阶级斗争。

① 《列宁选集》第4卷，第441页。

不同的历史时期，政治集中反映的经济内容是不同的。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之前，它的经济利益作为阶级的基本利益集中起来，就是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正如列宁所说：“无产阶级的基本经济利益只能经过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的政治革命来满足。”^①但是，当无产阶级取得了政权，并且基本上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之后，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斗争中，必须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打击和粉碎国内外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扫除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障碍，必须正确处理各方面的矛盾关系，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高速度发展社会生产力。列宁在1920年底曾讲过，我们的斗争有两个方面，一方面“要粉碎资产阶级制度遗留下来的东西，粉碎整个资产阶级一再想消灭苏维埃政权的尝试”；另一方面是“从事国家建设的政治”，“经济方面的政治”，“我们走向战胜白卫分子的每一步都会使斗争的重心逐渐转向经济方面的政治。”^②列宁这段话清楚地说明，政治在无产阶级所进行的各项斗争中都存在，在保卫和巩固无产阶级政权的斗争中存在，在进行国家建设发展经济的斗争中也存在，而且在基本上消灭了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以后，政治的重心越来越转向经济方面。比如，今天我们最大的政治，是全力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因为，现代化建设的成败，直接关系到无产阶级专政的巩固和发展，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社会生活的安定和经济利益不断得到满足。

社会实践还告诉我们，完成某个经济任务本身也就是政治。因为，在某种情况下，无产阶级的经济利益，还直接表现在某个具体经济任务的完成上。这时，完成这个任务本身就是政治。例如，苏联在国内战争时期，农民以及一部分工人，由于饥饿等原因产生不满情绪，阶级敌人则利用这一点搞反革命叛乱。在这种

① 《列宁选集》第1卷，第262页。

② 《列宁选集》第4卷，第370页。

情况下，就象列宁所说的：“从事国家的经济建设，收获更多的粮食，供应更多的煤炭，解决更恰当地利用这些粮食和煤炭的问题，消除饥荒，这就是我们的政治。”^①象我国60年代初，由于国外敌对势力的封锁，我国面临着缺乏石油的严重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说，开发石油，实现石油自给，就是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

总之，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经济是政治的基础。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要落实到各项具体的经济工作中去，落实到各项具体的业务工作中去，否则，政治工作就会变成脱离经济基础的“空头政治”。

二、思想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

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这个科学论断，不仅包含政治来源于经济，而且包含政治反作用于经济。列宁说：“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②，毛泽东说的政治是统帅，是灵魂，都是讲的政治对经济的能动作用。政治对经济的能动作用，集中表现在，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

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它一切工作的生命线，这是合乎实际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结论。而“生命线”的真正含义，就是“服务”和“保证”作用。恩格斯曾说：“政治权力不过是用来实现经济利益的手段”^③。列宁也说：“任何民主，和一般的任何政治上层建筑一样（这种上层建筑在阶级消灭之前，在无阶级的社会建立之前，是必然存在的），归根到底是为生产服务的。”^④毛泽东明确指出：“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是完成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的保证，

① 《列宁选集》第4卷，第370—371页。

②④ 《列宁选集》第4卷，第441、439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6页。

它们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①无产阶级革命领袖这些论述说明，思想政治工作是为经济建设服务的。在我国新的社会主义历史时期，思想政治工作就是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保证经济建设工作和其它一切工作的社会主义性质及方向。诸如在经济工作中，保证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各个经济组织的社会主义性质，坚持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坚持对外开放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相结合，坚持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一致的原则，等等，都要依靠马克思主义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作指导，都要有各种具体的法规、措施和强有力的组织工作，也就是说，都要依靠坚强的思想政治工作。否则，“我们的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稍为一放松，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就一定会走到邪路上去。”^②我们的领导干部，如果“不注意思想和政治，成天忙于事务，就会成为迷失方向的经济家和技术家，很危险^③”。

只有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才能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使我们的经济建设，在安定团结的环境中顺利进行。我们必须依靠思想政治工作，使人们在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问题上保持清醒的头脑，既要看到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有力打击极少数犯罪分子的破坏活动，又要防止把阶级斗争扩大化。处理大量存在的人民内部矛盾，更离不开思想政治工作，因为人民内部矛盾的解决，单纯靠经济手段或行政措施是不够的，而必须把各种经济的和行政的手段同思想政治工作结合起来，要经常教育我们的干部和人民从全局出发，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批评各种错误思想，特别是同那些严重的官僚主义，极端个人主义进行斗争，才能保证人民内部的团结，使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得以顺利进行。

只有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才能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保证

①②③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03页。

劳动人民以主人翁的姿态从事社会主义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人民自己的事业，只有依靠人民群众的觉悟、智慧和力量，才能取得成功。革命的思想政治工作的重大意义之一，就在于能够使劳动者振奋精神，自觉地履行自己作为国家和社会主人翁的光荣职责，积极地投身到创造性劳动和工作中去。

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是我们党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胜利的经验总结。早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为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所写的古田会议决议中强调，用无产阶级思想建军、建党、反对党内存在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反对单纯军事观点。1934年2月，在召开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次全国政治工作会议上，当时的军委主席朱德和副主席周恩来明确地把思想政治工作比作“生命线”朱德讲：“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周恩来也说：“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你们是领导者，每一战争的胜利离不开你们，离不开政治工作。”

在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党在1942年进行的整风运动，这是一场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也可以说是全党进行的一次相当普遍而深入的思想政治工作，它为党的“七大”的胜利召开作了思想准备，为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这个时期最大的思想政治工作，是动员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周恩来在《抗战军队的政治工作》一文中，深刻论述了“革命的政治工作是民族革命的生命线。”他指出：“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以革命主义为基础的革命政治工作是一切革命军队的生命线与灵魂！”^①解放战争时期，在解放军内开展“诉苦”（诉旧社会和反动派给予劳动人民之苦）和“三查”（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运动，同样也是一场深刻的思想教育运动，它大大提高了全军指战员为消灭蒋介石反动派，解放全中国而战的自觉性。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更加深刻地论述了思想

①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93页。

政治工作是统帅，是灵魂，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1955年，他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按语中，进一步论述了“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的思想。1958年2月，他在《工作方法六十条》中提出：“把党的工作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去”，“思想和政治又是统帅，是灵魂”^①。在这一历史时期，我们党通过大量的思想政治工作，使广大干部和群众确立了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奋斗的信念。特别是毛泽东发出的“向雷锋同志学习”的战斗号召，极大地激发了广大青年建设社会主义的革命热情。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纠正了“左”的指导思想，大抓精神文明建设，各行各业激发出振兴中华、发奋图强的革命精神。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充分肯定了“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这一科学论断，把思想政治工作作为一门科学和完成各项工作的中心环节提了出来，它在内容、形式和方法方面，正在不断地充实和发展。所有这些事实充分说明，思想政治工作是革命和建设事业胜利的保证。

三、政治和经济的统一

政治和经济是统一的而不是截然分开的。政治来源于经济，决定于经济，又反作用于经济，为经济服务，这本身就表明了政治和经济是统一的。毛泽东针对在政治和经济关系中的形而上学的观点，明确指出：“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这是毫无疑义的，年年如此，永远如此。”^②因此，对于只讲经济，不讲思想政治工作的错误倾向，我们要坚决反对。而对林彪、“四人帮”鼓吹的所谓“突出政治”、“政治可以冲击一切”的反动谬论，则更应该永远摒弃，从而进一步明确政治和经济的有机统一的思想。

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为了适应改革、开放、搞活的

^{①②}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03页。

新形势，党中央强调指出，思想政治工作，不但不能削弱，而且要加强。如果放松或削弱了思想政治工作，就会贻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就会犯历史性的错误。所以，中共中央发出号召，不仅要建设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建设高度的精神文明，要“两个文明”一起抓，通过对人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的教育，抵制和克服剥削阶级思想对人们的侵蚀和影响，等等。这些号召对激励人们建设社会主义的革命热情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也确实出现了忽视思想政治工作的错误倾向。有的人讲：“物质文明搞好了，精神文明就自然而然的上去了”；有的人认为，只要动脑筋发奖金，就可以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更有甚者，有的人只是动脑筋不择手段的搞钱，至于祖国的前途，人类的理想都置于脑后，等等。这些现象，我们必须加以注意和克服。毛泽东早就讲过：“政治和业务的关系，是两个对立物的统一。一定要批判不问政治的倾向。一方面要反对空头政治家，另一方面要反对迷失方向的实际家。”^①

总之，我们党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总结出一系列关于思想政治工作的理论，强调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我们必须发扬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全力抓好思想政治工作，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推向前进。

第三节 红与专的统一

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在教育、科学文化领域，表现为政治与业务、红与专的统一，就是处理好红与专的关系，走又红又专的道路。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03页。

一、红与专的科学含义

在50年代，毛泽东就提出“又红又专”的口号。所谓红，就是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和路线，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所谓专，就是掌握有关专业知识，具有专业技能，即各行各业的专业知识和专业能力。邓小平于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上说：“毛泽东同志提倡知识分子又红又专，鼓励大家改造资产阶级世界观，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世界观的重要表现是为谁服务。一个人，如果爱我们社会主义祖国，自觉自愿地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工农兵服务，应该说这表示他初步确立了无产阶级世界观，按政治标准来说，就不能说他是白，而应该说是红了。”^①这段话概括了“红”的客观标准，纠正了长期以来形成的“左”的错误观念。

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内，在红与专的问题上，有很大的混乱。“四人帮”胡说“知识越多越反动”，鼓吹“宁要没有文化的劳动者”，把既无知识又无专长的交白卷的小丑捧为“红专”的榜样，把孜孜不倦，刻苦学习，为祖国的科学技术事业作出贡献的好同志诬蔑为“白专”的典型。这完全是一种是非混淆，黑白颠倒。科学事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一个重要方向。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证明，科学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显得越来越重要。我们的知识分子为发展社会主义科学事业，日夜奋战，不畏劳苦，努力攀登科学高峰，并作出贡献，这固然是专的表现，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红的表现。我们不能要求科学技术工作者，至少是绝大多数科学技术工作者，读很多的政治理论书籍，参加很多的社会活动，开很多与业务无关的会议。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动不动就用“脱离政治”的罪名来打击科学技术人员，谁努力钻研

^① 《邓小平文选》，第89页。

业务，就会被扣上“白专”帽子。“白是一个政治概念。只有政治上反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才能说是白”。^①把努力钻研业务与白扯在一起是极其错误的。

社会主义事业是有分工的。各行各业的同志在坚持社会主义的政治立场的条件下，努力做好自己岗位的工作，这不但不是脱离政治，而且正是有社会主义觉悟的表现。

二、红与专的统一

红与专的关系，如同政治与经济的关系一样，是对立的统一。两者既相互区别，又互相联系，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一方面，专不能离开红，技术不能脱离政治。无产阶级政治为专业技术人员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专业技术人员脱离了无产阶级政治的正确指导，脱离了社会主义轨道，脱离了人民的需要，就会迷失方向。另一方面，红也不能脱离专，政治也不能脱离专业技术。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里，一个人天天学政治，不懂业务也不行。毛泽东明确说：“政治家要懂些业务。懂得太多有困难，懂得太少也不行，一定要懂一些。不懂得实际的是假红，是空头政治家。”^②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一方面要反对空头政治家，另一方面要反对迷失方向的实际家。”^③

社会实践已证明，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里，知识分子不学习无产阶级政治，不树立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思想，不确立为建设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的志向，不仅难于学好科学技术，就是学到一点“真本领”，也难于充分发挥作用，甚至会走向背离社会主义的歧途。同样，一个人没有一定的专业知识，既不能很好地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也不能很好地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方向。如果一个人只是口头上讲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而实际上不钻研自己所从

① 《邓小平文选》，第91页。

②③ 《毛泽东著作选读》，第804、803页。

事的事业，不热爱自己的工作，不去积极地为社会主义作贡献，就不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脱离专的红，不是真正的红，真正的红必须与专结合起来。在实际工作和生活中，要坚持红与专的统一，反对两种倾向。

三、又红又专——知识分子成长的必由之路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国之后一段时间里，我们党对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采取了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在这个方针的指导下，从旧社会过来的许多知识分子，积极投入民主革命的实践活动，特别是50年代初期，许多知识分子积极参加土地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运动，投身到社会实践中去改造自己，精神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此，我们要给予充分的肯定，这说明知识分子注意改造世界观是十分必要的。因为，知识分子是掌握文化知识和科学技术的人，这就涉及到把科学文化知识去为谁服务的问题，这里有立场、有世界观问题。就是在今天，知识分子已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也并不意味着不要改造世界观了。邓小平同志指出：“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里，人人都要改造。不仅那些基本立场没有转过来的人要改造，而且所有的人都应该学习，都应该不断改造，研究新问题，接受新事物，自觉地抵制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袭，更好地担负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① 知识分子注意世界观的改造，这是知识分子走向又红又专道路的关键所在。当然，我们党在知识分子改造问题上，犯过“左”的错误，尤其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残酷打击迫害广大知识分子，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错案，极大地挫伤了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但这是甄别和平反问题，这并不能否定知识分子改造世界观的必要性。

^① 《邓小平文选》，第90—91页。

知识分子怎样不断的改造自己？1956年1月，周恩来在《关于知识分子的问题》报告中，全面而系统地论述了知识分子改造世界观的必要性和基本途径。他说：“知识分子的改造通常经过三条道路：一条是经过社会生活的观察和实践；一条是经过他们自己的业务实践；一条是经过一般的理论的学习。这三个方面是互相联系的，一个人的思想的转变常常在这三方面都受了影响。但是，一般地说来，社会生活的教育作用最为广泛和直接。”^①这就是说，知识分子只有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活动中，努力地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才能逐渐改造非无产阶级思想。同时，知识分子也要深入实际，深入工农群众与广大工农群众相结合，克服思想方法的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做到主观和客观，知和行、理论和实践的历史的统一。知识分子改造主观世界的根本途径是深入群众，参加社会实践。周恩来这些分析，是切合实际的，在今天看来仍然是正确的，并对调动广大知识分子参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走又红又专的道路，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与此同时，我们党也主张，科学技术人员，以及广大的知识分子应把最大的精力放到科学技术工作和其他业务工作上。周恩来在《关于知识分子的问题》的报告中，要求改进党对知识分子的工作，保证知识分子至少有六分之五的工作日用在自己的业务上。1978年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重申了周恩来这个重要意见，并强调指出：“我们说至少必须保证六分之五的时间搞业务，也就是说，这是最低的限度，能有更多的时间更好。”^②在教学、科研和生产劳动上，不少知识分子付出了全部的精力，往往是废寝忘食、呕心沥血，这正是他们热爱社会主义事业的忘我精神的崇高表现，我们对于他们应当充分地肯定和鼓励。无数的事实说明，知识分子只有把全副的精力投入发展我国的科学文

①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77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91页。

化事业中，专心致志，精益求精，不畏劳苦，百折不回，才有可能攀登科学技术的高峰，为繁荣我国的科学文化事业做出自己的贡献。

总之，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在知识分子方面，要教育他们处理好红与专的关系。我们知识分子、大学生、科学技术专家、文学家、新闻工作者等等，都应当努力学习，既要努力学习业务，又要注意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深入工农群众，确立无产阶级立场、观点和方法，在又红又专的大道上不断前进！

第四节 理想教育要科学化和具体化

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根本目的和任务，就是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和道德教育人民群众，使人们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树立坚定的信念，提高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讲：我们的报刊、电视和所有宣传工作都要注意对人们进行共产主义理想教育，“我们一定要经常教育我们的人民，尤其是我们的青年，要有理想。”^①他还指出：“要教育我们的下一代两代，一定要树立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一定不能让我们的青少年作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俘虏，那绝对不能。”^②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是人们的力量源泉和精神支柱。有远大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人们才能目光远大，胸怀开阔，斗志顽强，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道路；反之就有可能发生种种迷失方向的危险。

一、理想是现实与未来的统一

什么是理想？按照一般的说法，理想是人们对未来的向往和

^{①②} 邓小平：《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第5、7页。

追求，是同奋斗目标相联系的、有实现可能的信念。理想作为人们向往与追求的奋斗目标，是随着人类社会的产生而产生的。人类从产生的时候起，就有了对美好目标的追求。但是，人类有了对未来目标的设想和追求并不等于就有了理想。因为理想还有更深刻的含义，它不仅是一种奋斗目标，而且必须是一种可能或者有望实现的奋斗目标。在社会生活中，有的人向往未来的天国生活，以求精神上的安慰；有的人做着各种各样的黄金梦，企图靠偶然的成功发财致富；等等。但这些还都不是理想，只能是空想或梦想，因为他们不是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也没有找到（有些是不可能找到）实现的道路和方法。而理想是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共产主义是人类的伟大理想，在于“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的整个思想体系，同时又是一种新的社会制度。”^① 共产主义社会制度是由共产主义思想体系所发现和揭示的人类最理想的社会制度，是人类社会制度的最高形态。共产主义之所以能够成为无产阶级的伟大理想，完全在于它的科学性，在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把唯物辩证法应用于人类社会的研究，揭开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找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规律，代表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根本利益，得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科学结论。正象列宁所指出的：“资本主义社会必然要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这个结论，马克思是完全而且仅仅根据现代社会的经济发展规律得出的。”^②

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理想，是现实与未来的统一。理想来自现实，又高于现实，反过来对现实起指导和推动作用。理想来源于现实，是指理想不是凭空提出来的，而是通过对历史经验和现实条件的科学分析，从中推导出来的科学结论，是从现实条件出发确定的未来的奋斗目标。理想高于现实，是指理想从现实出发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第374页。

② 《列宁全集》第21卷，第15页。

去追求更高的目标，它意味着对现实的变革和发展，意味着创造出比现实更完美、更高尚的境界。因此，理想是现实的升华，它向人们提出了更高的奋斗目标，展示了更美好的前景，给人们以前进的方向，进取的力量，战胜困难的信心和勇气，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巨大力量，是人们变革现实的精神支柱。一百多年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在实践中受到检验，得到发展，并且“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磅礴于全世界，而葆其美妙之青春”^①。在世界范围内，在中国大地上，一代又一代革命志士前仆后继，用生命和热血谱写出共产主义理想之歌。在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中，老一辈革命家抛头颅，洒热血而毫不犹豫；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无数英雄人物锐意改革，日夜奋战而不辞艰辛，其原因就在于他们对共产主义伟大目标的孜孜不倦的追求。

从现实到理想有一个奋斗过程。共产主义是我们党的最终奋斗目标和最高理想，这个最高理想不是一下子就能实现的，而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它要经过若干发展阶段，因此，除了这个最高理想外，又必须有每个时期的奋斗目标。每个时期的奋斗目标，就构成了党在各个历史发展阶段的最低纲领。例如，在民主革命时期党的最低纲领，是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建立工人阶级为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共和国。“这个任务没有完成以前，社会主义是谈不到的”^②。在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就是现阶段我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理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实现最高理想的必经阶段，对我们共产党人和革命者来说，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奋斗，也就是为党的最高理想而奋斗。我们当前的理想教育工作，要同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理想结合起来，同各行各业的发展目标和建设任

①② 《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第375、372页。

务结合起来，同各自的岗位职责和人生追求结合起来。毛泽东明确指出：“我们不是空想家，我们不能离开当前的实际条件。”^①每一个历史时期具体任务的完成必将促使共产主义远大目标的最终实现。

在道德教育方面也是如此。共产主义道德是人类的最高尚的道德，但是，共产主义道德教育，也不能脱离现实，要照顾到多数人的实际思想水平，不要苛求每个社会成员都是共产主义战士。在当前要注意对人们进行社会主义道德教育，教育人们向善、向真、向美、尊重人、关心人。社会主义道德教育的基本要求是：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使“五爱”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体现出来。在同志间、在民族间、在家庭内部和邻里间、在人民内部的一切相互关系上，建立和发展平等、互助的社会主义新型关系，引导不同觉悟程度的人们一起向上，形成凝聚亿万人民的强大精神力量。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②。“共产党人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③。这就是说，人们在完成当前任务的时候，不要忘记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为共产主义理想而斗争，要立足于完成现实的革命任务。为最高理想而奋斗与完成当前的革命任务是相辅相成的辩证统一的关系。共产主义是我们的最终目标和最高理想，完成现实的革命任务，是在架设通向共产主义的桥梁。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既要反对空谈共产主义的“理想主义者”，又要反对不要共产主义理想的盲目的“现实主义者”。毛泽东反复地说过，如果我们对现阶段的具体革命斗争的实践稍许放松，稍许怠工，稍许表现不忠诚，不热情，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第372页。

②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64、284页。

不准备付出自己的鲜血和生命，而空谈什么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那就是有意无意地，或多或少地背叛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就不是一个忠诚和自觉的共产主义者。我们提倡理想与现实的统一，鼓励人们为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而积极投身于建设社会主义的现实斗争，成为脚踏实地的目光远大的实干家，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为建设共产主义大厦培土奠基，添砖加瓦。

二、用科学方法向人们灌输马克思主义理论是理想教育的一条重要原则

人们的思想政治观点或意识的形成和发展，要受到整个社会意识和每个人的世界观的影响。而最重要的，对人们影响最大的社会意识乃是引导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它是整个社会意识的核心，支配或影响着其他社会意识，支配或影响着每个人的世界观。因此，宣传这一指导思想，强化这一指导思想对人们的影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最革命、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也是无产阶级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尖锐武器。无产阶级革命一刻也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同样，马克思主义也离不开无产阶级。马克思主义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无产阶级把马克思主义当做自己的思想武器。所谓思想工作，最根本的就是教育人们掌握马克思主义这个思想武器，用以改造社会和改造自然界，同时也改造人们的主观世界。

马克思主义理论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揭示。这种科学理论不会在人们头脑中自发产生，它只能经过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学习，才能逐步树立这

种思想。列宁曾多次指出，工人阶级运动只能自发地产生工联主义的意识，要使工人阶级获得科学社会主义的意识，必须从外部灌输进去。毛泽东也明确讲过：“政治工作的基本任务是向农民群众不断地灌输社会主义思想。”^①

在当今的时代，从本质上说，只有两种思想体系，即资本主义思想体系和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体系。而且，资本主义思想体系“经过了更加全面的加工，它拥有的传播工具也多得不能相比”^②，它的存在和影响比科学社会主义深广得多，久远得多。可以说，资本主义思想体系无孔不入，渗透到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而科学社会主义是年轻的，从全球来说才有一百多年之久的历史，社会主义社会出现在地平线上，才不过七十年之久。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自觉地积极地向人们灌输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就恰恰会受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控制”^③，把人们“投到资产阶级羽翼下去”^④。

有的人认为，在我们物质文明不发达的国家里，宣传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共产主义道德观念，是“超历史阶段”，等到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了，“人们的共产主义道德观念就自然而然的产生了。”这种观点是违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人们的思想观念不是与生产力直接相联系的，而是由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决定的。社会意识相对独立性的原理也说明，人们的思想观念的高低程度，与经济的发展水平也是不完全同步进行的。所以，用我国生产力发展的暂时落后性，否定向人们灌输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必要性，是根本错误的。

对人们进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灌输”工作，是一项传播真理的伟大工作，因而其“灌输”的方式和方法要注意科学性和具体化，绝对不要教条式的传授。列宁明确讲：“我们不赞成用棍子把人

①《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44～245页。

②③④ 《列宁选集》第1卷，第258、257、256页。

赶上天堂”^①。共产主义理想是具体的，它体现在我们的工作、学习和生活中。用科学的方式和方法，向人们灌输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是理想教育工作的一条重要原则。

三、关心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理想教育工作的出发点

毛泽东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使群众认识自己的利益，并且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②“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③马克思也说过，人民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关心人们的根本利益是理想教育工作的根本出发点。

我们强调加强对人们进行共产主义理想教育，当然包括要有计划地组织人民群众、党的干部，特别是广大青年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但是，仅仅这样做还不够。在组织人们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的同时，还要特别注意关心人们的“利益”，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不断满足人们对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追求及需要。否则，共产主义理想不仅难以在人们头脑中扎根，而且人们对共产主义理想和道德也根本不可能接受。人民群众所以拥护社会主义，就是因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使全体劳动者都过上富裕幸福的生活。我们党之所以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爱戴，就是因为她时刻关心着人民群众的疾苦，为人民的利益前仆后继，不怕牺牲，忠心耿耿地奋斗不息。从古至今，人们都是为一定的“利益”而从事改造自然界和社会的斗争的。历史经验也反复证明，我们党只要心里想着人民的利益，处处为了满足人民根本利益而努力工作，人民就有高昂的热情，奋发向上的精神，表现出极大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① 《列宁全集》第20卷，第58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13页。

③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563页。

我们的共产主义理想教育工作，绝对不要搞形式主义的“空头政治”，我们要切实把理想教育工作同关心群众生活，帮助群众解决实际困难结合起来。在这方面，我们党是有优良传统的。在革命战争年代，一方面，我们党的干部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政策交给群众；另一方面，我们党的干部深入群众与群众打成一片，关心群众生活，帮助群众解决柴、米、油、盐、住房之类的实际问题。党的干部以身作则，感动人心。这些优良作风，在解放初期还有所保留和发扬，后来由于“左”的影响，慢慢地变了，把共产主义理想教育工作，误认为是“政治运动”，“思想斗争”，“路线斗争”，伤害了许多同志。这方面的教训是很深刻的。邓小平同志依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历史的经验明确指出：“不讲多劳多得，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革命精神是非常宝贵的，没有革命精神就没有革命行动。但是，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是唯心论。”^①

教育群众充分认识自己的根本利益，调节好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整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关系，就要实行物质奖励和精神鼓励相结合。物质奖励和精神鼓励是相辅相成的，两者互为补充，缺一不可。所谓物质奖励，就是指运用物质利益原则来满足人们的一定生理需要和物质要求，以此来保证人民的生存和发展，调动人们生产、学习和工作的积极性。所谓精神鼓励，就是运用表扬先进，给予荣誉等办法，鼓励人们奋发向上，调动他们革命和生产的积极性，激励他们为祖国繁荣富强、为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而奋斗。这种精神鼓励可以使人感到心理上的满足，感到自己被重视、受尊重，看到自己的生命价值和意义，提高其主人翁的责任感、荣誉感和自信心。

^① 《邓小平文选》，第136页。

共产主义理想教育是具体的，它体现在我们的工作、学习和生活中，对人们进行共产主义理想教育，决不是要求人们死背几条马克思主义原理，而是教育人们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不断克服自己头脑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树立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和人生观。在当前，共产主义理想教育工作的科学化和具体化，是思想政治工作极待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只要我们坚持不懈地努力，加强和改进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我们的国家在不远的将来，一定能以社会主义强国的风姿屹立在世界的民族之林。

第十五章

军事辩证法

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毛泽东的军事著作，既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军事理论的极为杰出的贡献”，又“提供了在实践中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的光辉的范例”。毛泽东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来研究战争，尤其是把唯物辩证法运用于军事实践，揭示了战争规律和战争的指导规律，研究了战争力量的推移与转化，指明了战争发展的趋势与战争的形式，阐明了战略学与战术学中的辩证法诸范畴，等等，从而对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作出了独特贡献。

第一节 唯物辩证的战争观

毛泽东在他的军事著作中，运用唯物辩证法，对战争与政治、战争与革命、战争与经济的相互关系作出了明确的论述，指出正确处理它们之间的辩证关系，是夺取战争和革命胜利的根本问题。

一、战争与政治

列宁说：“辩证法的基本原理运用在战争上就是：‘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即暴力）‘的继续’”。^①

毛泽东总结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经验，运用一般与特殊的辩证

^① 《列宁选集》第2卷，第626页。

法，继承和发挥了列宁关于战争与政治关系的观点。他指出：“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战争是流血的政治。”^①这就指明了战争与政治的内在关系。毛泽东说：“‘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在这点上说，战争就是政治”^②，从古以来没有不带政治性质的战争。但他又说：“战争有其特殊性，在这点上说，战争不即等于一般的政治。”^③他完全同意列宁的“战争是政治的特殊手段的继续”的论断。政治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再也不能照旧前进，于是爆发了战争，用以扫除政治道路上的障碍。为此，毛泽东批判了两种错误观点：一种是把战争和政治等同起来；另一种是把战争和政治割裂开来。他指出，既要反对脱离政治的单纯军事观点，又要反对离开军事谈政治的“空头政治”。毛泽东不仅一般地考察了战争与政治的关系，而且特别区分了战争的直接目的与战争的政治目的这互相关联的两件事。战争的直接目的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而战争的政治目的，或是为民族压迫或民族解放，或是为阶级压迫或阶级解放。战争实行者总是通过战争的直接目的来达到战争的政治目的的，二者相比，战争本身就成为手段了。

毛泽东在阐述政治决定战争、战争从属于政治的同时，着重指明了战争对政治的反作用。他在《论持久战》中指出：“国内政治的改进，是和抗战的坚持不能分离的。政治越改进，抗战越能坚持；抗战越坚持，政治就越能改进。但是基本上依赖于坚持抗战。”^④“革命战争是一种抗毒素，它不但将排除敌人的毒焰，也将清洗自己的污浊。凡属正义的革命的战争，其力量是很大的，它能改造很多事物，或为改造事物开辟道路。”^⑤毛泽东对战争和政治的辩证关系的论述，为我们从整体上把握战争指明了方向。

毛泽东根据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这一基本思想，明确提出了无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第231页。

②③ 同上，第230页。

④⑤ 《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第205页、第206页。

产阶级军队的政治建军原则。建军原则主要包括：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在军队中建立政治工作制度；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唯一宗旨；执行战斗队、工作队、生产队三大任务；实行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瓦解敌军的政治工作三大原则；开展政治、经济、军事三大民主；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牲和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等等。几十年来，人民军队中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有了很大发展和创造，现在的面貌和过去大不相同，但基本路线没有变。历史反复证明，以军代政或以政代军，都会给实际工作造成极大的危害。

二、战争与革命

战争与革命是战争与政治关系的一个侧面。马克思很早就发现了战争与革命之间的内在联系。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向外扩张，必然会引起殖民地国家人民的强烈反抗。中国鸦片战争后连绵不断的起义，英国的大炮是一支主要的催化剂。不过，马克思还没有把战争引起革命作为帝国主义时代的一条规律明确提出。

列宁深刻地研究了帝国主义的本质和历史特征，提出了帝国主义就是战争的明确论断，揭示了帝国主义战争与国内战争、帝国主义各国之间的战争与民族解放战争之间的相互转化的客观规律。列宁说：“战争必将导致无产阶级革命。”^①“没有革命的发展，战争是结束不了的。”^②斯大林也指出：“战争一定会引起革命，并使一些国家的资本主义的存在本身发生问题，就象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进程中所发生的情形那样。”^③

毛泽东继承了列宁的思想。他认为，战争固然可以导演出帝国主义国家里的无产阶级革命，更可以导演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里的民族民主革命。战争教育了人民，人民将赢得战争，赢得

①② 《列宁选集》第3卷，第90页，第92页。

③ 《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261页。

和平，又赢得进步。毛泽东不仅肯定了战争与革命之间的相互转化，肯定了暴力革命是普遍规律，而且运用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相互联结的原理，分析了在不同国度，在有战争和没有战争的情况下，实行暴力革命原则的具体途径。毛泽东指出，在资本主义各国，在没有法西斯和没有战争的时期内，要经过长期的合法斗争，利用议会讲坛，经济的和政治的罢工，组织工会和教育工人，一旦革命爆发，首先占领城市，然后进攻乡村；但在另一类国家，象中国这样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内部没有民主制度，外部没有民族独立的情况下，则是从革命一开始，就要进入武装斗争，包括国内战争，也包括对外民族战争，是走先占领乡村，后取城市的道路。^①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这一重要思想受到林彪一伙的肢解和篡改，片面地把井冈山道路夸大成为夺取革命胜利的唯一道路，无条件地适用于世界各国。为此，毛泽东在1970年回答日本朋友安斋库治关于这个问题时，重申了他在1938年对不同类型的国家革命观点仍然有效。这就阐明了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具有不同的特点，要取得革命的胜利可以走不同的道路。

毛泽东还认为，革命可以制止战争。这个思想最早是由列宁提出的。列宁指出：“战争是由一定阶级进行的，……。只有把政权交给另一个阶级，才能停止战争。”^②说明不仅战争对革命起巨大的加速作用，而且，革命对战争有巨大的反作用。毛泽东指出，正义的战争，可以制止和消灭非正义战争，实现真正的和平。他说：“人民是决定的因素，依靠人民的团结和斗争，必能战胜帝国主义和他们的走狗，取得世界的持久和平。”^③这就是说，革命的发生可以打破敌人的时间表，推迟战争的来临。这里，必须作辩证

① 参见：《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第290—291页。

② 《列宁全集》第24卷，第123页。

③ 见1960年5月9日《人民日报》。

的科学分析，既要承认革命对战争的反作用，又不能把革命制止战争作绝对的、机械的、形而上学的理解。

共产党人并不是“战争万能论”者，我们是主张和平反对战争的，我们拥护正义战争、反对非正义战争。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用战争反对战争，用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用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民族反革命战争，用阶级革命战争反对阶级反革命战争。”^①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在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经过二十多年长期的革命战争，打败了国内外敌人，建立了新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在国内铲除了发动战争的根源，为维护世界和平作出了贡献。毛泽东说：“如果帝国主义者一定要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可以断定，其结果必定又要有多少亿人口转到社会主义方面，帝国主义剩下的地盘就不多了，也有可能整个帝国主义制度全部崩溃。”^②

三、战争与经济

战争依赖于经济，经济是战争的物质基础。一切社会发展和变革的最后决定力量是生产方式，有什么样的生产方式，就有什么样的政治，就决定着什么样的战争。战争的性质、战争的政治目的、战争的规模、战争的形式，都是由生产方式决定的。

恩格斯指出：“暴力的胜利是以武器的生产为基础的，而武器的生产又是以整个生产为基础”^③。毛泽东说：战争是力量的竞赛，“战争不但是军事的和政治的竞赛，还是经济的竞赛。”^④这就是说，战争就是两军指挥员以军力、财力等项物质基础作资本，互争优势和主动的主观努力的竞赛。战争作为一种社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第92页。

②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94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06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25页。

会历史的运动现象，其形式、规律、强度、军队的武器装备、人员的数量和质量、军队的编成和组织、以及战争指挥规律思想的发展，归根到底是由社会生活的经济条件、物质技术条件所决定的。在长期的中国革命战争中，毛泽东总是强调物质经济条件的作用。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指出工农武装割据的存在和发展的重要条件之一，就是要“有足够给养的经济力。”^①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分析抗日战争之所以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属于中国的原因时，指出了战争是正义的还是非正义的，是得道多助还是失道寡助等政治方面的原因外，特别强调了军力、财力等物质经济方面的原因。日本在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在东方是一等的。相反，中国则是一个弱国，在军力、财力、经济力、政治组织力各方面都不如日本，因而决定着中国的抗战不能速胜，只能进行持久战。但是，日本却又先天不足，它国度小，人力、军力、财力等物质经济条件均感到缺乏，经不起长期战争的消耗。而中国是一个大国，能够支持长期的战争消耗，经济物质的潜在能力，加上政治的主观方面的因素，必然促使敌我强弱的转化。因此，亡国论是错误的，日本必败，中国必胜。

毛泽东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在艰苦的战争环境，把进行革命战争与发展生产辩证地统一起来，既指出战争依赖于经济，又强调积极进行经济建设，创造战胜敌人的物质条件。他要求我军一方面进行革命战争，在军事上狠狠打击敌人；另一方面利用作战间隙开展生产运动，创造战争所必需的物资。这样，既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得到了人民的拥护；又能支持革命战争，用以扩大军队，扩大解放区，达到消灭一切敌人，解放全中国的目的。

毛泽东在强调战争依赖于经济的同时，还指出战争又是为经济服务的。无论是革命的战争，还是反革命的战争，都是为着本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56页。

阶级一定的经济利益和政治目的所采取的暴力手段。他说：“帝国主义的本性是掠夺，帝国主义国家在‘和平’时代的政策也无时不是为了掠夺。但如果一些帝国主义国家的掠夺政策遇到了另一些帝国主义国家的阻碍而不能用和平方法冲破这种阻碍时，就使用战争方法去冲破这种阻碍，以便继续其掠夺政策。所以，掠夺——这就是帝国主义战争的唯一的目的。”^①

总之，战争与经济的关系是辩证的统一，战争依赖于经济，从事革命战争不能脱离经济；同时，战争又为经济服务，经济是战争的最终起因。战争实践证明，过去的战争依赖于经济，未来现代化的战争更要依赖于经济。任何割裂战争与经济的关系，都是片面的、错误的。我们既要反对否认战争依赖于经济的唯心论，也要反对无视政治因素、把经济因素唯一化，或否认战争对经济的反作用的战争机械论。

第二节 战争的客观规律性和人的自觉能动性

战争是瞬息万变的，它较之任何别的社会现象更难捉摸，更少确实性。但战争不是神物，仍是世间的一种必然运动，它是有规律可循的，是可以为人们所认识的。探索战争的规律，实现对战争的正确指导，充分发挥人们的自觉能动性，是取得战争胜利的关键。

一、研究战争规律要着眼其特点和发展

所谓战争规律，就是指战争双方的政治、经济、军事、地理诸因素的内在联系及其发展趋势。毛泽东说：“军事的规律，和其他事物规律一样，是客观实际对于我们头脑的反映，除了我们的头脑以外，一切都是客观实际的东西。”^② 在战争中，要从实际出发，

① 《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第211页。

② 《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第101页。

就是从敌我双方的客观实际情况出发，研究敌我的军事、政治、经济、自然、地理和国际环境等条件，也研究双方的主观指导能力，弄清战争的客观规律，并据以制订出能够克敌制胜的战略和战术。毛泽东要求我们，不仅要研究一般战争规律，还要研究革命战争规律，更要研究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殊规律。他说：“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这是任何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决的问题。”^① 所以，我们要以一般战争的规律为指导，着重于研究特殊的战争规律，坚持战争研究中一般与个别、共性与个性的辩证法。

怎样才能把握战争的规律呢？毛泽东指出：“我们研究在各个不同历史阶段、各个不同性质、不同地域和民族的战争的指导规律，应该着眼其特点和着眼其发展，反对战争问题上的机械论。”^② 要把握战争规律，必须首先把握战争这个具体对象的特点。那么，从认识论的观点来看，战争究竟有什么特点呢？

第一，战争带有更大的流动性。孙子说：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这是合乎战争实际的。毛泽东指出：“战争是迅速地向前流动的（或运动的，推移的）”^③。

第二，战争有其不确实性。这不仅由于战争常常受天时、地利诸条件的影响和战争中的战略战术经常改变，而且战争双方都要保密，从而造成战争特有的不确实性。

第三，战争受偶然性（“盖然性”）的影响很大。战争是双方互争优势和主动权的激烈竞赛，各方都时刻想把对方抛入偶然性泥潭中，使其举棋不定，造成惊慌失措，甚至完全陷入被动挨打的境地。而自己的错觉和疏忽大意又往往被对方所利用，从而使战争运动具有双重的偶然性。

第四，战争的指挥者最容易受周围环境或部下情绪的影响。

①② 《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第89、91页。

③ 《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第248页。

毛泽东批评那种鲁莽的专凭热情办事的军事家，常常由于受敌人的欺骗，受敌人表面的或片面的情况的引诱，受自己部下不负责任的无真知灼见的建议的鼓动，从而以感情代替实际，从主观出发吃了大亏。

战争的这些特点，并不说明战争是不可认识的神物。一切战争指导规律和其他事物一样，都是依照历史的发展而发展，依照战争的发展而发展，一成不变的东西是没有的。我们看待和指导战争，必须树立发展变化的观点，克服静止、孤立的观点。朱德曾指出：人民军队的用兵方法，则是随机应变，变化无穷。他说：“我们用兵的主张，可概括为：有什么枪打什么仗，对什么敌人打什么仗，在什么时间地点打什么时间地点的仗。第一句话是根据部队武器装备，第二句话是根据敌情，第三句话是根据时间地形各种条件，这就是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的用兵新法。”^①

在战争中要真正做到着眼其特点和发展，最主要的就是要着眼于战争的历史条件、战争的性质和交战双方的力量对比这三个关键性的环节。战争的历史条件包括当时国内外的阶级斗争形势，战争所处的时代和地域。这些对战争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战争的性质即正义的和非正义的，关系着人心的向背，是决定战争命运的根本因素；战争力量对比包括双方政治、经济、军事、地理等多方面的比较。这些就决定了战争的态势和相应的指导原则。毛泽东认为，必须在深入分析各种基本特点的基础上进行科学的综合，从全部敌我因素的相互关系中产生我们的结论。他在《论持久战》中指出：“中日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全部问题的根据就在这里。”^②从这个根据出发，他具体地剖析了中日双方互相矛盾着的四个基本特点，即敌强我弱、

① 《朱德选集》，第168页。

② 《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第195页。

敌小我大、敌退步我进步、敌寡助我多助，这四组矛盾的基本因素的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排斥，就形成了这场战争从发生、发展到结局的必然趋势，这就是中日战争发展的客观规律。根据矛盾发展的必然趋势，毛泽东又科学地预见到在整个抗日战争的持久战的长过程中，必然要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这三个阶段和犬牙交错的战争形态。根据各个不同阶段的情况和特点，应当采取相应的战争形式：在战略防御阶段，主要是运动战，游击战和阵地战是辅助的；在战略相持阶段，游击战是主要的，运动战和阵地战是辅助的；在战略反攻阶段，运动战又升为主要形式，阵地战和游击战辅之。而在整个抗日战争中，主要和重要的形式是运动战和游击战。抗日战争的战局经过了曲折和复杂的发展过程，证明了毛泽东的预见是完全正确的。

二、战争的主观指导要符合于客观实际

战争的客观规律是必须遵守的，谁违背了它，就会立即受到惩罚。然而，人们只要充分发挥自觉能动性，认识并驾驭战争规律，就能夺取战争的胜利。

什么是人的主观能动性？毛泽东说：“思想等等是主观的东西，做或行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都是人类特殊的能动性。这种能动性，我们名之曰‘自觉的能动性’，是人之所以区别于物的特点。”^① 这表明自觉能动性，一是指认识，即人们根据对客观规律的认识而制订的计划、办法、方针、政策、战略、战术等；二是指实践，即在客观规律的基础上人们自觉地去指导工作和实施方案。可见，所谓主观能动性，是一个认识过程和行动过程的总和。

战争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活动形态。战争中的每一方为了打败对方，都倾注了自己全部的物力和智力。毛泽东对战争中人的主观能动作用给予极高的评价，他历来认为，主观和客观的统一是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45页。

打胜仗的关键。而解决战争中主客观矛盾的重要的一环,就是“知己知彼”。孙子说:“知彼知己者,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①毛泽东十分重视孙子的这一朴素的唯物主义认识论思想。毛泽东所说的“熟识敌我双方各方面的情况,找出其行动的规律,并且应用这些规律于自己的行动”,就是指的解决战争中主客观矛盾的根本方法。他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曾意味深长地指出:二十年了,才找到主观与客观相一致这个中国革命胜利的道路。

毛泽东进一步指出:重要的问题在善于学习。所谓学习,应理解为学习与使用两方面。他更强调在实践中学习,“从战争学习战争——这是我们的主要方法。”^②战争实践是认识战争规律的基础,是解决主客观矛盾的钥匙。当然,对战争的认识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对战争指挥员认识的深化运动作了完整的分析,揭示了认识过程的辩证法:首先,在计划与实施作战中,认识的对象必须包括敌我两个方面;其次,认识过程必须按照侦察、判断、决心、部署的逻辑顺序,使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不断深化对战争的认识,解决主客观的矛盾,实施正确的战争指导;最后,毛泽东说:“认识情况的过程,不但存在于军事计划建立之前,而且存在于军事计划建立之后。”^③从开始执行计划到战局终结止,这是又一个认识过程,即从理性认识回到实践的过程。毛泽东揭示的关于战争认识过程中两个飞跃的辩证法思想,为《实践论》产生作了准备。《实践论》就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从军事形态到哲学形态的升华。

三、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是人不是物

在战争中,如何看待人和武器的关系,是同尊重客观条件和

① 《孙子·谋攻篇》。

② 《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第100页。

③ 同上,第99页。

发挥自觉能动性的问题密切联系着的。古今中外的一切战争，人和武器总是它的基本要素，两者辩证地统一于现实的战争中。在战争这种暴力的对抗中，人和人之间处在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中，而武器则是体现这种关系的媒介物。一方面，人只有借助武器，才能实现其暴力意志；另一方面，武器只有借助于人的使用，才能在现实的战争中表现其作用。因此，离开人的武器和离开武器的人，都不能对战争的胜负发生作用。如果人为地割裂了人和武器这两种因素的内在的辩证统一关系，片面地强调一个方面，就会陷入“唯武器论”或“唯意志论”。

那么，在人和武器这两个因素的统一中，哪一个因素对战争的胜负起着主导的决定的作用呢？毛泽东指出：“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军力和经济力是要人去掌握的。”^① 武器是战争中的重要因素，不承认这一点，就是唯心论。但是，如果看不到战争中人的作用，不仅会陷入唯心论，而且会陷入机械论（“唯武器论”）。正确的作战方法是人和武器两种因素巧妙结合的表现。

恩格斯曾指出：“赢得战斗胜利的是人而不是枪。”^② 又说：“枪自己是不会动的，需要有勇敢的心和强有力的手来使用它们。”^③ 斯大林也指出：“决定战争命运的归根到底并不是苏联的敌人们大量供给高尔察克和邓尼金的技术装备，而是正确的政策和千百万人民群众的同情和支持。”^④ 为什么在战争中“决定的因素是人而不是物”？这是因为：

第一，“力量的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第21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第232页。

③ 同上，第16卷，第211页。

④ 《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96页。

和人心的对比。”战争的双方都是成群武装着的活人，而人总是物质与精神的统一体，人的这两个方面的因素即人力和人心是相互作用、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一方面，精神因素不是一种独立的力量，它必须和物质相结合，转化为物质力量才能表现出来；另一方面，如果没有精神因素，物质因素也不会自觉地发挥作用。在战争中，胜利究竟属于谁，归根结底还是由那些在战场上流血奋斗的群众决定的。

第二，“军力和经济力是要人去掌握的”。离开人，武器自身不会发生变化，威力再大的武器也不能成为战斗力，而且，武器发挥效力的程度也因掌握者的质量不同而不同。因此，在人与武器这两个因素中，人是主导方面。

第三，在具备了一定的客观物质条件的基础上，人的主观能动性对战争的胜负具有决定作用。比如，“往往有这种情形，有利的情况和主动的恢复，产生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①

可见，人和武器相比，人是第一位的，是决定的因素，武器则是第二位的，被人使用的因素。无论武器如何先进，威力如何巨大，它都是人发明和制造，并由人去掌握和使用的。刘伯承曾说过，无论现代新式武器，飞机、坦克、化学武器、新式火炮、机关枪之类，怎样精良到了不得，总是死的，都要靠活的人来使用；如果人的质量（包括政治的、军事的与纪律的训练和素养）不强，那么只有打败仗。任何先进的武器，都无法取代人的本质所赋予战争指导者的创造思维，洞察力和思考能力，主动性和勇敢精神等等。

在战争中，不仅要发挥指挥员的自觉能动性，还要充分发挥战斗员的自觉能动性。夺取战争的胜利，不仅要发挥军队的自觉的能动性，还必须依靠群众，大打人民战争，发挥全国民众进行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381页。

革命战争的自觉的能动性。毛泽东说：“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①“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②中国革命战争史，是以弱胜强、以劣势装备的革命军队打败优势装备的反革命军队的历史。这一敌我力量转化的过程，就是广大军民在客观物质基础上，充分发挥符合实际的自觉能动性夺取战争胜利的过程。

在当代，新式武器和军事技术迅猛发展，对未来作战行动必然产生重大影响。在现代战争中，物质因素对战争胜负的作用，有日益增长的趋势，应引起高度的重视。现代武器的杀伤力和破坏力是空前的，作战必须适应新武器的特点和要求，否则就会付出巨大的代价。但是，这并不能改变决定战争胜负的是人民，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的规律。

四、主动性、灵活性和计划性

毛泽东不仅一般地考察了人的自觉能动性，而且还考察了这种能动性在战争中的具体表现，这就是主动性、计划性和灵活性。他告诫我军的指挥员不要变成乱撞乱碰的鲁莽家，要成为勇敢而明智的将军，不但要有压倒敌人的勇气，还要有驾驭整个战争变化发展的能力。

首先，主动性是军队行动的自由权。毛泽东说：“这里说的主动性，说的是军队行动的自由权，是用以区别于被迫处于不自由状态的。行动自由是军队的命脉，失了这种自由，军队就接近于被打败或被消灭。”^③因此，“战争的双方，都力争主动，力避被动。”^④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第266页。

② 同上，第232页。

③④ 《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第239—240页。

军队的主动权是取得胜利的关键。然而，主动权不是现成的东西，而是要有意识地争取的东西，在战争中获得主动争得自由，必须具备三个基本条件：第一，把握战争过程的必然规律，采取正确的主观指导；第二，要集中优势兵力，造成战争力量的优势，“战争力量的优势或劣势，是主动或被动的客观基础。”^① 第三，要造成敌人的错觉和不意。毛泽东说：“有计划地造成敌人的错觉，给以不意的攻击，是造成优势和夺取主动的方法，而且重要的方法。”^②

主动和被动、优势和劣势的地位是可以改变的，关键就在于主观指导是否正确。主观指导正确，可以变劣势为优势、变被动为主动；主观指导犯了错误，优势会变为劣势、主动会变为被动。就中日战争来说，日本处于优势，具有某种程度的主动权，而我则是劣势，处于某种被动不利地位。但是，这种主动与被动的状况只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根据我兵多、地广的有利条件，利用敌人的弱点和不利因素，如：兵力不足、在异国作战、指挥笨拙等，实行战役、战斗上的外线速决的进攻战，造成我之许多局部的优势和主动，通过局部优势的积累就能造成战略优势和战略主动地位，为我军的行动自由创造客观基础。由于抗日战争是在中国广大领土上打的，我们可以依靠千百万群众，封住敌人的耳目，造成敌人的错觉，给以出其不意的攻击，这是使敌丧失优势和主动，造成我之优势和夺取主动的重要方法。

其次，灵活性是灵活地使用兵力，争取主动地位的最重要手段。

要取得战争的主动性，还必须坚持灵活性，灵活性是具体地实现主动性于作战中的东西。毛泽东说：“灵活，是聪明的指挥员，基于客观情况，‘审时度势’（这个势，包括敌势、我势、地势等

①② 《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第240、244页。

项)而采取及时的和恰当的处置方法的一种才能,即是所谓‘运用之妙’”。^①这就是说,要夺得优势的地位全在于指挥员用兵之“妙”即灵活地使用兵力,而这只有聪明的指挥员才能做到。灵活性具体表现于:第一,要善处自己,这就必须具有正确的战略方针和机动灵活的战术(包括使用战术和变换战术),掌握好时机、地点、部队这三个关节;第二,要善处敌方,千方百计地利用并且造成敌人的错误,包括诡诈的行为在内,语曰:“兵不厌诈”,这就是毛泽东所说的,利用自己的聪明而有效的动作,采用各种欺骗敌人的手段,在有组织的民众掩护之下,造成敌之判断和行动的错误,使敌人丧失优势和主动。

在游击战中,毛泽东提出了灵活地使用兵力的三个诀窍,即分散、集中和转移。分散时,不要绝对地平均分散,要使分散执行任务有一个重心和能够应付可能的事变;集中时,不要绝对地集中,要照顾到发动群众和在次要方向上箝制敌人等任务,就是要统筹兼顾,以避免顾此失彼;转移时,行动要秘密、迅速,“象流水和疾风一样,迅速地移动其位置。”^②充分发挥游击队行动灵活的优点,采用巧妙的方法去欺骗、引诱和迷惑敌人,使敌人疲于奔命,被动挨打,处于惶恐不安的境地,而自己则始终处于主动的地位。

再次,计划性是夺取战争胜利的根本保证。

指导战争离不开计划性。由于战争也是世间的一种必然运动,它虽然没有绝对的确定性,但还是有相对的确定性,这就为战争的计划性提供了客观基础。预先有了周密的计划和准备,才会有作战行动上的主动权和灵活性,才能实现进攻去夺取战争的胜利。所以,毛泽东说:“游击战争要取得胜利,是不能离开它的计划性的。”^③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第247页。

②③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383页。

基于战争的不确定性和流动性，就使战争很难完全和固定，因而，战争计划的特点只具有相对的固定性。一般来说，在一定的战略阶段内，战争具有较大的固定性，它仅随战略阶段的推移而变化。战役计划的固定性小一些，战术计划的固定性更小，然而在某一时期也有其固定性。那种夸大战争情况的不确定性和流动性，否认一定条件下相对固定的战争计划的观点，是战争问题上的相对主义。

在战争中，部分地改变计划的事是常有的，全部地改变计划的事也是间或有的。战争指挥员必须依据敌我双方的具体情况实施计划，根据战争的流动性和情况的具体变化，适时地改变计划，以适应新的情况。那种否认战争情况的不确定性和流动性，要制定一成不变的完全固定的计划的观点，是战争问题上的机械论。毛泽东指出：“在绝对流动的整个战争长河中有其各个特定阶段上的相对的固定性——这就是我们对于战争计划或战争方针的根本性质的意见”。^① 而没有计划，或不依据情况的变化而改变计划，只是乱干一阵，这是玩弄战争，必然会招致失败。

毛泽东说：“主动地位只有在进攻胜利之后，才能最后地取得。一切进攻战也都要主动地组织之，不要被迫地采取进攻。灵活地使用兵力，环绕于为着进攻战这个中心；计划性的必要，主要地也是为了进攻的胜利。”^② 实行战略上的内线持久的防御战和战役、战斗上的外线速决的进攻战的方针，都离不开主动性、灵活性和计划性。但主动性、灵活性和计划性又都是环绕于战役和战斗的进攻这个中心的。我国古代大军事家孙武说过：“战胜不复，而应形于无穷。”^③ 这就是说，取得作战胜利的方法，不应重复老一套，而要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多变。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第249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384页。

③ 《孙子·虚实篇》。

中国革命战争发展史,我军从小到大、由弱变强的战斗历程,有力地证明了毛泽东关于尊重客观规律性和发挥自觉能动性思想的正确性。

第三节 人民战争战略战术的辩证法

研究战争,不仅要研究战争的总体规律,而且要研究战争的局部规律,同时还要研究战争的指导规律,即战略战术问题。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总结了中国人民战争的丰富经验,创造了一整套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这是毛泽东军事辩证法思想中极为重要、精彩的部分。这里,仅从全局与局部、进攻与防御、集中与分散、持久与速决、内线与外线、游击战与正规战、运动战与阵地战、歼灭战与消耗战等方面略加叙述。

一、全局与局部

只要有战争,就有战争的全局和局部的问题。战略学就是研究战争之总体规律的科学。战术学则是研究战争之局部规律的科学。因此,战略是指导战争全局的,研究带全局性的战争指导规律,是战略学的任务;战役和战术是指导战争局部的,研究带局部性的战争指导规律,是战役学和战术学的任务。毛泽东指出:“世界可以是战争的一全局,一国可以是战争的一全局,一个独立的游击区、一个大的独立的作战方面,也可以是战争的一全局。凡属带有要照顾各方面和各阶段的性质的,都是战争的全局。”^①

全局是由它的一切局部构成的。但作为整体的全局并非局部的“机械迭加”而成,而是一个有机的统一整体。在战争中,一定要认识和处理好全局和局部的关系。

第一,要树立全局观点,统观全局,局部服从全局。毛泽东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第93页。

指出：“战争的胜败的主要和首先的问题，是对于全局和各阶段的关照得好或关照得不好。如果全局和各阶段的关照有了重要的缺点或错误，那个战争是一定要失败的。”^①又说：“没有全局在胸，是不会真的投下一着好棋子的。”^②所以，任何一级指挥员，都要胸怀全局，在作战指挥上，不但要考虑到左邻右舍，而且要考虑到各个阶段、各个方面的情况及其对全局的影响。毛泽东以反“围剿”中退却终点的选择，说明从全局看问题的重要。第一次反“围剿”时，红军退却的终点选在根据地的中部，第二次和第四次反“围剿”时选在根据地的前部，第三次反“围剿”时选在根据地的后部。这都是根据当时发展变化的敌我态势，权衡全局的利害而确定的。实践证明了这些决策的正确性。只有在第五次反“围剿”时，“左”倾教条主义者全然不顾整个形势的变动，没有全局和长期的打算，完全是一种缺乏战略头脑的“鲁莽灭裂的干法”。

第二，局部构成全局，影响全局，必须重视局部，没有局部也就没有全局。全局支配局部，局部隶属于全局，而局部又反作用于全局，局部具有相对独立性。毛泽东在总结战争实践经验时，十分注意那些对全局有决定意义的局部。为此，他作了具体分析：一是，战争中有些局部破坏或失败了，对全局不起重大影响，就是因为这些局部对全局没有决定意义。因此，有些战术或战役的失败，常常不至于引起战争全局的变化；二是，组成战争全局的多数战役失败或破坏了，全局就会起变化，多数局部（战役）就成为决定性的东西，这就是量变引起质变；三是，某一、二个战役失败了，全局就会起变化，这是指具有决定意义的局部。所谓“一着不慎，满盘皆输”，就是指带全局性的有决定意义的一着，而不是说的只带局部性的即对全局没有决定意义的一着。

战略和战术的关系，实际上也是全局与局部的关系，毛泽东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第94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05页。

提出了一条重要的战争指导原则，即在战略上我们要藐视一切敌人，在战术上我们要重视一切敌人。

第三，全局与局部在一定条件下会相互转化。因此，我们不能凝固地、静止地看待和处理战争中的各种问题，对于全局和局部的划分要随着具体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在全局与局部区分上的这种变化发展的辩证关系，就要求人们在战争指导上不要陷入僵死不变的形而上学，而要依时间、地点和条件为转移，把自己注意力的重心，始终放在那些对全局来说有决定意义的问题和动作上。

二、进攻与防御

进攻和防御是在任何战争中交替使用的两种基本战斗形式，是实现战争目的两种基本手段。进攻是消灭敌人的主要手段，防御是保存自己的主要手段。追击是进攻的继续，退却是防御的继续。相持是进攻与防御的过渡状态。

进攻与防御是对立统一的关系：一方面，两者相互对立、相互排斥，又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即没有进攻的一方，就没有防御的一方，没有防御的一方，也就没有进攻的一方，失去一方，他方就不存在。另一方面，进攻与防御又是互相渗透的，任何进攻中都包含有防御，任何防御中也包含有进攻，即攻中有防，防中有攻，攻防结合。例如，战略防御中必然会包含许多战役战斗的进攻，战略进攻中也必然会包含一些战役战斗的防御。部队进攻时，在一定的方向、目标上是进攻，在其他方向必须防御；防御时，也不能单纯地防御，而要通过适当的反击，积极消灭敌人，才能达到目的。就连各种兵器（如坦克）的制作，也要考虑到进攻和防御两方面需要。进攻和防御还可以相互转化，进攻达到一定目标就要停止，转入防御；防御必须转入反击，才能完成任务。毛泽东说：“革命和革命战争是进攻的，但是也有防御和后退——

这种说法才是完全正确的。为了进攻而防御，为了前进而后退，为了向正面而向侧面，为了走直路而走弯路，是许多事物在发展过程中所不可避免的现象，何况军事运动。”^①又说：“我们过去的战争，整个地说来是向国民党进攻，然而在军事上采取了打破‘围剿’的形式。”^②毛泽东还指出，从战争的全体来看，进攻是主要的，防御是辅助的。但是，进攻的主要地位不是唯一的，更不是绝对不变的。进攻与防御的主次地位在一定条件下会相互转化。因此，战争的指导者必须从战争实际出发，正确处理进攻与防御的辩证关系，在进攻时反对冒险主义，防御时反对保守主义，转移时反对逃跑主义，灵活地运用攻防这两种斗争形式，捕捉有利战机，夺取战争的胜利。

毛泽东历来主张积极防御，反对消极防御。他说：“积极防御，又叫攻势防御，又叫决战防御。消极防御，又叫专守防御，又叫单纯防御。消极防御实际上是假防御。”^③那种认为防御只能是防御，进攻只能是进攻的观点，是军事上的形而上学的机械论。从辩证法观点看来，进攻和防御是辩证地结合在一起的。积极防御是促使敌我强弱形势转化，从量变到质变飞跃的根本方针，这一战略方针是符合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殊规律的。毛泽东把质量互变规律创造性地运用于中国革命战争实际，以劣势装备的革命军队战胜优势装备的反革命军队，这一敌我力量转化的过程，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由部分质变到根本质变的过程。这一由弱变强、由量到质的飞跃要具备许多条件，最根本是两条：依靠广大群众，进行人民战争；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在抗日战争中，敌我之间犬牙交错，就是积极防御方针的具体体现。毛泽东称这种犬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第116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84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82页。

牙交错的战争是“战争史上的奇观，中华民族的壮举，惊天动地的伟业”。^①

总之，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就是在防御的形式中贯穿进攻的内容，用战役战斗的进攻达到战略上的防御，用军事战略上的积极防御实现政治上的进攻。战争历史证明，凡是能够按照攻防辩证规律去指导战争的，就可以多打胜仗；反之，就要受挫折，打败仗。就是在未来战争中，当敌人深入内地以后，也必然会采取这种进攻与防御相结合的战争形态。

三、集中与分散

在战争中，兵力的分散与集中是矛盾的两个侧面，两者既相互排斥又相互联结，既相互依存又相互转化，组成矛盾的对立统一体。毛泽东关于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思想，是抓主要矛盾的原理和量变质变规律在战术上的运用，是中国人民长期进行武装斗争的经验总结，也是我军传统的作战原则。

早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就提出“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抗日战争一开始，他就提出，我们的拿手好戏是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八路军挺进敌后开辟抗日民主根据地。抗日时期我军分散兵力，是根据抗日战争的性质与敌情的特点决定的。一是日本以少兵临大国，兵力严重不足；二是以少兵临多兵，虽然我们正规军不多，但有广大民兵，并获得人民拥护；三是敌在异国作战，兵力孤单。加上蒋介石对日本采取消极抵抗政策，出现了广大空间地带，便于我们广泛地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根据地。小股力量机动灵活，便于灵活巧妙地隐蔽自己和更有效地打击敌人。

从辩证法的观点看来，分散与集中是对立统一、相反相成的。集中兵力是有条件的，分散也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分散之中有集中，由分散到集中是更高基础上的集中。相反，以形而上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第224页。

学观点看来，分散与集中是绝对对立的，是不能相容的。他们认为，我军兵力少，再行分散，是自取灭亡。毛泽东在党的“七大”时曾说，有人把打大仗当作“民族英雄”，而称麻雀战是“机会主义”，可是，用麻雀战的办法使我军集中到九十一万，麻雀长成了野鸡。这是集中与分散的辩证法的生动体现。

四、持久与速决

持久与速决，是战争运动的时间概念。持久是指某次战争延续的时间较长。速决是指战争持续的时间较短，迅速解决了战斗。孙子曾说过：“兵贵胜，不贵久”。毛泽东指出：“战略的持久战，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这是一件事的两方面，这是国内战争的两个同时并重的原则，也可以适用于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①这就是说，持久与速决是战争中一对矛盾的两个方面，它们之间既对立又统一。这是一条十分重要的原则。毛泽东认为，速决并非全利，持久也非全弊。

速决战的长处是：人力、物力消耗少，对各方面影响较少，容易组织、指挥，表现了军事运动的快速性、流动性和灵活性。速决战的缺点是：只适用于对付小国、弱国和毫无战备的大国，对于有准备并全力抵抗的中等以上的国家不能达到预期目的；即使以战略速决取胜，也只能解决军事占领的目的，不可能最终征服民心。相反，一定会引起被侵略者的强烈反抗。

持久战也有缺点：耗费大，军队疲劳，人民受苦，弱点易于暴露。持久战优点是：可以利用广大国土，动员众多兵员，逐步积蓄力量，尤其在革命战争中采取持久战的方针，既暴露了敌人的残暴，又能广泛地动员群众，使广大军民习惯于战争，实行置敌于死地的良策。

毛泽东关于“持久中的速决”的战略思想，在抗日战争和解放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17页。

战争时期，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他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指出，整个的抗日战争，由于日寇是强国，是进攻的，我们是弱国，是防御的，因而决定了我们是战略上的防御战和持久战，我们的战略方针应该是在战略的持久战中采取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在《论持久战》中，他全面地考察了中日战争的基本特点和发展的必然趋势，回答了当时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即为什么是持久战和怎样进行持久战，批驳了亡国论和速胜论的错误及其认识论根源。指出，日本是“一长三短”，中国是“三长一短”，“这些特点，规定了和规定着双方一切政治上的政策和军事上的战略战术，规定了和规定着战争的持久性和最后胜利属于中国而不属于日本。”^①毛泽东指出：战争问题中的唯心论和机械论的倾向，是亡国论和速胜论的认识论根源。毛泽东具体地阐明了在一定条件下，持久与速决既相互联系又相互转化的活生生的辩证法。

五、内线与外线

内线与外线是战争中的空间概念，是指进攻或防御的范围。内线，是指作战在我（自己）占领地内进行；外线，是指作战在敌人占领区内进行。两者的区别是相对的，一般说来，防御者处于内线，进攻者处于外线。

毛泽东认为，内线与外线是相对的、有条件的和可变动的，两者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换位置。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处于被强敌“围剿”中的红军，存在着许多不利条件，但是我们完全可以将敌军对我军的一个大“围剿”，变成我军对敌军的许多个别的小“围剿”。这样，对敌军来说，就形成了外线中有内线的态势；而我军来说，就形成了在内线中有外线的态势。例如，红军第二次反“围剿”，就是变内线为外线的典型战例。当时，敌以二十三万强兵对我军三万，敌七倍于我，我利用根据地的条件和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第198页。

敌军各部的不统一，采取“分兵法”，分别与敌军多路作战，共战十五天，横扫七百里，五战五捷，歼敌三万余人，缴枪两万多支，取得了重大的胜利。

毛泽东关于“防御中的进攻，持久中的速决，内线中的外线”的战略思想，是正确地解决中国革命战争中敌强我弱这个矛盾的典范。他具体指出：第一，可使主力军处于内线，游击队处于外线，形成为夹击敌人的奇观；第二，当敌人置于外线对我主力实行包围时，如若顽敌死盯住我根据地而久留不去，应采取“围魏救赵”一法，使红军主力突破敌人围攻线，转入外线解决战斗；第三，为了变内线为外线，应着力于打运动战，这是将“进攻”、“速决”、“歼灭”这三项合而为一的最佳作战方针。

在抗日战争中，形成了三种包围：日中双方处于一种包围和反包围的战争状态，敌处于战略进攻和外线作战，我处于战略防御和内线作战，我在敌之战略包围之中，这是第一种包围。由于我采取战役和战斗上的外线作战，可以使各路分进之敌的一路或几路处在我之包围中，但游击队又处于敌的几面包围中，这是第二种包围。还有国际上侵略阵线与和平阵线的包围和反包围，这是第三种包围。这就是内线与外线辩证关系的生动表述。

六、游击战与正规战

游击战是相对于正规战而言，它是分散流动的作战形式，是由非正规军或游击部队不按照所谓正规化战术对付敌人的一种特殊的战争形式。毛泽东说：“人民的游击战争，从整个革命战争的观点看来，和主力红军是互为左右手，只有主力红军而无人民的游击战争，就象一个独臂将军。”^①然而，就战争的全体来说，正规战争是主要的，游击战争是辅助的，因为战争的最后命运，只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10页。

有正规战争才能解决。无论是游击战与正规战，都必须执行防御中的进攻，持久中的速决，内线中的外线这三项战略总原则。而在执行这一战略总原则时，又都离不开自觉能动性的正确发挥，离不开主动性、灵活性、计划性问题。但游击战较之正规战在执行这些原则时，在程度上或表现形式上，又具有它的特殊性。

第一，游击战比诸正规战的进攻形式，出奇不意和灵活机动性更大，袭击是游击战的基本作战形式。

第二，游击战对速决性的要求更高，此种作战形式最忌旷日持久。

第三，由于游击战规模小，它在战役和战斗中包围敌人的外线圈也小。

第四，游击战的基本方针是进攻，它力戒消极防御，进攻时力戒分散兵力。

这些特点，就决定了游击战能起到正规战所不能起到的特殊作用。毛泽东指出，游击战争的特殊的战略作用有两个方面：“一是辅助正规战，一是把自己也变为正规战。”^① 游击战对正规战的辅助或配合包括：战略的、战役的和战术的三种。

游击战与正规战在一定条件下还会互相转化。这不仅表现为双方战略地位、作用的转化，还表现为游击队在长期的战争锻炼中，逐渐地变为正规部队。毛泽东指出：这个转化“须具备数量扩大和质量提高两个条件。前者除直接动员人民加入部队外，可采取集中小部队的办法；后者则依靠战争中的锻炼和提高武器的质量”。^②

毛泽东关于游击战与正规战辩证关系的思想，在未来反侵略战争中仍然具有十分重要意义。这是由我们进行的正义战争性质所决定的。我们要研究现代条件下游击战对付反游击战的战术原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第252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02页。

则，使游击军和游击队起到配合正规战的作用。

七、运动战与阵地战

什么是运动战？毛泽东说：“运动战，就是正规兵团在长的战线和大的战区上面，从事于战役和战斗上的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的形式。”^①所谓阵地战，是依托坚固阵地或野战阵地进行防御，或者是对据守坚固阵地或野战阵地之敌实施进攻的作战形式。

运动战与阵地战是统一的、不可分割的整体。运动战之中包括了运动性的防御，也包括了阵地进攻和阵地防御。毛泽东指出：“我们主张以战役和战斗上的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为内容的运动战，其中包括了辅助作用的阵地战，又包括了‘运动性的防御’和退却，没有这些，运动战便不能充分地执行”。^②这就是说，在主攻方向对敌人实行外线速决进攻的运动战时，同时，在牵制方向的某些支点，为了阻挡牵制援敌，需要执行阵地防御；在战略进攻时，对孤立无援的敌人使用阵地进攻。因此说，没有阵地战的辅助，运动战就不能充分地执行。

然而，由于条件不同，运动战和阵地战的地位与作用是不平衡的。毛泽东认为，在中国革命战争中，运动战是基本的，阵地战是辅助的。一般的运动战都有比较相对固定的作战线，而唯独敌强我弱悬殊的中国红军例外，运动战战线不固定程度更甚，流动性更大。因此，毛泽东把中国特殊的运动战称为提高了的游击战，或带有游击性的运动战。

毛泽东根据中国运动战的特殊性，创立了一整套灵活多变的军事原则。例如，红军时期，采取了“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这种带游击性的运动战。贺龙有句形象的话：可靠的根据地是在我们的脚板上。解放战争中，在战略防御阶段是“大踏步进退”的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第250页。

② 《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第251页。

运动战；在战略进攻中采取跃进方式，并在广阔战场上往返机动；在战略追击阶段实行远距离包围迂回。抗美援朝战争，由于我军的机动手段落后于美军，运动战的形式则表现为战役小包围迂回，并与战术穿插分割相结合。

总之，运动战、阵地战和游击战，是战争家族里的“三兄弟”，对它们的运用，必须审时度势，灵活选择，有主有次，互相渗透，巧妙结合。

八、歼灭战与消耗战

就实现战争目的的效果和程度来说，一般有歼灭战与消耗战的区别。歼灭战，就是歼灭敌人全部或大部有生力量的作战。消耗战，有两种含义：一是以消耗敌人有生力量为目的的战斗；二是虽给敌人以消耗，而自己也付出了代价的得不偿失或得失相当的作战。

在中国革命战争中，毛泽东一贯主张歼灭战，反对击溃战，并将其规定为“基本的方针”。为什么要把歼灭战作为人民军队作战的基本方针？

第一，使军队获得补充和发展。过去，我军的兵工厂和弹药库是在战场上，只有打歼灭战，才能大量俘获敌军人员和武器来补充、装备自己。在我们的人力和物力相当差的情况下，不能与强敌拚消耗。毛泽东说：“‘拚消耗’的主张，对于中国红军来说是不适时宜的。‘比宝’不是龙王向龙王比，而是乞丐向龙王比，未免滑稽。”^①

第二，给敌以决定性的打击。击溃战，对于雄厚之敌基本上不是决定胜负的东西。歼灭战，则对于任何敌人都立即产生重大影响。毛泽东说：“对于人，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对于敌，击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220页。

溃其十个师不如歼灭其一个师。”^①

第三，打击敌人的气焰，鼓舞我军民士气。敌军整团整师以至更大的建制部队被歼灭，消息传开，使革命军民受到极大的鼓舞，更加增强了斗志和信心。而在敌军阵营内，从士兵到高级指挥官，都会产生恐惧心理。如1947年5月13日至16日孟良崮歼灭战，我华东野战军经过三昼夜激战，消灭了号称蒋军“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编74师，敌师长张灵甫被我击毙。蒋介石哀叹这是“无可补偿的损失”，敌第一兵团司令汤恩伯被撤职，打乱了敌人重点进攻山东解放区的计划。

第四，保持和发展革命力量所控制的地区。革命根据地得以保存并扩大，是通过消灭敌人有生力量实现的。因此，我军作战，不在于一城一地的得失，而要“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②。保持有生力量，自然能控制地区。失地存人，地终可得；失人得地，人地两失。这就是得失之间相互转化的辩证法。

第五，改变战略上敌强我弱之态势。

早在抗日战争初期，毛泽东就指出：“敌之强的因素尚在发挥，战略上的优势和主动依然存在，没有战役和战斗的歼灭战，就不能有效地迅速地减杀其强的因素，破坏其优势和主动。我之弱的因素也依然存在，战略上的劣势和被动还未脱离，为了争取时间，加强国内国际条件，改变自己的不利状态，没有战役和战斗的歼灭战，也不能成功。”^③在解放战争中，我军由战略上的被动防御，终于转入战略上的主动进攻，就是通过打了许许多多的歼灭战而实现的。

当然，歼灭战并不是想打便能打成的，必须具备条件。这就是：要实行集中优势兵力，采取包围迂回战术；还须有群众、地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220页。

②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628页。

③ 《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第254页。

形、好打之敌以及出敌不意等有利的条件。

注重歼灭战，并不意味着消耗战全无意义而可以忽视它。要达到战略消耗的目的，除了战役战斗的歼灭战以外，还要有战役和战斗的消耗战。一般来说，运动战是执行歼灭任务的，防御性的阵地战是消耗性的作战，游击战既执行消耗任务又执行歼灭任务。这三种作战形式都是人民战争中不可缺少的，因而歼灭战和消耗战也都是需要的。消耗和歼灭这两种作战效果是相互转化和相辅相成的。有的时候，没有一定的消耗战，就没有漂亮的歼灭战。箝制方向的消耗战正是主攻方向歼灭战的重要保证。

总之，毛泽东关于战略学和战术学中的唯物辩证法范畴，同毛泽东的整个军事辩证法一样，反映了中国革命战争的客观规律，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宝库。

第十六章

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对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贡献

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我党许多卓越领导人对它的形成和发展都作出了重要贡献”。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就是其中的突出代表。

第一节 周恩来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贡献

周恩来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建人之一。是我国杰出的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和外交家。他在中国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实践中，出色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一、注重调查研究，坚持实事求是

周恩来认为，调查研究和实事求是，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是我们革命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他指出：“毛泽东同志一向提倡调查研究和实事求是。从延安整风到七大，到全国解放，我们发扬了这种精神，取得了全国胜利。”^①他强调毛泽东的工作方法论

^①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313页。

就是调查研究，调查研究和实事求是两者是一致的，讲的是世界观，也是方法论，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思想。

第一，周恩来提出，要把调查研究和实事求是提到革命和建设事业成败的高度来加以考察。早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后，周恩来在上海负责主持中央实际工作期间，就明确指出：调查工作应切实去做，这“对于了解中国农村实际生活及帮助土地革命策略之决定有重大意义。”^①他提出，研究党的历史，“要有合乎历史实际情况的眼光，……先说事实，事实是对的，就说对，不对的，就说不，结论放在后面。”^②他认为，要把革命引向胜利，最重要的就是从实际出发，正确认识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和前途，必须“把中国的情况搞得很清楚”。建国以后，周恩来作为政府总理，肩负着党和国家的繁重领导工作，仍十分重视调查研究工作，并身体力行，认真做到实事求是。他强调指出：“我们要进行建设，首先就要进行发掘、调查、统计和搜集材料的工作。这是准备工作，是建设新中国的重要基础工作。”^③1958年，针对我国刮起的那股浮夸风，周恩来指出：“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这四句话归纳起来就是：实事求是。”^④说真话，就是提倡大家讲真话，首先要领导人喜欢听真话，反对说假话，这是一个党风问题；鼓真劲，就是要踏踏实实地干，把主观能动性和客观可能性结合起来，提倡鼓干劲，不是鼓假劲，而是鼓真劲；做实事，就是要做实实在在的事，做了实事，就有实效，才会对人民有利。

第二，周恩来认为，实事求是与调查研究是相辅相成，互为条件的。调查研究是达到实事求是认识的途径，实事求是调查研究获得正确认识的前提。周恩来在论述两者的关系时，他一方

①②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36页，第157页。

③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24页。

④ 同上，第350页。

面指出：“实事求是是一句成语，毛泽东同志做了新的解释，它代表了毛泽东同志的一个根本思想。这四个字，话虽简单，却包含着丰富的内容。如何做到实事求是？首先要通过认真的调查研究”^①；另一方面，他又反复指出：调查研究要存真，不要哗众取宠，故作惊人之笔，“要实事求是，不能乱搞。”^②这就告诉我们，实事求是和调查研究是在客观的基础上的统一。无论是实事求是，还是调查研究，都应当从客观的实际出发，不能带有丝毫的主观随意性。周恩来要求作调查研究的同志要有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要尊重客观事实，不要受任何框框的限制，“是好是坏，要从客观存在出发，不能从主观想象出发。”^③他自己做调查研究，就始终贯彻这种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

第三，周恩来认为，要做到实事求是，必须注意联系和发展地看问题，对事物进行分析、综合和比较。周恩来说：“事物总存在内在的矛盾，要分别主次；总有几个侧面，要进行解剖。各人所处的环境总有局限性，要从多方面观察问题；一个人的认识总是有限的，要多听不同的意见，这样才利于综合。事物总是发展的，有进步和落后，有一般和特殊，有真和假，要进行比较，才能看透。”^④这就是说，要做到实事求是，就必须遵循辩证法的联系和发展的原则。一方面，要分清事物的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揭示事物的一般和特殊，判明事物的真伪，从事物的多方面、多层次进行分析和综合；另一方面，要掌握事物内在的矛盾发展规律，揭示事物发展的总过程和阶段性，明辨事物的进步和落后，然后作出判断和结论。只有这样，才能把唯物辩证法和实事求是有机地结合起来。

第四，周恩来还认为，要搞好调查研究、做到实事求是，就必须坚持毛泽东提出的三条原则：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集

①②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350、346页。

③④ 同上，第313—314页。

中起来，坚持下去；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他指出，这就是民主集中制，它不但是组织原则，也是工作原则。智慧是从群众中来的，对群众的意见集中起来进行加工，然后回到群众中去考验，在这一基础上再进行加工。他告诫我们，如果脱离群众，就会丧失党的基础；然而，尾巴主义，随着群众跑，又会放弃党的领导。博采众议的民主作风，从认识论上说，是帮助人们获得正确认识的重要手段，这是周恩来调查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这就把实事求是同认识论和唯物史观高度统一了起来。

二、在革命实践中运用辩证法，丰富辩证法思想

早在五四时期，周恩来就指出，审察的工具具有两种：一种是哲学的精神，一种是科学的能力。他认为，只有运用这两种方法，认识才不致发生大的谬误，所得出的结果才能合乎研究的意义。他说：“我们要知道，有不同的意见的人跟我们来讨论、争论，真理才能愈辩愈明。辩证法就它的希腊字源来说，意思就是进行论战”。^①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周恩来一贯坚持把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运用于自己的全部工作，以“哲学的精神，科学的能力”去解决革命和建设中的问题，丰富了唯物辩证法。

1. 把辩证法运用于党的建设

第一，周恩来提出必须从思想上、政治上注意加强党的建设。针对党内存在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周恩来强调：必须“加紧党内的政治教育，提高党的理论水平。这是从积极方面消灭小资产阶级意识的正确的出路。”^② 这里，周恩来关于“加强党内的政治教育”的思想与毛泽东在古田会议上关于“从教育上提高党内的政治水平”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为我们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对于“左”、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周恩来强调要给以历史的科学的

^①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329页。

^② 同上，第12页。

分析：一方面，开展思想上理论上的斗争是绝对必要的，这是巩固党的很重要的武器；另一方面，批判错误决不能搞简单化，不能对犯错误的人进行人身攻击。

第二，周恩来始终强调在发展党内民主生活的同时，坚决批判极端民主化的倾向。在民主革命时期，他就深刻地论述了扩大党内民主生活的必要性，反对陈独秀的家长制，因为家长制的统治，抑制了党的自我批评，使布尔什维克党的生活变成了毫无生气的官僚机关。因此，必须“发展党内政治的讨论，提高政治的水平线。各级党部都要尽可能地讨论一切党的政治问题，引导每个同志都尽量发表对于政治问题的意见。”^①同时，周恩来坚决反对极端民主化的倾向，指出党内主张极端民主化的人的一个错误，就是否认扩大民主是有条件的有原则的。他科学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民主、自由的观点，批判极端民主自由的错误，指出：（1）任何民主都是在一定条件下实行的，党内民主的扩大，应该得到客观的环境的许可；（2）当时党内无产阶级基础薄弱，尤其是在国民党统治区，白色恐怖正在激化，党内民主化必须与这种环境适应；（3）我们不是民主主义者，更不是要求极端民主的无政府主义者。因此，决不能片面追求极端的民主自由。“小资产阶级极端自由的思想，可以把党的组织打得粉碎，以至于消灭。”^②这“不外是援助敌人的东西”。这就深刻地揭露了极端民主化的危害性。

第三，周恩来历来注意开展正确的党内斗争，既大力提倡在党内认真进行反对“左”、右倾错误倾向，又坚决反对把党内斗争扩大化。正确处理党内斗争，这是建设坚强的马列主义政党的一个重要条件。周恩来指出：“反机会主义主要的是要肃清机会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但有些同志竟专门攻击个人，因此而放

①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2页。

② 同上，第9页。

松了对于机会主义观念的批评。仿佛某几个人如果打倒了，机会主义便可肃清。殊不知机会主义的来源很深，决不是排除了几个人就能把机会主义肃清的。”^① 他主张循循善诱、耐心说服，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诚然，党对于那有系统的执迷不悟的机会主义分子，只有尽情驱逐，才能坚固本身壁垒；但是主要的还在批判一切机会主义的观念，使全党同志有明白的认识，然后党的政治路线才能走上正确的道路。”^② 为了搞好党风，周恩来强调领导干部必须以身作则，加强政治思想修养。他在《怎样做一个好的领导者》一文中具体阐述了党的干部必须具备的条件：（1）要有确定的马列主义的世界观和革命的人生观；（2）要有坚持原则精神；（3）要相信群众力量；（4）要有学习精神；（5）要有坚韧的奋斗精神；（6）要有高度的纪律性。^③ 他还制订了《我的修养要则》，为广大干部树立了培养无产阶级作风的光辉榜样。

2. 把辩证法运用于统一战线

第一，必须团结各派民主力量，结成以无产阶级为领导、以工农力量为中坚的反帝反封建的广泛民族统一战线。周恩来指出：中国是一个外受帝国主义侵略、内受封建军阀统治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中国民族欲图生存，必须打倒帝国主义。帝国主义不倒，中国民族也万难解放。”^④ 因此，统一战线应当包括两个革命联合：“一联国际无产阶级及弱小民族作反帝国主义的进攻，一联国内被压迫民众推翻帝国主义走狗之中国军阀的革命。”^⑤ 在对各革命阶级科学分析的基础上，周恩来正确地阐述了它们在国内统一战线中的地位和关系。1925年，他就明确提出了“工人是国民革命的领袖”的重要思想，强调无产阶级“要领导农人兵士而为工农兵的大联合，共同来打倒帝国主义。”^⑥ 1926年，他进一步强调

①②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9页。

③ 同上，第128页。

④⑤ 《辛丑条约与帝国主义》，1924年5月7日。

⑥ 《在省港罢工工人第六次代表会上的政治报告》。

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地位：“只有无产阶级是最不妥协的革命阶级。要靠他携同农民、手工业工人督促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不妥协地与敌人争斗，才能达到国民革命的真正目的——民族解放和民主政治的实现。”^① 工农群众是统一战线中的中坚，由于农民受剥削和压迫最深，故“拥护革命最力”。他把中国资产阶级区分为买办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指出：“我们现在要认清中国的买办阶级，不是中国的商家”，它是受帝国主义“支配”的，它“甘为帝国主义的走狗”；^② 民族资产阶级则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压迫，是可以合作的朋友，因而要把它包括在“革命民众”的范围之内，视为革命“实力”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周恩来认为，在革命发展的不同阶段，由于主要矛盾的变化，敌我关系和斗争营垒不断发生变化，因而各个时期统一战线的形式和性质也会发生变化，“大革命、十年内战和抗日战争三个时期的统一战线，是有不同的形式和性质的。”^③

第二，正确实行又联合又斗争的原则，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反对“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周恩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剖析了统一战线的基本状况，指出：“国民革命原是中国各被压迫阶级共同的出路。不过在这革命过程中，各阶级却有他们各自的出发点，尤其是在民主政治的实施期中，他们更有各自所欲获得的利益。”^④ 不同的阶级地位，决定了各阶级不同的政治态度，“民族资产阶级总是富于妥协性，小资产阶级也常摇摆不定，只有无产阶级是最不妥协的革命阶级。”^⑤ 他通过对国民党进行透彻的阶级分析，提出我党巩固、发展统一战线的正确方针：联合

①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2页。

② 《在东江行政会议上之政治报告》，1926年2月22日。

③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207页。

④ 同上，第1页。

⑤ 同上，第2页。

国民党左派，依靠工农群众作为“革命的势力”；团结和争取中间派，帮助他们打破“妥协的心理，断然离开不革命的右派”；揭露、孤立右派，“肃清”国民党内部的反革命^①。他总结了“五卅”运动以来的历史经验，预见到统一战线内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斗争的不可避免性，并特别提醒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要警惕代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利益的国民党右派从统一战线内部破坏革命。他说：“要有冲突，必是革命的工农群众与和帝国主义敌人妥协的资产阶级冲突；要有分裂，必是革命的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分子与不革命的右派分子分裂。”^②因此，正确执行与民族资产阶级又联合又斗争的原则，坚持用无产阶级的革命坚定性去克服它的妥协性，就显得更为重要。他批评右的错误，只注意联合，否认斗争，一切通过统一战线，结果出卖了原则；相反，“左”的错误，只强调斗争，否认联合，要打倒一切，结果一切打不倒。

第三，在统一战线中，必须坚持独立自主、掌握革命领导权，实行我们党的主义和政见，并保持对同盟者监督和批评的权利。周恩来指出，统一战线中复杂的阶级关系，决定了无产阶级必须坚持自己的独立性，掌握革命的实际领导权。在领导权问题上，右倾是放弃领导权，把整个队伍送出去；“左”倾是把自己孤立起来，把整个队伍推出去，成为“无兵司令”、“空军司令”，都会使革命遭到损失。他强调，在统一战线中不应该掩盖我们党的旗帜，除宣传我们的主义外，还时时有将政见宣布的必要。宣布我们党的“主义”和“政见”，就是坚持了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要坚持独立自主，就必须保持对同盟者的监督权和批评权，这是维护无产阶级独立性的一个原则问题。

3. 把辩证法运用于经济建设

第一，提出了“生产是我们新中国的基本任务”，论述了农业

① 《最近二月广州政象之概观》。

②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2页。

是基础、工业是领导的思想。建国伊始，百废待举。周恩来说：“经济建设是百端待举，但须有缓急轻重之分”，^①不能什么事情一下子统统解决。他提出了“生产是我们新中国的基本任务”，分析了我国经济中的城乡、内外、工商、公私、劳资、上下（中央与地方）等六种关系，明确指出：“我们必须在发展农业的基础上发展工业，在工业的领导下提高农业生产的水平。没有农业基础，工业不能前进；没有工业领导，农业就无法发展”。^②这是建国以来第一次提出工业与农业之间的领导与基础的辩证关系，是毛泽东思想在工农业、城乡关系上的运用，也是对七届二中全会有关提法的进一步发挥，为中国的经济建设指明了发展方向。

第二，具体地分析了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两重性，提出了在经济领域中反对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任务。周恩来对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作了具体的分析，他说：“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受帝国主义的压迫，愿意脱离帝国主义的经济束缚来建设中国的企业，所以他们还有进步性和建设性；同时他们又是软弱的、动摇的，并且有投机破坏性。”^③他着重批判了当时存在着的“左”的倾向，明确指出：“在私人企业中我们要团结民族资本家”，“承认他们的进步性，鼓励他们的建设性”。^④针对当时在对待知识分子和企业管理人员方面“左”的情绪，周恩来指出：“工人和职员都是工人阶级，他们有的是处在管理的地位，有的是直接生产的体力劳动者，但只是分工的不同，没有阶级的对立。”^⑤他还旗帜鲜明地提出在经济领域中反对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任务，“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也是反对农业社会主义或极端平均主义的经济方针的”，^⑥在

①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370页。

②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0页。

③④⑤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364页。

⑥ 同上，第305页。

新民主主义五种经济的构成中，国营经济是领导的成分。在逐步实现计划经济的要求下，要“使全社会都能各得其所”，“基本精神是照顾四面八方，就是实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以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目的。”^①

第三，经济工作要实事求是，合理地规定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周恩来提出，我们的计划必须切实可行，实事求是，不能盲目冒进。他说：“社会主义积极性不可损害，但超过现实可能和没有根据的事，不要乱提，不要乱加快，否则就很危险。”^② 我们应该根据需求和可能，合理规定国民经济发展的速度，把计划放在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基础上，以保证国民经济比较均衡地发展，应该使重点建设和全面安排相结合，以便国民经济各部门能够按比例地发展。他针对“大跃进”给国民经济带来不平衡、严重比例失调的状况，指出：高速度的发展必须建立在客观可能性的基础上，必须遵守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这些思想和主张，对于发展国民经济和经济调整工作，都起了重要作用。

第四，主张建立以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为主、以个人所有制为补充的经济结构。我国社会主义时期的经济结构，主要是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还有第三种补充性质的个人所有制。周恩来主张允许个人所有制存在。他在“八大”的报告中指出，有些手工业可以让它完全自产自销，不必勉强组织起来；商业方面应保持相当数量的小商小贩，采取合作商店、合作小组、代销甚至完全自购自销等方式，更好地为居民服务。他认为，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工农商学兵，除兵以外，各行各业都可以允许有一些私营的，活一点有好处。

第五，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同时学习外国的经验和长

①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370页。

②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90页。

处。周恩来说：新中国在“生产建设上要自力更生，政治上要独立自主”，^①把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中国经济变为自力更生的独立的经济。同时，他又指出，我国同世界各国在经济上、技术上、文化上的联系，必然会一天比一天发展。因此，在建设社会主义事业中的孤立思想，是错误的。我们应该学习世界各国在建设中的经验和长处，无论在革命斗争还是在建设事业中，中国人民都一贯坚持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

第六，指出培养技术人才、发展科学技术是我们国家建设的关键。周恩来认为，科学技术是关键，没有现代化的技术，就没有现代化的工业。他说：“科学是关系我们的国防、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的有决定性的因素”，^②“只有掌握了最先进的科学，我们才能有巩固的国防，才能有强大的先进的经济力量”。^③1956年1、2月间，他提出了“向现代科学技术大进军”的号召，亲自抓了1956——1967年的12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的制定工作。1963年，他提出：要实现四个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强国，实现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是关键。

4. 把辩证法运用于外交政策

第一，提出对于资本主义世界的不同势力应采取不同的方针。周恩来在分析国际形势时，指出资本主义世界“不是铁板一块”，他把资本主义国家分为三种势力：一是动不动就发动战争的好战势力；二是主张维持现状的势力；三是主张维护和平的势力。根据这个分析，他为我国制订了如下的外交方针：团结维护和平的势力，争取主张维持现状的势力，孤立好战势力。就是说，要在国际舞台上建立维护和平的统一战线。他认为，中国有可能也有必要去影响这些势力。

①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0页。

②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81页。

③ 同上，第192页。

第二，提出处理国家关系的著名五项原则。1953年底，周恩来首先提出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这五项处理国家关系的准则，为1955年万隆会议通过的十项原则奠定了基础，从而极大地促进了中国一贯倡导的第三世界国家反帝统一战线的形成。

第三，提出在国际事务中“求同存异”的思想。周恩来认为，国与国之间应当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互相了解和彼此重视不同的见解。他说，我国同其他国家之间所有悬而未决的问题，包括边界问题，都应当本着争取世界局势的和缓、争取同世界各国和平共处这个基本的政策，通过和平协商的途径，求得公平合理的解决。1972年2月28日在上海签署的《中美联合公报》，是国际关系史上一个独特的文件，它是经过长时间的紧张谈判和各自相让的结果。公报既说明了两国的共同点，又详细地列举了彼此之间存在的分歧。这充分体现了周恩来“求同存异”的思想，体现了他的外交家的本色。周恩来是新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奠基人之一，为维护世界的持久和平和各国人民间的友好合作贡献了毕生的精力。

三、坚持群众观点，密切联系群众

第一，把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看作是各项工作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早在民主革命时期，周恩来就十分重视群众路线的贯彻执行，他反复强调：党必须永远不与群众隔离，要相信群众的力量。在军事工作中，他指出：“游击战争最重要的是要有组织性，要与群众有密切的联系”；^①在党的建设方面，要重视基层工作，“要做到凡有群众的地方一定要进去工作”，^②“使党成为真正群众的党”；^③他强调：要反对孤立主义，要“先划一个最大的圈子，把亿万人民群众团结在一起”，^④团结广大人民群众一道前进。尤

①②③④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5、111、13、327页。

其要团结广大的非党人士，同他们搞好合作，不要在党团员和非党团员之间“划一个鸿沟”。这就从多方面丰富和发展了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这个唯物史观的核心思想，把群众路线看作是我们事业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

第二，要贯彻执行党的群众路线，必须反对官僚主义作风。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周恩来就严厉地批判了党内存在的“资产阶级种种政客官僚的卑污恶浊手段”、“家长制”、“消极怠工”和“雇佣革命的观念”。在延安整风运动中，他再次阐明了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的重要性，批评了党内存在的“马虎主义，空谈主义，自大主义，形式主义，事务主义，以及破坏党和军队传统的现象”。^①他在《我的修养要则》中，强调“向群众学习”，“过集体生活，注意调研，遵守纪律。”^②为全党树立了反对官僚主义、执行党的群众路线的榜样。他历来把“发扬民主”、“倾听群众意见”，作为贯彻群众路线的前提，倡导“思想自由”，反对独断。他指出：“什么叫独断？就是我说的话就对，人家说的话就不对，那还辩什么呢？你的意见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那谁还跟你辩？”^③当然，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又要辨别是非，这样才能集中群众正确的意见。当有人诬蔑无产阶级专政，把我们的国家机关和剥削阶级的国家机关相提并论，硬说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根源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时，周恩来驳斥道：“在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国家机关是资产阶级压迫和剥削广大人民的工具，这种国家机关是同广大人民的利益根本对立的。在这种国家机关中，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不可克服的。我们的国家机关完全是另一回事。社会主义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全体人民的共同事业，社会主义国家必须而且能够吸收最

①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32页。

② 同上，第125页。

③ 同上，第329页。

广大的人民群众来参加国家事务的管理和监督。所以社会主义国家从根本上说来，是同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不相容的。”^①

第三，正确地阐明人民群众和革命领袖的辩证关系。周恩来在《学习毛泽东》一文中，阐述了实践、群众和领袖的相互关系。（1）在高度评价毛泽东的功绩的同时，又反对把人民领袖神秘化；（2）人民领袖来自人民、来自实践，同人民血肉相联，跟中国的大地、中国的社会密切相关；（3）人民领袖不是“天生的圣人”，它的成长有一个历史发展过程。因此，学习毛泽东要全面地学习，从他的历史发展来学习；（4）学习毛泽东，不是出于对他的迷信，而是因为他代表着真理。

总之，在半个多世纪的战斗历程中，周恩来对马克思主义，矢志不愈，贯彻始终，为在实践中运用和发展毛泽东哲学思想，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第二节 刘少奇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贡献

刘少奇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国杰出的革命家、政治家和理论家。他一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一、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实践观

刘少奇认为，革命的唯物主义一刻也离不开实践，他把实践视为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基础，离开了实践，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唯物主义。

^① 《政府工作报告》，1957年6月26日。

第一，实践是人们的社会活动、革命的活动。刘少奇指出，人类本身，是一种历史发展的过程。人是实践活动的主体，人为了要生活，就必须和自然进行斗争，利用自然来生产物质资料，这样，就在生产中必然建立一定的生产关系。在阶级社会中，每个社会成员都作为一定阶级的人而存在，都在一定的阶级斗争条件下生活。“人们不但在和自然界的斗争中，而且在社会阶级的斗争中，改造自然界，改造社会，同时也改造着人们自己。”^①所以，革命者要改造和提高自己，就必须参加革命的实践。革命的实践活动是千百万人民的活动，是一个推陈出新的过程，是历史上一代一代人连续下去的活动。因此，革命的唯物主义者，就应当抛弃形式的、抽象的、脱离社会实践的东西，在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中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

第二，实践对理论的基源性与优越性。刘少奇认为，认识、知识产生的根源是实践，强调了“实践对理论的基源性与优越性”^②。他指出，人们的实践活动是实际工作和计划的根据，没有实践就没有认识的根据，没有长期的革命实践，就不能深刻地认识社会及其发展规律。他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是国际工人运动经验的总结，是在革命实践中形成又服务于革命实践的理论。只要我们密切联系革命实践，去学习它，运用它，掌握它，我们就能够了解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了解各阶级在目前如何行进和向哪里行进，了解这些阶级在最近的将来如何行进和向哪里行进，我们就能够有确定行动方针的能力，能够对革命运动的前途具有信心。”^③我们除了学习历史上的革命经验即前人的实践经验之外，还必须亲自参加到当前的革命实践中去，在实践中发挥主观的能动性。只有这样，“才能够逐渐深刻地体验和认识社会发展和革命斗争的规律性，才能真正深刻地认识敌人和自己，才能发

①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98页。

②③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218、120页。

现自己原来不正确的思想、习惯、成见，加以改正，从而提高自己的觉悟，培养革命的品质，改善革命的方法等。”^①

第三，人的认识是不断由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通过现象去认识本质的过程。刘少奇指出，在实践基础上认识世界是要费气力的。他说：“列宁讲过，要认识一个复杂的问题，要认识一个真理，没有相当艰苦的独立的精神和工作是不可能的。必须有自觉的、艰苦的、独立的工作，要自己搜集材料，分析材料，否则要了解真理是不可能的。”^② 因此，我们必须不断地参加革命实践，去增加感性知识，积累实际经验。但是，光有感性知识和实际经验，还是不够的。必须从感性认识跃进到理性认识，把那些不深刻、不全面、不系统的材料，进行全面而深刻的综合，通过总结，提到政策、理论的高度。“提不到理论高度，就不能认识事物的本质。理论的东西就是要‘透’，不是光说明现象、皮毛，而且能说明内部的联系。”^③ 这就充分说明了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感性认识有待于上升到理性认识的道理。

第四，在革命实践中检验一切理论和是非。刘少奇指出：我们的言行、每一步工作，都必须“拿实践的经验来做根据，并拿实践经验来审查”。^④ 毛泽东思想的生成、发展与成熟，是“在无数次的千百万人民的剧烈斗争中反复考验过来了，证明它是客观的真理，是唯一正确的救中国的理论与政策。”^⑤ 毛泽东思想——中国共产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不只是在和国内国外各种敌人的斗争中，同时又是在和党内各种错误的机会主义思想——陈独秀主义，李立三路线，以及后来的左倾路线、投降路线、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等进行原则的斗争中，生长和发展起来的。

①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99页。

②③ 同上，第410—411页，第403页。

④ 同上，第296页。

⑤ 同上，第334页。

第五，在实践中改造世界、改造自己。刘少奇指出，马克思主义“不仅说明世界，而最重要的是去改造世界”；要“经常保持马克思主义的活泼的、革命的力量。”^①他说：“我们应该把自己看作是需要而且可能改造的。不要把自己看作是不变的、完美的、神圣的，不需要改造的、不可能改造的。我们提出在社会斗争中改造自己的任务，这不是侮辱自己，而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的要求。如果不这样做，我们就不能进步，就不能实现改造社会的任务。”^②这就深刻地说明了改造客观世界和改造自己的密切关系。他一贯坚持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既反对“轻视实践，脱离实践的理论研究”；又反对“过分强调实践，轻视理论的重要性，轻视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③他认为，这两种意见都没有正确解决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应把两者统一起来。在实践中得到理论，实践又受理论的指导；在实践中认识世界，同时又在实践中改造世界。这就是以实践为基础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原则。

二、反对实际工作中的唯心论和形而上学

第一，从认识方法和思想方法上阐明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分歧。刘少奇说：“如果纯粹从理论上讲，所谓原则就是事物发展的一般法则。特殊的事物有特殊的发展法则。相同的事物有大体上相同的发展法则。我们所谓原则问题也就是按照事物的一般发展法则作为我们观察问题处理问题的方法问题。”^④这就明确地回答了什么是辩证法及其作用。他从对于事物、对于革命中的各种问题之不同的认识方法和思想方法，论述了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根本分歧，指出：辩证法是能够“按照客观事物的发展和联系的

①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296页。

② 同上，第98页。

③ 同上，第218页。

④ 同上；204页。

规律，全面地客观地去看问题”，从而得出正确的结论，作为我们行动的正确向导；形而上学“却习惯于从事物的静止的、孤立的状态去看事物”，“片面地主观地去看问题”^①，“只看见夸大事物”的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因而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不能提出指导我们行动的正确方向。他指出，“左”倾冒险主义犯错误的思想路线上的原因，就是他们观察问题的主观性、片面性和抽象性。所谓主观性，就是不知道客观地看问题。他们不是从实际出发去分析形势及其发展变化，而是从共产国际的决议出发，从自己的主观愿望和主观想象出发，对形势作完全主观的推断；所谓片面性，就是不知道全面地看问题。他说：“左倾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者还常常对目前形势作一种空洞的、夸大的估计。上海、天津这样的中心城市，是帝国主义与中国反革命力量最集中的地方，他们有时竟可以估计这些地方似乎明天就要成为苏维埃区域。”^②所谓抽象性，就是不知道具体地看问题。例如，在白区的某一工厂，形势到底如何，就要“庄严地估计群众情况，精密地计算敌我双方力量”^③，而左倾冒险主义者只是夸夸其谈世界形势、全国形势如何如何好，似乎世界革命在当天就可以和这个工厂的斗争直接相配合，推翻一切敌人，而无须研究这个工厂阶级力量的实际对比。他们不知道如何具体地在每一个问题上估计形势，以及什么是决定条件，因而他们的一切空话、大话，都不能不在现实的斗争面前遭到破产。

第二，坚持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结合的原则，反对空谈主义。刘少奇从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相互关系出发，在中国革命中自觉地运用共性与个性的辩证法。他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具有普遍

①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153页。

② 同上，第31—32页。

③ 《罢工策略》，1932年11月。

的指导意义。因此，要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但是，在马克思恩列斯的著作上“说到中国的事情并不多。而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具体道路和欧洲各国社会历史发展的道路比，有其更大的特殊性。”^① 因此，要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要用马列主义的原理来解释中国社会历史实践，并指导这种实践。刘少奇指出：“由于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有其极大的特殊性，以及中国的科学还不发达等条件，要使马克思主义系统地中国化，要使马克思主义从欧洲形式变为中国形式，就是说，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与方法来解决现代中国革命中的各种问题——其中有许多是在世界马克思主义者面前从来没有提出过与解决过的问题，在这里是以农民为主要群众（而不是以工人为主要群众），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压迫和中世纪残余（而不是反对本国资本主义）——这乃是一件特殊的、困难的事业。这决不是如某些人所想的，只将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加以熟读、背诵和摘引，就可成功的。”^② 这就要求我们，既要用马克思主义作指导，又要认真研究本国的具体情况；既要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又要吸取世界革命的经验，把两者统一起来，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

坚持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结合原则，就要反对实际工作中的空谈主义。刘少奇指出空谈主义的种种表现：指示性质的文章、信件和报告，长而乏味，内容非常空泛与不清楚；指示与文件的公式化、刻板化；或者是为着要“具体”，而把一切细小的事情毫无组织与中心地堆积起来；或者是为着“不脱离总的形势”而泛论全世界、全中国各方面的形势，玩弄许多政治名词，傲慢地咒骂一切，等等。他认为，空谈者不懂得在实际中应用辩证法，不了解总任务与总策略是一个，但一到实际工作上，各地方各部分就各有不同。忽视了特殊情况，就变为空谈了。他说：“空谈没有好

①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222页。

②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35—336页。

处，只有坏处。要求同志们尤其是领导同志们绝不要空谈。你们应该客观些、细心些、诚实些，有什么你们就说什么，懂得，你们就说懂，不懂得，你们不要说懂。”^① 要改变空谈的工作作风与空洞的领导方式，就要“很实际地去了解问题，了解环境，很实际地去布置、计划与指导工作。”^② 把普遍的原则与具体的实际结合起来。

第三，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抛弃主观主义与形式主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刘少奇指出：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就要研究矛盾的特殊状态，对不同的矛盾采取不同的解决方法。他说：“当着客观形势的发展不利于我们前进的时候，就要善于等待，不要冒险前进。这时候不耐烦等待，就要犯错误。但当着客观形势的发展，是来潮，是高涨，有利于我们前进的时候，就不要再等待，要大胆前进，这时候再等待，也就要犯错误。”^③ 他强调指出，不能把党内斗争简单化、机械化、庸俗化，一切具体的实际的问题，常有几个解决的办法。由这里到那里，常有几条可走的路。因此，在实际工作中，不能抱机械的绝对的态度，要把原则上的不调和、明确性同斗争方法上的灵活性很好地结合起来。

为了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一马克思主义原则，就必须坚决抛弃主观主义与形式主义。主观主义与形式主义“只注意事物的表面与形式，而不注意事物活泼的内容；它只记得马克思主义的条文，而不能将这些条文活泼地运用到具体环境中去”^④；它使我们机械地处理问题，一切工作公式化、刻板化，使许多同志毫无生气，不去思索问题、考虑问题。刘少奇指出，形式主义、机械论者无视具体事物的特点，搞绝对化、片面化，“一切与他们不同的地方，他们都要实行对抗，强使其绝对的相同，他们是一切

①②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42、45页。

③④ 同上，第263、71页。

都不妥协，绝对不妥协。他们把一切的矛盾都看成对抗，对抗着一切，这就是他们的绝对主义。”^①他们虽然也可能造成党内某种一时的统一现象，但这种统一“是虚伪的、表面形式的、机械的统一，一旦这种虚伪形式被揭破，就要产生党内极端民主的无政府状态。”^②这种形而上学的哲学所产生出来的错误，给我们党的损失是很大的。刘少奇号召：“我们的同志必须坚决抛弃这种主观主义与形式主义，用马克思的辩证法来代替”。^③

三、加强党的思想建设，注意共产党员的思想修养

共产党员思想修养的问题，是党的思想建设的一个重要的问题。把党的思想建设放在首位，对于中国共产党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刘少奇指出：“党的建设中最主要的问题，首先就是思想建设问题”，^④“要把思想教育和思想领导放在党的领导的第一位”。^⑤由于中国是一个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占优势的国家，他们大批地加入党的组织，把大量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带进党内来。因此，党内无产阶级思想同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矛盾，特别是同农民、小资产阶级思想的矛盾就成为突出的矛盾。能不能正确解决这个矛盾，直接关系到党的无产阶级性质问题。刘少奇说：“仅仅是党员的社会出身，还不能决定一切，决定的东西，是我们党的政治斗争与政治生活，是我们党的思想教育、思想领导与政治领导”。^⑥他强调克服党内小资产阶级思想和其他非无产阶级思想，主要靠思想建党。根据多年来从事党的建设的丰富经验和长期对党内生活、党员表现的观察，他写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这一名著，提出了共产党员进行思想修养的系统理论。

第一，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党的性质及其所担负的历史

①②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188、329页。

③④ 同上，第71、327页。

⑤⑥ 同上，第330、325页。

使命等方面，论述了共产党员进行修养的必要性。刘少奇指出：一方面，共产党员“是近代历史上最先进的革命者，是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现代担当者和推动者”；^① 另一方面，“不论是无产阶级或是非无产阶级出身的党员，不论是老党员或是新党员，他们会或多或少地带有旧社会的思想意识和习惯”。^② 因此，为了保持无产阶级先锋战士的纯洁性和率领广大人民群众进行革命斗争，加强自身改造尤为重要。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他以极大的努力从事党的思想理论建设。早在大革命失败后，他就写文章批判党内表现出来的悲观、消极、丧失革命性的右倾情绪，揭露了党内小资产阶级的危害性，提出了加强党内无产阶级意识的任务。1936年，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上，他批判了党内的“左”倾关门主义、冒险主义的严重倾向，强调党内要注意理论思想教育。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写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作一个好党员，建设一个好的党》、《论党内斗争》、《论党员在组织上和纪律上的修养》以及在党的七大上作了《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等，在这些著作中，他论述了党的性质、党的指导思想、党的纲领、党的群众路线、党的组织原则、党的修养、正确开展党内斗争等问题，对党的理论建设起了重要作用。

第二，阐述了思想修养的根本问题是树立党的利益高于一切的思想。刘少奇指出：我们在思想意识上的修养，“就是每个党员用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去同自己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意识进行斗争；用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去同自己的各种非共产主义的世界观进行斗争；用无产阶级的、人民的、党的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去同自己的个人主义思想进行斗争。”^③ “党的利益高于一切”，这是每个党员思想和行动的最高标准，树立起党的利益高于一切的

①②③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98—99、103、121页。

思想，是共产党员进行思想意识修养的主要内容。共产党员如果以党的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作为自己思想和行动的准绳，就能够自觉地用无产阶级世界观克服形形色色的个人主义思想，树立大公无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解放，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献身。同时，也只有这样，我们的党才能保持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才能有统一意志、统一行动，从而率领广大人民群众去实现共产主义。

第三，强调提高全党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提出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并把这个问题提到关系革命成败的高度。刘少奇指出：“为什么要学马列主义呢？特别是一个共产党员，不学行不行？少学行不行？不行。‘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这是列宁的有名的话。革命的行动是受革命的理论指导的。理论正确，指导正确，革命就能胜利，否则不能胜利。”^①他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我党的理论基础，是我们观察、处理一切问题的武器，特别是观察社会现象、处理一切社会问题的武器。只有掌握这个武器，才能站稳无产阶级立场，代表无产阶级和人民的根本利益，把握科学的思想方法，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在情况变化了的时候及时地改变战略和策略，从而保证革命的胜利。

早在1943年7月，刘少奇在《清算党内的孟什维克主义思想》一文中，就提出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体系”^②的概念，要求全党学习、研究、并用它来武装自己的思想。1945年，在《论党》的报告中，他正式提出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对毛泽东思想这一科学概念，以及它的产生、内容、特点、作用、对它应抱的态度，作了精辟的论述。他指出：“毛泽东思想，

①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409页。

② 同上，第300页。

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①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唯一正确的指导思想，唯一正确的总路线”。^②他向全党发出号召：“现在的重要任务，就是动员全党来学习毛泽东思想，宣传毛泽东思想，用毛泽东思想来武装我们的党员和革命的人民，使毛泽东思想变为实际的不可抗御的力量。”^③

第四，提出了思想修养的正确途径和方法。共产党员怎样进行思想修养呢？刘少奇指出：“革命者要改造和提高自己，必须参加革命的实践，绝不能离开革命的实践；同时，也离不开自己在实践中的主观努力，离不开在实践中的自我修养和学习。如果没有这后一方面，革命者要求得自己的进步，仍然是不可能的。”^④他既反对脱离革命实践去“闭门思过”，又反对单纯参加实践而不联系思想实际，主张把革命实践和自觉改造思想结合起来，这就为共产党员的修养指明了正确的道路。

四、关于两类社会矛盾的学说

关于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学说，特别是社会主义社会中人民内部矛盾的学说，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社会矛盾学说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刘少奇是我党较早地看到社会主义社会内仍然存在矛盾并提出正确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领导人之一，他遵循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逻辑，较早地思考了两类矛盾的问题，在理论上有很多独创之处。

关于社会主义社会还有没有矛盾的问题，在我国实践中首先是以国营工厂内部还有没有矛盾的形式出现的。刘少奇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的探讨，最初也是从探讨“国营工厂内部矛盾”开始的。他指出：“一切事物的构成都是矛盾的构成，国营工厂的内部

①②③④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33、334、337、99页。

结构当然也是矛盾的结构。什么是构成国营工厂的内部基本矛盾呢？这就是国营工厂管理机关与工人群众之间的矛盾，就是国营工厂内部的公私矛盾。”^①它是一种不容否认的、客观存在的、真正的矛盾，是在长期内要我们来认真加以调查和处理的矛盾。这就为科学地分析社会主义社会范围内的矛盾奠定了思想基础，从根本上否定了所谓社会主义社会内部已不再存在矛盾、“完全一致”的形而上学观点。

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必然导致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早在1949年7月4日的一次党内报告中，他就使用了“外部矛盾”和“内部矛盾”的概念。他说：“中国人民民主专政，有它的外部矛盾与内部矛盾，有它的外部斗争与内部斗争。”“所谓外部矛盾与外部斗争，就是它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及与国民党残余势力的矛盾和斗争。”“所谓内部矛盾与内部斗争，就是人民民主专政内部各阶级间各党派间的矛盾与斗争。”^②他认为，工人阶级对待劳资间的矛盾的原则应该是在向资产阶级进行必要的适当斗争的同时，还要同民族资产阶级实行必要的适当的妥协与联合。这是刘少奇在建国前夕关于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最初表述。刘少奇的这次报告和毛泽东同年6月30日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是我们党开始探讨社会主义社会中两类社会矛盾问题的先导。1957年4月27日，即在毛泽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正式发表之前，刘少奇曾以《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题，在中共上海市委召开的党员干部大会上做了重要讲话。在讲话中，他再次指出：“矛盾可以分为两类”，“处理矛盾的方法也有两种。”他特别强调“认识矛盾的性质，而后决定处理的方针和方法。”^③1962年5月23日，刘少奇在同中央政法小组

① 《刘少奇选集》下卷，第93页。

② 《关于中国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性质与政权性质》。

③ 《刘少奇选集》下卷，第301页。

同志的一次谈话中，指出1958年前后政法工作的经验教训“是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没有把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清楚地、严格地、细致地区分开来”，“没有严格区分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两种不同的方法。”^①

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是为了在实践中正确地处理、解决矛盾。刘少奇认为，所谓“正确处理”，即对不同性质的矛盾分别采取完全不同的处理方法。搞错了，就要犯大错误。他提出：第一，采取什么方针和方法来解决矛盾，不是凭主观愿望决定的，而是由客观矛盾的性质决定的。因此，要先认识矛盾的性质，而后决定处理的方针和方法；第二，在处理上，对敌我矛盾，要“采取对抗的办法，打倒的办法，‘一棍子打死’的办法。”^② 对人民内部矛盾，只能用说服、民主的办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即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办法来解决；第三，两类矛盾是可以互相转化的。对抗性矛盾在一定条件之下会转化为非对抗性的矛盾，非对抗性的矛盾在一定条件之下也会转化为对抗性矛盾。矛盾转化了，处理的方针也要随之转化。不仅矛盾的性质会转化，两类矛盾在社会生活中的主、次地位也会转化，当“人民内部的矛盾已成为主要矛盾”时，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就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第四，绝不可用处理敌我矛盾的方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相反，只要是没有危险的，倒是可以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办法去处理敌我矛盾。

刘少奇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研究分析了两类矛盾的性质、内容、表现、区分标准及处理方法，强调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他对两类矛盾学说的思考和探索充分证明了，这一学说是毛泽东和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共同探讨的成果。

①② 《刘少奇选集》下卷，第450、300页。

第三节 朱德对毛泽东军事辩证法的贡献

朱德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建人之一，中国杰出的革命家、政治家和军事家。他一生的革命活动主要是在军事领域，从辛亥革命起，经过护国、护法战争，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无私地贡献了毕生的精力。朱德对毛泽东军事辩证法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一、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的用兵新法

朱德指出，不同的军队有不同的用兵方法，非人民的、反人民的军队的用兵方法，不能不限于固定成规和固定格式，而人民军队的用兵方法，则是随机应变，变化无穷。他把我军的用兵原则通俗地解释为“有什么枪打什么仗，对什么敌人打什么仗，在什么时间地点打什么时间地点的仗。”^①他说：“第一句话是根据部队武器装备，第二句话是根据敌情，第三句话是根据时间地形各种条件，这就是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的用兵新法。”^②

第一，“有什么枪打什么仗”，这是朱德反复强调的一个用兵原则。武器装备是战斗力诸因素中的重要因素，它是产生技术、决定战术直至战略的重要物质基础。朱德在研究和制定战略时，总是从我军的武器装备出发，非常重视武器在战争中的地位。他在分析抗日游击战争的诸要素时，就把武器作为五个要素之一作了详尽的分析：（1）肯定武器的作用，指出一切战争都离不开武器，每一种武器都有一定的效能；（2）武器不是万能的，它的作

①② 《朱德选集》，第168页。

用是有限度的，武器的效能要在一定的条件下才能发挥，它也有可以被制服的方法；（3）提出发挥武器威力的诸种条件。他指出，抗日游击队的武器虽然比不上敌人，但如果使用这些武器的人善于使用它，善于利用时机，利用旺盛的攻击精神，利用地形配合起来，必能发挥其威力；（4）不能做劣势武器的“拜物教徒”。他说，抗日游击队的武器虽落后，但使用武器的人不应当落后。我们绝不能“象红枪会的某些师父那样用念符咒、吃打药等去挡炮子，那是无益而有害的。”^①因此，抗日游击队一方面要使用自己现有的武器，另一方面要夺取敌人的武器来使用。

朱德研究武器装备从来都是和人联系在一起，把两者辩证地统一起来。他通过对各种武器性能的分析，说明在一定条件下，武器的长处和短处是可以转化的，从而启发和鼓励我军指战员人人开动脑筋，研究新战术，创造新战法，用智谋去战胜敌人。

第二，“对什么敌人打什么仗”，这是朱德又一用兵原则。古兵法说：“善医者因症立方，善兵者因敌立法”。朱德正是这样的善“因敌立法”者。他十分重视对敌人的政治、经济、人员、装备、交通等基本要素的考察和研究，从而确定我军的战略方针，并根据敌情的变化，及时地作出相应的决策。对于不同之敌，朱德把它们划分为外敌与内敌、强敌与弱敌、狡敌与蠢敌、顽固之敌与动摇之敌等，强调对敌方的武器装备、兵员素质、战场情况、后方补给以及指挥官的性格特点等都要作具体的了解和分析，从而采取不同的战术。例如，他把敌人的主力比作“大鱼”，提出对付敌人的主力要用“钓大鱼的办法”。就是要设法“引”敌人上钩，拖住它，它来攻我就退，有条件就阻击一下，没有条件就不阻击，把它拖得很疲劳，弹药也消耗得差不多时，再用大部队去奔袭歼灭它。

^① 《朱德选集》，第53页。

第三，“在什么时间地点打什么时间地点的仗”，就是打仗要根据各种条件。随着时间的推移，战区的转换，各种条件都在不断地发生变化。因此，熟知敌我双方的各方面情况，根据具体情况制定正确的战略战术，是实施正确战争指导的前提。朱德一贯反对墨守陈规，他创立战略战术原则，总是从当时当地的实情出发，主张因时因地制宜，因情因势制变。在《论几个战术的基本原则》中，他讲了山地作战的战法；在《关于四渡赤水战役的电报》中，他谈了渡河作战的战法；在《论解放区战场》中，他论证了平原作战的战法；在《打下石家庄的意义和经验教训》中，他总结了攻取坚固设防城市的战法。这些都充分体现了“在什么情况下打什么仗”的唯物主义原则。总之，从敌强我弱的中国革命实际出发，根据条件的变化，不断创新，提出新的战法，这是朱德用兵打仗的一个显著特点。

二、军事上辩证的“结合”方法

“结合”方法是朱德军事辩证法的一个重要特征，它是对立统一规律在战争实际中的运用。早在1933年，他就告诫红军指挥员：“要以唯物的辩证法来研究和运用战术。首先要知道事物是变动的，情况是迁移的，决不容有一成不变的老章法来指挥军队。”^①

第一，军事运动与群众运动相结合。坚持“军事运动与群众运动相结合”，是朱德人民战争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南昌起义部队在广东潮汕地区遭受失败以后，朱德和陈毅等收集了起义军余部，艰苦转战于湘粤赣边境，并在安远天心墟、大余和崇义上堡对部队连续进行了三次整顿、整编、整训。朱德在《从南昌起义到上井冈山》一文中指出：“失败的主要教训，就是起义军没有和

^① 《朱德选集》，第14页。

江西的农民运动相结合，而去了广东。假如当时能够利用军阀内部相互之间的矛盾，就在江西各地开展农民运动，解决土地问题，建立革命根据地，同时也改造起义军本身，那是完全可以站得住脚的。”^①朱德认为，我党领导的弱小红军要生存发展，就必须把武装斗争同农民运动相结合，采取农民游击战争的形式。他根据中国国情的特点，提出了创建红军与土地革命相结合。他说：“中国红军是在土地革命发展和深入的过程中生长和壮大起来的。它的主要的组织成分是得到土地革命利益的雇农、贫农及中农。”^②朱德指出：“一、二、三次反‘围剿’，是中国很好的革命战争经验。主要一点是在于依靠群众。三次反‘围剿’，我们都是为了群众，又很好地依靠了群众。”^③“只有依靠群众，依靠根据地，诱敌深入，才能大量歼灭敌人。”^④

第二，军事与政治相结合。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朱德指出，创建红军需军事与政治相结合，使红军的军事技术训练与政治训练结合起来。他说：“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工农红军只有在共产党正确领导之下才能够完成它的历史的伟大任务。”^⑤朱德这一思想早在他率领南昌起义余部在赣南山区三次整顿特别是大余整编中已突出地体现出来。当时，朱德在对部队进行改编的同时，着重加强了党对部队的领导，他采取了四条措施：一是整顿了部队的党团组织，重新登记党团员，并吸收了一些新党员，成立了党支部；二是扩大了党领导军队的权限，改变了大革命时期党只管政治工作的制度，决定党可以直接地领导部队的各项工作；三是各支队都设立一名政治指导员，对部队进行政治教育和吸收新党员；四是把党团骨干充实到基层支队去工作。这些

① 《朱德选集》，第393—394页。

② 同上，第1页。

③④ 同上，第131、130页。

⑤ 同上，第2页。

加强党对军队领导制度的措施，与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部队进行三湾改编的基本内容，不谋而合，是对马列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学说及其领导军队的思想的正确运用和发展。朱德明确提出：要建设一支人民群众所需要的铁的红军，必须注重政治训练，以提高其阶级觉悟；必须着重军事技术的提高，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必须建立自觉的铁的纪律，以服从集中统一的指挥。

第三，军事与科学相结合。“把科学与抗战结合起来”，这是朱德在抗日战争时期提出的一个深具战略眼光的创见。他说：“马列主义是反对黑暗与落后，尊重科学与文明的。马列主义的本身，就是科学的最高成果。唯物辩证法的哲学，是人类五千年科学思想的结晶。”“不论是要取得抗战胜利，或者建国的成功，都有赖于科学，有赖于社会科学，也有赖于自然科学。”^① 科学“是一个伟大的力量”，我们的力量，军队的战斗力，人民的富裕，人民的文化程度与政治觉悟的提高，都有赖于与科学结合。因此，我们一方面要把科学与抗战建国的大业密切结合起来，以科学方面的胜利来争取抗战建国的胜利；另一方面，只有抗战胜利，民主成功，中国的科学才能得到繁荣滋长的园地。

在革命战争年代，我们党十分重视科学技术的发展。朱德和毛泽东曾经签署了红军创建无线电队的命令和中华苏维埃政府向白区征聘医生、无线电人才以及军事技术人员的布告等。全国解放以后，为了建设现代化的国防，朱德提出我们的陆军、空军和海军都必须有充分的机械化的装备和设备，而这些都离不开复杂的专门的技术。朱德指出，今后战争的胜利仍然要靠勇敢，但不能只靠勇敢，而必须使军队各种成员精通技术，使各级指挥员精通现代的指挥艺术和善于组织有计划的作战，使勇敢与技术相结合。

① 《朱德选集》，第76页。

第四，战略与战术相结合。根据敌强我弱的特点，毛泽东和朱德在中国革命战争实践中创造了一整套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原则。这就是：以战略上藐视敌人和战术上重视敌人的思想为统帅，以战略的内线持久的防御和战役战斗的外线速决的进攻为指导原则，以战略的以少胜多和战役战斗的以多胜少为基本战法，这是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整体。朱德把这个持久与速决、分散与集中、打与走、打“硬处”与打“软处”相结合的战法，称之为“机动战的原则”。

首先，是持久与速决、分散与集中相结合。敌优我劣、敌强我弱的战略态势，决定了中国革命的长期性、持久性。因此，必须在战略的防御战中，采取战役和战斗的进攻战；在战略持久战中，采取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在战略的内线作战中，采取战役和战斗的外线作战。朱德说：“无论大兵团、小部队，在进攻中每一动作，都要选定主要突击方向而集中其最大兵力在这一方向来决战。其他次等方向只留出可以箝制敌人的兵力，但须积极动作吸引敌人的注意力向着本身，借此保障主要突击方向容易进攻。”^①

其次，打与走相结合。所谓“走”，就是在广阔的战场上和不固定的战线上，实施高度的机动，积极地创造和捕捉战机；所谓“打”，就是以积极的进攻，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打与走是战争的基本活动方式，也是进攻与防御的基本手段，一切战争活动都离不开这两种形式。只打不走，进攻时就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防御时则有可能被敌人从四面包围中吃掉；只走不打，就变成了逃跑、溃散，等于放弃了战争的目的。因此，必须把打与走联结、贯通起来，坚持打中有走，走中有打，打而不利就转为走，走中创造了有利条件再转为打。

① 《朱德选集》，第15页。

再次，打硬处与打软处相结合。朱德用“喝汤”和“啃骨”、“钓小鱼”与“钓大鱼”的形象比喻，说明打弱敌与强敌、打小敌与大敌必须采取不同的战法。他指出：“打小敌、弱敌，可以用比较简单而直接的办法；但打大敌、强敌，必须定出系统的斗争方针，战斗开始必须懂得摆布它，懂得用迂回曲折的办法。这是真理，要好好牢记、研究。”^①只知道打“硬处”（大城市、大敌、强敌），不知道打硬处与打软处相结合，硬拚，蛮干，必然遭到失败。只打“软处”，不抓紧有利时机夺取大城市和聚歼集中、强大之敌，坐失良机，也是不足取的。朱德认为，敌人的接合部，军阀割据的交界处，火力配置薄弱部位，防御侧翼和突出部位死角地，深入我区的分散敌人等，都是“软处”。先打软处，后打硬处；先占领农村，后占领城市；先打中小城镇和敌据点，后打大城市直至夺取全国的胜利，这便是一般的规律。

第五，正规军和游击队、民兵相结合。倡导游击队、地方军配合主力部队作战，把三股力量合成一股力量，并在创建地方武装的过程中发展主力红军，这是朱德坚持人民战争的一个重要特点。井冈山会师以后，朱德和毛泽东一起，广泛组织赤卫队、暴动队等地方群众武装，并派干部，送枪支，训练干部，经常与他们一起行军、打仗、训练，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和提高地方武装。当地方武装发展起来之后，就上升为地方红军，然后编入主力红军。这样做的好处是：（1）主力红军可以随时执行超地方的作战任务，主要对付和歼灭敌人的正规军；（2）地方武装在人民群众配合下，能有效地保卫根据地，配合主力作战，打击和歼灭当地之敌；（3）从地方武装中发展红军，解决了兵员来源，改善了红军的成份，提高了红军的军政素质。从而形成了对敌斗争的天罗地网，这就是人民战争的实质所在。在抗日战争中，朱德积极倡

^① 《朱德选集》，第236页。

导建立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野战军与地方军相结合，军队与民兵相结合，武装群众与非武装群众相结合，造成军队和人民总动员的人民战争。他生动地指出：“无数游击队的不断的动作，却是非常伟大的力量，象连续的滴水可以蚀穿石头，使敌人的交通迟滞、阻塞，企图暴露，军心动摇，汉奸政权也不稳固，兵力不敷分配，给养断绝，经济资源被破坏，有生力量被削弱。在军事活动的全时间内，所有的游击队配合主力军一齐动作起来，就和蚂蚁蛀蚀着朽楼一样，可以倾覆敌人存在的基础，影响到全面抗战的结局。”^①

朱德卓有成效的人民战争实践和对这些实践经验的精辟概括，是我们学习和研究人民战争思想的宝贵财富。

三、民族的、人民的、民主的建军原则

朱德指出，人民军队具备“民族的、人民的、民主的特点”，实际上也就是建军的原则，而归根到底是一个总的原则，就是从人民出发，为人民服务。“它是民族的，因为它始终站在反对外国侵略者的立场，具有保卫祖国的至高无上的热情。它是人民的，因为它是从人民当中来，始终是为人民的解放和幸福而奋斗。它是民主的，因为它是军民一致和官兵一致的；因为它一扫军阀制度，成为为人民的民主政治而奋斗的工具。它的战斗力，它的不可战胜，就是由于它具备了这三大特点。”^②

坚持“从人民出发，为人民服务”，这是中国革命力量的源泉。这一建军原则为广大指战员所掌握，就会变成强大的物质力量，使我军立于不败之地。朱德作为我军的总司令，是身体力行并领导全军实行这个建军原则的模范。早在中央根据地时，他就要求红军加强政治训练，使全体指战员完全服从党的领导，了解

① 《朱德选集》，第58页。

② 《朱德选集》，第158页。

群众力量的伟大，与群众紧密联合起来。在抗日战争中，他强调：我们一切力量都出于群众身上，一切办法也都由群众创造出来，我们没有别的本事，我们的本事就只有同群众密切结合在一起。在解放战争中，他更明确指导部队：要反复宣传人民是我们一切力量的泉源；部队要随时随地为民兴利除弊，帮助人民解决战争引起的各种困难。

朱德曾在旧军队里从事革命活动，带过兵打过仗。但他坚决摒弃旧军队的陈规陋习，并坚决反对把我军完完全全变成一支象苏联红军一模一样的军队。他主张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走一条既不因袭也不照搬的建军新路。1931年7月，为了批驳陈独秀取消派对红军的攻击，进一步加强红军建设，朱德发表了《怎样创造铁的红军》一文。在文中他明确提出了红军必须具备的六个基本条件：第一，确定红军的阶级性。“红军是工农的军队，也可以说是一切劳苦群众的军队。红军的历史任务是夺取政权，建立和巩固工农自己的苏维埃政权，使无产阶级及一切劳苦群众在政治上经济上完全得到解放”；第二，红军必须“无条件地在共产党领导之下”，建立政治委员和政治工作制度；第三，红军政治训练的主要任务是“启发和提高指挥员战斗员的无产阶级的觉悟，使他们认清本阶级的利益，努力于本阶级的政治任务，与敌人作决死的斗争，去达到消灭敌人、解放本阶级的目的”；第四，必须注重“军事技术的提高”，“在战术方面必须超过敌人，在技术方面必须努力学习使用新式武器的知识”；第五，必须“自觉地遵守铁的纪律”；第六，“要有集中的指挥和统一的训练”。文中特别把军事技术的提高作为红军建设的基本条件之一提出来，这是对古田会议决议的重要补充和发展，进一步明确了红军建设的方向。^①

朱德从我军是民族的、人民的、民主的三大特点出发，根据

^① 见《朱德选集》第1—6页。

自己多年带兵的经验，从我军各个时期的实际情况出发，并批判地吸取了古代军事家们的文韬武略，形成了一套出色的治军方法。其主要内容：第一，强调爱兵，号召干部从政治、工作、生活上关心部下，成为“能与士卒共甘苦”的名将；第二，强调以身作则，主张用干部的模范行动去影响士兵；第三，强调练兵先练心，主张把政治思想工作做到战士的心里去，通过政治教育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自觉练好本领，消灭敌人；第四，强调“团结全军，巩固纪律”，官兵要共同自觉地遵守纪律，不应有亲、疏、厚、薄之分，不应有爱、恶、生、熟之别，不应有小团体主义和本位主义；第五，强调人与技术密切相结合，把部队的勇敢精神和良好的技术统一起来，这样才能克敌制胜，避免无谓的牺牲；第六，强调军事教育、技术运用、政治工作以及实行奖励都“走群众路线”；第七，强调军队智力训练中的文化和生产教育，为社会培养“有用人才”，等等。这些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经验，在长期革命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于今天带好部队仍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总之，朱德的军事思想，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军事理论，极大地丰富了毛泽东军事辩证法。

第十七章

毛泽东哲学思想在新时期的运用和发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毛泽东哲学思想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在新时期里，我们党对新的时代、新的现实、新的社会实践所提出的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运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从哲学上作出了新的概括和总结，从而多方面地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哲学思想。

第一节 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恢复和发展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党一直为恢复和发展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而进行着斗争。这个斗争是在两条战线上展开的，一条是纠正“文化大革命”及以前的“左”的错误，反对“两个凡是”的错误倾向；另一条是反对怀疑和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倾向。在斗争中重新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并坚持和发展了这一条思想路线。

一、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

“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是党的优良作风，是我们党夺取革命和建设胜利的根本保证。在“文化大革命”中，党的这一思想路线遭到林彪、“四人帮”的肆意践踏，给党和人民的事业带来了严重的损害。粉碎“四人帮”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

党通过批评“两个凡是”的错误倾向，领导全国人民进行了全面的拨乱反正，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并从理论上对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作了更为系统的科学概括。

当“两个凡是”开始提出不久，邓小平于1977年4月10日给党中央写信，提出，“我们必须世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①同年5月24日。在一次谈话中，明确指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②同年7月21日，在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上，指出：“毛泽东思想不是在一个别的方面，而是在许多领域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个体系，是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③1979年3月30日，他又明确指出：“我们坚持的和要当作行动指南的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或者说是由这些基本原理构成的科学体系。至于个别的论断，那末，无论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同志，都不免有这样那样的失误。”^④我们党对“两个凡是”的分析批判，归纳起来主要有如下几点：

第一，揭露了“两个凡是”的目的，是要原封不动地继续和保持毛泽东晚年的“左”的错误。如果凡是毛泽东做过的、说过的都不能动，那么，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就难以纠正，我们党长期以来所犯的“左”倾错误就难以清除，拨乱反正的工作也难以深入展开，

第二，指明了“两个凡是”的实质，是割裂和歪曲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我们说要坚持毛泽东思想，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南，是指坚持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学习和运用它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如果凡是毛泽东说过的每一句话都要坚持，抓住毛泽东说过的某一句话不放，就会把毛泽东思想体系搞得支离破碎，不能根据它的科学体系来思考问题，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

①②③④ 《邓小平文选》，第36、35、40、157—158页。

第三，指出了“两个凡是”的危害，必然导致教条主义和思想僵化。毛泽东的话都是在一定的时间、地点、条件下讲的。如果把具体的时间、地点、条件置之不顾，死守着原来的字句不放，势必导致犯教条主义的错误。

总之，“两个凡是”，在理论上违背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政治上维持“左”的思想指导，阻碍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的顺利进行。正因为如此，“两个凡是”的方针提出后，不仅受到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批评和抵制，而且也受到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反对。在这种历史条件下，1978年我国展开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通过这场讨论极大地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于实现历史性的伟大转变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它的伟大历史功绩就在于，从根本上冲破了长期“左”倾错误的严重束缚，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标志着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正如邓小平所说：“三中全会确立了，准确地说，是重申了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①

二、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新发展

邓小平说：实事求是“党的这条思想路线是毛泽东同志确立的，他在领导革命的大部分时间内是坚持这条思想路线的。”^②在历史发展的新时期，我们党在拨乱反正、全面改革，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首先是坚持这一条思想路线，重新确立和发展这一条思想路线的。坚持和发展是紧密相联的，坚持就要发展，发展才能坚持。从思想路线的历史发展来看，这个新时期的确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大普及、大提高、大发展的时期。我们党

①② 《邓小平文选》，第242页。

不仅忠实地继承了“实事求是”这个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而且发展了这条思想路线，谱写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新篇章。

(一)揭示了实事求是是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我们党把实事求是提到一个新的理论高度，从多方面进行了论述。党中央明确提出，实事求是“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①这一科学论断，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高度概括，揭示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华，阐明了实事求是是在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也反映了毛泽东哲学思想中国化、民族化的特色。同时也告诉我们，实事求是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体系中最根本的东西，抓住了它，就掌握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根本点、基础和精髓；不懂得实事求是，也就不懂得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抛弃实事求是，也就等于抛弃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用了相当多的篇幅阐述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历史发展及其重要性。他语重心长地告诫全党：“同志们请想一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这是不是毛泽东思想的根本点呢？这种根本点有没有过时，会不会过时呢？如果反对实事求是，反对从实际出发，反对理论和实践相结合，那还说得上什么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呢？那会把我们引导到什么地方去呢？很明显，只能引导到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只能引导到工作的损失和革命的失败。”^②这就是说，抛弃实事求是，就必然走向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泥坑。邓小平的这些忠告，是对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的高度的哲学概括和总结，为党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增添了新的颗

^{①②} 《邓小平文选》，第64、113页。

粒。

(二)阐明了以实事求是为核心的党的思想路线的基本方面

我们党总结了中国共产党革命和建设长期的实践经验，对党的思想路线作出了新的概括。邓小平指出：“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就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①这个表述，后来被写进党的十二大通过的新党章中。在这里，邓小平以极其简洁的语言，说明了党的思想路线的基本点。这决不是对过去思想路线内容的简单重复，而是在新的实践基础上的充实和发展。诚然，毛泽东创立了党的思想路线，也分别论述了这四个方面，但他并没有把这四个方面完整地有机地统一起来，赋予它明确的思想路线的规定。我们党对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所作的完整的科学的新论断，在我党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它体现了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的有机统一。这就丰富和发展了党的思想路线的基本内容，并使之得到了充分的论证和展开。

(三)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正确路线、方针和政策，得到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拥护和支持，但斗争并没有结束。一方面，“左”倾思潮即“两个凡是”仍然在一定范围存在着，致使一些干部不能自觉地深刻地认识和理解三中全会路线的伟大意义，也不能从根本上去认识“两个凡是”的错误及危害性。另一方面，又出现了右倾思潮，他们对三中全会的路线作了错误的理解，误认为解放思想可以不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可以不受任何限制，有的人甚至叫嚷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过时了”、“无用了”，并利用我们党发扬民主，提倡解放思想之机，大搞无政府主义，搞大民主，怀疑和否定四项基本原则。这两种错误倾向，无论是“左”的还是右的都严重干扰和破坏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方针、政策

^① 《邓小平文选》，第242页。

的贯彻执行。因此，三中全会之后围绕着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一问题，我们党面临着两条战线的斗争。这就是，一方面继续克服和肃清“左”的、“两个凡是”的影响；另一方面对来自右的、否定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思潮进行回击。简单说，既要反对“两个凡是”，又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邓小平指出：“我们贯彻这条思想路线，就要反对教条主义，反对修正主义”^①。这是邓小平针对着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两种错误倾向，从贯彻党的思想路线的角度提出的一条指导性原则。这就是说，只有坚持开展两条战线的思想斗争，才能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因为，搞教条主义，搞“两个凡是”，一切从本本出发，对书上的话或上级指示照抄、照搬、照转，习惯于“唯上”、“唯书”，必然思想僵化，根本谈不上实事求是；而搞修正主义，否定四项基本原则，更谈不上实事求是。正如邓小平所说：“离开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没有根，就没有方向，也就谈不上贯彻党的思想路线。”^②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总结我国长期历史经验和针对新时期的现实提出来的，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我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体现。可见，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是相辅相成的，切不可反对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搞形而上学片面性。这样才能保证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贯彻执行。

（四）阐明了思想路线同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之间的相互关系。毛泽东分别提出和论述过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给我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把三者统一起来，深刻阐明了“三条路线”之间的联系。其一，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是确定政治路线的基础，贯彻实行政治路线的保证。邓小平说：“思想路线不是小问题，这是确定政治路线的基础。正确的政治路线能不能贯彻实行，关键是思想路

①② 《邓小平文选》，第242、242—243页。

线对不对头。”^①党的历史告诉我们，凡属正确的政治路线，都是以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为指导的；凡属错误的政治路线，都是与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相背离的。正确的政治路线确定以后能不能贯彻执行，关键仍然是思想路线对不对头。如果思想路线不对头，不能坚持实事求是和解放思想，那就不能使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贯彻执行。其二，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的实现要靠组织路线来保证。这是因为政治路线确立之后，要由人来具体贯彻执行。由什么样的人来执行，结果是大不一样的。邓小平说：“组织路线是保证政治路线贯彻落实的。”^②因此，组织路线问题是一个极端重要的问题。他深刻指出：“中国的稳定，四个现代化的实现，要有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要有真正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性强的人来接班才能保证。”^③可见，“三条路线”是有机统一的，既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又有各自不同的地位和作用，但其中思想路线起着指导作用。

（五）把实事求是同民主集中制结合起来

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内乱结束后，人们都在思索：怎样避免这样的历史悲剧不致重演？在这个有关中国前途的问题上，邓小平作出了实事求是的、科学的回答。他说：“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象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④他又说：“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

^{①②} 《邓小平文选》，第176、178页。

^{③④} 《邓小平文选》，第178、293页。

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①他认为,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来说,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就是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而变成了个人领导。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或少数人手里,必然要造成官僚主义,必然要犯各种错误,必然要损害各级党和政府的民主生活、集体领导、民主集中制、个人分工负责制等等。我们对这个问题长期没有足够的认识,成为发生“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因,使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②

1980年8月,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提问:“如何避免类似‘文化大革命’那样的错误?”邓小平回答说:“这要从制度方面解决问题。我们过去的一些制度,实际上受了封建主义的影响,包括个人迷信、家长制或家长作风,甚至包括干部职务终身制。我们现在正在研究避免重复这种现象,准备从改革制度着手。我们这个国家有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缺乏社会主义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法制。现在我们要认真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和社会主义法制。只有这样,才能解决问题。”^③他曾一再强调指出:“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④在邓小平的倡导下,我们党提出了要坚持党对国家生活的正确领导,党就必须坚持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的重要原则,并把它规定在十二大通过的新党章中。后来,新宪法又作了明确的法律规定。

① 《邓小平文选》,第293页。

② 参见《邓小平文选》第287—289页。

③④ 《邓小平文选》,第307、136页。

这就从法律上、制度上解决了执政党同人民群众的正确关系，为国家民主生活的制度化、法制化奠定了基础，为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贯彻实行作出了切实保证。

(六)把实事求是同改进工作方法结合起来

毛泽东创立的唯物辩证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是完整的科学体系，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一大特色。它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仍然是指导我们革命和建设事业取得胜利的科学方法。那种认为这一整套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已经过时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然而，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实践中，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它要求我们不仅仅是坚持原有的一套科学方法的基本方面，而且要求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这一套方法加以改进、丰富和发展。邓小平指出：“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研究和解决任何问题都离不开一定的历史条件。……时间不同了，条件不同了，对象不同了，因此解决问题的方法也不同。”^① 在解决思想路线的同时，他一再强调说：“工作方法总要适应四个现代化的要求，改得好一点、快一点嘛。”^② 还说：“按照体制改革的要求，包括要有完善的规章制度、工作方法、领导方法。”^③ 他强调指出，注意工作方法，克服官僚主义，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迫切问题。为此，他反复强调要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反对不讲实效的形式主义，克服实际工作中那种甘当“收发室”、照搬照抄照转的本本主义的弊端。他尖锐地指出：“我们的思想懒汉不少，讲现话、空话的多。真正仔细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切实地想办法使我们的步伐快一些，使生产力发展快一些，使国民收入增加快一些，把领导工作做得更好一些，这样的同志还不多。”^④

针对目前我们干部的情况，为了提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水平，邓小平提出：“建议中央提倡学习，主

^{①②} 《邓小平文选》，第114、246页。

^{③④} 《邓小平文选》，第364、243—244页。

要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重点是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哲学著作。……现在我们的干部中很多人不懂哲学，很需要从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上提高一步。”^①这说明，坚持党的思想路线，不是一个空洞的口号，要运用它来指导我们的工作，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还必须开动脑筋，改进工作方法，提高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以利于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第二节 体制改革与社会基本矛盾

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党认真总结了历史经验，分析了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全面情况，形成了许多新的理论观点，制定了一系列正确解决这个基本矛盾的方针、政策和方法。它已成为指导全党和全国人民为完成新时期总任务的重要理论基础，从而使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

一、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发展的客观要求

毛泽东曾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它们之间是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这些矛盾的不断产生又不断解决，推动社会主义向前发展。不过，这些矛盾同旧社会的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②。1979年邓小平重申：“从二十多年的实践看来，这个提法比其他的一些提法妥当。”^③毛泽东这一论断，第一，坚持了用对立统一规律分析社会主义社会，提出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矛盾，批评了社会主义社会已不存在矛盾的形而上学观念。第二，明确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

①③ 《邓小平文选》，第267—268、168页。

②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67页。

筑的矛盾，是贯串于全部人类社会历史的基本矛盾。第三，明确区分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与旧社会基本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这一理论，是国内和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历史经验的总结，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丰富和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社会主义进行了再认识，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作了新的发挥，并把它运用于指导各方面的改革实践。

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非对抗性的矛盾，表现在人际关系上主要是人民内部矛盾。因为在社会主义国家，广大劳动人民享有最广泛的民主，直接参加管理国家和企业，成为国家和企业的主人；全民所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主体，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处于主导地位；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不同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劳动产品归劳动者公有，分配上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的利益；个人消费品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所以，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不是对抗的阶级矛盾，而是根本利益一致非对抗性的人民内部矛盾。这种矛盾可以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加以解决。这是我们今天进行体制改革的基本依据，也是我们坚定社会主义必胜信念的立足点。

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改革是一场深刻的革命。尽管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的性质是非对抗性的，它的特点是既相适应又相矛盾，而相适应是基本的。但是，在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中存在着种种弊端，正是这些弊端阻碍着生产力的发展，束缚着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发挥。因此，改革是社会主义深入发展的必然。如果现在再不实行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这场改革，是涉及到各方面体制的改革，涉及到各方面观念的深刻变化，涉及到人与人之间利益关系的调整，所以，这是一场深刻的革命。但是这种“革命”不是

改变我们的社会主义根本制度，“不是对人的革命，而是对体制的革命”^①，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社会之所以具有内在活力，之所以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就在于它能够不断地自我调节、自我更新和自我完善。建国三十多年来经济发展的事实充分说明，改革才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出路。

在社会主义体制改革方面，我们走了一段曲折的道路。建国初期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是我国生产关系大变动，大改革的时期。在这期间，我们党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创造性地进行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顺利地完成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的任务。虽然，在这期间我们党的工作也出现了一些缺点和偏差，但是从总体来说，是遵循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上层建筑适合经济基础的客观规律办事的，指导思想基本上是实事求是的。

可是，后来由于发生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党的“八大”制定的正确路线，没有得到继续贯彻执行，我们在指导思想上发生了“左”的失误。因而把本来已经基本解决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又夸大起来，仍然看作是国内的主要矛盾。这就影响到对社会基本矛盾的认识和处理。再加上在意识形态领域不断地开展错误的批判，不仅伤害了大批知识分子，妨碍了文化科学事业的发展，而且直接影响了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这样，上层建筑就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为经济基础服务的轨道。当然应当看到，在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中，我们党对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的弊端也不断有所发现、有所纠正、有所克服。在调整国民经济和教育过程中，针对发生的“左”倾错误陆续制定了各部门一系列工作条例，规定了一些适合当时情况的具体政策。因而，在经济建设遭到严重挫折的情况下，仍然取得了很大成

^① 《邓小平文选》，第352页。

就。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四人帮”完全篡改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学说，他们大批“唯生产力论”，把“按劳分配”、商品经济、奖金制度等等，当作修正主义来批判；鼓吹“突出政治”，“全面专政”等，搞乱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正确关系，使社会主义建设遭受到巨大损失。由于党和人民的艰苦奋斗，特别是由于周恩来、邓小平先后领导的对国民经济体制进行整顿和调整，才使林彪、“四人帮”的破坏受到一定限制，使国民经济仍然取得进展。但是，整个说来，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缺陷加深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实现了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和工作重点的转移，使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弊端更清楚地显露出来。我们提出了多方面地改革同生产力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任务，采取了一系列进行体制改革的具体措施。特别是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推进了体制改革的深入开展。可以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是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基本矛盾问题上进行拨乱反正的时期，也是建国以来，对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认识最清醒和处理最成功的时期。

二、深入开展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为了推进社会生产力的大发展，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遵循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规律，在经济体制方面进行全面而系统的改革，政治体制改革也正在分步骤、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

在生产关系方面，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往往离开生产力发展水平，盲目地不断提高生产资料公有化程度，搞“一大二公”，“穷过渡”，否定按劳分配、商品交换、价值规律、集市贸易

等等。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党依据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客观要求，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的实际状况出发，建立和发展多层次的生产关系，在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前提下，不仅允许个体经济如私人企业的存在和发展，也允许外商来我国经办企业。在分配制度方面，我们建立了多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努力地贯彻“按劳分配”为主的原则，克服吃“大锅饭”，搞平均主义的现象。在商品经济方面，增加了流通渠道，克服了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在企业管理方面，进行了把所有权和经营权分开的试点和推广，增加了企业的自主权，克服了国家对企业统得太多太死的现象，树立了国家机关为企业“服务”的新观念，增强了企业的活力。

经济体制改革的展开和深入，对政治体制改革提出了愈益紧迫的要求。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过程，应该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过程。不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最终取得成功。党的“十三大”明确指出，把政治体制改革提上全党日程的时机已经成熟，要分步骤、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邓小平 1980 年 8 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所作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是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指导性文件。

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基本政治制度是好的。但在具体的领导制度、组织形式和工作方式上，存在着一些重大缺陷，主要表现为权力过分集中，官僚主义严重，封建主义影响还未肃清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逐步认识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特别是党的“十三大”，已经明确了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要兴利除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政治体制改革的长远目标，是建立高度民主、法制完备、富有效率、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

为了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更高更切实的民主政治，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大发展，必须克服官僚主义。党的“十三大”指出，我们

党提出克服官僚主义，要着眼于具体制度的改革，要实行党政分开；改革政府工作机构；改革干部人事制度；进一步下放权力，改变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建立和完善各种规章制度，恢复和健全民主集中制；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等等。

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是实行党政分开。中国共产党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在新的形势下，只有改善党的领导制度、领导方式和领导作风，才能加强党的领导作用。近几年来，我们在改善党的领导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但长期形成的党政不分、以党代政问题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不解决，党的领导无法真正加强，其它改革措施也难以顺利实施。

总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不仅正视了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存在的问题，而且初步找到了解决这些问题的正确途径和方法，为社会生产力的大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三、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的新发展

在体制改革中，我们党创造性地运用了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科学地总结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为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作出了新的贡献。

第一，找到了解决问题的途径和方法。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具体地阐发了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一系列相互联系的环节和方面，从而把复杂的体制问题理出了一个头绪，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关键。指出，现行经济体制中的弊端集中表现为企业缺乏活力，增强企业活力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而增强企业活力，关键是赋予企业自主权；这就要求把所有权与经营权适当分开，确立国家和企业、企业和职工两方面的正确关系。要实现这一要求，就需要明确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需要进行计划体制、价

格体系、国家管理经济的职能和劳动工资制度等方面的配套改革。如果说，过去我们党对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认识还比较肤浅，对于要解决的问题没有抓准、抓细，那末，现在我们的认识深刻得多了，已经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正确途径和方法。

第二，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社会生产力。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共中央一再指出，我们进行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领域的改革，其根本目的就是发展生产力。也就是说，改革是为了解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使社会财富越来越多地涌现出来，消灭贫穷，达到人民富裕，国家富强。在《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指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社会生产力”，要“把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检验一切改革得失成败的最主要标准”。邓小平指出：“搞社会主义，一定要使生产力发展，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我们当然要坚持社会主义。但要进一步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首先必须建设能够摆脱贫困的社会主义。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只有到了下世纪中叶，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才能说真的搞了社会主义，才能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现在我们正在向这个路上走。”^①即说，搞社会主义，不能忽视生产力这个主要标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首要任务就是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是对社会主义再认识的一个重要思想。明确了这一点，就可以制约很多“左”的东西，统一人们对体制改革的认识，为体制改革的发展扫清了道路。

第三，明确了生产关系各方面、上层建筑各部门都要转到为发展生产力“服务”的轨道上来。中共中央在《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把上层建筑的一个重要方面——政府管理经济的

^① 《邓小平同志重要谈话》（1987年2月——7月），第23页。

职能，概括为八项，这八项归结到一点，就是“服务”二字。这对于改革上层建筑，改变机关作风，改变过去长期形成的领导机关不是为基层服务，而是让基层和企业围着领导机关转的局面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互关系的原理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

第四，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自我完善、自我改进。我们的改革，是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有计划、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的。我党一再指出，这次改革只能促进而不能损害社会的安定和生产的发展。这是中共中央对过去搞政治运动的经验教训的总结。例如，要根据国民经济各个环节的内在联系和主客观条件的成熟程度，分别轻重缓急和难易，有先有后，逐步进行；改革的步骤积极而稳妥，看准了的坚决改，看不准先试点，全国性的大改革的实施，由国务院统一部署；对价格体系这样的关系国民经济全局，涉及千家万户实际利益的改革，更要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党和政府各级领导机关要保持清醒头脑，进行精心指导；改革中出现失误也是难免的，但要尽力去避免那些可以避免的失误。这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认识的深化，是对正确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的重大贡献。

第三节 建设社会主义民主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一再提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邓小平同志也说：“我们各种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改革，要坚定地、有步骤地继续进行。这些改革的总方向，都是为了发扬和保证党内民主，发扬和保证

人民民主。”^① 这就是说，要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以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一、社会主义民主的科学含义

民主是一种国家形式，一种国家形态。社会主义的民主，包括两方面的科学含义。一是从国家的性质来说，是指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成了国家的主人，在国家政权中居于统治地位；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共同享有对生产资料的不同形式的占有权和支配权的基础上，享有管理国家的最高权力。二是从国家的民主制度、民主生活来说，是指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起来的各项民主制度，民主生活的高度发展和高度完善。这两个方面，是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前者是决定性的方面，后者是前者的必然要求、具体表现和保证条件。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真正享有各项公民权利，享有管理国家和企业权力。社会主义民主是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反映，是人类历史上最广泛的民主，是比资产阶级民主更高类型的民主。

我党总结国内外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反复强调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是我们的根本目标和根本任务之一。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决议》、“十二大”报告、五届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新宪法等，都对建设社会主义民主问题作了深刻的论述。特别是党的“十三大”报告明确提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真正享有各项公民权利，享有管理国家和企业事业的权力。现阶段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建设，必须着眼于实效，着眼于调动基层和群众的积极性，要从办得到的事情做起，致力于基本制度的完善。”^② 并具体提出和论述了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若干制度。这标志着我们党对建设社会主义民主的认识，从理论到

① 《邓小平文选》，第332页。

② 赵紫阳《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单行本，第45页。

实践都已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二、社会主义民主的基本特点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从我国实际出发，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对社会主义民主的基本特点进行了深刻的论述。

其一，社会主义民主是目的和手段的统一。社会主义民主是目的，还是手段，这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有一种观点认为“民主是手段，不是目的”。这种观点，影响了对社会主义民主制的建设。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党中央总结了历史的经验教训，反复强调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是社会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任务和根本目标之一。社会主义民主，既是手段，又是目的。它作为一种政治上层建筑，是建立在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之上，并为这种经济基础服务的，是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政治保证。从这个意义上讲，社会主义民主是一种手段。但是，它同时又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目的。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不仅要有富裕文明的物质文化生活，而且要有高度民主的政治生活。因此，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不断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同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大力发展生产力，不断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一样，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一项根本任务和根本目标。

其二，社会主义民主是民主和集中的统一。我们国家和党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在社会主义民主体系中，民主是集中的前提和基础，集中是保障民主得以实现和发展的必然条件和必要形式。民主和集中相互联系、不可分割。只有实现高度民主和高度集中相结合，才能正确有效地实现人民对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的民主管理。我们国家的一切权利属于人民。我们强调社会主义国

家的公民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必须以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合法的自由权利为条件。我们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决不意味着社会的每个成员都按个人的意志自由行动。如果以损害国家、集体和别人的民主权利作为自己行使民主权利的条件，那就不可能享有真正的民主自由和权利，就谈不上社会主义民主。因此，民主需要国家机关来组织和实施。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是实现民主的一种必然的途径和形式。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是建设高度社会主义民主的根本保证。共产党是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她能正确协调各部分人民之间不同具体利益的关系，也可以说，社会主义民主的根本保证，是共产党的领导。

其三，社会主义民主是民主和法制的统一。建设社会主义民主，必须同时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有人往往把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对立起来，认为法制限制人民的民主。这种观点在理论上是错误的。社会主义民主是社会主义法制的基础，是把广大人民群众享有的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权和支配权、把广大人民群众享有管理国家的最高权力上升为国家意志，使之法律化和制度化。社会主义法制是社会主义民主的保障，也就是说，只有把社会主义民主法律化和制度化，民主才有可能实现。谁要享受一定的民主和自由，谁就必须严格遵守法律和纪律，每个人都应按照法律来规范自己的行动。邓小平讲：“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①党的“十二大”通过的党章还明确规定：“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任何组织或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这是我们党关于党的领导与社会主义民主关系理论的一个重大发展。

^① 《邓小平文选》，第136页。

其四，社会主义民主是民主和专政的统一。对广大人民群众实行民主和对极少数敌对分子的专政，是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对人民内部实行民主，是对敌人实行专政的前提和基础，而对极少数敌对分子实行专政，是对人民实行民主的保障。我们强调建设社会主义民主，决不意味着否定专政。邓小平同志讲：“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决不是可以不要对敌视社会主义的势力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没有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就不可能保卫从而也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① 建设社会主义民主，必须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并正确处理我国现阶段一定范围内的阶级斗争。

其五，社会主义民主是最广泛的自我教育的有效方法。社会主义民主是广泛的民主，它不只限于政治生活领域，而且也包括经济生活领域，文化生活领域和其他社会生活领域的民主。在这些领域中实现和加强人民对这些领域的民主管理，既保证人民的政治权利，又保证人民的经济权利和社会权利，社会主义民主才能得到全面的实现。

社会主义民主是人民群众进行自我教育的有效方法。在人民内部运用民主的方法，开展讨论，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解决相互间的矛盾，纠正错误的思想，宣传正确的思想，提高人民的政治觉悟，是走向高度民主的条件和表现。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对社会主义民主的认识提高到了一个更加新的历史阶段。邓小平同志讲：“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② 这就把社会主义民主提高到了战略地位的高度。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都要靠继续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来保障和支持。只有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才能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才能保证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

①② 《邓小平文选》，第155、154页。

第四节 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既是历史唯物主义，也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从社会主义的历史和现实出发，把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作为一个根本任务和根本目标，提到了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

一、精神文明的科学含义

党的十二大报告中指出：所谓文明，是指人类社会进步的一种状态，是人类改造客观世界的成果。客观世界包括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改造自然界的物质成果，就是物质文明，它表现为人们物质生产的进步和物质生活的改善。改造社会的成果，是新的生产关系和新的社会制度的建立以及发展。精神文明，是指人们在改造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这种客观世界的同时，自己的主观世界也得到了改造，社会的精神生产和精神生活也得到了发展，它表现为教育、科学、文化知识的发达和思想、政治、道德水平的提高。一切文明社会都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有机统一。社会的改造，社会的进步，最终都表现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这样，从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来阐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概念，从而达到了规范化、科学化的高度。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根据摩尔根《古代社会》的历史分期法，把人类社会的发展分为三个主要时代：蒙昧时代、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而在此之前，人们虽然制造了石斧、弓箭，甚至学会了经营畜牧业，都不能称为文明时代。“文明时代是学会对天然产物进一步加工时期，是真正的工业和艺术

产生的时期”，^① 当人们能够依靠自身改造世界的“造物”来维持其生存和发展时，开始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时，才“走到文明时代的门槛”^②。按恩格斯的说法，人类开始进入文明时代，是在精神生产从物质生产中分离出来之后才实现，文字的出现是人类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志。恩格斯明确指出：“奴隶制是古代世界所固有的第一个剥削形式；继之而来的是中世纪的农奴制和近代的雇佣劳动制。这就是文明时代的三大时期所特有的三大奴役形式”^③。马克思也说过：“没有对抗就没有进步。这是文明直到今天所遵循的规律”。^④ 由此可见，他们认为，文明时代的基础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剥削。在阶级对抗的社会中，文明也是不断发展的，但是，文明的发展总有很大的局限性。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由于消灭了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才能得到充分的发展。正如列宁讲：“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才能够达到而且真正达到了高度的文明”^⑤。由此可见，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在谈到文明和文明发展史时，是强调同阶级斗争发展史联系在一起的。而党中央在“十二大”报告中，在论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时，是把文明同人们改造主观和客观世界连在一起的，是和一定的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相联系的。人类社会的发展史，也就是文明产生、发展的历史，一定的文明发展程度，反映着人类社会历史的进步程度。

总之，文明是人类在改造世界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称；它是人们观察和分析社会现象、社会生活的一个基本概念，是指人类社会进步的程度和状态。

二、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的辩证关系

“十二大”报告中指出：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在社会主义建设

①②③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3、161、172、104页。

⑤ 《列宁全集》第30卷，第374页。

中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物质文明建设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不可缺少的基础，精神文明对物质文明的建设起推动作用和保证它的发展方向。两个文明的建设既互为条件，又互为目的。

物质文明是精神文明的基础和源泉。物质生产活动是一切社会活动的物质前提，一切精神活动，都需要一定的物质设备和手段。在任何一个历史时期文化科学事业的发展，从根本上说，都离不开物质文明的存在和发展。作为精神文明的文化建设方面的内容，是人们在改造客观世界的物质生产活动中，总结出来的科学知识；人们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人们的主观世界、认识能力才得到改造，人们的道德观念才得到不断的进步。历史证明，精神文明的发展，依赖于物质文明的存在和发展。

精神文明的发展是物质文明发展的保障。精神文明为物质文明的发展提供理论指导，是物质文明发展的精神动力。物质文明不是单纯体力活动创造的，而是人类智力的“物化”，任何社会中物质文明的创造，离开精神文明发展这个条件，是难以进行的。文化科学知识可以提高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人类的生存环境和物质生活条件，从古至今发生了巨大变化，都是人类劳动创造的，是人类知识力量发展的体现。社会科学的发展，人类道德观念的提高，特别是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教育，可以提高人们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可以激发人们建设物质文明的革命热情，可以促进新型的人际关系的形式和发展，强有力地推动物质文明的发展。

两个文明建设是互为目的的。人们在社会生活中，不仅有物质利益的需要，同时也有精神利益的追求。社会越向前发展，人们对精神利益的追求越强烈。人们从事物质文明建设的目的是为了增加社会的物质财富和改善人们的物质生活，同时也是为了满足和提高人们的精神生活的要求。人们从事精神文明建设的目的，在于增加社会精神财富，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同时也为了

促进物质文明的发展，不断满足和提高对物质利益的追求。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是从不同方面去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造就一代又一代的具有先进思想的新人，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

两个文明又是互相渗透，互相转化的。物质文明是精神文明的物化，而精神文明是物质文明的结晶。物质文明的发展，可以转化为精神文明。如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不仅推进了现代科学文化事业的大发展，也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产生和发展。精神文明建设可以转化为物质文明前进的动力。精神文明中的科学文化知识，可以直接转化为生产力，成为物质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精神文明中思想建设部分，可以间接转化为生产力。如人们的道德观念的提高，组织纪律的加强，主人翁劳动态度的发扬，就有助于生产更多更好的物质财富。

两个文明的发展具有不平衡性。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从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来看，是同时产生，相伴发展的，是互相平衡，互相适应的。但是，对此也不能机械的理解。从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地区来看，它们的发展往往是不同步的，常常会出现不平衡的状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是从平衡到不平衡，又从不平衡到新的平衡，循环往复的前进运动。

从历史和现实来分析，物质生产力相对落后的国家或地区，精神文明的某些方面，发展得比较快，水平也比较高；而物质文明比较发达的国家或地区，精神文明的某些方面却比较落后。所以会出现这种状况，是由于精神文明内容结构的复杂性和社会意识相对独立性的特点决定的。精神文明是由文化建设和思想建设两个部分构成的。文化建设部分，如科学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是与生产力的发展状况直接相连的。一般来说，生产力发展水平比较高的国家或地区，科学文化比较发达。反之亦然。而思想建

设部分则不然，如思想道德观念等，虽然从根本上说，是以物质生产力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并不直接与生产力的发展相连，它是对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的反映，它要通过经济基础这个中介与生产力发生关系。所以，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或地区，只要经济关系和政治制度发生了变化，必然产生反映新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制度的社会意识形态。当代资本主义世界，物质文明的发展水平是相当高的，但是，只要资本家占有制没有改变，反映剥削制度的社会意识形态，从根本上不会发生改变。对此，马克思曾经明确说过：“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①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发展不平衡性原理说明，在我们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如同社会主义革命可以在生产力较落后的国家里取得胜利一样，也一定会成功的。有的人认为，物质文明不发达，就谈不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等将来物质文明发展了，精神文明就自然而然地上去了。这种观点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

三、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在建设高度的物质文明的同时，还要努力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这对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不仅可以为物质文明建设的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更重要的是可以保证物质文明建设的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列宁在谈到俄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指出：工人阶级一方面要学习做组织工作，建设大工业和城市生活；另一方面要学习“全部社会主义文化和文明”，否则，“就不能实际着手组织社会主义新社会。”^①这就是说，只有“文化和文明”具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4页。

有了社会主义性质，才能建立社会主义性质的新社会，才能保证现代化建设的社会主义方向。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为什么能保证现代化建设的社会主义方向呢？这是因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其核心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斯大林说：科学社会主义是一门“关于社会、社会发展规律、无产阶级革命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发展规律以及共产主义胜利的科学。”^②学习和掌握这门科学，我们在经济建设中才有正确的方向，而不致于陷入盲目状态，才能抵制各种腐化因素的侵袭，不致仅仅限于物质利益的追求，而忘却了社会主义理想和目标。

进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首先要明确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处理好精神文明建设与经济建设和体制改革的关系。《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指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定不移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并且使这几个方面互相配合，互相促进。”这个“总体布局”是我们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经验的总结。我们要从这个总体布局的高度，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一切着眼于建设”。社会生产发展了，经济理顺了，思想才能理顺。思想问题，不能单靠思想来解决，思想问题的解决，归根结底要靠经济的发展。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

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对人们要进行共产主义理想的教育。

① 《纪念雅·米·斯维德洛夫》，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第127页。

② 《斯大林文选》（1934—1952），第247页。

共产主义是一种新的社会制度，同时又是一种科学的世界观。人类社会走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是走历史必然要走的道路。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共产主义理想都是我们共产党人和先进分子的力量源泉和精神支柱。丢掉了这个最高理想，也就会失掉这种力量和精神支柱，就有可能发生种种迷失方向的危险。

但是，到达共产主义社会，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拿中国革命来讲，我们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在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就是现阶段我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理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实现最高理想的必经阶段。对于我们共产党人来说，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奋斗，也就是为党的最高理想而奋斗。如果在这个现实斗争中不忠诚、不热情，那就是有意无意地背离党的最高理想，就不是一个自觉的共产主义者。我们的共产主义理想不是空洞的口号，当前，要把全国各民族的共同理想同各行业的发展目标和建设任务结合起来，同各自的岗位职责和人生追求结合起来，立志建设，艰苦奋斗，脚踏实地干事业。

在道德教育方面也如此。共产主义道德是人类的最高尚的道德，但是，共产主义道德教育，也不能脱离现实，要照顾到多数人的实际思想水平，不要苛求每个社会成员都是共产主义战士。在当前要注意对人们进行社会主义道德的教育。教育人们向善、向真、向美、尊重人、关心人。社会主义道德的基本要求，是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使“五爱”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体现出来，在同志间，在民族间，在家庭内部和邻里间，在人民内部的一切相互关系上，建立和发展平等、互助的社会主义新型关系，引导不同觉悟程度的人们一起向上，形成凝聚亿万人民的强大精神力量。

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还应注意民主精神和法制观念的教育。高度的民主是社会主义的伟大目标之一，也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体现。“民主、平等、自由”是资产阶级为反对封建统治提出的口号。马克思主义的民主和自由，是对资产阶级的民主和自由的扬弃，与资产阶级的民主和自由有原则的区别。我们党在民主革命时期，也是把争取民主作为人民大众争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口号。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民主问题有深刻的发挥。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我们应十分注意这个问题。党中央在《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中明确指出：“我国社会主义发展中的主要历史教训，一是没有集中力量发展经济，二是没有切实建设民主政治”。这段话是很值得我们反思的。当然，民主精神与法制观念是不可分的。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要把民主精神和社会主义法制教育结合起来。正如《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中指出的：“不要社会主义民主的法制，决不是社会主义法制；不要社会主义法制的民主，决不是社会主义民主。”

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还要加强科学精神的教育。科学文化既是物质文明发展的重要条件，也是提高人民群众科学文化水平和思想道德觉悟水平等素质的重要条件。当今世界，科学越来越成为推动历史进步的革命力量，成为代表一个民族文明水平的重要标志。我们进行现代化建设，应当更加自觉地依靠科学，发扬尊重科学、追求知识的精神，努力在全民范围内扎扎实实地组织科学文化的普及和提高。

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是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杠杆。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还很低，还没有达到马克思所设想的高度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这样，势必要在相当长的历史时间内，存在着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形式，这就必须实行按劳分配为主的多种分配方式，发

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和竞争。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不单是个经济问题，生产力问题，同时也是个文化问题，文明问题。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是高文化经济，是文明程度较高的经济。人们从实践中越来越体会到，搞商品经济要按市场需求组织生产，不仅要知道产品的性能、质量、规格和货源情况，而且要了解消费者的心理及购买力的投向，还要清楚党的方针政策、法律、法令及其给市场带来的影响，等等。所有这些，如果没有文化，不懂科学技术，不懂得经营管理，不掌握市场信息，没有一定的法律知识，是搞不成的。所以，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必将促进社会生产力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进一步发展。

由此可见，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决定了它必须是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精神文明建设，必须是促进全面改革和实行对外开放的精神文明建设，必须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精神文明建设。这就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基本指导方针。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一切有利于建设四化，振兴中华，统一祖国的积极思想和精神；一切有利于民族团结，社会进步，人民幸福的积极思想和精神；一切用诚实劳动争取美好生活的积极思想和精神，都应当加以尊重，保护和发扬，进而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为实现全国各民族的共同理想而奋斗。

结 束 语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历史地位

我们把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基本内容，按照它的内在的逻辑体系，结合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实际问题，进行了阐述。从它的基本内容来分析，毛泽东哲学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经验的哲学概括，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无产阶级世界观和方法论。

毛泽东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继承和发展，它同马克思主义哲学同属于一个体系。毛泽东哲学思想作为完整而系统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极其丰富的内容。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这三个方面，是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是贯穿于毛泽东思想各个方面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因而也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根本内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革命实践中对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认识论、辩证法、自然辩证法和历史唯物论等一系列哲学理论上的丰富和发展，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大贡献。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运用于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各个领域，从而形成了党的建设的辩证法，统一战线的辩证法，军事辩证法，社会主义建设的辩证法，思想政治工作的辩证法，唯物辩证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等等，这些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革命和建设各个领域中的运用和展开，是对中国革命和建设辩证发展过程的总结和升华。所有这些构成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基本内容。

毛泽东哲学思想产生的历史条件，它所面临的历史任务，带有时代的新特点。因此，它除了具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般特点外，还具有独自的特点。就是说，毛泽东哲学思想是适应中国革命实践的需要，在中国革命中创造性运用和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它是具有中国作风、中国气魄、中国的民族形式和语言特点的群众化、大众化的哲学。它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同党内外错误思想进行斗争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的论敌主要不是以理论形态出现的社会上的唯心主义思潮，而是党内以主观主义为特征的实际工作中的唯心主义。因此，毛泽东哲学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运用于革命战争和建设，所形成的正确的思想路线和科学的思想方法。总之，毛泽东哲学思想具有革命性和科学性相统一的特点，这是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般特点相一致的。但是，从内容和形式上带有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基本特点。

毛泽东哲学思想是贯穿于毛泽东思想各个组成部分的灵魂，是联系各个部分的纽带。毛泽东思想包含着多方面的内容，比如，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关于革命军队的建设和军事战略的理论，关于政策和策略的理论，关于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的理论，关于党的建设理论等等。而所有这些理论中“一以贯之”的东西，就是毛泽东哲学思想，也就是说，所有这些理论都是运用毛泽东哲学思想分析和研究各个领域和各个方面所作出的科学结论，用统一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把它们联系起来，形成有机的整体。因此，在毛泽东思想体系中，最根本、最具有长远指导意义的是毛泽东哲学思想。毛泽东哲学思想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即作为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它过去是、现在和将来仍然是我们党的理论的哲学基础。我们要永远坚持，不断发展。

列宁讲：“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

现代所要求的東西，而是根据他們比他們的前輩提供了新的東西。”^① 自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诞生以来，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在他们各自所处的历史时代，为人类、特别是为无产阶级提供了比他们的前辈更多的东西。毛泽东哲学思想是20世纪继列宁主义之后的时代精神的精华，代表了历史发展的方向和主流，是新的社会实践经验的哲学概括和总结。因此，它在多方面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第一，从理论和实践高度结合上，充分发挥了“实践的唯物主义”。

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在批判公开的，并具有理论形态的唯心论和形而上学中，创立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而且他们的批判主要是联系当时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成果来进行的。而毛泽东所处的时代，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和自然科学的发展，在共产党内和工人运动中，唯心论和形而上学以公开的方式来对抗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不太可能了。它们往往以隐蔽的或以合法的方式来同唯物论和辩证法作斗争，并且这种斗争，已经不仅限于理论领域，而且已经深入无产阶级政党的实践活动中，因此，问题已不在于在理论上或口头上承认马克思主义哲学，而主要是在实践上能不能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不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考虑中国的革命和建设问题。所以，毛泽东特别强调在革命实践活动中坚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反对主观主义，唯心主义思想路线。他明确提出，主观主义是共产党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只有打倒主观主义，马列主义真理才能抬头，革命才能胜利。可以说，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一大特色，真正体现了马克思的“实践的唯物主义”。

① 《列宁全集》第2卷，第150页。

第二，从认识论和辩证法的一致上，系统论证和发挥了以实践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

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创始人，他们在实践和认识一致问题上曾经提出一些重要的和基本的观点，但未做出深入而系统的阐述。列宁时代，认识论已成为唯物论与唯心论斗争的焦点。列宁为了捍卫马克思主义哲学，同形形色色唯心主义进行了论战，明确提出“生活、实践的观点，应该是认识论的首先的和基本的观点”，并创造性地提出了“辩证法就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著名论断，等等。但是，由于面临的论敌主要是唯心论的哲学倾向，因而他的主要注意力放在捍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反映论上，而对实践是认识的基础，认识发展的辩证途径，未来得及从完整的理论形态上加以系统地论述。毛泽东结合党内斗争的实际，他在《实践论》中，抓住认识和实践这对矛盾，突出实践第一的观点，对“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进行了系统地论述，揭示了认识运动的总规律，建国后，他又深刻地阐明了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的认识辩证法，从而系统而完整地论述和发展了以实践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

第三，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结合的高度上，集中地论述了以矛盾规律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

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他们研究了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区别，指出了唯物辩证法的研究对象，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观点和本质特征，提出了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和基本范畴的普遍性及客观性。为了通俗地讲解辩证法，1858年1月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一封信中曾说：如果有机会，他打算写一本“使一般人都能理解”的辩证法专著。^①马克思这个愿望虽然没有实现，但是他们把辩证法与唯物论统一起来，把辩证法奠定在唯物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250页。

主义基础上，使辩证法成为科学的世界观，在哲学史上引起了巨大的革命。

列宁所处的时代，世界各种矛盾全面激化，整个世界处于大动荡、大转化时期。列宁在新的实践基础上，系统地研究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深入地分析研究了黑格尔等人的哲学，进一步总结了自然、社会和思维的运动规律，把辩证法应用于认识论，指明了主观辩证法和客观辩证法的关系。他说：“可以把辩证法简要地确定为关于对立面的统一的学说。这样就会抓住辩证法的核心，可是这需要说明和发挥。”^① 根据列宁的《哲学笔记》来看，他有一个写作辩证法专著的宏伟计划，但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和领导十月革命的繁重工作，致使《哲学笔记》成为列宁未完成的辩证法论著的宝贵遗产。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处于矛盾错综复杂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这种客观矛盾的存在和发展，就决定了矛盾学说在毛泽东哲学思想中占有极端重要的地位。毛泽东的《矛盾论》，就是为了实践的需要而写成的，是列宁《哲学笔记》中辩证法思想的直接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第一部系统地阐述以对立统一规律为核心的辩证法专著。当中国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坚持用对立统一规律的理论，观察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中的新问题，提出了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伟大理论。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的长期斗争中，善于把辩证法运用于实际工作，使辩证法广泛普及于群众之中，成为群众手中的尖锐武器。社会实践表明，毛泽东不仅是一个杰出的唯物辩证法的理论家，而且也是一个杰出的唯物辩证法的实践家。

第四，从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的统一上，着重阐明了以社会基本矛盾为主题的历史唯物论。

^① 《列宁全集》第38卷，第240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唯物史观的奠基人。列宁称马克思把唯物主义运用于人类社会生活，是“彻底发挥唯物主义”，是对以往历史理论的革命。但是，他们是着重阐明唯物史观在历史科学中的作用，着重于经济研究，着重于经济生活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这是他们所面临的反对历史唯心论的任务决定的。对此，恩格斯曾明确指出：“当时是应当这样做的”^①。到了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日益滋长起来，他们否定上层建筑的反作用，鼓吹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也有的人把唯物史观关于经济的决定作用歪曲为“经济唯物主义”，“经济决定论”。这时，恩格斯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关系作了论证，反对了唯心论和形而上学。列宁也十分重视把辩证唯物主义运用于社会历史和社会生活，丰富和发展了历史唯物论。

毛泽东继承和发挥了马克思、恩格斯及列宁的思想。他在《矛盾论》中，深刻批判了否认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等矛盾的双方，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的机械唯物论观点。这是对唯物史观思想的深化，明显地反映了毛泽东唯物史观的特点。毛泽东运用这种唯物史观，剖析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和特点，揭示了中国社会基本矛盾的发展规律，提出了独创性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完整理论。在社会主义时期，他又运用唯物史观，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性质和特点，探索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学说，创立了两类社会矛盾的理论，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谱写了新的篇章。

第五，致力于哲学的解放，指明了哲学要成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

马克思说过：“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00页。

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① 列宁评价马克思主义哲学时说：“它把伟大的认识工具给了人类，特别是给了工人阶级。”^② 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普及到群众中去，是马克思和列宁的一个重要思想。毛泽东毕生致力于哲学的解放，强调哲学的群众化。他号召把哲学从书本上和课堂里解放出来，变为广大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提倡在实际工作中讲哲学，用哲学。毛泽东不仅这样说，而且也是这样做的。他打破了哲学的神秘性，他的哲学著作深入浅出，通俗易懂，为群众喜闻乐见，从内容和形式都真正是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哲学。

毛泽东哲学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是多方面的。比如，在辩证自然观方面，着重指出了物质的内部矛盾性和无限可分性；在军事理论方面，形成了完整的马克思主义军事辩证法体系等等。这些问题，我们已有专章进行论述，这里不再重复。

毛泽东哲学思想不仅指导中国的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伟大胜利，它还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理论指南。党中央反复强调学习毛泽东哲学思想和毛泽东的哲学著作。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决议》指出：“这不但因为历史不能割断，如果不了解过去，就会妨碍我们对当前问题的了解；而且因为这些著作中包含的许多基本原理、原则和科学方法，是有普遍意义的，现在和今后对我们都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③ 邓小平也指出：“建议中央提倡学习，主要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重点是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哲学著作。”^④

恩格斯说过：“社会主义自从成为科学以来，就要求人们把它当做科学看待。”^⑤ 毛泽东哲学思想是发展的科学，我们也必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5页。

② 《列宁选集》第2卷，第443页。

③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④ 《邓小平文选》，第267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01页。

须用科学的态度对待它。所谓科学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也就是说，要学习它、运用它，既坚持，又发展。不坚持它的科学原理，就会走到邪路上去；不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发展它，也就不可能更好地坚持它。在坚持中发展，在发展中坚持，这是辩证的统一。为此，我们要反对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形而上学和教条主义的倾向，把毛泽东哲学思想任意拔高，对毛泽东哲学思想只是照抄照搬照转；另一种是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科学价值持怀疑的态度，把毛泽东哲学思想任意贬低，以毛泽东晚年犯了错误为借口，企图否定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科学真理，否定它对我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作用。实事求是地直气壮地肯定毛泽东哲学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的历史地位和它对中国革命及建设的伟大指导作用，这是我们学习、研究和宣传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前提。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毛泽东哲学思想教程 _ 1 9 8 9 _ 宋一秀 _ c _ _
作者 =
页数 = 4 7 3
S S 号 =
D X 号 =
出版日期 =
出版社 =

书名	
前言	
目录	
编者说明	
总论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
第一节	实事求是与中国革命
	一 “实事求是” 涵义的新的科学规定
	二 坚持还是背离实事求是，是中国革命和建设兴衰成败的关键
第二节	实事求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根本点
	一 实事求是与哲学基本问题
	二 实事求是与实践唯物论
	三 实事求是与矛盾辩证法
	四 实事求是与科学认识论
	五 实事求是与群众路线、独立自主
第三节	实事求是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的核心
	一 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基本方面的内在联系
	二 只有坚持实事求是，才能勇于坚持真理
第一章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第一节	毛泽东哲学思想产生的客观条件
	一 毛泽东哲学思想产生的时代特点
	二 毛泽东哲学思想产生的阶级基础
	三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理论来源
第二节	毛泽东哲学思想产生的主观条件
	一 毛泽东在第一师范时期的哲学思想
	二 青年毛泽东世界观的转变
	三 毛泽东世界观转变过程的基本特点
第三节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历史发展
	一 毛泽东哲学思想在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从萌芽、形成到系统化
	二 毛泽东哲学思想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丰富和全面发展
	三 毛泽东哲学思想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初期的进一步发展
	四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曲折发展
	五 毛泽东哲学思想在新时期的运用和发展
第二章	主观和客观相符合
第一节	一切从实际出发
	一 一切从实际出发，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唯物论的基石
	二 客观实际，是存在于头脑以外的一切事物
	三 一切从实际出发，就是要从中国的国情出发
第二节	坚持调查研究
	一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二 调查研究必须有正确的态度和科学的方法
	三 时时了解社会情况，时时进行社会调查
第三节	发扬自觉的能动性

		一	自觉能动性是人类独有的特点
		二	自觉能动性和客观规律性
		三	自觉能动性在一定条件下的主要的决定的作用
		四	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为发扬自觉能动性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第四节		反对主观主义
		一	主观主义是实际工作中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表现形态
		二	主观主义是一种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
		三	反对主观主义是一项长期的任务
第三章	认识和实践相统一		
	第一节		实践是认识的基础
		一	实践的科学含义和基本特点
		二	实践的基本形式及其相互关系
		三	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四	从实践论的观点，阐明了天才问题的理论
	第二节		认识的辩证过程
		一	认识过程的两次飞跃
		二	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
		三	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
	第三节		通过实践发现，证实和发展真理
		一	在实践中不断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
		二	真理同谬误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
		三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四	改造主观世界同改造客观世界的关系
第四章	矛盾普遍性与矛盾特殊性相联结		
	第一节		唯物辩证法的核心与矛盾的普遍性
		一	矛盾规律是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
		二	坚持矛盾的普遍性，发扬彻底的辩证法
	第二节		矛盾特殊性理论的系统阐发
		一	矛盾特殊性的学说
		二	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的理论
	第三节		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事物矛盾问题的精髓
		一	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辩证关系
		二	关于事物矛盾问题的精髓
第五章	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相结合		
	第一节		矛盾的根本属性
		二	矛盾的斗争性
		三	一切事物矛盾关系的实质
	第二节		矛盾运动的内在机制
		一	同一性的有条件性
		二	斗争性的无条件性
		三	一切事物矛盾运动的源泉
第六章	唯物辩证的范畴论		
	第一节		范畴的综合性特征
		一	什么是范畴的综合性特征

		二	范畴的综合性特征的客观依据
		三	范畴综合性特征的意义
	第二节		范畴之间的内在联系
		一	本质是一个最根本的核心范畴
		二	范畴是以本质为中心的相互联系的系统
		三	坚持范畴内在联系的意义
	第三节		范畴的成对系列
		一	本质与现象
		二	主流与支流
		三	内容与形式
		四	可能与现实
		五	必然与自由
第七章			唯物辩证的自然观
	第一节		自然界的辩证发展
		一	自然界一切都在运动变化发展中
		二	自然界的存在和发展是对立统一的
		三	自然界物质的无限性和无限可分性
	第二节		自然科学的辩证发展
		一	自然科学同生产实践的关系
		二	自然科学同阶级斗争的关系
		三	自然科学同哲学的关系
		四	我国自然科学发展的方针和道路
第八章			唯物辩证的工作方法论
	第一节		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体
		一	世界观和方法论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二	提高领导艺术，讲究工作方法
	第二节		分析和综合相结合的方法
		一	分析和综合必须是客观的、全面的
		二	分析与综合相结合的具体方法
	第三节		一般和个别相结合的方法
		一	一般和个别相结合与党的群众路线
		二	一般与个别相结合的具体方法
	第四节		民主和集中相结合的方法
		一	民主和集中及其关系
		二	民主和集中相结合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
		三	实现民主和集中相结合的方法
	第五节		统一性和独立性相结合的方法
		一	统一性和独立性及其关系
		二	统一性和独立性相结合与独立自主原则
		三	统一性和独立性相结合的具体方针、方法
第九章			社会基本矛盾和两类社会矛盾
	第一节		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
		一	社会基本矛盾理论的历史发展
		二	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内容和特点
		三	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解决方法

	第二节	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
	一	社会主义社会两类社会矛盾理论的提出和发展
	二	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我国政治生活的主题
	三	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方针和方法
	第三节	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
	一	社会主义社会在一定范围内还存在着阶级斗争
	二	两类社会矛盾和阶级斗争
	三	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特点
第十章	领导与群众相结合	
	第一节	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一	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
	二	群众观点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
	三	正确把握领袖和群众的辩证关系
	第二节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一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正确依靠和领导群众的
科学方法		
	二	坚持群众路线，必须采用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的
方法		
	三	民主集中制是保证正确依靠和领导群众的有效手段
	四	把群众路线与群众运动区别开来
	第三节	共产党的路线，就是人民的路线
	一	实行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具体方法
	二	坚持领导和群众相结合，必须反对不正之风
	三	坚持领导和群众相结合，必须反对官僚主义
第十一章	党的建设的辩证法	
	第一节	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
	一	党的思想建设
	二	党的组织建设
	三	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的关系
	第二节	党内团结和党内斗争
	一	党内团结和党内斗争的辩证统一
	二	开展两条战线斗争，防止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
	三	对犯错误的同志应采取分析态度
	第三节	党内矛盾的根源和实质
	一	党内矛盾的根源
	二	党内矛盾的实质
第十二章	统一战线的辩证法	
	第一节	社会的主要矛盾与统一战线中各种社会势力的相互关系
	一	社会主要矛盾决定着统一战线的任务和内部结构
	二	一条战线，两种联盟
	三	一个目标，民族团结
	四	一党领导，多党合作
	五	一个国家，两种制度
	第二节	统一战线的策略原则的辩证法
	一	又联合又斗争的原则

	二	既统一又独立的原则
	三	具体分析、区别对待的原则
第十三章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辩证法
第一节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与客观经济规律
	一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必须从中国国情出发
	二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必须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
第二节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与各种经济关系
	一	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
	二	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
	三	国家、集体和个人
	四	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
	五	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
第三节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与人的主观因素
	一	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
	二	自力更生和学习外国
	三	革命精神和科学态度
第十四章		思想政治工作的辩证法
第一节		破和立的统一
	一	先破后立
	二	先立后破
	三	破和立的统一
第二节		政治和经济的统一
	一	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
	二	思想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
	三	政治和经济的统一
第三节		红与专的统一
	一	红与专的科学含义
	二	红与专的统一
	三	又红又专——知识分子成长的必由之路
第四节		理想教育要科学化和具体化
	一	理想是现实与未来的统一
	二	用科学方法向人们灌输马克思主义理论是理想教育的一
条重要原则		
	三	关心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理想教育工作的出发点
第十五章		军事辩证法
第一节		唯物辩证的战争观
	一	战争与政治
	二	战争与革命
	三	战争与经济
第二节		战争的客观规律性和人的自觉能动性
	一	研究战争规律要着眼其特点和发展
	二	战争的主观指导要符合于客观实际
	三	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是人不是物
	四	主动性、灵活性和计划性
第三节		人民战争战略战术的辩证法

	一	全局与局部
	二	进攻与防御
	三	集中与分散
	四	持久与速决
	五	内线与外线
	六	游击战与正规战
	七	运动战与阵地战
	八	歼灭战与消耗战
第十六章		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贡献
第一节		周恩来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贡献
	一	注重调查研究，坚持实事求是
	二	在革命实践中运用辩证法，丰富辩证法思想
	三	坚持群众观点，密切联系群众
第二节		刘少奇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贡献
	一	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实践观
	二	反对实际工作中的唯心论和形而上学
	三	加强党的思想建设，注意共产党员的思想修养
	四	关于两类社会矛盾的学说
第三节		朱德对毛泽东军事辩证法的贡献
	一	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的用兵新法
	二	军事上辩证的“结合”方法
	三	民族的、人民的、民主的建军原则
第十七章		毛泽东哲学思想在新时期的运用和发展
第一节		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恢复和发展
	一	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
	二	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新发展
第二节		体制改革与社会基本矛盾
	一	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发展的客观要求
	二	深入开展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
	三	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的新发展
第三节		建设社会主义民主
	一	社会主义民主的科学含义
	二	社会主义民主的基本特点
第四节		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一	精神文明的科学含义
	二	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的辩证关系
	三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结束语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历史地位